流離歲月

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Diana Lary

戴安娜·拉里——著　廖彥博——譯

時報出版

時報出版

歷史與現場 232

流離歲月

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戴安娜·拉里——著

廖彥博——譯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
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
這場戰爭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讓它成為革命的溫床。

——戴安娜·拉里 Diana Lary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聚焦八年抗日戰爭，其規模空前巨大且冗長，而日軍採高壓的戰略，大舉屠殺平民，與中國初期越挫越勇的民族性兩相衝突，使中國在物質與精神皆受到巨大的破壞，大批難民開始流亡。為了生存，個人、親族、社會的道德羈絆嚴重斷裂，相互背叛。作者重新審視這段時期，將戰爭放在社會變遷的中心位置，指出長期的動盪不安，對社會所形成的後遺效應，是難以估計的。

戴安娜教授從記憶研究、創傷理論的視角切入，站在抗日浩劫的中心處，凝視受苦難的人們，重新理解社會的變動和歷史的弔詭。她指出，不記得過往是有危險的，對過往的無知會帶來重蹈過去錯誤與暴行覆轍的危險。這同樣也意謂人們無法正視、承認過往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或是去糾正、補償這樣的損失。

回到八年抗戰，本書銘刻逐漸被人們遺忘的記憶，為人性的暗影，互信感的喪失做最強而有力的解釋與辯護。

時報悅讀網
ISBN 978-957-13-6476-6 (628.5)
BCB0232　NT$450

戴安娜·拉里

Diana Lary **作者**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著作等身，為民國史專家，同時也是桂系研究權威，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為最早的一本研究桂系之英文著作。她以數十年的時間投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此領域上有豐富的教學經歷。除《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外，還撰寫《社會史觀下的中國內戰》（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中國共和政體史》（China's Republic）等多部專書，為重要的民國史專家。

廖彥博

譯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曾經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撰稿，現從事著述、翻譯、近代史紀錄片及講座策畫。著有《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蔣氏家族生活祕史》、《個人旅行：西雅圖》、《愛新覺羅．玄燁：抹粉的聖君》、《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與白先勇合著）等；譯有《大清帝國的衰亡》、《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漫遊中古英格蘭》等書。

DESIGN **POULENC** poulenc.area@gmail.com

流離歲月

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Diana Lary

戴安娜·拉里——著　廖彥博——譯

本書獻給我最摯愛的母親連森夫人（M. M. E. Lainson），她在本書甫完稿時不幸辭世。

本書也獻給珍妮．喀爾德（Jenni Calder），我們從童年時就成為好友。我們一起在劍橋的佩斯（Perse）學校上拉丁文課，學到了《埃涅阿斯紀》（Aeneid）裡的一句話「諸事堪落淚」（*lacrimae rerum*，翻成英文為 the tears of things）。這些淚水既是為了戰爭帶來的哀傷與痛苦而流，也為它所造成的荒廢與虛耗而流。

目錄

contents

前言 006

導讀 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白先勇 010

序章 戰爭的代價 019

第一章 戰事的高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041

第二章 失敗與撤退：一九三八年 089

第三章 僵持與轉變：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 141

第四章 陰鬱的年份：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 197

第五章 轉捩點：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 251

第六章 戰後初期歲月：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 287

第七章 抗戰的遺緒 327

卷尾語 357

前言

本書的寫作宗旨，是幫助我們理解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對中國社會所造成巨大而可怕的衝擊。本書盼望讀者能夠了解，這場戰爭不只是共產黨人於一九四九年席捲全中國的陰鬱序幕，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至關重大的關鍵事件之一。

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陰影底下長大。在我兩位祖母的生命裡，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影響壓倒一切。祖母梅布爾・希姆斯（Mabel Symmes）在漫長的一生當中，都在哀悼她那於一九一七年復活節戰役中喪生的丈夫，當天還有將近四千名加拿大士兵戰死。外婆瑪格麗特・連森（Margaret Lainson）收藏了兩大本剪貼簿，上面貼滿了從《泰晤士報》（*Times*）剪下的三行死訊，這些在戰爭中陣亡的人，全都來自她的家鄉，英國薩福克郡（Suffolk）的小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的父母經歷的戰爭。我們的童年歲月和這場戰爭至為接近。我們生活世界裡的大人們，一直說起這場戰爭。我們在戰爭造成的物資短缺當中過生活，而我們也明白戰爭對於一個「戰勝國」所帶來的各種損失。我的母親連森女士教導我們，戰爭是如何的痛苦而徒勞無益。戰爭在西方造成的人命代價和成本，在中國的情況裡，還要放大許多倍。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使讀者能夠增進對於抗戰造成的創傷和英勇事蹟的了解。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得到很多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之外的朋友協助。在這群朋友之中，使我獲益最多的一位，是充滿熱情而且具備睿智洞見、來自紐約的瑪莎・卡羅爾（Martha Carroll）。她不但堅持認為我研究的主題十分重要，更以她的廣博的知識和見解，引領我離開原來相當狹窄的學術環境，開拓出更為廣闊的視野。

我要感謝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同事，他們在我撰寫這本書的多年期間，提供許多幫助。他們是：貝麗（Alison Bailey）、卜正民（Timothy Brook）、顧雄、劉靜、史蒂芬・李（Steven Lee）、曹星原、吳才德（Alexander Woodside）、以及袁家瑜（Eleanor Yuen）。

蘇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貝麗爾・威廉斯（Beryl Williams）在我研究二次大戰對於歐洲文學的影響和衝擊時惠予協助。我在抗戰研究群的同仁們則助我良多。在此我要感謝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Vogel）、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麥金農（Stephen Mackinnon）、北京的楊天石、以及東京的山田辰雄。我從前教過的學生，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他們是昆特倫理工大學（Kwantlen University College）的葛凜然（Colin Green），以及歐堪那岡學院（Okanagan College）的祝少康。目前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指導的學生，也協助我蒐集資料，他們分別是吳揚（Yang Wu）、魯大偉（David Luesink）、以及楊孟軒（Dominic Yang）。

我要在這裡感謝所有願意與我分享他們（或是他們的家人）戰時經歷的人士。他們分別是：陳志讓（Jerome Ch'en）、張溫妮（Winnie Chueng）、何吉卜（He Jibu）、山謬・何（Samuel

Ho）、洪卜仁、邢福瀛、蔣靜、林靖（Lin Jing）、居之芬、法蒂瑪・李（Fatima Lee）、陸鴻基（Bernard Luk）、利德蕙（Vivienne Poy）、楊天石、葉嘉瑩、以及余約翰（John Yu）。特別感謝陳志讓教授，他在我剛開始研習中國近代史的時候，就告訴我這場戰爭的創傷有多麼深重，而抗戰又在多麼龐大的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

本書的課題涉及多次實地研究考察的旅行。在此我要感謝實地考察研究期間，給予我幫助和接待的人們，他們分別是：北京的楊天石、布平（Bu Ping）、柯非普（Phil Calvert）、尚塔爾・馬爾（Chantal Meagher）、居之芬、珍娜・黎（Janet Lai）、齊文鑫、瑪姬與安德魯・華特森（Maggie and Andrew Watson）夫婦、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以及莊健平；上海的瑪麗・波伊德（Mary Boyd）、詹姆士・米契爾（James Mitchell）、藍斐；閩南地區的李明桓、王連茂、以及丁郁林（譯音）；香港的奚治月、鍾逸傑（David Jones）、紀昂尼・莫（Gianni Mok）、冼玉儀（Elizabeth Sinn）；渥太華的鄭藹玲（Denise Chong）和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以及台北的張瑞德和陳永發。

若不是加拿大社會科學暨人文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慷慨贊助經費，這些考察旅程都將無法實現。我運用下列的圖書館、檔案館所藏檔案史料，在此表達謝忱：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的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倫敦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慕尼黑的西門子檔案館（Siemens Archiv）、以及廈門大學圖書館。

最後，我要感謝三位小人兒為我帶來的快樂，我對他們有最深摯的愛，並且希望他們永遠也不要經歷戰爭。他們是我的孫子：梅布爾、傑克與米莎（Misha）。

導讀

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

白先勇

戴安娜（Diana Lary）教授是民國史專家，著作等身，近期的重要作品有《中國共和政體史》（*China's Republic*）、《社會史觀下的中國內戰》（*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等。戴安娜教授並且還是桂系研究權威。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乃最早的一本研究桂系之英文著作。這些著作皆由劍橋大學出版。

二〇一〇年出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係戴安娜教授的力作，這本書生動的刻劃出一幅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苦難深重的流離圖。令人讀後，深深感動。戴安娜教授如此形容這場異族侵華的大災難：

>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
>
> 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

的確，八年抗戰，這場二十世紀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戰爭，其規模之廣，從東北到西南兩廣，中國幾乎半壁江山盡落敵手；而時間之長，如果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算起，則是十四年之久，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的損失，根本難以用數字計算，估計有兩至三千萬人喪失生命，比整個台灣的人口還要多。國軍官兵的死亡達三百多萬人。人民財產的鉅大損失，已經無法列表，中國社會架構全面崩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國已經打得國困民貧，經濟上通貨膨脹失控，人民元氣大傷，這一場勝利可說是慘勝。

西方歷史學家書寫中國近代史，多側重在一九三七年抗戰以前，或者一九四九年中共崛起以後，中間抗戰八年，卻多所避諱。最近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抗戰史《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其命名可見一斑，中國如此慘烈的戰爭，西方學者卻選擇「遺忘」。即使如米德等人的著作，多從軍事、政治、外交方面來論述抗戰，至於當時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則著墨不多。

戴安娜教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則是一個例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戴安

娜教授分析這場戰爭當然保持她應有的客觀冷靜態度，但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更在於她能撇開戰爭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戰時中國社會的深層，接觸到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三千萬人的死亡，對她來說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研究數字，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血淋淋的大悲劇。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憐憫之心，替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記錄下他們的劫難如山的悲慘故事。

戴安娜教授這本著作的重要主題之一是由抗戰引發的社會變遷（social transformation），她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報導、回憶、文藝作品、電影、歌曲，其中有不少名人現身說法的回憶文章、小說詩歌，如學者費孝通、蔣夢麟、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根據當事人的自述，當時文藝作品及報導的反映，拼湊出一幅中國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戰亂流離圖，極富真實感及現場感。

中國歷史不乏戰亂遷徙，西晉東遷、北宋南渡，都是著名的動盪時代，但即使元朝蒙古人、清代滿洲人入主中原，也沒有像八年抗戰那樣觸發如此巨大的難民潮。戴安娜教授引述的各省逃難的民眾數據，相當驚人：全國總共九千五百多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六。重災區如河南、湖南、江蘇、山東，都有千萬人以上，占全省百分之四十多。日軍攻打中國，對中國人民採取殘暴恐怖政策，以達到鎮懾高壓、最後征服中國的目的。除了南京大屠殺，三十萬軍民喪命，其他各地的屠殺事件亦層出不窮，日軍姦淫擄掠，引起占領區的百姓極大恐慌，於是紛紛棄家出走，逃向西南後方，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逃亡潮。

以筆者家鄉廣西為例，日軍侵犯廣西兩次，一九三九年，日軍攻打桂南，時間尚短，並在崑崙關吃了一次大敗仗；第二次，一九四四年桂柳會戰，十一個月間，廣西軍民遭到重創，引起抗戰中最著名的一次逃難「湘桂大撤退」。廣西難民兩百五十多萬，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多。八年抗戰，廣西人民死亡二百一十萬，廣西官兵五十多萬為國犧牲。廣西遭受戰爭破壞之慘烈，筆者身歷其境。「湘桂大撤退」，筆者父母兩家八十餘人，由母親率領，倉皇登上最後一班火車，逃離桂林，火車頂上早已擠滿難民，桂林全城一片火海，國軍實施「焦土抗戰」，日軍進城前，所有建築、交通設施、物資，燬於一炬；五萬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四百七十餘家，我們家的兩處住宅，也片瓦無存。桂林保衛戰，日軍猛烈進攻，守軍不敵潰敗，殘餘桂軍最後拼死保衛家鄉，防守司令部參謀長陳濟桓、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呂旃蒙，均壯烈犧牲，第一三一師長闞維雍自殺。

日軍使用毒氣，各據點成千上百的守軍被毒氣窒息，殺死在巖洞中。普陀山七星岩裡，退入八百多最後抵抗的守軍，日軍施放瓦斯毒氣，以及噴火，八百多名中國官兵全數殉難，這是廣西版的「八百壯士」。筆者在桂林小學遠足，參觀鐘乳石林立的七星岩奇觀，璀璨瑰麗，彷若仙境，未料抗戰時，卻變成愛國壯士葬身的屍窟。廣西省境有四分之三、七十五個縣淪陷，受日軍踐踏近一年。

八年抗戰引發了中國難民大規模的流離遷徙，戴安娜教授認為，這場兵禍，徹底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根基，顛覆了中國社會的傳統架構。農村的家族制度原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力量，

因大量青年人口外逃流失而解體。城市因日軍無情轟炸，家屋毀於一旦，菁英分子，紛紛逃離，物質的破壞與精神的挫傷，中產階級的弱化，城市的家庭結構也瀕臨崩潰。戰亂對人民的創傷，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痛苦沮喪，難以形容，而對中國社會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戰後中國所謂的「舊社會」分崩瓦解，成為一片廢墟。戴安娜教授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戰後國民政府的虛弱及中國社會之動盪不安，正好給予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取得勝利。……

> 抗戰最具重要性的後果，就是導致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取得勝利。……
>
> 抗戰打得中國山窮水盡，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自信、強悍、冷酷無情的革命運動，搭好大展身手的舞台，最後接收整個國家。……
>
> 社會所遭受的傷害，以及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流離失所，都是讓中共壯大的養分。……

八年抗戰結束，中國人民並沒有嚐到勝利的果實，旋即國共內戰又起，戰亂再延續四年。人民厭戰心理，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艱苦，失業破產，造就大量失望幻滅的民眾：

> 他們的夢想與事業企圖心，都因為抗戰而遭到摧毀。他們正在找尋一個新社會、一個很可能是經由革命而造就的新社會。……

最後戴安娜教授引述夏志清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段話，形容當時失望幻滅的中國人民：

> 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又貪汙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

對於中國抵抗日軍侵略的八年抗戰，戴安娜教授抱持「同情的了解」之態度。她清楚國軍與日軍相比，軍備、訓練、各方面皆有天壤之別，日軍有備而來，國軍倉促上陣，客觀上這場戰爭似乎勝敗已定，難怪日軍口出狂言，三個月要解決中國的戰事。當時世界各國也不看好中國，可是戴安娜教授指出來，日本卻忽略了中國一股隱形的強大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精神。她用英文 endurance 一詞，指明中國傳統的民族精神。如岳飛〈滿江紅〉還我河山的氣概，結合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股現代的愛國熱情，築成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血肉長城，也正是當時響徹全國、〈義勇軍進行曲〉振奮人心的歌聲中傳達出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戴安娜教授稱讚抗戰頭幾年中國軍民抵死抗敵的勇氣與犧牲精神，如張自忠將軍壯烈成

仁。但她也惋惜經過長期抗戰，中國軍民人困馬乏，軍心漸漸渙散，失去前期奮勇高昂的士氣。人民因為不知戰爭何時了結，看不到未來，也逐漸失望幻滅。她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一些造成災害的措施，亦提出公平嚴正的批評，如一九三八年的「長沙大火」，造成人民財產巨大損失，與河南花園口黃河決堤相提並論。

抗戰最後一兩年，國軍幾乎支撐不住。不過這時日軍亦是強弩之末，太平洋戰爭，節節失利，最後本土吃了兩顆原子彈而結束戰爭。

戴安娜教授在結論中指出，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八年抗戰對中國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國民黨政府失去江山，共產黨奪得政權，都是這場戰爭種下的惡果，而且影響深遠。她甚至發人深省的指出：

> 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
>
> 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譯者廖彥博乃青年歷史學者，曾譯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名著《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並撰寫抗戰史《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廖彥博譯筆流暢精確，頗能掌握原作者之語調態度，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歷史譯作。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序章

戰爭的代價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1]。實際上，整個國家都被戰爭所吞噬了。中國所有的大城市全部遭到占領，東半部、東北和許多東南國土也淪於敵手。國民政府被迫遷入內陸。幾乎每個家庭和社群都遭受戰火波及。數千萬人民逃亡。約有二到三千萬的軍民，在這場戰爭當中失去生命。

這場戰爭是一八四〇年代隨著鴉片戰爭開始的一連串外患欺凌的最後一役。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的**中心主題**，就是外國侵略所帶來的傷害與不義業已結束，中國在長期遭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羞辱之後，已經獲得尊重，並且恢復她應有的國際地位。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相遇，始於西方的侵略，但是在約莫一個世紀以後，日本人的入侵與占領則是目前為止，中國近代史上程度最為慘烈的外敵攻擊。最後這場為害最烈的外侮，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來自一個亞洲國家，而這個國家，從前還屬於中國長期支配的版圖之一。

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在他的文章〈戰爭與戰略問題〉裡，發表了一段最為有名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聲明。這句話時常和毛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鬥爭之中掀起革命的鬥志連繫在一起，不過在毛寫下這句話的當時，敵人是日本，鬥爭的目標是反抗外侮。中共在抗戰中逐漸茁

壯，到了戰爭結束時，已有能力挑戰國民黨的江山。抗戰的猛烈與混亂，是中共後來奪取天下的推動力量——到內戰（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結束之時，他們的確靠著槍桿子，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戰爭都是殘暴、帶有毀滅性質，而且難以預測的。它們難以使用冷靜而善於分析的筆觸加以書寫，因為戰爭既無法控制，也不合理。戰爭引發暴力和毀滅，造就英勇事蹟和壯烈的犧牲，它促成的是激情洋溢之舉，而不是冷靜思考後所做出的舉措。

戰爭難以清晰明白的分析，這些時期是歷史上混亂和困惑的階段。它們的結果鮮少能夠事先預料，或是做下結論。許多歷史學者因此迴避在戰爭上頭著眼，將相關的議題留給軍事專家去書寫。這樣的迴避，在西方關於近代中國的論著作品當中，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也就是通常會跳過八年抗戰及其後的國共內戰，將討論的時間斷限結束在一九三七年，或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說起。

在中國，抗戰的重要性已經廣泛被人們所接受了。這場戰爭的諸多細節，被史書、小說、電影和回憶錄鉅細靡遺的轉錄記載。對於抗戰有多種詮釋，不過當中都抱持著一種共同的見解：這場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關鍵轉捩點。這個轉捩點的性質，很明顯是政治上的。中共及其軍隊在這場對抗日本的戰役之中，學會了如何進行戰爭，而且贏得了因為抗戰而遭徹底改變、殘破不堪的社會人心。這場戰爭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讓它成為革命的溫床。

戰爭與社會

戰爭是社會史研究的分隔線。我們使用「大戰前」（pre-war）、「南北戰爭前」（ante bellum）和「戰後」（post-war）這些措詞來看待歐洲或美國的歷史，這正是承認戰爭在社會當中所產生的重大改變。戰爭通常是敲響舊有社會秩序的喪鐘，也是接生新社會秩序的冷酷產婦。這個過程並不是依照事前計畫妥當，或者在有條不紊的政治或意識形態藍圖當中誕生的。戰爭的特徵正是混亂。戰爭破壞社會結構，使得社會凝聚力喪失，而看來在承平時期可靠並能抗拒改變的制度與習俗，也隨之瓦解。

有些強而有力的論點，則站在與上述相反的立場——社會變革的重大過程，也許會受到戰爭的干擾，卻不會因為戰爭而改變原來的方向；這也就是說，戰爭並未對社會造成重大的改變，社會的根基太過堅韌，不是戰爭所能夠撼動的。抱持這種見解的人，相信中國在本質上，從遠古以來從未改變過。另一個反對戰爭為社會帶來改變的看法，則認為改變是一種長期、緩慢的進程。傑出的中國史學者杜贊奇（Prasanjit Duara）寫道，在近代中國，「戰爭就像天然災害，聲勢相當驚人，不過效果則甚為短暫。」[2]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發現，要讓中國和任何其它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總體戰爭裡度過好多年歲月的國家接受上述這些觀點，是困難的。這些社會在戰爭期間起了重大的改

變，而改變通常使人感到悚然一驚。像美國和加拿大這樣只派出子弟參戰、本土並沒有遭受侵略的社會，戰爭的經驗較不那麼混亂動盪，但是仍然屬於變革的過程。

舊社會

在抗戰之前，中國社會就已有部分正在經歷快速的變化。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的覆滅、中華民國的建立、外國的入侵、工業的發展，以及現代運輸和交通方式的產生，儘管影響的速度和層級，還有影響的地區各有不同，卻全都開始對社會發生重大的衝擊。社會變遷在東部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相當快速，在其他地方則緩慢得多。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鴻溝正在快速拉開。傳統社會在農村地方根深蒂固，但是在中國的已開發區域則趨於沒落。在那裡，舊社會理想的大家庭「四世同堂」共居，正讓位給現代概念下組成的小家庭；而在多數人口聚居的鄉村地方，原有的社會典範——宗族／親族組織、與祖先的密切聯結、對年長者的尊敬、對於憑媒妁之言安排的婚配和對一夫多妻習俗的接受、以及女性的附屬地位——只發生些微的改變。對鄉間仕紳菁英的敬重占優勢地位，只不過，在這種尊重的基礎裡，原先對傳統教育資格的尊重，現在要少於對其經濟權力的敬服。

這些變化開始萌生，是否意味著即便在農村地區，舊社會也趨向破滅？在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具備現代觀念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激進人士，對於社會舊有秩序有相當多的抨擊，讓許多人相信上述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農村產生了全面性的危機，只有終結舊有秩序的革命才能解

決這一危機。革命黨人相信舊秩序正在覆滅，他們急切的想要加快其死亡的速度。他們都是年輕人，自身也正和家裡的長輩所施加於其身上的壓迫和家長式的作風決裂。他們的政治革命，就起因自他們對於舊有社會秩序的極度厭惡。

他們當中有些人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進，後來成為革命中國的領袖人物。回首前塵，在他們早年的活動與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天下這二者之間，很容易看出一條直線性的連結來。但在實際上，這並不是一條康莊坦途。

在抗戰爆發前，中共處在窮鄉僻壤之地，他們對先前放棄的世界所保有的影響力，簡直是微不足道。在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手段激烈的革命失敗了。中共從他們在華南的最後幾個根據地裡被驅逐出去，被迫進行長征，逃往西北，才找到了一處立足之地。在一九三七年，中共想統治中國的希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在國民黨政府內外的開明改革者，也沒能實現激進的社會改革。官方對於改變社會的計畫，始終只是紙上談兵，很少能付諸實行。個別的改革人士例如在河北省定縣、山東省鄒平等地所付出的努力，相當令人欽佩，但是他們的成功僅只於局部一地。在國民黨定都南京後的十年統治期間，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政策，得以帶來真正的變革。

中國甫與日本全面作戰的時候，仍舊是一個大幅維持著傳統形態的社會，雖然有初具胚胎的改變跡象，但是當中很少有穩固的基礎。這場戰爭迫使社會改變。抗戰帶來戰鬥、轟炸和經濟崩潰，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使得舊社會分崩離析、天翻地覆。有些戰爭帶來的改變突然而急

遽，過程極為暴烈，以至於社會扭曲變形；其它的變化比較漸進平緩，但是卻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基本架構。

舊有的社會秩序無法回應日本的侵略。它看來既無效率，也難以適應時局。隨著戰事進行，人們對於舊秩序產生了廣泛的厭憎之情，這是一種背離的感覺。激進的解決手段在此時開始看似可行，從某種層面上來說，這在抗戰爆發之前，是難以想像的事。

社會崩壞

家破人亡

The family is destroyed, the people lost

社會崩壞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年輕男子在戰爭當中大量喪失性命。這個損失無可避免地大幅增加未婚女性與沒有孩子的寡婦的數量，並且很快地促使出生率下降。這是戰爭帶來的普遍影響。通常，隨著這種情況而來的，是戰爭結束之後補償性質的嬰兒潮；在大規模的死亡後，隨之而來的是出生率的揚升。

軍人死亡同時也造成孤兒和寡婦的數量大幅增加。在某些地方，女子的人數壓倒性的超過男性。寡婦必須學會獨立生活，並且靠自己的力量拉拔喪父的孩子長大成人；寡婦能再嫁的機會不高。只有極為貧窮的男性，才會以寡婦做他的結婚對象；要是這個寡婦還帶著她的公婆進

門，她就結不成婚了。

許多家庭和社群聚落則因為另一種型態的損失而崩解——戰爭而引發的流離失所。因為戰爭和轟炸，人們被迫逃離家園，而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很快又返回，卻也有其他人再也沒回來，或是在戰爭結束後數十年還沒有回家。當這些人真的歸來時，故鄉與家園已經面目全非。而在此同時，從社會、經濟還有情感的層面來看，這些人的家庭算是失去他們了。

在戰亂中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改變了家庭關係的組成模式，也改變了家庭經濟的構造。生存的嚴峻需求，強化父母與子女這層最接近的親情關係。父母拼命想要讓孩子們活下去，所付出的代價是將沒那麼重要的親屬棄之於不顧：自己的雙親、祖父母、叔伯舅舅、姑媽阿姨、堂表兄弟、外甥和姪女等。一個家庭在逃難的時候，很可能必須將老弱拋下。家庭規模的收縮，引來實質上真正核心家庭的產生。這種新模式招致了一種更為貧乏、單薄的家庭關係，這種關係只著重父母對子女強烈的愛。這樣的依賴關係，在寡婦獨力撫養她的孩子長大成人的情形裡尤為深刻；她一生中唯一在意的，就是她的孩子。

上述這些社會的崩解促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出現，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和戰前相比，幾乎已經面目全非。它同時也在結構上劇烈改變。

社會結構的改變

在有系統的社會變革論述之中，抗戰是一個黑洞。這場戰爭太過混亂、太過變幻不定，以至於沒有辦法收集資料，或是做出有條理的分析，以便討論社會正遭受到何種衝擊。抗戰後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接著又是社會主義革命。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都不可能對此從事科學性質的調查研究工作。然而，儘管談論這段混亂、困惑的時代是如此困難，還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某些變化的因素。

舊社會的菁英急劇的喪失其原來的地位。舊政府和社會菁英無能為力，難以保護他們的國家或鄉里，雖然這被歸因為**不可抗力的因素**，卻也能看作是一種徵兆，說明他們沒有能力適應時局，在面對日後看來難以避免的衝突時，也缺乏準備。他們或是逃往內陸，或是在敵占區裡和敵人合作，這看在人民眼中，戕傷了他們治理的正當性。在抗戰後，他們再也沒能恢復原來在戰前的地位。

同樣顯露得很清楚的，是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軍人的地位，在國共兩黨陣營裡都快速爬升。由於戰爭的需求，軍隊的需要被擺在人力資源最優先的位置——有些最富有才華的年輕人，也就此投身軍旅。伴隨原來科舉考試的停辦與舊時菁英晉升之階的結束，這種趨勢是晚清以來一直持續的進程；現在它被強化，並且持續不斷的鞏固其基礎。

從前曾經被人鄙夷的軍人，如今成為政治和軍事上的統治階層。與此同時，戰事的腳步取代了原來那個更加從容不迫的理想世界，武人，而不是受過教育的士大夫，躍居而為治理地方的統治菁英，於是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就愈發黯淡了。舊日那些由文官和文人們牢牢掌握的官僚集團，如今已不復存在。

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別均衡態勢。許多女子必須學會獨自面對生活，承擔起之前應該由她們父親或丈夫所扮演的角色。她們被迫獨立，開始改變原來女子依賴男性生活的模式，給了女性解放自己的機會。在此同時，為數眾多的從軍男性，進入一個全是男人的世界裡，在這裡他們被灌輸以新的行為準則：紀律、強悍、犧牲。他們的人生徹底的改變了，他們的未來也同樣起了變化。在戰時死去的士兵可能會變成英雄；而存活下來的人則得到勳章的慰藉、一份長期的工作，並被承諾享有退伍軍人的福利，這是以斷絕家書換來的（軍官則除外）。

處在這個極度危疑動盪的時代，人們對於財富的定義也改變了，本來偏好不動產（例如房屋、土地、汽車等），現在變得不安全，因為不動產可能會被竊占或徵收，人們因此轉而偏愛輕便可帶走的細軟（例如黃金和珠寶），以及不易受到損害的資產或重要人脈（例如外國銀行的帳戶，或是居住國外的親戚）。致富和賺取錢財的觀念改變了。在戰爭中養成的本事，諸如將就湊合、動作快速、當機立斷、以及討價還價等等，都比長期的理財計畫或者是投資來得重要。原先在社會穩定時處於邊緣的而受鄙視的人們，此時一躍而居經濟面的頂端，還經常保持這樣的地位。這些人在戰時中國看來像是危害社會的鼠輩，其實正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發戰爭財的人。他們身上有各式各樣的名稱，沒有一個是好聽的：發國難財的商人、衣冠楚楚的奸商、地痞流氓、投機政客、到處搜刮民脂民膏的人。

這些靠戰爭發跡的人，是許多戰爭產生的新類型之一。另外一種新類型的人，對於就在眼前的未來而言，顯得重要許多，他們是一群獻身於革命的人，情願為了社會主義革命大業而犧

牲自己的家庭與鄉里。中共的大多數領導人都已經這麼做了。在抗戰時，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將愛國精神與革命大業置於他們的家庭前面。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變化，也是個深具威脅性的改變：年輕人正為了一項志業而放棄他們的家庭與原來舒適的生活；他們是在號召抗戰的背景下這樣進行的，而中共在其中逐漸取得領導的角色。

哀傷悲痛

千辛萬苦

Untold suffering

對於戰時社會最大的衝擊就是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哀痛。美國就算沒有花上一整個世紀，也費了數十年時間，才能面對南北戰爭當中六十萬人死亡的損失。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各國都因為哀痛而震動。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是個舉國都在服喪的地方，因為全國人口中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人死亡，當中主要是年輕男子。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失去了兩千六百萬人[3]。存活下來的人，在他們的餘生中，都為亡者流淚哭泣。最常見，情感上也最為動人的蘇聯戰時回憶，就是正在哀哀哭泣的女人、寡婦和母親們。中國的軍民在抗戰時所蒙受的損失，就和蘇聯在二次大戰時遭受的傷害一般無二。中國背負著她身上的巨大哀傷。

在這樣的哀痛裡，蘊藏著社會和政治的涵義。個人遭受的損失，加上幾近絕望的情緒，將

人們從本來在社會上安頓好的位置裡逼出來，促使某些歷經戰禍的倖存者加速轉變其立場為政治激進主義——在那個時代，這意味著參加共產黨。曹日昌是中國第一代的心理學家，在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遭到日軍殺害以後，他便參加了中共[4]。他只是許許多多原本生活遭到這場戰爭所粉碎的其中之一，而他將社會主義革命拿來填補自己失去家庭後的空缺。

社會與戰爭

本書要檢視的，是抗戰對於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效應，不是去談戰事為何爆發，或是這場戰爭如何進行，又或者是誰該為此受到譴責。抗戰的政治與國際因素，在本書裡只是敘述的背景。這本書透過遭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眼中，透過所有各行各業、境遇不同的中國人眼裡，透過這個原來的社會被破壞得天翻地覆的民族眼底，去看這場抗日戰爭。在本書裡來自日本方面的聲音非常之少，這是刻意的忽略。在這場戰爭期間，中國人只能將日本人看成敵人。在沒有遭到敵人占領的地區，他們對於日本的直接經驗，就等同於遭到轟炸。在被敵人占領的地方，和日本人接觸的經驗，通常是害怕和憂懼。

全書架構與史料

這本書的書寫架構，按照時期的先後順序排列；時期則由軍事和政治事件作為分隔。這些時期長短不一。頭一個階段，包含一九三七年戰事初起、驚魂未定的前六個月；第二個時期，是敗仗與撤退的一九三八年；第三個階段，是為期數年的蕭條停滯，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第四個時期是接下來艱困的兩年半；第五個階段，是抗戰具災難性質的最後一年（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第六個時期，則是抗戰後的初期階段（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在每個階段裡，我探討該時期的主要社會議題，不過許多議題會由這個時期，延續到下一個階段。

在抗戰期間，中國被一分為數個區域。我把討論的焦點放在幾個不同的地區，以反映出這種劃分的情況。除了討論國民黨政府的首都重慶與中共總部所在地延安以外，我還引用了以下幾個例子，分別是抗戰初期就被敵人占領的山東半島、部分遭到敵人占領的閩南地區、以及到了戰爭的最後階段，才遭到敵軍攻陷的廣西。抗戰時期兩場最大的浩劫都發生在河南，所以我同時探討黃河大堤在一九三八年的決堤，以及河南大饑荒。

我所使用的材料來源相當廣泛。我並不只是以單一的資料來檢視抗戰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舉例來說，如同安格斯．卡爾德（Angus Calder）僅僅只是運用英國的《大眾觀察》檔案（Mass Observation Archive）裡的材料，就寫出具有開拓性的著作《人民戰爭》（*The People's War*）[5]。雖然當時中國已有少數社會學者記錄下戰爭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戰時對於社會

的調查研究，數量仍然很少。抗戰時沒有全國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不過有的地區性報紙，品質相當高。我引用了一部非常珍貴的剪報資料集：現藏於廈門大學的《末次剪報》。政府的各種宣傳品是有用的材料。其他的中外官方紀錄，提供了若干數據，不過它們很少直接觸及社會議題。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們，留下非常豐富的回憶錄；近年來，這些回憶文字已經陸續出版，算是中國傳記體文學復興的一部分。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官所留下的記述文字也同樣重要。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中國各地開始出版《文史資料》，裡面包含了許多極為珍貴的記載，從中可見戰爭對特定地區造成的影響。

我沒有使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很容易就忽略了占領區百姓遭受的苦難。除了某些例外，很顯然這些研究調查報告都是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本部所收集的；這一點非常關鍵，也就是說，日本資料當中不會有太多中國人民的戰爭體驗。有些資料甚至想呈現這場戰爭是中國的歡樂時期。有一本近年出版的著作，《戰時日本藝術》（*Art in Wartime Japan*），書中在中國所拍攝的照片，都是凱旋勝利的場景；舉例來說，關根康弘所拍攝的〈勝利入南京〉，以及向井潤吉的〈陰影：飛越蘇州〉，照片裡的中國百姓都歡欣鼓舞，正在歡迎日本軍隊[6]。

除了冷硬的史料，我還運用小說和詩歌來呈現這場戰爭帶來的痛苦與悲傷。我和麥可・貝里（Michael Berry）一樣，堅信「以藝術手法表達暴行，從苦痛與犧牲裡獲得啟發，在廢墟與灰燼中得到成長，書寫他們各自的故事，從當中會興起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那就是『歷史敘事』。[7]」小說和詩歌動人地刻劃了人們怎麼面對他們所身處的折磨與艱困。我在書裡選擇了若干當時的小說作品，以及近年來以這場戰爭為題材所書寫的小說。在抗戰時期，小說的出版數量是相當受限的。出版在抗戰中是一大困難事。出版審查（國、共以及日本三方）和紙張的匱乏，使得作家們很難將自己的作品付梓面世。毛澤東時代的種種限制，延續了出版關於抗戰作品的困難程度，在當時，以這場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是不被接受的。所有這一切，都意謂著若干刻劃這場戰爭最為鮮活生動的故事，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作家們終於可以處理抗戰題材之前，都沒有被寫下來或者出版的機會。電影作品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的二十年以來，主流電影拍出了許多關於這場戰爭的作品，全都生動的再現了抗戰那段歲月。我在書中列舉了幾部重要電影的片名。藝術家、攝影師和插畫家的作品，為我們提供抗戰的強烈圖像，我在本書裡還運用了當時的插畫、照片、木版畫、漫畫以及繪圖。

以文字書寫的史料裡，聽不見平民大眾的聲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其他那些識字的人，則生活在某種程度或某些特定的壓力之下，不敢將事情寫下。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口述回憶，是我在寫作本書時的重要資料來源。我在一個被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所籠罩的社會底下長大，這個社會的人們不停的談論著這場戰爭，通常用的是強烈的字眼。從我頭一次到中國開始，就聽到許多人們說起各自在抗戰中的經歷，混雜著不同的元素：超越、失去、愛國精神、以及悲傷哀痛。從這些回憶當中，我開始了解到這場戰爭是如何改變了中國。在書裡，我引用經歷過抗戰的人們和其子女們的口述訪問，為討論這場戰爭，添

加了額外的深度。

本書通篇之中都安插了成語，它們都是四個字的短句或是語錄。其中若干成語來自古典文學，另外有些則是傳統的口語。這些成語在中文裡相當普遍，它們被廣泛使用，用以總結一種情況或是某種態度。它們有時候又被叫做「格言」，不過，這些成語的使用，實在太過普遍，當中所蘊含的意思，又是那樣的多，讓我很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在後頭加上特定的英文翻譯。我在本書裡列入了中文的人名、地名，這是恢復舊時漢學研究的做法，因為現代文字處理的能力，讓這種做法得以實現。

理論取徑

我寫作這本書，是受到法國社會學者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作的啟發，他創發了「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這個概念，用以了解人們在天災人禍之中的處境，他們身處的社會結構遭受破壞，日子變得相當艱難（即便不是無法忍受）。他們經歷了「這個世界的不幸災禍」（*miseres du monde*）[8]。布迪厄筆下的文字，投入情感，充滿同情；他的作品裡沒有若干學術研究裡的那種冷眼遙觀，在這些研究裡，疏遠的立場受到看重，從而讓研究者對受研究對象的同情，變得很可疑。我試著想呈現抗戰時期的中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才使得社會分崩離析，人們流離失所，幾近崩潰；並且對於我筆下這些苦難深重人們的生活，給予若干布迪厄式的悲憫同情。

我從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裡得到很深刻的啟發，這個理論通常應用在文學研究當中，不過，對於混亂動盪、事態的發展遠超出當時政府和人民所能掌握的歷史時期，它卻更加適用。戰爭的混亂製造出無以計數的創傷經驗，還夾雜著不安和時常出現的焦慮。創傷經驗在整個中國社會裡，已經產生了一種對於亂世的不正常恐懼。「亂」字代表了中國歷朝各代的大多數領袖最為恐懼的現象，也是他們用來持續威權專制統治的藉口[9]。

戰爭的後果

掀起戰爭的藉口，也就是開戰的導火線，未必會反映在戰爭的結果上。日本以「防杜共產主義」為名侵華，意在阻止共產主義由蘇聯輸入中國。中國方面從來就不怎麼相信這個侵略的藉口，尤其是因為日本軍隊只進攻過蘇聯一次，那就是一九三八年，日蘇雙方在外蒙古諾門漢爆發的軍事衝突。戰爭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日本進攻的並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反倒去侵略立場反共的國民黨中國。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這個攻擊共產主義的託詞，看起來不但老舊陳腐，而且還矛盾荒謬；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共的實力遠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強大，而且準備在內戰當中席捲天下。中共是這場抗日戰爭的政治受益者；它在戰後奪取政權，抗戰

使中共壯大，而且準備好在內戰中與國民黨政府一較高下。

抗戰留給中國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各個地方受創的差異是很大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有任何區域能逃過這場戰爭的衝擊[10]。戰爭的傷害為中共改造新社會的需求，提供了絕好的條件：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一張白紙，讓中共黨人們按照他們的構想，打造一個新世界。而這場戰爭也給了中共所需要，爭取民眾追隨的工具：群眾動員。在中國，政治動員的第一步，必須和抗日扯上關係，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是其早期形式，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以後，政治動員的模式就更形加強。在抗戰開始時，國共兩黨都以民族抗日為名，行政治動員之實；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主要活動根據地都位在淪陷區的中共，由於在這些地方，抗日動員的需求最為緊要，它已經將自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主張，匯聚成一股巨大的社會運動[11]。

中共堅持遵循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之後又混合了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大旗之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猛力使中國走上一條快速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抗戰所造成的創傷，卻始終沒有癒合。這場戰爭及其所造成的苦難，全都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些驚天動地的政治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十年浩劫的背景。有一個重大的疑問，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回答：這個國家竟然由自身內部釋放出如此可怕殘酷的暴行，後人該如何去解釋？「就和發生在二次大戰中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一樣，文革是如此的令人驚駭、毫無理性，不禁讓全世界的人們都感到好奇，到底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中國人也同樣

在問。[12]」

文化大革命被稱作「失落的十年」，人們通常對此是按下不表，避而不談。對於這樣的沉默，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發動文革的這個政黨，現在仍然在執政。可是，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人們內心有種深沉的羞恥與羞辱感，眼看著這樣一個精緻優雅、組織細膩、奉行古老經典為圭臬的社會，如今竟然被充滿了邪惡和相互背叛的洪流所吞噬。這種所有傳統價值都遭到顛覆的情形，和猶太人大屠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卻有一個最主要的不同之處：納粹對付的是亞利安種族之外的「非我族類」，而中國人卻在同胞之間彼此互相殘殺。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諸多恐怖，有許多可能的解釋：比如中國社會結構的根本缺陷、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造就的諸多扭曲、以及受到一位患有自大狂妄想的領袖毛澤東所帶來的惡意影響等。本書要提出另一種看法，基於歷史事實來提出解答：文革的暴行正是八年抗戰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場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於焉展開。戰爭時期對中國社會造成暴力與分裂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動盪的一九五〇年代，導致了社會解體和分裂，使得人們得以輕易的相互殘殺。

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抗戰加速了社會分崩離析的過程，接著又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政策而更形惡化，造就了一個舊時代人際間的共同鍊結全部侵蝕腐壞的社會。這種腐壞侵蝕的過程繼續下去，接著在中共建國初期、階級鬥爭熾烈的時候，文化大

革命的各種攻擊與恐怖就成為可能——於是它們便發生了。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對於這場戰爭開始時的救國情操而言，更是徹頭徹尾的矛盾悖逆。抗戰歷史所走的這條陌生軌跡，可以反映在一首最為知名的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以及譜寫這首歌詞曲的兩個人所遭遇的命運上頭。這首歌曲原來是為了抗議日本侵略東北而作，後來幾乎成為抗戰時舉國傳唱的歌曲。作詞者是田漢，譜曲者是聶耳。這兩人的結局都令人哀傷。聶耳於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游泳時溺斃，雖然這或許是一次意外，不過他的死還是被解釋成一場暗殺。田漢在文革時死於獄中，當時他被扣上「毒草」的帽子。但這首歌卻存活了下來，配上不同的歌詞，繼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延伸閱讀

閱讀一：〈義勇軍進行曲〉（一九三四）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
前進　前進　進

■註釋

1 八年抗戰後來被納入範圍更大的二次世界大戰，成為這場一九三九年爆發的大戰的一部分。

2 Prasa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9.

3 Drew Gilpin Faust, *The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2008); Stephane Audoin-Rouzeau and Annette Becker, *14-18,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0); and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4 曹日昌後來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那裡，他邂逅席爾瑪．沃斯（Selma Voss），並和她成婚。席爾瑪是一位荷籍猶太人，她藏匿在荷蘭以躲避戰禍。她跟隨夫婿回到中國，婚後生活幸福，夫婦育有兩子。他們是我在

第一章

戰事的高峰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四年赴中國進行研究時，頭一批認識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席爾瑪自殺身亡，曹日昌患病去世。

5 Angus Calder, *The People's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69).

6 Hariu Ichiro (針生一朗), *Art in Wartime Japan, 1937-1945* (東京：國書刊行會，2007), pp.21, 26.

7 Michael Berry, *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8 Pierre Bourdieu, *La misere du mondu*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1993); translated by Priscilla Ferguson,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見Ban Wang,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以及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敘事，暴力》（台北市：麥田，2011）。

10 關於地區差異性的討論，參見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rz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unism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225. 冀朝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翻譯員。

戰爭的序幕

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與三〇年代初期，中國看似正邁入一段統一與變革的新時代。一九二八年，國民黨為中國建立起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將首都由北京遷往南京，北京則更名為北平。

一開始，這個政府所能控制的領域，只有區區華中數省；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它的實力慢慢壯大，蔣介石的政府逐漸能將數個地區軍閥勢力（馮玉祥、閻錫山、以及廣西桂系）置入中央某種程度的控制之下。當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占領了東北三省之後，東北少帥張學良的勢力便遭到嚴重的削弱。

一九三四年，中央軍將盤據在江西邊區的中國共產黨驅逐出去（譯按：即五次圍剿），逼迫他們踏上史詩般的長征之路。這趟長征將中共的軍隊帶到位於陝西延安的偏遠根據地，在此，中共黨人終於可以休生養息，從沿途上所遭受的可怕艱難困苦損失當中恢復過來，他們的苦難經驗，成了中共設想將來戰勝逆境的踏腳石。然而，在一九三七年時，中共仍然只是一小群屢遭痛擊的餘黨，和中國民眾生活的重心，距離非常遙遠。

在華東的幾個大城市裡，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是一個發展成長的時期，在商業、文學、教育、音樂和大眾文化等層面帶來的興奮刺激加總在一起，促成了現代性（modernity）的快速到來。可是，在這個成長榮景的背後，是一片陰霾烏雲——來自日本的威脅。日本在一八九五年擊敗中國，拿下台灣。十年後，日本又打敗俄國，取得遼東半島和滿洲南部的利權[1]。一九三一年，日本奪得整個滿洲。在接下來的五年裡，他們蠶食進逼的重點放在華北。當中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日本嘗試想占領上海，而中央軍並沒有積極抵抗。當時他們主要將力量擺在剷除地方部隊和中共的武力上頭。

沒有積極抗日，引來大批激烈的抗議活動，抗議的對象是日本和國民黨政府。這些愛國抗議活動以學生和商業團體為主力，不過認為中國被日本羞辱而蒙受「國恥」的想法，卻廣為流傳。一九三六年底，一場戲劇性的插曲改變了政治局勢。

蔣介石在西安遭到張學良所部武裝挾持。蔣氏後來獲釋，作為獲釋條件之一，他被迫答應和地方軍隊與中共合組一條抗日統一戰線。中國準備要抵抗日本的下一步進逼——而反過來，在日本方面，也準備在中國變得太強大以前先行進攻。

一九三七年的重大事件

還我河山
Give me back my rivers and hills

戰爭的進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間，中日雙方軍隊爆發衝突，這場衝突的地點在北平近郊的盧溝橋，從而引發了全面戰爭。到了一九三七年夏末，北平和天津這兩座大城皆以令人震驚的速度相繼陷落。中國軍隊在火力上無法與日本軍隊匹敵，而面對日本這個世界海軍、空軍強權，中國只有少得可憐的空中、海上武力。日本預料中國將會很快的屈服，認為很快就會見到他們向日本投降。

結果，中國不但沒有屈服，還發起猛烈的抵抗；這種抵抗受到已經達到高峰的民族主義情緒所激發，這種情緒則建立在現有的民族救亡運動之上。中國受到愛國熱情的激勵，人人心中義憤填膺，因為國家神聖的領土已經遭到侵略。嘹亮響徹的口號，是岳飛在〈滿江紅〉裡的呼喊：「還我河山」（見延伸閱讀一）。在中國各地，軍隊動員起來；地方部隊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日本的侵略竟然促成中國政治人物一直無法達到的成就：一個團結統一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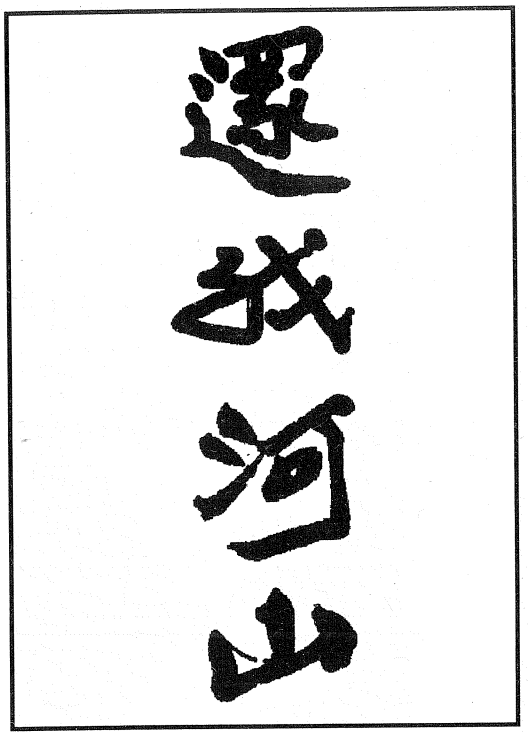


圖1.1　還我河山

在該年之初宣告成立的統一戰線，如今成為政治現實。在軍事前線，國民黨與地方部隊幾乎承擔了抗戰第一年的全部戰事；身處西北高原的中共部隊，則很少涉入其中。

兵臨城下
The enemy is the gates

國民黨軍事統帥部決定，把這場對日本人的戰爭拉到長江口來打。由此展開了一直持續戰鬥到一九三七年底的上海／南京戰役，這

場戰役是在公眾傳播注視下進行。國軍打的上海保衛戰中，官兵與日軍逐街、逐屋的進行苦戰，在全中國掀起一股愛國熱潮。中外媒體每個小時都在報導那一營孤軍：「八百壯士」死守蘇州河畔（上海公共租界界河）四行倉庫的英雄事蹟[2]。

第二場戰役在山西開打（譯按：忻口會戰），而在華北軍事強人閻錫山退兵後宣告結束。南邊的戰役同樣也以撤退告終。日本增援部隊迂迴至中國軍隊的側翼，在上海以南的杭州灣登陸。

到了秋末，中國軍隊全線後撤。政府遷離首都南京，向內陸撤退到武漢；南京被放棄了。到了一九三七年底，華北的關鍵省份山東也落入敵手。華東許多地區現在都遭到占領；以中方的話來說，也就是成了「淪陷區」。中國的抵抗能力看來已經遭到摧毀。英國情報機構於十二月底發自上海的報告稱：「裝備最新武器的現代中國軍隊，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而只剩下發動游擊戰之價值。[3]」

十二月十三日這天，日本軍隊攻入南京城，開始了為期六週的恐怖燒殺搶掠；在日後被稱為「南京大屠殺」。

一九三七年的後半對中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痛苦煎熬，可是，戰爭的蹂躪和破壞卻讓這個國家舉國團結一致，凝聚出一種愛國的情操，這都是從前所欠缺的。這場戰爭同時也猛然啟動了中國社會的轉變，這樣的轉變是立基在過去好幾十年來嘗試的步伐上，以打破某些年輕人視之為監獄或束縛的儒家社會秩序。戰爭的動盪造就了之前難以想像的社會重整，而對侵略者的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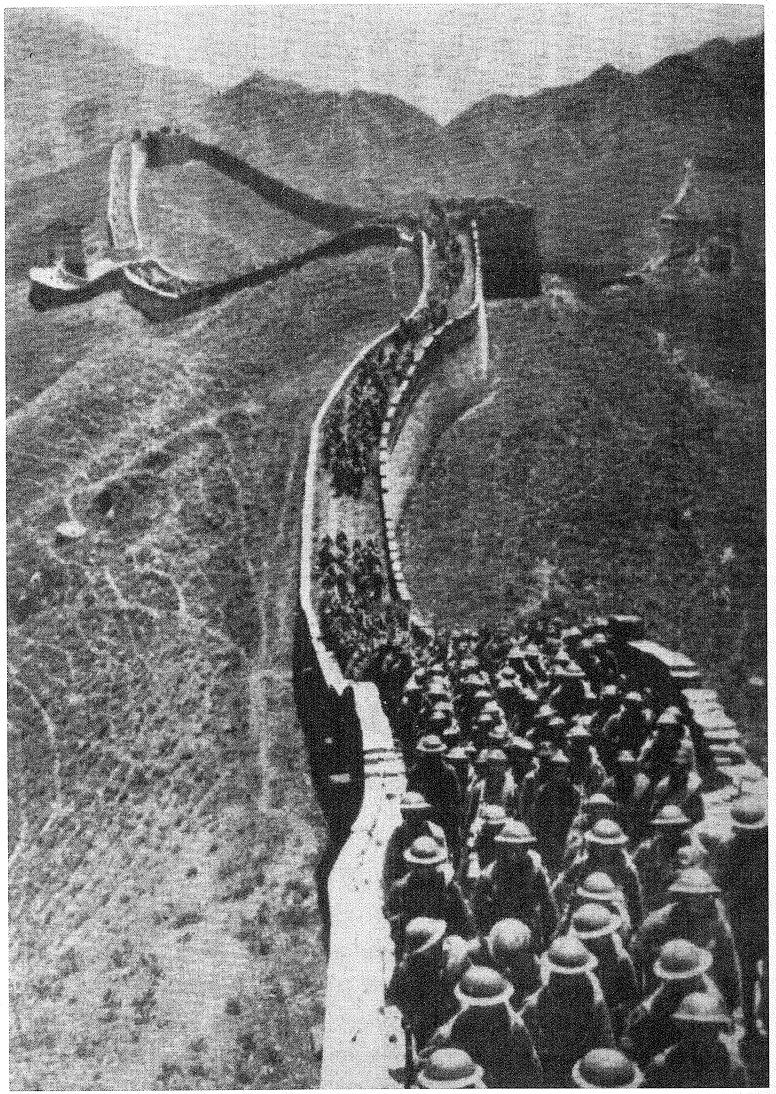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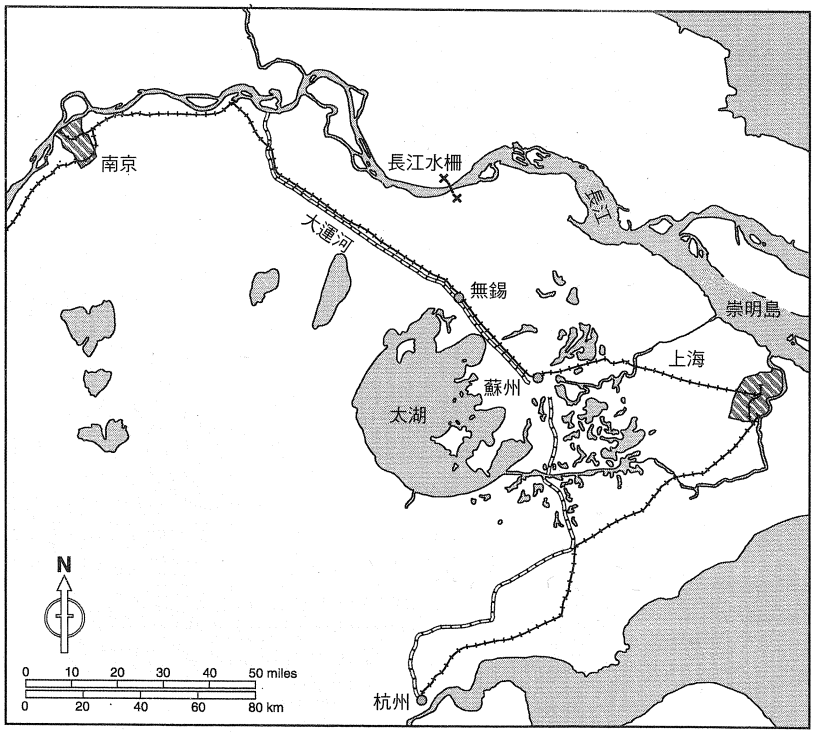


圖1.2　長城上的中國軍隊（取材自O. M. Green, China's Struggle with Dictators, London: Hutchinson, 1941, p.144）。



地圖1　長江下游

怒反應，則引發、鼓舞了規模巨大的社會動員。這場戰爭是一次大地震，搖晃撼動著舊社會的根基。

在中國發生的這些事件，在國際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興趣或同情。當時的列強都各自有令他們頭痛的事情。美國才剛從經濟大蕭條的創傷中爬起，堅定的抱持著孤立主義的立場。歐洲則有迫在眉睫的問題：法西斯主義掌權、以及德國的希特勒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崛起。在西班牙，內戰方才結束，勝利者是佛朗哥

領導的親法西斯陣營。一場發生在法西斯陣營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大戰，看起來可能成為現實。蘇聯國內正因為大整肅而受到重創，更別提蘇聯紅軍了。日本選在這個幾乎沒有外界援華可能的時間點上侵略中國。唯一對這次侵略感到關注的，是勇敢的西方駐華記者團，他們抱持著對中國民眾的深刻同情，報導這場戰爭的進展。

各種議題與案例研究

恐怖和混亂

社會動盪的主要製造者，是抗戰開始後頭幾個月發生的恐怖事件。在幾個星期之內，中國就墜入了驚惶恐怖的無底深淵。

兵荒馬亂
Turmoil and chaos of war

平民死難　打從戰爭一開始，日本軍隊就利用恐怖作為武器來對付中國平民百姓。將這種策略施加在民眾身上，有部分似乎是一種精心籌劃的策略，目的在逼迫中國政府投降。中國民

眾之前已經歷經過軍閥混戰時期（一九一六至二八年）的動盪，但是對於這種大規模的殺戮，無論是來自天空的炸彈，或是從地面而來的砲彈與屠殺，人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中國民眾發現，一九三七年的諸多殺戮，實在太痛苦、太難以接受，於是他們稱呼日本人為「鬼子」，這是一種人間所難以理解的可怕天譴。有一個之前用來稱呼西方人的貶抑名稱「洋鬼子」，算是和上述「鬼子」這個稱呼有若干呼應之處，但是「日本鬼子」這個語調可完全不一樣——它代表極度的恐怖，而非不解與困惑。

規模最大、最令人震駭的平民屠殺，發生在南京，開始的時間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中旬，結束於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底。有一個象徵大量死亡的恐怖符號籠罩在中國的首都：首都民眾正被大肆屠殺，他們之所以遭到嚴懲，是因為他們的政府不肯在夏季時向日本屈服投降。日本軍方為殺戮找了一個藉口，說他們是在「對付」脫下軍服的中國士兵；可是根據當時的中外記載，這場大屠殺根本就是毫無區別對象的任意殘殺。在屠殺過程中，有大量的平民百姓——男人、女人、孩童——被殺死於刀槍之下[4]。民眾死難的確切數字至今還不清楚，也永遠不會清楚。許多遺骸被扔進流經南京、蜿蜒向北的長江裡去。和德國人沒有保留在歐洲所殺害人數的紀錄一樣，日本人在中國也沒有留下紀錄。一手促成設立南京「國際安全區」（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的約翰・拉貝（John Rabe）在屠殺後一段時間估計，約有五萬平民遭到殺害。他估算的基礎，是據他統計在大屠殺之前，南京城裡還有三十萬人口。國際安全區救護了約二十五萬平民百姓，剩下五萬沒被計入的民眾，推定應該是於屠殺之中死難[5]。這些數字並未將士兵

被殺的人數列入。拉貝的統計數字是溫和保守的，遠低於若干被引述的中國資料來源通常所稱的三十萬人被殺害，卻遠高過某些日本記載所稱的一千人死亡。但是即使是拉貝所估計的保守溫和死亡數字，也能讓南京大屠殺名列近代歷史當中最惡劣的人類暴行之一。

血流成河
Blood flowing in rivers

關於南京大屠殺確切死亡數字的激烈爭論，讓各界的注意力聚焦在南京城裡的死亡人數，而讓在整個占領區裡發生的許多其他小規模屠殺，一直無法獲得重視。在特定地方，這些屠殺幾乎總是在日軍一到達之後就宣告展開。由於我們只把焦點放在南京一地，沒能看出當時降臨在華北與長江下游城市與農村的恐怖浪潮。在一個又一個地方，開入的日本軍隊殺害平民百姓，人數從數十人到數百、甚至幾千人之譜[6]。日本軍方的藉口總是那一套：為了搜索躲藏混入平民之中的中國士兵。接下來就是一段毫無分別的殺戮，平民百姓或者受傷而無法撤離的士兵，都在被殺害之列。

殺人如麻
Killing people like flies

在這些屠殺之外，大量增加的平民傷亡數字，來自空襲轟炸中身亡的受害者。

轟炸　中國是第一個遭到敵人以平民百姓作為有計畫轟炸目標的國家。日軍對中國的轟炸，在令西方為之震動的大事件、也就是德軍於一九三七年四月空襲格爾尼卡（Guernica）幾個月之後展開。中國的空軍實力弱小，防空陣地設施在實際上等於沒有；因此日本空軍可以任意進行轟炸。很快的，隨著侵略行動開始之後，中國的天空上就都滿是轟炸機的身影。在各個城市和村鎮，由天而降的恐怖彈雨，是戰爭的頭一個徵兆。

極度諷刺的是，上海第一次遭受的轟炸，竟然是由「自己人」所發動的。八月十四日，在一次對日本停泊於上海外灘碼頭的巡洋艦「出雲」號笨拙的攻擊行動之後，一架中國空軍戰機將四枚炸彈拋落在上海市中心鬧區。下面是一段對於這次傷亡慘重的誤擊事件的目擊記述：

> 戰艦上的防空砲火不但把中國飛機趕跑，還擊中了其中一架飛機的投彈架。四枚兩百五十磅重的炸彈鬆脫掉落。這架戰機的飛行員並不知道座機的投彈架已經損毀，而且顯然是驚魂未定，於是他將飛機的高度轉為一千五百英呎，並且飛越公共租界上空。
>
> 有兩枚受到震動、從投彈架上完全鬆脫的炸彈，掉落在南京路上。其中一枚擊中匯中飯店（Palace Hotel），另一枚落在馬路上。南京路當時正擠滿了數以千計從其他鄰近內陸地區湧入的中國難民，而轟炸又來得如此出乎意料，人們毫無能夠尋找掩蔽物的時間，也來不及躲入附近街旁的建築物裡避難。在塵埃和硝煙慢慢落定之後，死傷人數幾乎高達三千人，傷者和死者成堆的躺在人行道上。
>
> 這是一個血肉模糊的場景，許多屍體被炸成碎片。頭顱、軀幹、殘肢斷足散落得到處都是。……
>
> 不到一分鐘之後，距離第一個落彈現場一英哩之遙、位於愛多亞路（Avenue Edward VII）上的大世界遊樂城前面……落下另外兩枚鬆脫的炸彈。這兩枚炸彈造成馬路上又有將近兩千人死傷[7]。

稍後的傷亡數字統計則比較低：南京路上有一百餘人死傷，而大世界遊樂城那裡的死傷人數則是一千兩百人[8]。這次由中國空軍發動的誤炸平民百姓事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之後其他所有轟炸，都是由日本空軍發起，首先是對長江下游地區進行轟炸，接著是許多未遭日軍占領的地區，日機幾乎如入無人之境，飛到低空投彈。下面這個表格所顯示的，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三日之間，受到轟炸的中國城市與村鎮名單，見下頁表格[9]：。

上述這些地方，絕大部分都和實際發生戰事的前線，有相當遙遠的距離，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戰略目標可供實施轟炸。這樣轟炸的背後，已經可以看出一種策略，是想讓平民百姓陷於極為不幸的恐怖之中，並且使他們震懾屈服，從而反對中國政府的抗戰政策。結果，中國對於這類轟炸的反應，是之後其他國家遭受轟炸時反應的先聲：憤怒與蔑視、反抗。轟炸作為一種讓

平民百姓屈服的手段，可以說完全收到反效果。並沒有任何統計數字能說明中國民眾在轟炸中死亡的全部數字，不過既然這類轟炸一直持續進行到戰爭後期，那麼因空襲而死難的人數必定達數十萬人之譜。

轟炸對於基礎交通設施的破壞相當巨大。橋梁、道路以及鐵路都是很明顯的軍事目標，許多設施都遭到炸毀。但是同樣遭遇這種劫難的，是中國的新式教育體系。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數十所大專院校遭到空襲。德國漢學家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描述這種毀滅道：

> 一陣狂風橫掃過年輕的中國文教機構，這陣狂風過處，留下被洗劫一空、斷垣殘壁的宿舍，冒著煙的教學大樓、運動館和實驗室，以及當場遭到殺害的男女學生遺體[10]。

省份	城市／村鎮
山東	韓莊、曹莊、兗州、濟寧
江蘇	南京、浦口、上海、無錫、江陰、徐州、崑山、嘉定、太倉、松江、蘇州、揚州、南通、海州、連雲、淮陰、南翔
浙江	杭州、寧波、海寧、筧橋、嘉興、朱溪、金華、紹興
福建	廈門、龍海、金門
廣東	廣州、石龍、虎門、英德、古丁、樂昌、惠口、汕頭、黃埔
安徽	蕪湖、廣德、安慶、朱巷、蚌埠、舒城
江西	南昌、上饒、餘江、琴江、九江
湖北	漢口、武昌、漢陽、孝感
湖南	洙州

遭到空襲最為頻繁的城市，是一九三八年底成為戰時首都的重慶。重慶在大轟炸當中的故事，將在本書第三章裡講述。

難民與疏散民眾　一九三七年下半激烈的戰事和轟炸，引發了大量平民百姓的疏散與逃亡潮。難民逃亡的浪潮和戰事的擴大畫上等號。超過十萬以上的民眾，在十、十一兩月大量湧入上海的外國租界，因為當時日軍對於上海華界的攻勢正在加強[11]。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平民百姓在戰火逼近時慌張出走。個性強悍的美國籍飛行員倫納德（Royal Leonard），在日本軍隊逼近南京時駕機低飛過這座城市上空。在這之前，他已經在其他地方看過這種驚惶慌亂之下的撤離：

> 沒什麼太大的不同。堵塞住道路的馬車、獨輪手推車、汽車與人力車上的人們，臉上細微的表情全都一樣：麻木、恐懼、絕望。在這裡聽見的聲響和在任何地方出現的聲音一樣：轟然巨響、動搖震撼與崩塌。在這裡所見的場景完全一樣：火焰、煙霧和塵埃。[12]

倫納德看到的這批民眾，可能是短期出逃的難民，當戰事持續進展時，他們就往鄉間躲避。家境窮困的人沒有辦法就此遠走高飛。錢和移動的管道，是能否長期避難的關鍵因素。

當中央政府於十一月從南京溯長江而上遷入內地時，幾乎所有的資深文武官員都隨之離開，同時帶上他們的家屬；每艘往來於長江江面上的船隻，全都受命搭載政府撤離人員。其他各地的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也大都在侵略者來到以前就離開工作崗位。各省省政府紛紛疏散遷入內地，舉例來說，山東省政府就由濟南移駐寧陽。在一些較小的城鎮和村莊，許多地方仕紳與地主也出逃了。

隨著戰爭向南方和西邊進展，當地的民眾同樣搶在戰火到來之前先行逃難，他們不像某些之前逃難的民眾那樣慌亂失措，但卻懷著更強烈的憂傷，因為許多人相信，他們這次離家遠去，可能要很久都不能返鄉了。林語堂在他關於抗戰的著名小說《京華煙雲》裡，捕捉到了這些難民們堅苦卓絕的情懷（見延伸閱讀二）。

這些倉惶失措的逃難，多半由轟炸空襲所引發。在日本飛機空襲山西汾陽的第二天，當地望族冀家上路逃難，拋下原來舒適的生活和尊榮的地位，準備前往武漢。他們來到了一個之前作夢也沒辦法想像的世界。在這趟漫長的路程裡，當時年僅八歲的冀朝鑄大部分時間都靠自己的雙腳趕路：

> 我們得和一些身上氣味不佳的陌生人睡在同一張炕上，然後在他們矮小屋舍的骯髒地板上吃飯，一面還要作聲驅趕那些在我們腳邊糾纏、想討些食物渣屑吃的雞狗。我家的人原來過的都是榮華富貴的日子，從來沒想到竟會落得這般境地。從父母倦極了的臉孔裡，我看得出這是逃難所需付出的代價，但是處在這樣困難與不適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兀自堅強撐持著[13]。

許多民眾之所以出逃，是由於害怕他們的家人可能會遭遇不幸。尤其是年輕女孩，特別容易遭受即將入侵的日軍性侵害。這些女孩的父母會試著在日本人到來以前將她們送走，因為大家都聽說過傳言，關於一九三七年底在好幾個占領的大城裡所發生的事情。在十一月日軍拿下蘇州之後，當地超過兩千名年輕女子被送去充當「慰安婦」——或是性奴隸[14]。這些關於女子可能會遭到危險的傳言，聽了讓人毛骨悚然，足夠讓家家戶戶慌忙出逃。

某些逃離日軍占領區的人們，並不是因為恐懼驚惶而出逃，而是不願意在敵人統治底下生活。這些人裡，有的是學生，其他則是離開家鄉為國作戰的年輕人。年紀稍大的知識分子出走，是因為他們知道日本人來了以後，自己會惹上麻煩（見延伸閱讀三）。從北邊撤出的中國軍隊殘部同樣願意抵抗，從上海疏散的那些人——商人、工廠業主、工人、新聞記者和演員——也是如此，他們遷移到內地，以示不對侵略者低頭屈服。

在戰爭前線的某些地方，可以見識到最大規模的難民潮。有部分的難民來自下面這三個不同的區域：

安慶（位於南京上游，一九三八年初遭日軍占領）

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約十萬人）離開。那些被留下的，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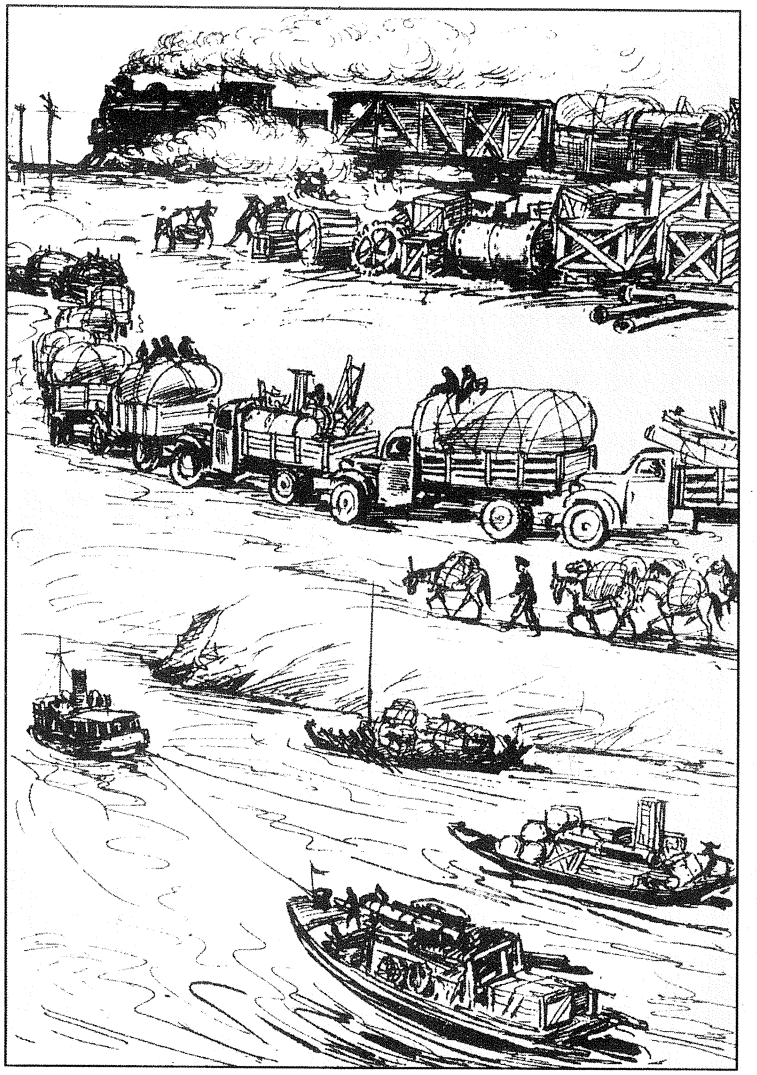


圖1.3 〈到後方去〉（取材自王履之，《國民革命大畫史》，台北：中華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頁220）。

是受傷的士兵和私人保鏢。[15]

開封地區（在黃河流域，河南省東部，一九三八年春季遭日軍占領）

一九三七年之前，本地區人口有二百九十萬。一九四五年只剩下百分之五十。在戰爭期間，有一百一十四萬人逃往內地，另有超過三十萬人死亡。[16]

廈門（福建沿海，一九三八年底遭日軍占領）

一九三八年前，廈門有人口二十六萬。到了一九四一年，只剩下八萬八千人（其中還包括一萬名從台灣來的移民）。這座城市成了一座空城[17]。

上面這些難民，大部分都只是在戰事最激烈時，短期逃難在外。他們躲避的地方，最遠只到鄉下，或是他們家鄉附近的山區。局部的出逃有時候包含移往安全避難所、外國傳教士居住的院落，或是在較大城市裡的外國領事館或租界。到了一九三七年底，在上海一地，就有超過三十萬的難民住進將近三百處位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接待中心[18]。還有更多的難民不得其門而入。在戰事激烈進行的高峰，試著想要進入法租界的大量民眾，都被鐵門和警衛擋在邊界上[19]。

長程大範圍的遷徙，從抗戰爆發後的頭一個月便開始出現。在華北和華東都有大規模的難民潮，人們往西逃，進入未遭敵軍占領的區域。大部分的難民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他們出走，為的是躲避危險，而不是要到任何特定的地點。很多人反覆遷徙，永遠不確定他們在哪裡，或

者他們要在這裡待上多久的時間。在抗戰爆發後的兩年內，作家巴金從上海到廣州，到武漢，再到廣州，去桂林，回上海，到昆明，赴重慶，最後來到成都。這些路程是在擁擠的火車和船舶上，或是任何在道路中的交通工具裡度過的，全都是驚心動魄的戰時行腳。一路上，他繼續主編一份文學期刊，寫下三部名為《激流三部曲》的小說，還翻譯了不少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作品[20]。很少人將自己看成是長期逃難的人；即使是那些逃了很遠的路的人，也不認為他們會永遠離開家鄉，只是在戰爭時期出逃罷了。

撤退疏散從來就沒能有系統、按計畫的進行。大部分的難民必須仰仗他們自己的才智和手段，而他們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甚至為之讚嘆的程度。大規模遷徙的人們，並沒有亂成一團，他們反而展現出極大的尊嚴和堅忍，這些中國百姓彷彿是在對日本說：他們可以被打敗，但是不能被毀滅。

長距離逃難最好的管道是搭船走水路，或是由海路從華北南下，或是由東往西，溯長江或其他較小的河流而上，到後方去。在北方，鐵路看似提供了一個逃難的管道，但是大多數的路線都已中斷；這些路線要不是鐵軌在戰事中被摧毀，要不就是遭到撤退的中國軍隊破壞，或者列車班次遭到阻斷，因為鐵路必須優先讓給運兵列車使用。鐵路在戰時其實是危險之地：鐵路沿線、車站、以及連接處通常都是挨炸的對象。對許多人而言，道路是他們逃難的唯一途徑，而在中國的許多地方，走路就表示這是一段步行或搭馬車的路程；在幾個主要的大城市以外，中國很少能看到汽車或卡車，也很少能取得車輛燃料。

抗戰所製造出來的難民總數，很難加以統計。戰後各方統計的難民數字差異很大，從兩千萬到將近一億，或幾乎到達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21]。這個數字無疑的包括了那些多次逃難的人們，以及只做短期疏散的難民。即使考慮到這一點，這也堪稱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動盪之一。它將社會結構破壞無遺。

難民潮所帶來的社會效應，是許多占領區內的社會和政府領導階層，都遭到斬首式的破壞。地方菁英無論決定留下還是出走，都打亂了原來由傳統菁英所主導的格局。傳統的政治格局不復存在。那些選擇出走的人，失去了對地方的影響力。那些留下來的人，則必須與敵人妥協。在各城市、城鎮、以及農村地區，選擇留下的菁英階層成員知道，他們必將與敵人合作，或者從事某種程度的調適，又或者，帶頭反抗。按照舊時的統治菁英理想，這些菁英的統治基礎是建立在美德與教育之上的，照顧地方上的老百姓是他們的責任；那些出走的菁英，已經背棄了民眾對他們的信任，而那些留下與敵人合作者同樣也是如此。依照共產黨人的觀點，這些舊社會的檯面人物都是既墮落又腐化的，他們沒能離開，就證明了這些人的罪愆。一旦這些菁英人物或消失，或是投靠敵營，在各占領區內就到處出現領導階層真空的情況。

救濟　政府必須面臨分發糧食給難民這項課題。按照往例，國家會在全國各地遍設大型糧倉，以供救濟難民之用。至於其他各種緊急救濟需求，則全都透過地方上的家庭、宗族和社群來完成。難民尋求救濟的第一個去處，永遠都是家庭，可是，如果家庭無法提供協助，地方菁

英就會被指望出面，對特定需要幫助的族群組織協助，這些族群包括了年長者、孤兒、遭逢不幸的女子、瘟疫的受害者、乞丐、失業者、受到天災波及的人、難民、以及窮苦民眾。寺廟與教堂通常能提供這些人救濟和棲身庇護之處。

上述這些社會機構，沒有一個能夠稍加緩解因為抗戰而起的各種新需求；這些救濟的需求著實太過鉅大了。私人與宗教團體的慈善事業繼續進行，現在還加上政府部門的介入，並且向全國同胞呼籲協助。旨在幫助戰爭受害者的慈善事業，對於中國人民、以及海外華僑而言，成了一項愛國的任務。

政府制定了一項救濟難民的計畫，在一九三七年底公布。這項計畫的目的，是將照顧難民的責任，加諸在地方人士的肩頭之上。政府命令施粥站必須設立在難民潮途經的主要路線上，以期能對難民提供某些救濟。各地設立收容中心，寺廟和宗族祠堂通常被徵用為難民收容所。可是上述這些措施，對於實際的需求而言卻只是杯水車薪。能夠發揮功用的政府機構實在是太少了。一九四二年，行政院社會部只能列舉出五百六十處自由地區的救濟組織，大部分都位於四川與江西兩地[22]。救濟只限於中國政府所能控制的區域之內；對於占領區的難民則根本沒有任何幫助。

政府既無能關懷平民百姓，同樣也無力顧及受傷士兵的救護。抗戰爆發之初，政府就制定計畫，旨在處理前線醫師與護士極度短缺的問題，但是這些計畫只在若干傷兵醫院與救護站裡實施[23]。受傷士兵所能得到的醫療極為惡劣，這種情況在抗戰過程中持續成為普遍現象；在戰

場上負傷，通常就是被宣判了死刑。

在各個戰事前線地區，傳教士們在日軍占領城市和村鎮時向地方民眾提供避難之處。有些傳教士視一九三七和三八年為他們在中國傳教生涯的高峰，情況最是艱困，但是收穫卻最為豐盛。在占領區裡的傳教士們費盡心力搭救民眾，同時也感覺自己歸屬於當地的社群。他們的經歷，當中既熱情、憤怒，通常還充滿了強烈的情感，譜出一曲占領區初期的關鍵恐怖之曲。一位來自魁北克的耶穌會傳教士阿奉思・杜貝（Alphonse Dub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於江蘇徐州附近如此寫道：

> 我身邊有超過三百名難民……當中女人、孩童與男子都有。他們全都緊盯著我瞧，來決定他們的心情。如果我笑了，他們便放寬心……，因為這就表示情況並不嚴重。要是我不笑，他們的心便揪成一團，因為表示情形很嚴重。我成了決定他們心情好壞的溫度計。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明白什麼是責任，明白我是那唯一能帶領我們所有人度過難關的人，明白這背後代表的意思是什麼。……走錯一步，我們這艘汪洋中的小船，就有沉沒的危險（法文原句：la barque est a l'eau）。

此時所有地方菁英都已經逃離。杜貝成了實際上的地方領袖，他還代表在地民眾，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

我實際上已經成了鎮長了。……現在我手握生殺大權。要是哪裡失火，我立刻差人去撲滅。……要是發生了什麼事，也該是由我出面解決。……我聽說有個女人和一個小孩被幾個日本兵關在一間房子裡，……我就去通知這些士兵的長官，他立刻把那女人給救出來，將他們帶來給我。……有人發現一個孤兒，他的父親才剛被日本人殺害，他們把這個孤兒帶來給我。……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和她十四歲的哥哥來要求我的庇護，他們的父親也被日本人殺害，而母親則驚嚇而死。……我在路上遇見一名即將被處決的男子。……我接到請求，要出面為他說情，最後他被釋放了。……有幾個同情這些民眾遭遇的（日本）士兵，其中一個告訴我說，他們長官那裡至少還有兩百人，正在等候對他們生死命運的判決。……要是最後沒有人出面講話，他們很有可能最後就會被殺害。……我派了二十個人過去，為這些人作保。……[24]

家人分離　對許許多多的中國民眾而言，抗戰就意味著分離：部分的家人出外逃避戰火，年輕男子離開從軍去，或是參加游擊隊。這樣的分離既突然又毫無跡象可循，沒有期限、事前沒有計畫，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離去的人事前沒有準備盤纏，沒辦法知道他們即將前往何方。在那個沒有電話、自動提款機、以及電子郵件的時代，那些離去的人，就此斷了音訊，完全無法確知能否再得到他們的消息。

單身的年輕人出走，要比一個家庭中有好幾個成員出走來得簡單。這通常就表示在這個家庭裡，必需要做出抉擇：該帶誰一起離去，而誰又該被留下來。離開的人會是父親、年長的兒子與年輕的女子；而被留下來的則是老人、年幼的兒女，在眾多妻妾的家庭裡，妻妾、僕役、管家也會被留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就將他的第一個妻子和兒子送到香港，而將第二個妻子留在身邊，以便在刻苦的指揮所生活裡，能夠照看他的孩子。山東省主席何思源也有類似的情況。他娶了一名法國女子為妻。何把他的外籍妻子和他們的四個孩子送往天津法租界，然後他前往山東山區，領導該地的游擊戰[25]。

出外逃難的難民，可能得拋下部分或是全部家人。年長者通常必須被留下。成年的子女曉得，這一去也許就是永別；他們不再能對其父母與祖父母盡孝了。在中國民眾的生活裡，和家人分別是時常出現的場景，例如出外求學，或是創業，但是這樣情況下的分別是事前計畫好的，已經將各種責任交待妥當（通常是委由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代為接手）。戰時與家人分別，卻與上述情況大不相同。這樣的分離會導致人們心中深深的悲痛、遺憾，並且對於侵略者投以劇烈的憤恨之情。一九三七年八月，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動身南遷長沙以前，先回杭州老家探望父親：

當我向父親告別時，我心裡有一個感覺，怕自己從此沒有機會再見我所敬愛的父親了。父親所施於我的實在太多了。但是我所報答他的卻又如此之少。後來我的家鄉遭到轟炸時，他遷到山中，以栽花養鳥自娛，戰事發生兩年以後的一個早上，他像平常一樣起得很早，他忽然感

到有點頭暈，回到臥室，即告去世，享年八十。他不過是戰爭的間接受害者之一。戰爭對老年人實在是很大的磨難。[26]

某些分別是突如其來的，事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因為日軍入侵而離家的人們，後來發現他們就此與家鄉斷了音信。邢福瀛在一九三七年時離開家鄉濟南，到火車行駛四小時車距的天津去上學。他就讀的學校內遷到四川。邢在畢業以後投身軍旅。在抗戰結束後，邢被派往台灣，並在那裡終老餘生，再也沒能回家。抗戰使他和家鄉的親人永遠分別。

海外華僑也遭遇了類似的意外分離。那些在抗戰爆發之初回國探親的人，全都被迫困在國內，並且必須要熬過整場戰爭，因為抗戰中斷了這些僑胞在國外僑鄉家屬探望他們的管道。一九三七年，馬貝瑞（Barry Mar）的雙親帶著他從加拿大回廣東短期探親。他們就此被困在中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能返鄉。當他們一家回到位於加拿大薩省（Saskatchewan）穆斯喬（Moose Jaw）的家園時，貝瑞必須得重新學說英語[27]。

這些家庭離散很難說是殘酷的暴行，可是它們全都使人十分痛苦，因此也算是日本侵華所帶來的長期效應。家庭被拆散的痛苦，是無法以統計數字來衡量的，但是它帶來的破壞，也不會因為它無法以統計數字呈現，而有所減少或增加。這樣的分離對許多家庭來說，代表了故鄉一去不復返，代表了這些離鄉而去的人，他們和故鄉之間的連結，永遠的失去了。

社會重組

家徒四壁
A family with only four walls, all possessions gone

日本侵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重組。戰爭帶來的莫測變化，意味著一度能藉著財富維護自身地位的人們，如今能夠保護自己的手段，和窮人沒有兩樣。有一種嚴酷的平等待遇，無論你原來是貧是富，都必須要承受：財產的破壞毀滅、收入的喪失，以及家人的死去。在這場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戰鬥裡，人們的天賦、錢財、以及社會地位，全都不如緣分來得重要；緣分是一種神祕的命運力量，許多人相信自己的命運就是受到緣分的牽引。抗戰使得很多原來很富有的人變得貧窮如洗。戰前社會的巨大階級鴻溝如今開始消弭。當學者、商人、士兵和工人發現，他們處在很相同的物質條件之下（換句話說，也就是窮困）、共同加入「戰爭和不幸與希望的行列」時[28]，社會的階層便受到擠壓了。

出門逃難的富人，他們的經濟能力是逐步下滑的。他們錢財進項的來源都告枯竭；只要一離開家鄉，就無法收取地租，也沒辦法管理銀行戶頭。生活變得愈來愈艱難，必須在沒有僕從的情形裡勉力維持下去。這個損失在戰爭時期看似微不足道，可是對中國的有錢人家而言，無論其富裕的程度如何，他們人生裡總是有僕役伺候著的。原來由僕役們擔負的家務既繁重又費時。對一個人來說，光是洗滌衣物就可以耗去一整天的時間；採買食物和準備餐食，也能占去

一個人整天的工夫。親自照顧孩子則是出身名門的女子們，之前所從未想像過的事情。讓他們很吃驚的是，很多流亡在外、失去家產的人，開始學著自己照料家人。建築學家梁思成學會下廚，而且當他一家逃難到雲南時，煮飯給全家人吃。梁思成的父親是知名的維新大將梁啟超，即便是在梁啟超畢生事業的最低潮，也從來沒有想過下廚煮飯這件事[29]。

在淪陷區，社會問題與經濟困境密切相關。很多家庭失去收入，因為父親隨著國民黨撤入內地，而無法寄任何錢回家。另外有些家庭則因失去了地方上的工作而陷入困境。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重鎮北平，有極多在多所大學裡工作的人們，都丟失了飯碗。商家們陷入困難境地，則是因為有日本和朝鮮的商人移入，並且得到了足以威脅本地商家的特殊待遇。被敵軍占領所帶來的恐懼，還伴隨著時常浮現於人們心頭的經濟焦慮，而這樣的焦慮，卻不能表達出來。處在這種境地，這些人們所能夠做的，就只能是「埋頭苦幹」。

物質損失　這場戰爭在大規模範圍內帶來了物質損失。這些損失包括了實際的、直接的損害，以及當前與未來收入的減損。最重要的是，戰爭也就代表著物質保障的破滅。

計算物質損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統計數據，用能夠讓損失情況看來清楚明瞭的數字形式來說明損失。這種方法對戰時中國而言並不適合。當時有系統收集的統計數據並不多。中國方面的政府機構，已經無法在淪陷區收集資訊，而在政府能確實掌握的地方，處在戰時混亂動盪的局勢下，要想製造出準確而有意義的統計數字，也是相當困難的事。在抗戰的前幾年，中國海關是少數能維持公正的機構。日本占領區的海關收集了若干占領區的資料，並且得出了被認為可靠的數據，不過這些數據，只涵蓋了日方控制的區域，並未包含未受占領的地區。而最後，隨著戰事繼續，通貨膨脹使得任何財政統計數字全都失去了意義。

對於這種缺乏準確數據的情形，我們不能由此得出一個印象，認為戰爭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並不鉅大。有些損失無法用金錢價值來衡量，但這並不能減損人們心中因為物品遭受毀壞所得出的損失感，它們的價值不是用金錢計算，而是感情層面的：家庭留下的紀錄、書籍、照片、信函、以及各種紀念品。隨著這些物品一同喪失的，是和過往歲月的聯繫，是家族歷史的情感，失去的不只是當前的物品，也是過往的時日。

中國抗戰所造成的物質損失，在規模上無法與二次大戰時的東歐和蘇聯西部遭受的破壞相比，在這些地方，廣袤的土地成為無法居住的荒地；村莊與鄉鎮被夷為平地[30]。抗戰對中國家庭和個人帶來的損失，在程度上也遜於接下來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土地改革、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但是抗戰的物質損失仍然是重大的，它將家庭和社群的社會安全感侵蝕殆盡。

最顯而易見的物質損失，是戰鬥或轟炸之下所造成的財產破壞。這是長江下游三角洲許多城市地方的命運。空襲摧毀了平民百姓的財產，以及他們的棲身之處。對於平民百姓的財產，作戰的雙方都毫無顧惜。

其它形式的物質損失，則在戰鬥結束之後到來。搶掠洗劫隨著戰爭的腳步而來。中國的城

市在軍閥混戰時期已經習慣了遭到搶掠，民眾早已發展出一套藏好貴重物品的對應技術。有錢人家將貴重物品送往外國租界保護起來。到了一九三七年底，事態變得極其嚴重，搶掠洗劫像瘟疫一樣，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蔓延開來。撤退的中國軍隊或許不能免於遭受指責（軍隊在撤走時，有一項根深蒂固的傳統，就是清空他們所能帶走的一切物品），不過入侵的日軍才是主犯。下面的記述來自一則蘇州傳教士的報告，蘇州是中國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這份報告撰寫的時間，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

>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十一日）這段期間，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進蘇州城。我們見到每家銀行和商家、每戶民宅全都被迫開門。日軍士兵像螞蟻一樣在這些屋裡進進出出，搬出成綑的絲綢、絲絨被、商鋪的貨物，還有各種叫得出名字來的家庭用品[31]。

一個月之後，在從松江到上海的路上，這位傳教士遇上了好幾股才剛搶掠完畢的日本士兵：

> ……滿載著大小箱子的黃包車，被拴在騎兵戰馬的後面拖行，而日本士兵則騎乘他們從鄉間搜刮而來的驢子、母牛、甚至水牛。活豬被綁在火砲的拉車上[32]。

強迫徵用民眾的財產，是一種變相的掠奪，在淪陷區與自由地區都有這種情形出現。在北方的幾座城市裡，有大量的民間財物遭到徵收。日軍進駐北平燕京大學的校園，將這所學校改作為軍醫院。民宅被軍官和政府官員所占用。而在未受日本占領的自由地區，大院落、寺廟、祠堂和民宅都被挪用作為學校、政府機關、以及難民收容的場所，通常沒有任何補償。

另外一種變相的損失，是由於放棄而造成的。從淪陷區逃出來的民眾，必須將他們的財產留在原地，有時候是委託親戚或朋友代為照管，但是大多的情形，是沒有人可以代為看顧。許多這類的財產，在戰爭結束之後都無法收回；它們一旦放棄，就永遠無法取回了。

上述所有這些物質損失都會引來同一個結果：社會均貧。

社會學家孫本文從抗戰造成的物質損失著眼，他檢視戰爭和轟炸所產生的可怕社會動盪不安，以及在戰時盛行的各種搶掠、偷盜和破壞毀滅。有錢人雖然可以雇用保鏢試著守護他們的財產，但即便如此，他們也難以保護財產不受空襲轟炸的破壞。對許多人來說，物質的損失是全面的：房屋、衣物、用具、牲畜和存糧。甚至是一般的小富人家，都可能很快的變得一貧如洗[33]。

人們對於物質損失的各種反應，是難以預測的。有些人將他們的財產損失看成是一種解脫，是一種不役於物的方式；大部分的宗教教義，都教導人們不要被物質所綑綁，如此才是實踐教旨或者開悟的關鍵之道。中國悠久的佛、道傳統要求人們放下對物品的執著貪念，甚至還要人遠離塵世，在窮鄉荒野之處隱居，這都有助於某些人戰勝心中對於失去財產而起的痛苦。

有些人則接受物質損失，將其看作是對他們生存本領與手腕的一項挑戰。政府公開支持、提倡的「克難精神」，成為抗戰前期的主旋律。節儉刻苦是當時政府的要求。政府領導人自己就以身作則，故作姿態的吃著簡單的餐食。蔣介石在政府西遷到重慶後，住在一幢位於山頂的小屋裡，生活十分簡單。中共則採行更加刻苦的政策，這部分是因為他們生活的地方極為貧瘠使然。黨的領導人們在小菜園裡耕作，並且穿著手紡的棉布衣。毛澤東自己種植菸草，不過這些菸草也許無法持續供應他個人的香菸需求。

對於物質損失，雖然有上述這些正面回應，也許還會因此而讓個人有所成長，許多人還是因為他們蒙受的損失而大受影響，變得痛苦、焦躁而迷惘困惑。物質生活世界的崩解，讓人們感覺容易受到傷害，惶然不安。他們對於發戰爭財、牟取暴利的人，產生了愈來愈強烈的怨憎情緒，而這類發戰爭財的人，才是最可能在艱困時期過上好日子的人。

在西方，物質上的損失可以因為保險理賠以及政府在大災難後的賠償而獲得緩解。可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保險產業還處在嬰兒時期，而保險業務能涵蓋的範圍，也很少能超出沿海的通商口岸。蒙受財產損失的人們，因此只能仰仗傳統的經濟援助體系、信用周轉貸款、以及家庭的支持。這些體系依靠三大要素支撐：完整的社群、穩定的貨幣幣值、以及求助者在時間上能夠錯開。這些條件在抗戰時的中國全告瓦解：社群不再安好無損；有各式各樣幣值波動起伏的貨幣；而需要援助的人，此時如潮水般的湧來。這就代表在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裡，大部分這些重大的物質損失，無論是短期或長期的時間裡，都不可能得到彌補。

政府稅收與貿易損失　在各種損失當中，有一個容易統計的區塊，就是政府稅收的損失。隨著中國許多最為富庶的地區紛紛淪入敵手，中央政府的財用宣告枯竭。稅源收入直線滑落；政府喪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關稅收入，百分之六十五的鹽稅收益，以及百分之九十的統稅進項。面對這樣驚人的損失，只有幾項挽救彌補的辦法：撙節開支（在戰時不可能做到）、徵收新稅（由於原先徵稅的地區淪於敵手，因此也不可能）、借貸（鑒於當時有能力提供借貸的機構少之又少，這項辦法很困難）、或者是印鈔票。印鈔票成了募集資金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通往通貨膨脹的直線道路[34]。

政府收入的減少，有部分與中國對外貿易的瓦解有關。作為貿易活動信號的關稅收入，在一九三七與三八年之間直線快速下降。國際貿易在好不容易從經濟大蕭條的衰頹裡反彈後不久，便再次宣告萎縮。長江沿岸各個港埠都受到下游戰事的蹂躪、以及政府在江面上設置的封鎖線影響。一九三八年的進口貨物關稅不到前一年的十分之一（進口關稅由一九三七年度的法幣三千零九十萬五千一百零七元，跌到隔年的二百六十五萬七千零三十九元），而出口稅則由一九三七年的一千一百七十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九元，下跌至一九三八年度的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八十元[35]。這是一場經濟大浩劫。

客運交通在抗戰爆發的前幾個月裡，幾乎完全消失。在所有可用的船舶全都溯江而上、西遷到後方之後，河流運輸就告停擺。經由上海作為轉運門戶的國際客運也幾乎中止。到了

一九三七年底，西門子公司派駐上海的代表報告說，港口裡只剩下法國和義大利的客輪航線還維持著營運[36]。

國內貿易在戰爭爆發的前幾個月，遭受到徹底的破壞。許多主要貿易路線都斷絕了。政府的軍隊炸掉多座鐵路橋梁，並且封鎖長江，因此而切斷了大多數的主要貿易路線。與此同時，華北的第三大交通路線大運河，則在敵軍的占領之下。還沒有遭到切斷的運輸路線，很容易受到空襲和戰事的傷害與破壞。貨物在運輸途中可能蒙受的風險實在太大，商人們因此不會將貨物運送上路。隨著戰事進行，商人們展現出極為高明的手腕，將貿易又恢復起來，但是在抗戰爆發的前幾個月裡，國內的長途貿易形同崩潰。在日本占領區，商人與零售業者比較沒那麼恐懼貨物的直接毀損，他們主要關切的議題，是失去了後方的銷售市場，以及日本占領軍高層對於日本與朝鮮企業的優惠待遇政策。

地方市集是農村貿易經濟的關鍵組成部分。抗戰在長江下游地區造成的立即效應，就是使得這些依靠買賣貨物作為基礎的經濟活動陷入癱瘓。在江南這個「魚米之鄉」，農民栽種作物不但是為自家食用，也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賣。過不了多久，各種作物的收入暴跌；戰事使得作物交易中斷，而這是發生在一個農作物豐收的年份：「……由於交通隔絕，許多農村作物無法運出。例如，米與棉的價格，在內地產區跌至谷底，而於此同時，在其他地方，因為供應短缺，已經迫使價格急遽飆升。[37]」隨著農村市集的崩壞，它們原先所承擔起的其他職能也為之瓦解，其中包括了各項金融周轉業務、醫療照護、以及勞工的聘僱。

對勞工和農民來說，聘僱工作是至關緊要的問題。在抗戰爆發後的頭幾個月裡，隨著若干工廠西遷到後方，若干工廠關門歇業，上海與其他工業化地區有數萬製造業勞工丟失了差事。運輸業的工作機會也告衰退——除非人們願意追隨政府和軍隊，撤退到後方內地去。在沿海地區，漁民再也不能出海捕魚，因為海岸線上還沒有遭到日軍占領的地方，都被日本海軍的戰艦封鎖。捕魚收入因而劇烈下跌，很久都不會改變。

丟掉工作，就意味著喪失家庭收入。對於農村家庭而言，至少還能勉強圖個溫飽，因為他們的損失沒有城市家庭那樣巨大。但是那些原本依賴在外地城市（如東北，或海外）工作的家人匯錢回家的農村家庭，損失就非常慘重了。失去收入在這些家庭的肩頭上造成壓力，這種壓力在短期之內沒辦法獲得紓解，因為根本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有幾個部門的職缺，在戰時產生增長——軍隊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有更多部門的工作，則就此消失無蹤。

社會動員

盡忠報國 38
Serve the country loyally

日本對中國的威脅，已經蔓延滋長了太長的歲月，以至於當它真的發生時，侵略本身已經不令人感到震驚了。真正使人們感到震驚的，是進攻的程度、戰事的激烈、以及轟炸所帶來的

摧殘。日本侵華的鉅變，在中國製造起一波巨大的愛國浪潮。這場戰爭在最初起始時是一場衛國戰爭，一場將大部分人民捲入其中的抗戰。

各式愛國口號都是由上而下制定的，但是它們反映出基層大眾的感受。戰爭在爆發後的前幾個月，產生了一股極其驚人的刺激效應。愛國浪潮第一次能夠超越地域、鄉里和家族關係。這場戰爭被視作是一次種族間的戰爭，中華民族遭受另一個民族的侵略，而侵略者似乎將中國人看成是更低等的民族。一種全新的民族精神（國情）蓬勃開展。知識分子與學生的一切努力，都在宏揚民族主義精神，這些傳承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努力，現在到了收成的階段——其響亮高亢的程度，出乎任何人所能想像。

中國不會亡
China cannot be lost

這是一句抗戰初期的偉大口號，它在人們口中吶喊，被塗寫在牆上，並且於各類集會遊行當中受人吟唱。日本侵略中國，使得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成了民族主義者；原先對家庭的各種責任，現在退居次要地位。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北平保衛戰失利後陣亡的趙登禹，於上前線之前留書給他的母親：「忠孝不能兩全，兒為報國，無法盡孝膝前。如兒戰死，請恕兒之罪。[39]」

民族精神與戰火鍛造出的團結一致在舉國各地迅速發展的同時，作為社會基礎磐石的家庭，卻正因為戰爭帶來的動亂而遭到瓦解。動盪與流離、拋棄家園和財產、以及一夕之間因為

抗戰而突然變得貧窮匱乏，都被看作是為民族而犧牲。在當時用來激勵人心的宣傳敘事裡，被迫逃難正是一種英勇的表現，因為它彰顯了人們最佳的一面，並且讓他們成為真正的愛國者。

走在這些愛國者隊伍最前列的，都是年輕人。抗戰爆發後的前幾個月，各所大專院校及各級學校引發一股出走潮，由華東、華北的占領區向後方和外國租界遷徙。下列的表格顯示了大專院校遷徙的規模。[40]

年輕學子們成群結隊的離開就讀的大學，和他們的師長一起，或搭火車、卡車、船隻，或是步行，踏上未知的旅程。這些出走潮的背後有政府出資，因為政府認為中國必須要確保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以求在戰爭結束後培養治國人才。這些年輕學子都被豁免兵役。

中小學孩童也跟著疏散，尤其是那些就讀於政府興辦的菁英中學的學生更是如此。何保羅（Paul Ho）當時在江西南昌的一所中學裡讀書，學校鄰近他的家鄉新餘。當南昌在一九三七年底遭受日軍轟炸後，學校就發起疏散，師生步行遷徙到一百六十公里外的井岡山。何保羅來不及和母親道別，甚至一度還沒辦法向母親告知他的行蹤。他的信件花了兩到三個月的時間，才穿越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寄達家中。何保羅就讀的班級被分配到一處村莊，村裡原來的年輕人和男孩們無論出於自願與否，都因為參加

	一九三七年六月	%	一九三九年六月	%
占領區	92	82.9	4	4.4
非占領區	13	11.7	59.2	65.4
外國租界	6	5.4	27.5	30.2

長征而離鄉遠去；這些人的父母很高興讓孩子們借宿。何保羅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又回到家鄉。當他再次踏進家門的那一刻，他的母親驚喜過度，無法言語，眼淚直流[41]。

何保羅的故事，在數十萬因為戰爭而與家人分離的年輕學子當中不斷反復上演。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和家人分別是一種解放，可以逃離舊日家庭體系的糾纏和束縛，但是即使這些歡欣鼓舞成為自由身的年輕人，仍舊想念著他們的家人。在當時，他們並不曉得，很多人就此和家人永別。

結論

抗戰爆發後的前六個月帶來痛苦和混亂的程度，之前沒有任何中國人民能夠想像得到。即使這個國家經歷過辛亥革命和軍閥混戰的歲月，也還是無法承受日本侵華所帶來的恐怖。衝擊非常巨大；而危疑不定與不安全感，甚至更為嚴重。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儘管很多人對於戰事進行的時間，已經有了各自的臆測。這些猜測是相互矛盾的。有些人接受日本人將永久停留在中國的事實，認為日本勝利殆無疑義，這場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他們必須調整自己的生活，以求適應這種「新常態」。更多的人則感覺到這場戰爭根本就沒有結束，它會進行到日本人被趕出去的那一日；他們決心抵抗，立志反擊。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們，完全不知道未來將會如何；他們身心受創，被恐懼和焦慮所逼迫，眼前沒有一條清楚的道路可走。

抗戰的頭一個階段，是一場極為可怕的衝擊。中國政府和民眾對於侵略感到驚駭，對於他們奮起抵抗則感到驕傲自豪。在日本政府和軍方裡，有些人也許已經明白，他們業已陷入日後被稱作「支那泥沼」的困境裡；這個模糊的理解，卻並沒有能夠引來日本的戰略撤退，反倒是更加速他們侵略的腳步（見延伸閱讀四）。

⊙延伸閱讀

閱讀一：岳飛，〈滿江紅〉

這闋詞將當前的奮鬥和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岳飛連結在一起，還有一個未曾言明，但是讀者都能心領神會的寓意：岳飛遭到背叛，並且被謀害。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閱讀二：林語堂，《京華煙雲》

主角一家人足堪傳頌後世的故事結束於一九三八年元月，當時，他們在浙江杭州加入大批難民向大後方撤退的行列。女主角的名字木蘭，是依照古時傳說的女英雄花木蘭而取的：

在廟下面，有成千成萬的男女和孩子，都在這燦爛的元旦早晨，穿越美麗的田野，並且在軍車經過的時候歡呼喊叫。士兵的歌聲又響起來了：

山河不復誓不返！

木蘭因為與他們挨得很近，心中突然被一種新奇的情緒牢牢抓住。她覺得，那是一種幸福

的感覺、一種光榮的感覺。她從未如此感動，人只有在忘我地沉浸於偉大的運動之中才會如此感動。她記得在北京觀看孫中山先生的移靈儀式時，內心也曾有過這樣的感動；不過雖然同這一次很像，但不像這次，強烈到她的身心都大受震動。震撼她的，不僅是那些士兵，還有這個移動的偉大行列，包含她在內的廣大人群。

她的國家意識從未如此鮮明強烈；她也覺得，一個民族，只要忠誠團結，雖在逃避共同敵人之際，依然是堅強持久一如萬里長城的民族。她聽說華北和華中的所有人民都在逃難，四千萬男女同胞如何西遷，形成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為的是在中國大後方，建立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她覺得這四千萬人是按照一個基本的韻律前進的。處在這些極端窮困和痛苦的難民間，她卻從沒聽過一個人埋怨政府的抗日政策。她看見，這些人全都寧願作戰，而不願意當亡國奴；曼妮就是一個例子，雖然這一次戰爭摧毀了他們的家，殺害了他們的親戚，除了留下個人僅存的碗筷，他們已一無所有。這就是人類精神的勝利。再大的災難，人類的精神都能克服且超越其上，並把它轉變成偉大和榮耀的事[42]。

閱讀三：老舍〈自述〉

這篇〈自述〉，寫於一九四一年，當時距離作者從濟南逃出，已有四年時間；他回憶起自己離家時的感傷情緒：

抗戰第一年的深秋，我帶了五十塊錢，由濟南跑到漢口。一晃兒，四年了！

妻是深明大義的。平日，她的膽子並不大。可是，當我要走的那天，鋪子關上了門，飛機整天在飛鳴，人心恐慌到極度，她卻把淚落在肚中，沉靜的給我打點行李。她曉得必須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說什麼。四年沒聽見她的語聲了，沉著的靜，將永遠使我堅強！

兒女都小，不懂別離之苦。小乙幫助媽媽給爸爸拾收東西，而適足以妨礙媽媽。我叱了他一聲，他撇了撇嘴，沒敢哭出來。至今，我覺得對不起小乙；現在他大概已經學會寫幾個字了吧？

四年了，每一空閒下來，必然的想起離濟南時妻的沉靜，與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淚也就來到；可是，抗戰期間，似乎應把個人的難過都忍在心中，不當以淚洗面；我不敢哭。同時，我總設法教自己忙碌；沒有空閒，也就沒有了閒愁[43]。

閱讀四：村上春樹，《發條鳥年代記》

兩名駐紮在滿洲的日軍士兵談起侵華戰爭期間發生的事情。村上捕捉到日本人對於侵華產生的質疑，以及他們對於軍部行為所作的合理化解釋。

因為我是沒有軍歷的新任軍官，本來會被像濱野這樣戰爭經驗豐富的下士官所排斥或輕視的，但他和我之間並沒有這樣的情形。由於我是在大學受過專門教育的軍官，因此他對我抱有一種類似敬意的尊重。而我也不拘泥於階級，經常有心把他的實戰經驗和現實判斷力放在眼裡。加上他是山口縣出身的，而我是離山口縣境很近的廣島出身的，自然比較投緣談得來，容易產生親密感。他告訴我有關在中國的戰爭。他只有小學畢業，是天生當兵的料，但在中國大陸那不知何日終止的麻煩戰爭裡，他也頗抱懷疑。他把那種心情坦白說了出來。自己是當兵的，打戰當然沒關係，他說。為國家而死也沒關係。因為那是我的職業。但我們現在在這裡打的戰，怎麼想都不是正常的戰爭噢，少尉。那並不是有明確戰線，敵人從正面挑戰的正式戰爭。我們往前進，敵人幾乎不戰而逃。而敗走的中國兵脫掉軍服潛進老百姓裡面去。於是連我們都弄不清楚誰是敵人。所以我們聲稱捉匪賊，捉殘兵，而殺了許多無罪的人，掠奪糧食。戰線一直往前推進，補給卻追不上，因此我們只好掠奪。收容俘虜的地方也因為沒有糧食，而不得不殺掉俘虜。這是不對的。在南京一帶作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噢。我們的部隊也作了[44]。

⊙相關電影

- 《南京南京》，導演：陸川，二〇〇九年。
- 《拉貝日記》（*Diary of John Rabe*），導演：佛羅瑞．加崙博格（Florian Gallenberger），二〇〇九年。

註釋

1 滿洲包括了中國的三個省分：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中文裡通常稱之為「東北」。

2 「八百壯士」（實際人數大約只有一半）最終必須撤入外國租界，他們在那裡遭到軟禁，直到上海租界於一九四二年落入日本之手為止，之後這些士兵淪為日軍的戰俘。

3 General Staff, Shanghai, *Naval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Summary*, December 28, 1937.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RG25/1753/8044/VII.

4 對於這場大屠殺，當時最好的記載分別是Hsu Shu-hsi, *A Digest of Japanese War Conduct*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9)，以及Harold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Gollancz, 1938)。約翰・拉貝（John Rabe）的日記業已出版，見Erwin Wickert (ed.),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New York: Knopf, 1998)。

5 *Siemens Archiv* 9839; John Rabe, *Notizen fur die 100-Jahre Feier* [Notes for Centenary], 1943, p.9.

6 Diana Lary, "A ravage plac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Xuzhou region, 1938," i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The Scars of War*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pp.98-177.

7 Carrol Alcott, *My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Henry Holt, 1943), pp. 238-249. 當第一枚炸彈落下時，卡蘿・奧珂特（Carrol Alcott）當時從四川路走來，正要穿越南京路。

8 這些數字引自"Four Months of War,"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November 1937, pp. 24-25.

9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p.120.

10 K. A. Wittfogel, "Culture is war:' is the bomb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caprice or policy?" 收於國立西南聯大，*Japan's Aggression and Public* (Kunming, 1938), p.331..

11 *Reports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October 1937-March 31, 1939), p.11.

12 Royal Leonard, I Flew for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41), p.188. 倫納德之前先是擔任張學良的私人飛行員，後來轉為蔣介石駕機。

13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10. 冀朝鑄是知名經濟學者冀朝鼎的胞弟。

14 謝永光，《日軍慰安婦內幕》（台北：聯亞出版社，1995），頁76。

15 *Chinese Recorder*, March 3, 1938, pp. 141-146.

16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魯青分署，《魯青善救旬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頁10。

17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二日，在廈門訪問洪普仁（Hong Puren）。

18 魏宏運，《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頁166。

19 "Four Months of War," *North China Daily News*, p.127.

20 Olga Lang, *Pa Chin and His Writ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960.

21 Stephen MacKinnon, *Wuhan, 1938: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45-48; 魏宏運，《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頁163；以及張根福，《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北京：朝陽日報，2006），頁39。

22 柯象峰，《社會救濟》（重慶：正中書局，1945），頁85。

23 龐京周，《抗戰與救護工作》（長沙：商務，1938），頁3，頁16。

24 引自Diana Lary, "Faith and War: Canadian Jesuits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4): 825-852, 2005.

25 何茲全，《一位誠實愛國的山東學者》（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33。

26 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211-212. 譯按：引文據蔣夢麟，《西潮》（香港：中華書局，2008）回譯。

27 *Globe and Mail*, 21/6/2007, p.L6.

28 Edgar Snow, *Scorched Earth* (London: Gollancz, 1941), p.235.

29 J. K. Fairbank, *Chinabou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p. 228.

30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31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p.89.

32 Ibid, p.86.

33 孫本文，《現代中國社會問題》（重慶：商務，1943），頁204。

34 Ji Chaoding, *War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p.132.

35 Ibid., pp. 612-613.

36 *Siemens Archiv 8104*; G. A. Probst, reported from Shanghai, 11/18/1937.

37 *China Year Book*, 1939, p.486.

38 岳飛在第一次離鄉投軍前夕，請母親將這四個字刺在他的背脊上。九百年以後，這四個字成為一句響亮的戰時口號。

39 引自Olga Lang, 'Foreign and Chinese Shanghai,' *Amerasia* 1(9): 419, November 1937.

40 William Fenn, *The Effect of Japanese Inva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IPR, 1940), P.12. 表格內的院校數字包含大學、學院以及技術學校。

41 二〇〇六年八月，在洛杉磯訪問何保羅；二〇〇七年三月，在永新縣的採訪。

42 林語堂，《京華煙雲》，下冊（台北市：風雲時代，2010），936-937頁。

43 本文首先刊載於一九四一年的《大公報》。後來收入《老舍文集》，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180。

44 *Haruki Murakami*, translated by Jay Rubin,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New York: Bantam, 1998), p.143. 譯註：引文據賴明珠譯，《發條鳥年代記第一部：鵲賊篇》（台北：時報出版，2013），頁185-186回譯。

第二章

失敗與撤退

一九三八年

重大事件

愈挫愈勇
The more one is defeated, the courageous one is

一九三八年的頭兩個月，中國站穩了腳步，試著面對一九三七年底所蒙受的各種慘痛損失。當時在外國觀察人士當中有一個普遍的預期，認為中國政府最終還是會向日本屈服，而最應該對敗仗負起責任的蔣介石，則將會被迫辭職下野。上述這兩個預測都落空了。日本人已經讓中國舉國團結一致。「它（日本）用炸彈所作的宣傳，甚至是它的士兵們那種蠻橫跋扈的態度，早已更為有效的，使得自不識字的販夫走卒以上、所有階層的中國人，對與日本有關的一切事物均感到切齒痛恨。[1]」團結一致的中國需要一位領袖，而只有蔣介石才能擔此重任；雖然他的獨裁專斷作風遭到嚴重的限縮，但蔣仍舊在任。在武漢茁壯成熟的政治文化，沒有拘束限制，而且充滿創造力，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奔放自由的一段時期[2]。

一九三八年初，中國軍隊準備發動一波逆襲攻勢。反攻於三月在長江以北的江蘇省境內展開。台兒莊一役裡，中國軍隊打敗了日軍，這是有史以來的頭一遭。這次攻勢的戰果並沒有維持住，到了五月，中國軍隊就再次開始後撤，但是中國的抗戰意志已經確立，屈服投降不再是選項。中國準備抵抗到底的決心有多麼堅定，可以從一個跡象裡看出，那就是不計一切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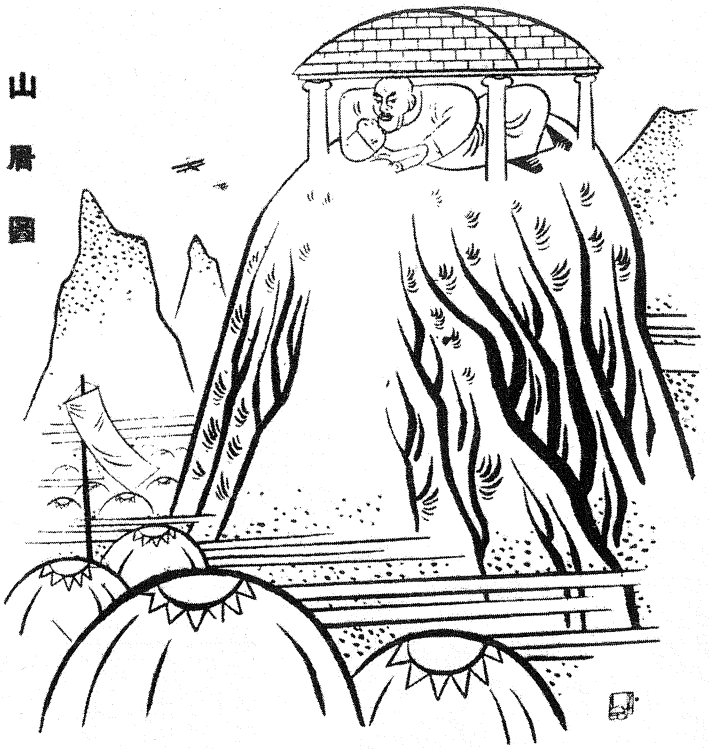


圖2.1　蔣介石山居圖（Jack Chen, *Asia*, 一九三八年五月）

施行焦土政策；頭一個例子是在這年的六月掘開黃河大堤；掘堤引發的滾滾洪滔，使得數十萬農民喪命。

這場洪水保住了中國的新戰時首都武漢，使她免於遭受來自華北的日軍攻擊，但是卻讓武漢暴露在溯長江而進的日軍大規模攻勢之下。在整個酷熱的夏季裡，中國軍隊發動了猛烈的抵抗，結果卻未如人意。各地接連淪入敵軍之手。廣州陷落。武漢結果只是臨時首都；到了十月，必須棄守。政府繼

續向西播遷，進入長江三峽後，來到重慶，在實際上等於與全世界隔絕，只靠緬甸、印度和中亞的陸路運輸，以及香港的空運接濟。大規模的陣地戰此時已經告一段落，戰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游擊戰，才正在展開。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局面已經趨於明顯：日本對中國的進攻，並未取得徹底的勝利。儘管從表面來看，日本已經控制了整個華北與華中地區，但是在實際上，他們的力量僅及於大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鐵路線。游擊隊在這些點和線的後方、甚至就在北平近郊的山區裡，都可以自由出入活動。

一九三八年，前一年已經展開的大規模難民潮繼續進行，數千萬人趕在日軍進攻之前出外逃難。當中最大的一股逃難潮，是因為黃河大堤決口而引發；另外一次則是由於湖南長沙大火所致，當時當局誤以為長沙有陷入日軍之手的危險，因而下令焚城。

那些沒有逃出敵人占領區的人們，必須想方設法和占領者共處，度過漫漫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時期。能夠離開的人，則繼續他們沒有根據的揣測，判斷這場戰爭還要持續多久。有些人覺得，戰爭將會無止無盡的進行下去；另外有人則盼望日本人很快就會消失不見。於此同時，他們全都必須生存下去。

對少數人來說，和敵人共處意味著積極合作；對其他許多人而言，這則代表著調適、尋找一個暫時妥協之下，不情願的生存之道。直接通敵的人並不多。和日本人直接打交道的人數很少，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是舊日社會菁英。至於其他的人，他們直接打交道的對象，要不是許多替日本人工作的朝鮮人和台灣人（在當時，他們都是日本國籍），就是中國籍的通敵分子。

圖2.2　難民（Rhodes Farmer, *Shanghai Harvest*, 1945, p.144.）

許多日本軍人的言行舉止裡的殘暴都令人驚駭，這種行為，在這個廣土眾民、不可能徹底以軍隊控制的國家裡，注定讓大部分的民眾對他們抱持著敵意。如何建立起一個文官統治的政府，是日本無法解決的一大問題。這場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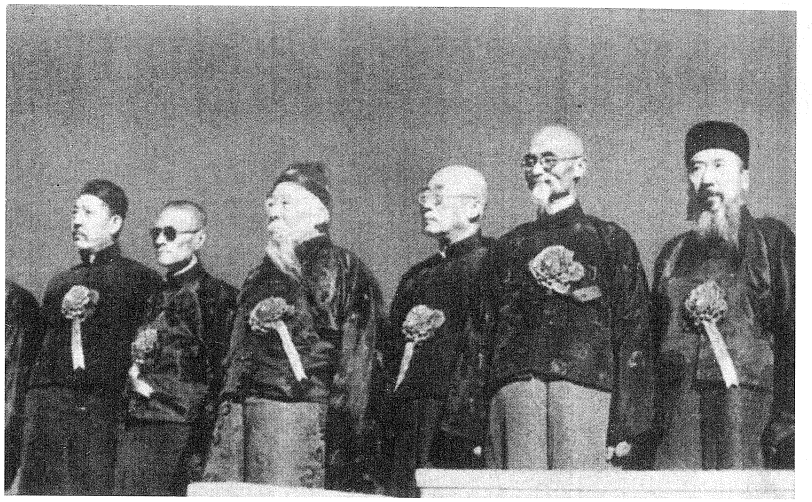


圖2.3　北京臨時政府（Andrew Caniff, Asia, March 1938.）

的暴虐無道，使得在日本人扶植的政府裡扮演主要角色的中國人士，無可避免的成為眾矢之的，被看成漢奸走狗。這就表示，很少人願意「下水」，和日本人合作。在南京成立的「維新政府」，以及在華北的各個政權，其成員素質都很低落；它們全是日本人扶植成立的（見延伸閱讀一）。

中國人稱它們為「傀儡」，對於參與這些政權的人士，以及政權本身而言，可說是相當準確。此時日本並沒有能拉攏任何真正資歷深厚的中國政治人物下水。日方想要敦請從前的軍閥吳佩孚出山，遭到他斷然拒絕；吳氏息影林泉，之後在一九三九年時因為蛀牙引發的敗血症去世。接著，到了一九三八年底，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叛逃事件，主角是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是一九四〇年成立於南京的親日政權魁首，他擔任此職位，一直到其於一九四四年去世為止。年輕時的汪氏是一位愛國英雄；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他試圖刺殺一位滿洲親王（譯按：攝政王載灃）未果。汪聰明能幹，是孫中山身邊關係密切的幾位追隨者之一。然而，他缺乏軍事方面的人脈背景，永遠無法站上他自認應得的頂峰職位。他是個深具吸引力的人物，相貌英俊迷人。一九三八年五月，一首汪氏的詩作被翻譯成英文出版，有一位評論者這麼說：「在這首詩裡，我看見了一位熱切的改革者，然而卻愛與朋友作長談；我看見了一位愛好美酒的情人，一位喜歡小孩子的丈夫，他喜歡永恆而純真的海洋、天空，和陸地。[3]」

這個評價是不對的。汪精衛是個性格更加糾結複雜的人物。一九三八年底，就在蔣介石遭到挾持的「西安事變」兩週年前夕，他悄悄由重慶出走，在河內短暫露面，接著轉赴南京。汪的叛逃是抗戰初期階段影響最為惡劣的衝擊之一。等到衝擊逐漸淡化消退，他便遭受嚴厲的譴責。在中國報刊上，對他的指責鋪天蓋地，稱其為叛徒、「汪逆」，是一名醞釀賣國陰謀的「傀儡」。一段較為冷靜的論述，對此有如下的評論：

> 汪氏不啻是政治自殺，僅此一舉，他已經將過去四十年為國效勞的功績一概抹煞，使他過往的友人和支持者為之疏遠寒心，讓他遭到國人的憎恨與輕蔑，給他自己永遠烙上叛國者的汗名[4]。

汪精衛在戰爭結束前的一九四四年過世。他從未被要求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出解釋，不過他身邊的好幾位親近同僚之後都被判處死刑。汪之前確實聲稱，他因為中國政府採取的焦土政策而幾乎失望透頂。但是這種失望是如何導致他同意出任通敵政權的領導人？則並不清楚[5]。他同意出任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權首腦一事，從來沒有獲得人們的寬恕。

主題與案例研究

抗戰爆發後的前十八個月，中國經歷了一場自然發生、事前沒有任何準備的社會革命，這場革命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程序方案，也沒有計畫藍圖。

在日本侵華這場逐漸加重的危機裡，舊有的「常規」社會消失了。許多人突然被戰爭之中的混亂與惶惑所攫獲。新的現實挑戰是生存——如何在轟炸、戰爭、以及逃難的極度痛苦當中存活下去。

生存

對平民百姓來說，最主要的考量也是最根本的法則：生存下去。生存本身是一個神祕難解的謎團，詮釋眾說紛紜。對某些人而言，這似乎事關命運或僥倖。這些倖存者感覺自己能夠存活下來，都要歸功於幸運，因為那些命運不濟的人，已經死了。有些更自我滿足的倖存者，則將能夠存活下來，歸功於他們的努力、才智、財富，或是社會地位。另外有些活下來的人，對於自己的存活歡欣鼓舞，即便他們為了活下來，已經給其他人帶來災難。他們這種態度，正好回應了一句來自中國最古老的史書《左傳》上的成語：幸災樂禍；這句成語是德文「Schadenfreude」的古代版本，意思是將他人的不幸看作愉悅之事。

有些人將其能活下來，歸功於宗教信仰，證明了神明（無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戰時基督教傳教士留下的紀錄裡，充滿了禱告力量的見證：「彭先生是我們其中的一員，他在空襲來臨時，跪在火車站裡禱告。當他站起身來，赫然看見身旁有十一個人身亡。他受到這樣的神助之後，內心充滿喜樂。[6]」在徐州教區的耶穌會傳教士們鼓足勇氣，用盡全力拯救出數千名難民，使他們免於日軍的殺戮，這是因為教區被占領的時間，是聖母瑪利亞的月份：五月；瑪利亞在這個地方顯現，以庇護那些呼求她名的人們[7]。

生存本身也可以是痛苦的地獄。在被棄守的首都，滿目所見盡是荒涼。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之間，南京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L. S. C. Smythe）在倖存的市民裡進行了一次抽樣調查。這次的調查是在充滿恐怖氣氛的環境下進行的，對於方才發生的大屠殺，只能低調謹慎的

暗示提及。調查的結果顯示，原有的市民百姓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那些倖存留下的人口裡，百分之四十三是由各地前來避難的難民，在國際安全區內（或是根本不得其門而入）仰仗著外國人士的援助和保護。有丈夫、妻子、孩子的「正常」家庭數目，這時急遽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女人當家的「破碎家庭」，她們的丈夫都已經死了，或是被「抓走」，而幾乎都可以確認遭到殺害[8]。留下來的人們，都陷入赤貧匱乏之中；百分之七十八的受訪人表示自己沒有任何收入；另外百分之十六的受訪者則有微薄的進項。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收入足以維持生活。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從事小本生意，或是製造業。他們之所以留下來，是為了保護自己僅有的資產，或是因為太過貧窮，而無法出城逃難。現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受訪者，還能夠保住戰前從事的工作[9]。

南京的物質結構所遭受到的破壞，並不亞於市民的處境。政府雖然沒有在撤離之前縱火破壞，但是全城已經在日軍進占以前慘遭轟炸，日軍在占領之後又大肆洗劫，因而飽受摧殘。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建築物都遭到摧毀，或是嚴重毀損，大多數的建築（百分之六十三）被劫掠。有若干財產已經被逃難出城的人帶走，可是絕大多數財產還是於占領期間損失（百分之六十七）。沒有遭到日軍洗劫的私人財產，都是地方盜賊從被放棄的房屋和商鋪裡偷出來的。那些逃離南京城的人，大多數根本身無分文，甚至連寢具都付之闕如[10]。的生存環境，想必很嚴酷：活在一座如同廢墟的城市，周遭都是死去的亡魂。南京城裡的人們飽受驚嚇創傷，以至於他們無法顯現出任何對存活下來的感激或喜悅之情。

無論活下來的原因作何解釋，倖存者的人生都因為他們這番遭遇而起了改變。他們全都從原來生活的世界被連根拔起，生活在新的現實，通常也身處新的環境裡。那些逃難到後方的現代社會菁英，發現了一個他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中國：比起東邊，這裡更加落後、更加傳統，物質條件也更加艱難不適。他們筆下的敘述裡，提到令人震驚的低落物質條件，也說到讓人滿心不愉快的和老鼠、臭蟲、蟑螂、汙垢為鄰的日子。他們身旁環繞著新的語言。他們當中大部分都聽不懂華西濃重的方言腔調；他們感覺自己是來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抗戰的初期階段，適應困難環境的需要與能力，被看作是高貴的，是一種為國家犧牲的意願，情願放棄自身的榮華富貴，投身抗戰大業。在抗戰的早期，幾乎所有到大後方的人們對此都很感自豪，沒有怨言。這種情形在稍後，就改觀了；妥善應付艱困環境這件事情，愈來愈和在延安的共產黨有關聯。

抗戰精神

在一九三八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反抗是攫獲大部份中國人內心思緒的情緒，那是一種對於前一年底降臨在這個國家的絕望與衝擊所起的反彈、振作心態。中國軍隊的重新振作，特別是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促使大眾的心態產生了強有力的轉折，匯聚成一股抗戰的精神。這種情緒的背後，有來自武漢、重慶和上海的未占領地區發起的高超宣傳戰運動所支持。來自海外華僑社群和外國援助組織的金錢挹注和加油打氣，如潮水般湧入中國。

這是一股樂觀而振奮人心的情緒。「為國家，為民族，為民主，為自由，為家鄉，為子孫」；這個早期的抗戰宣傳口號捕捉到人們愛國、犧牲小我、堅忍卓絕的情緒。

這種「我們頂得住」的精神，是兩年以後倫敦遭受德國轟炸時所興起奮戰抗敵精神的先驅。隨之而來的，是對環境的調適能力，以及無論多麼艱難困苦，也要正常過日子的決心。一九三八年夏初，廣州遭到反覆轟炸。經過兩個星期的空襲，這座城市仍舊屹立不屈：

> 今天的廣州，是一座有著劇烈反差的城市。許多區域持續過著平日的生活，在這座喧囂吵嚷的大城，伴隨著熟悉的忙亂與推擠。可是，就像上海閘北那樣，在戰爭期間所造成的荒涼與破壞，或許在區區幾步之外就能見到。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密集空襲時降臨到廣州城。炸彈落處所留者，盡是死亡與毀壞；那些反覆遭到轟炸的地區，被認為是極度危險的區域，很少有生靈駐足。窗簾早已放下，門閂也已拴起。有的彈坑直徑長達九公尺，將殘存的建築、磚塊、石頭、廊柱等燒得焦黑，被炸得四散碎裂的窗格，則為這從天而降的恐怖提供了令人生畏的證明。
>
> 這座城市與上述截然不同的景象，幾乎是同時並存在這些地區裡。汽車、人力車和其他種類的車輛載具爭搶於道路之上，同時間還有大量的行人在路面上穿梭來去。商家和餐廳門戶大開作足生意。小販扯開嗓門，以最大的音量叫嚷，販賣水果和其他貨品[11]。

抗戰精神裡，還包含了對捍衛神聖國土者的深深感激；這群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人，就是中國的軍人。

軍人地位的提高　在傳統菁英的觀念裡，軍人是受到輕蔑鄙視的。庶民大眾對武術和俠客的喜愛，並沒有穿透到社會階級較高的人們心中。興起於晚清、並在清朝覆滅過程裡出力甚多的新軍，在一九二〇年代已經墮落為軍閥武力，而本身同樣具有強烈軍事化傾向的國民黨，於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也未能使軍人的地位有所提升。真正讓這種情況改觀的是戰爭。中國軍人受到大眾歡迎，甚至被愛戴，他們被看作為拯救國家而奮戰的英雄人物。他們不再隸屬於原先軍閥混戰時期的部隊了，而成為國家的軍人。

中國軍人英勇抗敵的縮影，是八百壯士孤軍，這個加強營於一九三七年十月據守上海四行倉庫。到了一九三八年，這些士兵在密集的宣傳攻勢之下，成為新的國家英雄。有部以這支孤軍為題材的電影，在一九三八年中上映（這也是少數於武漢攝製的電影之一），伴隨著一首歌頌他們英勇行為的歌曲，幾乎成為舉國傳唱的國歌。軍人的形象不斷提升（見延伸閱讀二）。舊日關於當兵的諺語到此產生了翻轉。原來的俗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變成了武漢街頭一張海報上的標語：「好男要當兵，好鐵要打釘」[12]。

在一九三八年，中國軍隊為了他們的新角色，以生命和受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許多士兵而言，受了傷就等於是宣判延期執行的死刑。英國女記者范爾蕾．克瑞希一馬克斯

圖2.4　士兵行軍經過南嶽。（Farmer, p.193）

（Violet Cressy-Marks）描述她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見到的場景，地點就在台兒莊戰場的西側，當時有一列滿載傷患的火車停下卸客：

> 車門搖搖晃晃的慢慢打開，車裡面真是人間煉獄！裡面的傷兵倒臥在鐵皮車廂上；鮮血已經凝固，全都黏糊

地積在地板。地板冷得怕人，而甚至沒有可供他們倒臥的稻草。很快的，醫官指出當中已經死去的人，死者被抬出來，堆成一座小山。接著，他點出那些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人，他們也被抬出來，堆成另一座小山。那些傷得太重、無法進行急救的患者也跟著被抬出，其他的傷患則被帶出，盡可能的給予醫治，試著保住他們的肢體和性命。正忙得不可開交時，另一列火車駛來，停在這列火車的後面。我提了盞燈，走過去一瞧究竟。情況和這裡一般無二[13]。

傷者因為其勇氣與堅忍而備受表揚，專門照顧傷兵的特別醫院也在後方設立起來。但是這樣的表揚和照護，在一個醫療條件極度有限的社會裡，是難以救治這些傷患的。加拿大外科醫師白求恩（Norman Bethune）當時在陝西的中共部隊裡服務，他帶來當地人不懂的技術以救治傷患。在他於一九三九年過世之後，還被毛澤東指名褒揚，作為國際主義人士服務奉獻的楷模。

負傷而存活下來的士兵，註定要貧困匱乏度日，因為傷者既得不到長期的醫療照護，也沒有撫卹。傷兵的悲慘處境，加上那些被拉伕入伍壯丁的遭遇，就成為各界對政府嚴厲批評的焦點所在。士兵們的生活不但艱困，通常也很悲慘。他們與家人分離，重逢之日遙遙無期。與此同時，他們的家人也飽受音信隔絕與貧困交加的煎熬，分離的兩方都同樣的焦慮憂愁（見延伸閱讀二）。

在另一個新出現的戰時現象裡，歌頌軍人也是主旋律，這個現象，就是大合唱。

戰時大合唱　抗戰中有一項大受歡迎的創新之舉，是人們之前料想不到的，那就是群眾大規模歌唱的大量出現。合唱在中國算是新鮮事。從前，按照傳統，談到歌唱，那就只有戲曲的唱腔，幾乎總是獨唱、勞動曲和民歌。頭一首出現的大眾合唱歌曲，是〈義勇軍進行曲〉。

抗戰一爆發，中國就被歌唱的浪潮席捲。每天都有新的歌曲推出；僅僅在一部歌曲選集裡，就收錄超過一千五百首歌曲[14]。這些歌曲裡，有軍歌、懷鄉的鄉愁歌曲、支持前線士兵的歌曲、號召徵兵的歌曲、歌詠自由的歌、以及憤怒的歌曲。在每一次重大事件發生之後，立即就有新的歌曲出現。它們可能只由少數幾個人演唱，或是多人合唱，而不需要音樂伴奏；這些歌曲成為戰時文化最為流行、也最為直接的形式[15]。

有些作詞作曲者不難想見。田漢與詩人艾青都寫了一系列的歌詞，作家老舍和詩人聞一多同樣也是如此。後來出任駐美大使的知識分子領袖胡適，寫了〈上山〉的歌詞，由語言學家趙元任譜曲。

博學多聞的郭沫若寫了好幾首歌，當中包括了〈中國婦女抗敵歌〉。另外有些作詞作曲者，則是政界和軍界的菁英。從前，中國的文官和帶兵的武將有作詩的傳統。現在，他們改而寫歌。很難想像英國或美國的資深政治家寫得出流行歌曲，更別提像蒙哥馬利（Montgomery）或巴頓（Patton）這樣的粗莽武夫了。國民黨內的政治人物陳果夫為〈青年歌〉、〈尚武歌〉、〈國旗歌〉寫歌詞。他的胞弟陳立夫寫了〈抵抗〉。寫歌這股風潮，跨越了黨派的界線。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寫了〈贈寒衣予前方將士〉。白崇禧將軍則寫了一首歌〈勤夫從軍〉，鼓勵年輕人參加軍隊。

圖2.5　抗戰之歌

這些新歌的配樂，來源各有不同。有些曲調是改編自中國或歐洲的民歌，少數則在古典曲目裡取材。國外作曲家所譜的曲子很受歡迎，古典與當代的歌曲都獲得改編。孟德爾頌（Mendelsohn）的〈雲雀歌〉（Lerchengesang）被加上中文歌詞，成了〈新空軍〉。古諾（Gounod）所作的歌曲分別被改編為〈進軍歌〉與〈中華民國萬萬年〉。〈打日本〉配上一首巴哈（Bach）的曲子，而〈為中國興復向前進〉則配上另一首巴哈曲調。〈過太平洋〉這首歌配上的是韋瓦第（Verdi）的曲調。貝多芬（Beethoven）寫的樂曲也被改編成〈憶淞滬

陣亡將士〉。舒曼（Schumann）、海頓（Hayden）、和佛瑞（Faure）所作的曲目紛紛被改編成歌曲。〈馬賽進行曲〉（Marseillaise）的曲調被加上中文歌詞，成了讚頌孫中山的歌曲。讚美詩歌的曲調也被借用成歌。

另有一些新的抗戰歌曲，是由曾在歐洲研習音樂的作曲者創作的。這些作曲者當中最為多產者，首推出身廣東、曾留學巴黎國立音樂院的冼星海。冼在抗戰爆發後到延安去。一九三九年，他創作出〈黃河大合唱〉，運用黃河作為象徵，表達中國終將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念。他還創作了若干融合民謠因素的歌曲。另一首出自延安的偉大歌曲是〈美麗的南泥灣〉，這是一首讚頌開墾土地的可愛歌謠，聽後讓人在腦中縈繞不絕。（這首歌在一九九一年又重出江湖，由中國的搖滾樂天王崔健將其改編為搖滾版本。）

這些歌曲在往後的幾十年間，繼續為人們所傳唱，他們有的親身經歷過抗戰，有的則是這些人的後代[16]。可是，無論這些歌曲如何振奮處在自由地區人們的心情，到頭來還是無法紓緩那盤桓在人們心頭、明白他們已經失去太多的悲傷。就在抗戰的第二年，在死亡和物質損失之外，與家人和朋友離散的痛苦開始浮現。

家人離散

流離失所
Forced to leave home and wander aimlessly

抗戰有一個相當普遍、破壞性很大的效應，這個效應在戰爭結束以後，通常還繼續影響著人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戰爭逼使家人離散，突如其來，事前沒有任何警兆。有時候，和家人別離是出於自願，但是更多的情形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迫分離；士兵、公務員、以及雇員是奉他們上級的命令而離家。恐懼是造成離散最主要的驅動力量，其次則是愛國情操，又或者是上述兩種情緒的混合。「數百萬人和他們的親戚甚至父母雙親分離，有些是被軍隊徵召入伍，有些則是出外逃難躲避死亡威脅，但是當中有數以千計的人，為了報效國家，拋下他們的家庭。[17]」

出外逃難通常意味著和左鄰右舍、朋友、土地財產等分離，同時也是與家庭之外的親戚們分開。如果說「一個家庭」出外逃難，這很可能只是父母雙親帶著他們的孩子出走——這就表示，整個家族便隨之而分開了。有的時候，當家園被空襲炸毀，或被大火燒毀，家庭的流離失所，就變得名副其實了。「家」這個字，既可以指家庭，也可以指家園。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日本就開始了「遇見抵抗的村落，就將之整個摧毀」的策略。一九三八年四月，一輛日軍卡車在上海近郊的松江遇襲。同一天，大批日軍就出動，將該輛卡車行駛路線沿路十公里內的村

莊，盡數夷為平地[18]。既然家園與賴以為生的生計都被摧毀，對整個家族來說，這時惟一的辦法，是出外逃難，或是讓年輕人出外，想方設法支持全家人的生活。在這個過程裡，家人就被拆散了。

逃難、破壞毀滅、以及財產的徵收徵用，導致大家庭的崩壞，也代表傳統觀念裡，一個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共住一處大宅院的情形，現在宣告終結。傳統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現在，一部分的家族成員，通常是年紀大的家人，或許還是會留下；其他的成員，通常是較年輕的家人，則會離開。

家人的分離，既是身體上的分別，也是政治立場的分開。家人們對於對方如何回應日本侵略的態度，通常互不同意。這可能會導致家裡某些人出走，以反對其他積極與敵人合作的家庭成員。北平傀儡政權首腦王克敏的女兒就是一個例子。她鄙視父親的行為，因此由北平出走。另外還有一些較不戲劇性的例子，不過所有的結局全都一樣：由於政治立場的歧異，導致家人的分離，這是日後毛澤東時代所發生情況的先聲。

家人離散的發生是偶然而漫無頭緒的。蔣光鼐將軍一家在廣州遭日軍攻擊時遷居到香港，接著在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他們往廣東內陸逃難，在臨近福建邊境一帶落腳。而即便蔣將軍就駐紮在同一省境，他和家人在抗戰期間卻都處於分隔狀態之下[19]。

究竟是要將家庭置於最優先而留下來，還是要棄家庭於不顧而出逃，要作出抉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下面這三個作出不同抉擇的人的故事，就顯現出人們在作下抉擇時，通常有多麼匆促突然，作出的抉擇有多麼不正確，以及所得到的結果，又是多麼的難以預料。

豐子愷　豐子愷是中國最著名的漫畫家，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他以畫作詼諧幽默的評論變遷中的中國人生活。他在日本學習一種名為「漫畫」的藝術，並將之引進中國；「漫畫」是轉譯自英文「cartoon」的詞彙，但是它的涵義並不侷限於原來英文的用法，僅指有趣幽默與政治評論的插畫。一九三七年底，當時的豐子愷正處在創作生涯的高峰，他被迫放棄自己的家園，以及位於浙江石門灣運河旁的畫室。一次日機空襲重創了豐子愷的兩層樓住宅；在石門灣都是單層的民眾住宅裡，他的房子顯得特別醒目，因而引來了日機飛行員的注意。有三十二個人在這次空襲當中罹難[20]。

豐子愷立刻動身離開石門灣，有十六個人與他同行離去：他的岳母、他身懷六甲的妻子、他的妹妹、六個孩子、其他親戚，以及僕從。這團人搭船往內地行進。他們最後抵達桂林，豐子愷在那裡與其他多位藝術家共同度過之後的抗戰歲月。八年以後，當他終於重返家園時，發現他的房子與所有收藏的作品早已全遭搗毀。他將家人留在身邊，但是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賠上了他自己的藝術創作生涯。

郭沫若　郭沫若是位才氣縱橫的四川籍知識分子。他曾經留學日本，並且除了北伐（一九二六至二八年）那段短暫的時間之外，長期旅居日本。他娶日本女子為妻，並且和她生

下五名子女。一九三七年，他遭日方懷疑為中國間諜，於是拋下家庭，隻身出走回國。在中國，他以流星之姿在文化界中快速崛起，又因激情的抗戰宣傳家身分，在事業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武漢和稍後在重慶的時期，郭沫若都是知識分子當中的明星級人物，以其上古史研究、詩作，與出任文化行政方面的官職而聞名。與此同時，被他留在日本的家庭則遭到遺棄。郭沫若也許在內心裡因為某種程度的內疚而感到痛苦，可是在短期之內他就另娶了一位妻子，與她又生下了五名子女（譯按：郭沫若與于立群的婚姻，共有四男二女）。他不認為自己應該對複雜的個人生活負責，而是歸咎於抗日戰爭：「這一切都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造成的。[21]」

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Anna）（譯按：即佐藤富子），則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因為嫁給外國人為妻，她喪失了日本國籍。戰時，她與子女在貧窮匱乏的邊緣度日。戰後，她再次找到了丈夫，但是想要破鏡重圓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對她而言最好的安排，是讓她取得中國國籍。她遷居到遼寧的大連，在那裡以教日文維生。儘管她歷盡劫難滄桑，卻活到了九十九歲的高壽[22]。

周作人　郭沫若拋棄了他的日籍妻子與子女，而同樣娶日本女子為妻的周作人，卻走上與郭沫若截然相反的道路，周拒絕離開北平，也拒絕與家人分離。

周作人是位文學造詣高深的作家，他是位飽學之士，能翻譯希臘文、英文與日文，還熱衷於心理學，特別是哈維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研究。他還是一位雄辯滔滔的演說家，能夠就許多主張發表看法。在一九三〇年代，他因為胞兄魯迅（原名周樹人）的關係

而顯得更為知名；魯迅在日後被公認為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作家。

一九三七年，周作人和妻子、子女同住在北平，並且在北京大學執教。夏季時，他的同事們在日軍進城以前，大多都已經出城逃難。他卻決定不離開北平；在他看來，抵抗日本將是一場徒勞，因為日本必定會獲勝。他繼續他的工作，當中還包括了出席由占領軍所支持的各種場合。他這樣與敵人合作，在其他知識分子的眼裡看來，真是既令人震驚又厭惡，其程度堪與投靠納粹的法國作家路易・費迪南・賽利納（Louis-Ferdinand Celine）相比。對於自己的行徑，周作人並不感到自豪，而且宣稱他一直將與敵人合作維持在最低程度。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了。他昔日的同僚們都無法原諒像他這樣一位名聲卓著的學者，竟然允許自己的名字和聲望供敵人運用（見延伸閱讀四）。

戰爭結束後，周作人因為與敵人合作而遭到起訴，並且入獄服刑。他在一九四九年獲釋，之後忙於撰寫關於其兄童年與青年時期的回憶錄。一九六七年，他被紅衛兵迫害致死[23]。

上述這三個關於家庭離散和家人分裂的悲傷故事，正好發生在那些留下個人紀錄、並且獲得傳記作家注意的名人身上。而那些可怕的焦土政策底下的受害者，可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幾乎所有這些受害者全都在沒有得到公眾注意的情形底下罹難，或是被迫放棄家園，外出流亡。

焦土政策

破釜沉舟[24]

Smash the cauldrons, scuttle the boats

抗戰時某些最慘重的傷亡並非來自日軍的行動，而是中國方面的焦土政策所致。破壞最大的兩次焦土行動，分別是在花園口掘開黃河大堤，以及長沙大火。

堅壁清野的焦土抗戰政策被制定成為國犧牲的國策。這項政策的前提，是認為中國可以運用它廣大的幅員和眾多的人口，以空間換取時間，而不必在意任何人員的損失傷亡。從一九三一年日本奪取東北開始，中國的報界和軍政界裡就有許多論調，通常相當慷慨激昂，主張中國若想要抵禦日本的侵略，就必須使用一項弱國的武器，也就是堅壁清野的焦土行動。中國軍隊將會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國土將會成為大片的焦土地帶，而原本居住在其間的民眾則會消失無蹤。

在日軍侵華的初期，中國軍隊就開始破壞許多可能資敵、被敵軍利用的設施；橋梁被爆破，道路被截斷，鐵軌被掀翻，建築則遭到縱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山東省的省會兼商業中心濟南，在日軍進城之前，陷於大火之中。在青島，日資經營的棉紗廠於同一時間被人縱火。這些都是先發制人的破壞舉動，目的在阻止敵人取得重要的戰略資源。比起稍後進行的焦土策略，上面這些行動在規模上都算是小巫見大巫。

堅壁清野的策略被看作是中國終將擊敗日本的保證。國軍將領大力提倡焦土策略，認為這是他們採行最為成功的政策。薛岳將軍在將日軍從長沙擊退之後，作了如下的報告：

> 吾人業已贏得了這場戰爭，或更精確的說，吾人已經打破日本人在政治上控制整個中國的意圖，吾人僅憑採用焦土抗戰政策，便達到成功的結果。焦土政策已經成為吾人最主要採行的戰略。吾人已經對中國進行了破壞：遷走每一塊石頭，燒毀每一吋田地，拆毀每一條鐵軌，於是我方遂得以騰出手來，而吾人執行此一做法至為成功，以至於日人對其侵略作為，已經感到懊悔。對於侵華，他們已感到疲倦和厭煩[25]。

薛岳這番話所未提及的是，願意犧牲土地和資源，同時也就意味著甘願犧牲民眾，這是無法避免、相伴而來的結果。他的態度，可以看作是官方麻木冷酷的反應，官方的言外之意，是一種想當然爾的認定：在這樣廣大的人口之中，即便是大規模的傷亡損失也不會受到注意。但是它們確實受到注意了。每個芸芸眾生，都是各自家庭的成員，而大多數的家庭對於家裡各個成員，無不保留了詳細記錄，對他們的死去銘記在心。但是不管怎麼說，官方的麻木無情，並不適合解釋兩次焦土政策之下最為惡名昭彰的重大災禍，上層官員的倉惶失措才是較適當的解釋。看這兩次重大事件的事態發展，就知道這不是出自計算妥當的策略之舉，而是慌亂與困惑下的產物。他們所發動的，並不是對敵人的傷害，而是一場中國民眾的浩劫災難；原本的軍事

意圖，因為受難的鉅大程度而整個遭到抹煞。

花園口決堤　花園口是河南省黃河大堤南岸的一個小地方。可是這裡，卻是為害空前的一次災難開始之處：一九三八年六月，黃河大堤遭到蓄意掘開，河水隨即經由決口灌入陸地。決口所造成的洪災，奪去數十萬人的性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一場大規模百姓死傷，以及整場抗戰之中，災害規模最大、傷亡最為慘重的事件。掘開黃河大堤，是源自於中國最高軍事當局「以水代兵」的決策，將黃河作為戰略性武器，以阻止日軍沿著隴海鐵路沿線西進，同時也爭取時間，以讓參加徐州會戰的大批中國軍隊（約有二十萬人）得以撤離[26]。

洶湧而出的黃河之水，在華北平原氾濫。黃河大堤的決口，成為滔滔洪水的起始處，波及南、東兩個方向。洪水向東南流，穿越平坦的平原直達淮河、運河、長江流域。到最後，共有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洪水淹沒。

這場洪水對於被氾濫地區（後來稱為「黃泛區」）的衝擊，遠超出人們所能想像。對即將被洪水侵襲的平原地帶農村城鎮、人口稠密地區，地方政府完全無法事前警告。無論如何，事前警告對於協助百姓逃離洪災，實在起不了太多幫助。在這個全是泥造單層建築的地方，沒有任何災民收容處，沒有山丘，甚至沒有較高的建築物。唯一高聳於平原地面上的人造建築，只有黃河懸河大堤，以及各縣城的城牆。

這場水患的水深很淺——很少高於六十或九十公分——但是很難平息。由於無處可躲

避，也沒有任何救援可以指望，數十萬人死於洪水，他們或是當即被溺斃，或是在接下來的數個星期、幾個月之內，死於飢餓和疾病。按照官方的統計，傷亡人數超過八十萬。在黃泛區西側的數百萬民眾淪為災民，往河南西部與陝西省境躲避。到一九四五年時，還有六百萬災民居留在最初逃難的地方，當中有些人已經重新安頓下來，另有些人則淪為赤貧。沒有人往東逃向日軍占領區，災民心中對於敵軍的恐懼，遠甚於洪水。

這場浩劫在一片沉默之中展開。決堤之後幾個星期到幾個月的時間裡，花園口幾乎沒有出現在中外媒體的報導之中。軍事行動的主要方向因黃河決口而轉向往南，來到長江流域，而該處也正處於連日異常豪雨而起的洪災之中。像花園口決堤這樣重大的浩劫，要不被公眾所注意，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它的確不受外界所關注，而發生在長沙的大火竟然也是如此。

火城長沙　正如同蘇聯的列寧格勒（Leningrad），長沙是中國抗戰英勇抵抗外侮的象徵。這座城市遭受日軍先後四次攻打（一九三八年第一次，一九四二年兩次，第四次在一九四四年），但直到最後一次時方才陷落。長沙英勇抗敵的形象，卻掩蓋了發生於一九三八年的那場悲劇。

一九三八年以前，長沙是湖南省的省會，也是一個擁有悠久傳統的富饒之城。這座城市位居商業的樞紐，主導了由武漢往南、由廣東向北的沿河運輸貿易。長沙同時也是中國境內主要的稻米交易市場之一，還身兼華南最重要的文教中心。長沙培養出好幾個世代的官員和知識分

子。毛澤東年輕時就在這裡讀書。長沙因此在近代中國的政治運動當中扮演重要角色。湖南人裡出了許多位知名的排外運動家與政治激進分子；本省最知名的殉難烈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遭到處死的譚嗣同。在一九二〇年代，湖南採行聯省自治，並且制訂了省憲。

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長沙成為許多從北方和東南沿海地區逃難民眾的棲身居留之處。該市的人口因而膨脹到五十萬。長沙城也躍居中國的新文化樞紐。三所北方大學（北京、清華、南開）和許多上海的出版社南遷到此；許多抗戰初期階段的宣傳文宣，都是在這裡印製的。而後，大難來臨。武漢在十月下旬淪於日軍之手，湖南遭受威脅。長沙似乎難逃於兵禍。這座城市此時已經遭受日機轟炸，而且易攻難守，沒有天然屏障可以阻擋日軍的進攻。

十一月九日，蔣介石在長沙召開高層軍事會議。會中，他發表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說，引用昔日俄國火焚莫斯科，以阻擋拿破崙大軍攻城為例，主張當日軍有進窺長沙的可能時，應該將長沙的公私建築全都付之一炬。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奉命作此準備工作。囤積的燃油在長沙城裡到處擺放，省政府與許多難民則由城中遷出。十一月十二日，關於日軍正在逼近的謠言開始在城內外傳播，引發人們對於兩處地名的混淆，日軍實際上逼近的地方，距離長沙很遙遠，而誤傳日軍進攻之處，則離長沙很近。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時，長沙全城陷於大火之中[27]。這場火延燒整整三天，將全城燒成一片焦黑的廢墟。下表顯示[28]，城裡只有三分之一的建築得以幸免於難。

除了民宅與商業建築以外，長沙城中所有的古墓、寺廟、以及富人的宅邸，幾乎全部都毀

於這場大火。城裡的米倉，一共儲有一百九十萬石的稻穀，也全都付之一炬[29]。

許多當地居民，連同本來在長沙避難的難民，這時都已經逃出城外，可是大火造成的傷亡數字仍然非常巨大，當中包括了所有因負傷難以移動的傷兵在內。有兩組工作隊在大火後被派入長沙城中，負責清理廢墟與罹難骸骨，根據他們的紀錄，在城郊的鄉間埋葬了兩萬具屍首。有二十萬人無家可歸[30]。

這場災難實在太過鉅大，當局的誤判又是如此荒唐，以至於必須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政府於是將問責的矛頭對準奉命執行焦土焚城政策的人員。蔣介石在大火的隔日來到長沙，並在此停留數日。有三名高級軍官被逮捕，受軍事法庭審判，並且被判處死刑[31]。軍事法庭的速審速決並未能停損傷害，或是防止謠言的傳播：有人說，這場大火是汪精衛所發動的陰謀，他因為即

	原有房屋間數	全毀	半毀
總建築數（間）	31,884	20,838	299
店鋪		10,336	85
住宅		10,198	169
學校		55	16
政府機關辦公室		62	13
銀行		11	2
醫院		13	
寺廟		108	4
工廠		10	3
外國財產		55	7

將投靠日本，便計畫這次大火，以打擊中國的抗戰意志[32]。

這座城市的生氣被摧毀無遺。一位英國人在大火發生之後不久抵達長沙，為眼前所見景象感到驚駭：

> 自從我抵達這裡，已經過了五個禮拜，這座城市猶然死氣沉沉。少數幾個極為貧窮之人，已經慢慢出現在城裡，在斷垣殘壁之間用蓆子搭建他們棲身的小棚；在市郊幾處區域，有幾家受損輕微的店鋪，也正開門營業；可是主要的通衢街道不但全被焚毀，而且幾乎所有痕跡全被抹煞殆盡，全成了難以看出區別的一片殘瓦碎石、焚後灰燼[33]。

長沙是頭一個遭逢徹底摧毀厄運的城市，這樣的遭遇，稍後在二次大戰時，成為各個城市的常見情況。然而直到一九四四年，桂林遭到焚城厄運之前，長沙卻是惟一一座毀於「守城者」所燃大火，而非侵略者所投下的燃燒彈的城市。長沙大火，是高層浮誇愛國言詞與基層顢頇無能兩相結合之下的犧牲品。

這兩起「焦土抗戰」國策引起的劫難，都發生在中方仍能控制的區域裡。在日軍占領區裡，並未發生這樣的災難性事件。淪陷區裡的破壞並不在物質層面，而是心理層面的痛苦。

淪陷區的社會重組

那些被留在淪陷區的人們，受到戰爭帶來的影響，與那些出逃到後方自由地區、面對不確定未來的人十分不同。他們陷入一種週而復始、充滿不確定與不安全的狀態之中，他們的生活逐漸變得扭曲。原來的社會秩序已經遭到破壞。戰前的社會、政治統治階層，在政府領袖與許多地方菁英撤退到後方以後，有如被斬首斷頭。一時之間，沒有真正的菁英可以替代。

日本軍人與其非軍職的同夥是相當拙劣的占領者。他們幾乎毫無打算以文化風俗來轉變方才接手的地盤。不但如此，日方還堅持羞辱、懲罰地方上的百姓。中國人被迫在街頭遇見日本人時要對其鞠躬哈腰，藉此來表示順服；這在日本算是正式禮節之一，但在中國卻不是。儘管日本官方堅持聲稱中國民眾對於新統治者感到愉快滿意，事實真相卻全然相反。

在各城市裡，日軍的占領使得市民的日常生活嚴重受到限制。日本憲兵隊（即祕密警察）的各項活動，以及為占領軍當局奔走的朝鮮與台灣人眼線，合力製造出一種恐懼與不信任的氛圍，培養出不安全感，以及社會中的相互出賣。民眾的生活被一種對人生恐懼、焦慮的態度籠罩，許多愉悅和自然的感受，從平民生活中遠離。下列這段敘述，來自一位英國傳教士溫妮芙瑞・葛布瑞斯（Winifred Galbraith），當時她離開在湖南的崗位，短暫造訪北平；她比較了淪陷區和自由地區，兩個中國裡兩種不同恐懼的本質：

> 在「自由地區」的人們，恐懼的是空襲和敵軍進逼；他們害怕極度的貧窮、盜匪和死亡。

可是對於空襲的恐懼，雖然會讓人心神全被不安盤據，卻也是一種令人緊張、激動到極點的事情；因為，任何一刻都可能會出任何事；人們沒辦法事前做好準備，所以只能顧及眼前的事情，別去管未來如何。在北方，這種恐懼已經被免除了，但是更加危險、致命的戒慎恐懼，卻讓人不敢有所行動，甚至不敢憤怒，令人更加恐懼驚駭的是，因為這些恐懼是未知的，潛伏在每一個角落，藏匿於每一次和朋友、或與熟識之人會面的場合之中。人們害怕受人注意，走路時小心翼翼，雙眼從弓起的肩膀兩側偷瞄後方，懷疑每一個人，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放過，心中只擔心著有朝一日他們會突然消失，而沒有人會曉得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34]。

在鄉間地區，剩下的仕紳成員已經作出了留下來的選擇，並且至少有意願和占領軍當局進行合作。這個選擇很快就證明是不智的，因為在很多農村地方，日本人並沒有停留太久，而抗日游擊隊待的時間卻更長。

日本軍方的宣傳提倡回復舊有秩序，也就是儒家倫理下的地方秩序。在很多地方，還信奉舊有秩序觀的人們紛紛重新復出，他們多是在辛亥革命後就失去權位的前朝遺老，現在都浮出檯面，擔任傀儡政權的官職。在一九二〇年代出現形成的青年主導國家的形勢、以及年輕人在政壇、軍界崛起掌權的趨勢，現在全都宣告逆轉；年輕人都已離去，老一輩的得到第二春。隨著老一輩世代的重出江湖，舊日的服裝也從原來儲放的大櫥櫃裡重現天日，帶著濃重的樟腦味，跟著再次登場。中山裝和皮鞋讓位給絲綢長袍、棉襖馬褂，還有棉質布鞋。

圖2.6　一幅日軍宣傳漫畫（*Asia*，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圖2.7　日軍宣傳海報（O. M. Green, 1941, p.129）

在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婦女解放已經邁出了嘗試性質的第一步。在抗戰時期的日本占領區裡，這樣的趨勢受到遏止。淪陷區裡的性別平等被扭曲變了形。出外從軍或逃難的民眾裡，男性多於女性。這種「女多於男」的扭曲情況，出現在一個女性特別容易遭到傷害的時候，因為此時的占領軍，對女性並不怎麼尊重。強姦與害怕被強姦讓女性處在持續焦慮的狀態之中，待在家裡，使得她們實際上成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囚徒。有若干勇敢的女性，的確想辦法走出家門，到外面繼續過生活；但是有更多女性，就此躲在家中，隱居在她們宅院的高牆裡。

一九三八年，留在占領區的人們面臨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找出與日本人共存的生活之道，如何重新調整他們的生活。

與敵人共存　英文裡「collaboration」這個字指涉的意涵很廣，從正面意義到極度負面的意思都含括在內。「和敵人合作」（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這個概念，幾乎沒有辦法翻譯成意思妥適的中文。在中文裡，用來指涉負面合作意義的詞彙有好幾個。當中程度最為十惡不赦者，稱為「漢奸」。惡劣程度相等，但是更為可笑的，則是「傀儡」。

另外兩個情感上比較和緩的詞彙，一是「通敵」，另一個則是「親日」；這兩個詞彙，都帶有譴責、貶斥的寓意。「collaboration」的中性翻譯「合作」，在戰時的環境幾乎完全派不上用場；反倒是另有一個詞彙，傳達出對於人們在占領區裡討生活的理解：「活著」[35]。適用於前面四個詞彙的人們，也就是積極和敵人合作，或者是為日本人效力的人，數量非常有限。更

多的人屬於最後這一個詞彙，他們只是想要活下去——也因此，在自由地區的人們，帶著程度不一的憐憫和譴責，稱他們為「亡國奴」。

人們對於日本人的反應，有地區性的差異。在一九三七年時，台灣和東北已經在日本的長期治理之下。台灣是「模範殖民地」，而東北則已被重新改造為一個「自治邦」：滿洲國。台灣這時繁榮興盛，政府有效率，公共建設完善，人民也看似接受日本的主導控制，儘管台灣人還是天皇底下的次等臣民[36]。滿洲國被中國斥為「偽滿」或傀儡政權。雖然滿洲國的元首是前清遜帝溥儀，但是實際上掌權管事的卻是日本軍部。在這兩個地方，日本的嚴格控制，使得「與敵人共存」成為人們唯一可行的生存策略。在台灣抗日已經完全不可能，而在滿洲國，只有在邊遠的森林山區，才可能有抗日游擊隊——東北義勇軍——活動的身影。

在北方的幾座大城，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抵抗，不過這種缺少反抗的情況，不能解讀為對占領軍的歡迎。這些在戰爭爆發時無法、或不能離開北方各城的人，對於日本的占領逆來順受，沒有抗議。不過，北平這座城市具有與占領者共存的悠久傳統，而既然軍閥混戰時期，政府更迭如此頻繁，大城裡的人們對於和新統治者共處，也很有經驗；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這段時期之間，一共出了十一位總統，其中若干位，甚至號令只及於北京城內外。北平市民並不怎麼支持國民黨，因為後者在一九二八年將首都遷往南京，卻將經濟蕭條留給北平這座故都。林語堂描述了一九三七年夏季時北平人的反應：

> 那個故都裏的大多數人民，特別是真正的老百姓，卻坐在他們的家裏或茶館裏，泰然自若的談論著戰事的將臨以及那次戰事的結果，生活一切如常。
>
> 他們厭惡侵略者，但在這之前，他們早已見過了好幾個侵略者。現在北京城裏住著許多形形色色的居民，年老退職的滿清官僚，年輕的愛國學生，膽怯的官僚，和圓滑的善譏諷的政客，誠實的商人，和那替日本人當間諜的窮苦流氓。但一般人因為文化程度提高了，厭惡暴力和戰爭，同時對於在上海發生的那種恐怖和暴亂的行為也是不贊成的。因為他們是溫和的、含蓄的、愛好和平的，並且是非常忍耐的[37]。

北平城中的人們，謹慎小心的對他們的新統治者進行著抵制與反抗。有一項每天習慣做的事情，和時間有關係。日本在占領區內將時間往後撥快一個小時，與東京時間相同——這是中國被納入日本統治寰宇之內的重要象徵。抗戰期間都住在北平的德國籍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注意到，北平市民照樣以「舊表」預約時程過日子，這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提醒人們這座城市被敵人占據[38]。他還見證了一次令人驚訝的愛國之舉：一名他帶回家裡的茶館侍女，見到他碰巧擺在茶几上的德文畫報，竟上前親吻畫報上的蔣介石相片[39]。

對於日軍占領下的北平情形，最為知名的敘述，是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他在抗戰初起時由北平逃往後方，但是他的家人在戰爭期間全都留居於敵人占領下的故都[40]。於是老舍就成為了抗戰對於中國百姓帶來傷害的記錄者。在〈且說屋裡〉一文裡（見延伸閱讀一），他還

討論中國老官僚為與新來的征服者合作而造出的各種自私自利藉口，這是一項官僚們允許的傳統，而且在這樣的過程裡，還收伏了各類的征服者。

政府官員　日本占領當局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同意出任傀儡政權領導職務的人選，才幹與聲望多半低下不堪。這些人裡固然有像汪精衛、王克敏這樣一度聲望很高的人物，但是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就是個不討喜的年輕人，據說還有鴉片癮。另外有些出任占領軍政府的人，甚至更加不得人望。有一則送往位於渥太華的加拿大外務部的報告，以長老教會式的嚴苛口吻，對北平的維新政府有下列這番令人吃驚的批評：

> 一、他們全是老人。他們代表的，是存在於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國民黨崛起掌握全國政權之前的「舊政權」勢力，而其中大部分人自一九二四年起，甚至更早，就已經離職下野，遠離權力圈了。
>
> 二、他們的從政紀錄與一貫作風當中，充斥著欺騙、陰謀、背信以及叛國。
>
> 三、他們的私人生活，幾乎無一例外，皆墮落腐化且令人厭惡[41]。

有些通敵者在生意場上，讓人印象更加深刻。後來成為汪政權上海特別市市長的傅筱庵，就具有強大的商業頭腦——他同時還是長期反對國民黨的人士。他結束之前為期十三年、

居留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大連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就任市長。傅筱庵的意圖和其他的生意人一樣，只是想要繼續將生意做下去，而不像若干愛國資本家，將其產業遷往後方。而中國史學者柯博文（Parks Coble）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後者在上海商場當中所占的比例，只是一小部分罷了[42]。

地方漢奸　占領軍當局扶植的政府官員素質低落的問題，在縣一級的政權當中更為明顯；在縣級政權裡，投機分子躍居領頭地位，許多原來社會上的渣滓敗類也跟著雞犬升天。這種情況，在那些抗戰期間大多處在動盪之下的地方，更是如此。

在某些各方勢力角逐最為激烈的地方，通常很難分辨誰才是地方上領頭的人物——或者，是他們能盤據領頭的位置多長的時間。位於山東省東北沿海的蓬萊，地方政府權力交替換手的頻率，快得令人心生反感。蓬萊是座歷史古城，是前往海上祕島——蓬萊仙山的起點，也是繁榮的港埠，和東北的貿易往來極為密切。一九三七年底，國民黨派任的縣長與駐軍都逃走了。此後，蓬萊在國民黨分子、中共支持者、通敵者和地方仕紳的爭奪之下，呈現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蓬萊縣志》裡，光是抗戰八年當中縣長與鄉鎮首長更迭的記載，就用了滿滿六頁篇幅；而之前二十四年裡的人事更替，卻僅僅只有一頁半而已[43]。

有少數幾個人，在抗戰期間一直掌握蓬萊的實際權力，郝銘傳就是其中的一個。郝原先是個地方惡霸，在一九三八年縣長和駐軍撤走之後快速崛起，這多虧了他手下幾百名民兵武裝，

這支武力是從他的朋友親戚招募而來，並且配備以老軍火庫裡的槍械。他能發號施令的地方，僅及於縣城和周邊區域。歷任縣長來了又去，但是直到戰爭後期，只有郝銘傳才是真正手握實權的人。他有一個日本顧問，不過日本軍隊卻很少開進縣城裡來。郝銘傳擁有自己的情報隊，其任務是獵捕、誅殺任何威脅他的人；殺害這些受難者的託詞，永遠都是「有共產黨嫌疑」。他偏愛的幾種處刑方法裡，其中一種是活埋[44]。郝銘傳和前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簡直就是同一個模子裡打出來的，一樣是個強悍、殘忍、粗魯不文的人。在這個素來有繁榮富庶和文化禮教名聲的縣城裡，他竟能扮演頭號人物，正是這場戰爭為蓬萊帶來退化墮落的徵兆。

地方漢奸扮演的角色裡，有一項根本的矛盾衝突之處。他們很少能獲得日方的信任，原因很簡單：他們是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在日本直接控制的區域，漢奸分子不過是門面裝飾而已；在像蓬萊這樣的地方，並沒有受到日軍的直接控制，漢奸們就被允許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只要他們別做出什麼破壞擾亂日軍的事情即可，但要是他們做了，日方的報復會來得非常快速。

結論

對於大多數中國民眾而言，抗戰的第二年就像頭一年那樣，充滿痛苦的衝擊。軍事上持續的失利，抹去了春季反攻帶來的短暫喜悅之情，而難民潮甚至比去年更加擴大，花園口決堤與長沙大火兩場悲劇帶給民眾的痛苦劫難，則可與南京大屠殺相比。然而，就在這一切動盪混亂之中，中國人民展現了不屈不撓的卓絕堅忍——尤其，中國並未屈服認輸。

⊙延伸閱讀

閱讀一：老舍，〈且說屋裡〉

老舍這篇小說，寫於一九三八年，刻劃了某些人之所以願意和敵人合作的犬儒思想——或者，以較為中性的說法，是「現實主義」的態度。這種「現實主義」，總是能夠讓人們在各個時期，無論掌權的是誰，都能夠得到職位。

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占有的，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占有過，現在還享受與占有著。他有錢，有洋樓，有汽車，有兒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籍，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訃聞上的官銜，有各色的朋友，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有壽數，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

設若他稍微能把心放鬆一些，他滿可以胖胖的躺在床上，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即使就這麼死去，他的財產也夠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的，他的訃聞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杠夫抬著他遊街的。

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他有他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生活」不包括著什麼主義、主張、政策、計劃與宗旨。他只有一個決定，就是他不應當閒著。他要是閒散無事，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他不能受這個。他認為自己所不能參預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他應盡力地去破壞。反之，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他都覺得不該放過機會。像一隻漁船，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調動他的帆，以便早些達到魚多的所在。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他只為自己的帆看風，不管別的。

看準了風，夠上了風，便是他的「政治生活」。夠上風以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他不願休息，也不肯休息；平白無故地把看風與用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太對不起自己。越到老年，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越覺出別人的

幼稚；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況且他才剛交六十；他知道，只要有口氣，憑他的經驗與智慧，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

他恨那些他所不熟識的後起的要人與新事情，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就是為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不論是誰，自要給他事作，他就應當去擁護。同樣，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他清清楚楚地承認自己的寬宏大度，也清清楚楚地承認自己的嫉妒與褊狹；這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態度。他十分自傲有這個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得罪我與親近我，你隨便吧！」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著這個。

剛辦過了六十整壽，他的相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下面注著：「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看看自己的像，他點了點頭：「還得我來！」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這個新頭銜既能增多他的經驗，又能增高了身分，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想到將來的光榮與勢力，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有一二年他的相片沒這麼普遍地一致地登在各報紙上了；看到這回的，他不能不感到滿意；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別的政客的庸碌無能，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新人新事的確出來不少，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越老越綠。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包善卿的辦法是唯一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他一點不反對「官僚」這兩個字；「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才叫我官僚，」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45]。

閱讀二：〈八百壯士〉

這首歌曲作於一九三九年，用以頌揚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戰役的已敗之局裡，猶自孤軍奮戰的那一營士兵：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鬥守戰場，
四方都是砲火，四方都是豺狼，
寧戰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飄蕩，飄蕩飄蕩，飄蕩。
八百壯士一條心，十萬強敵不能擋，
我們的行動偉烈，我們的氣節豪壯，
同胞們，起來！同胞們，起來！
快快趕上戰場，拿八百壯士做榜樣。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

閱讀三：〈士兵的妻子〉

這是一群士兵所唱的民謠，他們藉著唱出這首小曲，驅趕心中想念妻子此時正在作什麼的焦慮愁苦，也藉此說服自己，他們的妻子，此時也正在思念著未歸的征人：

一更裡來，月亮照窗台，
奴家的丈夫怎還不回來？
當兵啊，一去三年整……
這樣的歲月怎麼叫人挨？

二更裡來，月亮照滿窗，
悔不該嫁了一個當兵的郎！
當兵的人兒是東啊流的水，
只要離家喲，就沒有個還鄉……

三更裡來，月亮正當頭，
天河啊兩岸呀！織女與牽牛，
神仙哪……一年還有個團圓團圓的日呀……
夫妻們呀，相逢還要幾千秋？……

四更裡來，月兒半朦朧，
夫妻們呀……夢裡怎也不相逢？
少柴無米呀，才逼走了你，
恩愛的夫妻啊，兩啊兩西東……

五更呀裡來，月兒掛西天，
世間哪有誰知當啊當兵的難！
打了個勝仗呀沒有個歸家的日……
打了敗仗呀，骨肉不團圓！
打了敗仗呀，骨肉不團圓……[46]

閱讀四：〈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

這封措詞激烈的譴責聲明信刊載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出刊的《抗戰文藝》。信末有十八位作家聯署，其中包括茅盾、郁達夫、胡風、胡秋原、張天翼和丁玲。信中優雅而博學的用語，讓全文的譴責之意更加尖刻。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淪陷，文人相繼南來，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們每聽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書青年，便慮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電探問；接先生復書，知道決心在平死守。我們瞭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並希望先生作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可是，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有，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仁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

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於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

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已表現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姦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於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

我們最後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國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後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以愛護。否則惟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47]

⊙相關電影

- 《活著》，導演：張藝謀，一九九四年。

註釋

1 Roger Hollis, "The Conflict in China," in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Public Opinion* (Kunming, 1938), p.129. 羅傑・霍里斯（Roger Hollis）當時是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的駐華代表。從他日後出任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局長的角色來看，他很可能在此時即已擔任為英國蒐集情報的任務。

2 Stepehn MacKinnon, *Wuhan, 1938: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3 *China Critic*, XXI, 5 (May 5, 1938), p.59.

4 *China Critic*, XXIV, 2 (January 12, 1939), p.19.

5 Lo Jiu-jung, "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1.

6 *China's Millions*, LXIV, 3 (March 1938), p.37 (report from Mrs. Weller, 於安徽宣城)。

7 Diana Lary, "Faith and War: Canadian Jesuits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XXXIX, 4(2005), PP. 825-852.

8 L. S. C. Smythe, "Nanking's population in wartime," *China Critic*, XXII, 7 (August 16, 1938), pp.115-118. 這個調查共訪問了四千四百二十三人，是南京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這個比較的基準，是來自早先對於南京人口的各個研究。

9 L. S. C. Smythe, "The Plight of Nanking's wartime population," *China Critic*, XXII, 8 (August 25, 1938), pp.121-122.

10 L. S. C. Smythe, "Nanking's building losses," *China Critic*, XXII, 9 (September 1, 1938), pp.138-140.

11 徐淑希 (Hsu Shu-hsi)，《廣州抗日記》（*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頁25-26。

12 MacKinnon, p.81.

13 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into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40), p.247.

1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抗戰歌曲選集》（台北，1997）。

15 Lin Yutang, "Singing patriots of China," *Asia* (February 1941), pp.70-72.

16 承蒙陳志讓（Jerome Chen）教授告知。

17 Edgar Snow, *Scorched Earth*, Vol.2 (London: Gollancz, 1941), p.233.

18 *China Critic*, XXI, 2(April 14, 1938), p.21.

19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在溫哥華訪問蔣光鼐的女兒蔣靜（Jiang Jing）。

20 Geremie Barme, *An Artistic Exile: The Life of Feng Zik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238.

21 Lu Yan, *Re-understanding Japan* (Hawaii, 2004), pp.96-97.

22 *Ibid.*, pp. 244-245.

23 *Ibid.*

24 這句成語源自西楚霸王項羽，當時秦亡後各方逐鹿，他的部隊即將被漢軍打敗，故有此舉動。譯按：項羽是於西元前二〇七年鉅鹿之戰時，發兵攻秦將章邯，下令打破煮飯用的鍋釜，渡江後鑿沉渡船，只帶三天乾糧，以示有進無退的決心。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25 引自Robert Payne, *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1945), p.77.

26 Diana Lary, "The waters covered the earth:China's war-induced natural disasters," in Mark Selden and Alvin So (eds.),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ma MD, 2004), pp.143-170.

27 任光椿，《火城長沙》（北京：團結出版社，1955），頁39；梁小進，《1938：「十一、一三」長沙大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79、81；羅玉明，《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上海：學林讀書出版社，2002），頁106。

28 〈湖南省政府呈報長沙大火災情〉，1512-3。房屋損毀以「間」為單位，類似的估計參見羅玉明，《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頁109。

29 梁小進，《1938：「十一、一三」長沙大火》，頁11-13。

30 唐迅、毛玲，〈憶長沙大火的善後工作〉，收於冰心（編），《抗戰紀事》（北京：友誼出版社，1984），頁125。

31 任光椿，《火城長沙》，頁40；羅玉明，《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頁112。只有當地指揮官遭到究責的看法，反覆傳播了許多年，見Wu Tixin，1948，頁7。

32 Haldore Hanson, "Firebrands and Chinese politics," *Amerasia*, III, 2 (April 1939), pp. 78-82.

33 Richard Dobson, *China Cycle* (London: Macmillan, 1946), p.135.

34 Winifred Galbraith, *In China Now*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1), p.255.

35 《活著》是余華一部精采小說的書名，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叫作《活著》。小說和電影描述一對夫妻在近代史上三十年當中掙扎求生存的故事，他們的艱辛困苦始於抗戰。

36 Shao Minghuang, "Taiwan in wartime," in Stephen MacKinnon and Diana Lary (eds.), *China at Wa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91-109.

37 林語堂，《京華煙雲》，下冊，頁853-854。

38 Wolfgang Franke, *In Banne Chinas* (Dortmund: Edition Cathay, 1997), p.130. 今日新疆的維吾爾族人也採取類似的策略，他們以當地的時間來過日子，而比北京官方的中原標準時間慢了三個小時。

39 *Ibid.*, p.91.

40 老舍的《四世同堂》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間分批出版。英文版的《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由浦愛德（Ida Pruitt）翻譯，於一九五一年在美國出版（New York: Harcourt Brace）。

4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RG25/ 1753/ 804/ VII. Report date 15/12/ 1937.

42 Parks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43 《蓬萊縣志》（濟南：冀魯書社，1995），頁11-17。

44 龔住幹，〈我所知道的郝銘傳〉，《蓬萊縣志》，卷一（1985），頁23-30。

45 Wang Chi-chen (ed.), *Stories of China at War* (New York: Columbia, 1947), pp. 107-109. 譯按：本篇老舍短篇之作，英文篇名為「漢奸」（The Traitor），中文原篇名為〈且說屋裡〉，收於《蛤藻集》。

第三章

僵持與轉變

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

46 Tien Chun (蕭軍), *Village in August* (London: Collins, 1942), pp.41-42. 譯按：據蕭軍，《八月的鄉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頁31-33回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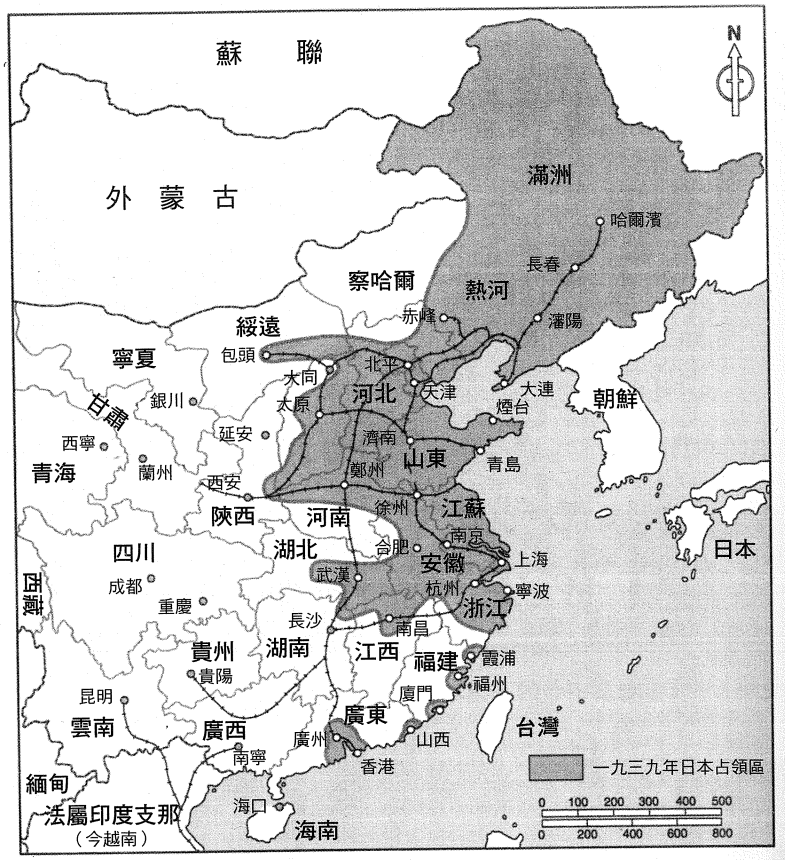
47 本文刊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出刊的《戰時文藝》，後收入張菊香編，《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頁550-552。

重大事件

一九三九年，抗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抗戰頭一個階段的結束，為中國帶來慘重的死傷，卻沒有能打垮中國。「十八個月的戰事，沒有讓她更加虛弱，反而讓她更加堅強。中國遭遇了最初的恐怖衝擊，並且承受下來。民眾和軍隊現在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正抱定嚴厲的決心，裹著傷口，咬緊牙關。[1]」接下來的三年，是一段漫長的僵持階段，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中國戰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擴大，才宣告結束。中國政府為這段陰鬱黯淡的僵持局面，做了一番正面的解釋；日本的進展之勢已經被阻擋住了[2]。

能夠守住戰線，主要是因為各地防線都是地形險要之處；日本軍隊難以在華北與華南山地和丘陵構成的障礙地帶，發動大規模的機械化戰爭。大型戰役現在已經結束，不過在山東、浙江、江西、福建、

年分	日數	日軍總進展公里數	平均每日進展公里
一九三七	177	3085	17.4
一九三八	365	2765	7.6
一九三九	365	415	1.1
一九四〇	365	215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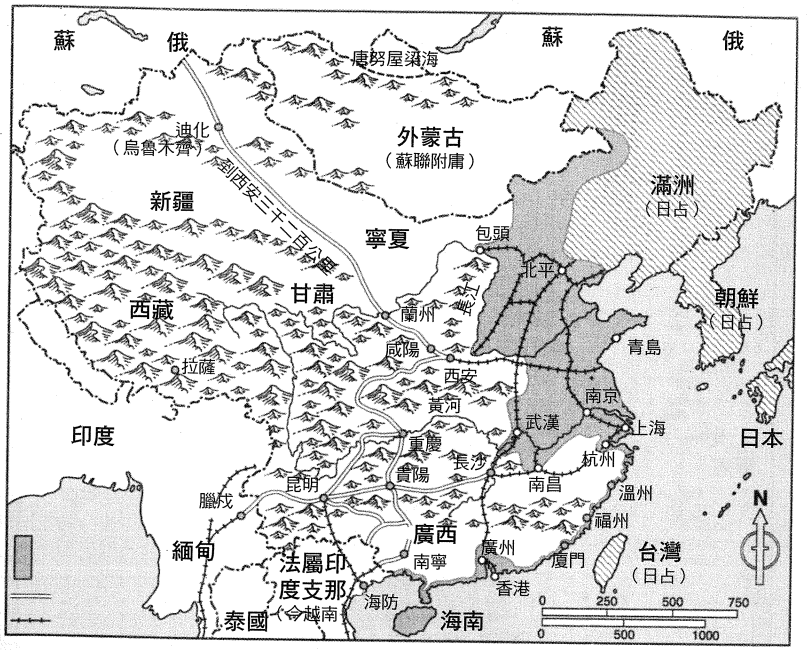


地圖2　一九三九年的日本占領區態勢圖

廣東、湖北和山西各省，都有抗日游擊隊在活躍。這些游擊隊，有的是國民黨所發起，有的是中共部隊，也有的是地方武裝。還有一些獨立武裝，稱為「民兵」，可能是由土匪、非法之徒、或者武裝農民所組成的。各支游擊隊之間並沒有良好的協同作戰機制，許多部隊的裝備都極為窳劣，而且游擊隊成員還得

仰仗地方民眾供養，但是他們對鐵路、道路、押運隊、以及軍事前哨發起的不定時進攻，使得日本人在主要城市中心之外、名義上由日軍所占領的廣大地區裡，都感到不安。

日本占領華北之後，在行政治理方面是一塌糊塗。之所以會以失敗收場，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占領軍當局有一個錯誤的認定，以為管理一個語言與日本如此相近的民族，應當不大困難。中日兩國語言看上去近似，實則大不相同；在書面語言上，透過共同的文字，中日文還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互相理解，但是在口語上則完全辦不到。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大和



地圖3　以重慶為中心的中國地圖

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在當時煽動了大多數的日本軍民，認定他們比中國人更具優越性。在中國的日本人，並未與這片他們占領土地上的人民接近，甚至連為他們效力的人們，關係也不密切。日本人無法停止扮演嚴酷對待抵抗者的占領者角色；抵抗就代表著對反抗者個人的逮捕或處決，以及對其親族朋友社群的報復（見延伸閱讀一）。

國民政府自從被迫從華東撤退之後，就在西部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這是它在戰前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比起抗戰之前，西部不再那麼與外界隔絕了。抗戰促使自由中國開啟幾道通往外界的後門路線。頭一個對外路線位於西南，分別是由雲南經單軌鐵路到海防的路線，以及經由一九三八年在崇山峻嶺中興建的滇緬公路一途。第二個對外路線在西北，由新疆經古絲路出國；主要幹道的建設計畫已經啟動，尤其是一條由西安通往迪化（烏魯木齊）、長達兩千五百公里的公路。這些聯外交通路線並不穩妥，地緣政治是最大的阻礙因素。納粹與蘇聯之間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之後，新疆這條路線就形同斷絕。重慶仍然有到香港的空運路線，以及日後愈來愈頻繁、經由險峻山脈通往印度的航路（令人啼笑皆非的被稱為「駝峰」）；但是這些有限的聯外管道，卻不能絲毫減輕重慶方面的壓力：中國被孤立了，它的盟友要不是無能為力，就是忙於別的事情，無暇他顧。

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季，發生了一件微小的事情，竟然改變了這場戰爭的進程。蘇聯軍隊在滿蒙邊境擊敗了由滿洲越境進入外蒙古的日本軍隊。日軍在諾門漢遭遇的這場慘敗，讓日本大本營相信，要想打敗蘇聯，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的戰略意圖，從此便由北方和西北，轉向南

方與西南。對於中國西南聯外路線來說，同樣具有威脅性的事件，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德義日三國軸心的正式成立。法國的維琪（Vichy）政府給予日本在法屬印度支那駐軍之權，因此切斷了這條中國由鐵路通往海口的聯外路線。

在軍事長期對峙僵持的局面下，中共的實力開始有了穩定的增強。毛澤東看來已經鞏固了他在黨內領導階層當中的地位。在華北農村地區，在對現有的游擊隊施展控制，並且動員農村民眾這兩個層面上，中共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中共的幹部開始填補地方菁英離開或投敵後在基層事務上留下的空缺，不過在很多地區，游擊隊的行動仍然是由地方所組織的。游擊隊的活動對地方百姓來說十分危險。日軍在游擊隊活動後施行的報復相當恐怖。如果像毛澤東所說的，「游擊隊是魚，遨遊在人民群眾的海裡」，那麼日軍對游擊隊的報復策略就是「把水抽乾」——他們在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村，全都發起恐怖的清剿戰役。

血海深仇
A blood feud

在政治角力的場域，國共兩黨組成的抗日統一戰線開始走樣變質。兩黨之間長期的敵對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中共軍力的增強，在一九四〇年底發動的百團大戰當中得到證明，不過日軍的反擊實在太過猛烈，以至於讓中共往後再也無法發起陣地戰。發生在安徽的國共武裝衝突「新四軍事件」，是促使國共決裂的最後一根稻草。到了一九四一年初，局勢已經很清楚：國共統一戰線宣告破裂，而且兩方都沒有興趣去修補。雙方彼此的互不相容，給了日本一個意料之外的優勢。

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是抗戰期間幾個最低潮的時間點之一。接著，是一連串接踵而來的國際重大事件，改變了抗戰的進程。六月，德國發動「巴巴羅薩作戰」（Operation Barbarossa）入侵蘇聯。這場爆發在歐洲的戰爭，帶來了一個新局面：蘇聯成為同盟國的一員，同時也是德國攻擊矛頭所指之處。到了年底，日本攻擊珍珠港，猛然造成美國介入歐、亞兩大洲的戰事。美國對日本的憤怒，為中國的抗戰帶來了新的動力和物資援助。

政府的影響力

抗戰為中國的政治權力版圖帶來驚天動地的變化。隨著原先的權力場域盡皆落入敵手，行使權力的所在地轉移至後方，播遷而來的是政府、軍隊、以及國內許多學術界人士和具有創造力的人才。

> 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提及中日戰爭的時候，將會特別記下一筆中國國民政府的功績：這筆功績至為明顯，可是卻很少有人能完全明瞭其重要程度。這項功績，就是在這場橫掃一切的戰爭進行途中，成功的將國民政府的完整行政架構，由過去政府能夠完全掌控之處，轉移到原先在戰前南京只能行使名義權力的地方[3]。

中國西部門戶大開。過去，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們，只有受到流放懲罰才會來到的地方，現在他們出於愛國心，遷徙至此，度過整個抗戰期間。西南各省的省會，從前被東邊那些見過世面的「下江人」看成無可救藥的落後地方，現在也紛紛搖身一變：重慶是戰時首都，桂林是文化樞紐，而昆明則成了大學教育中心。民眾往西遷徙，代表後方各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長。在一九三七年到四二年這段時間裡，重慶人口由原來的四十五萬人成長到七十六萬人以上，桂林人口由原來的八萬一千人成長到二十七萬五千人，貴陽人口從原來的十二萬一千人成長到將近二十萬人，而昆明則由原來的十五萬一千人增長到超過二十萬人口[4]。後方規模較小的城鎮人口，也有相當程度的成長。

隨著大批民眾向西遷徙同時而來的，是社會階級的重整。許多初來乍到後方的民眾，現在都成了窮人，失去原先戰前所享有的資源。相反的，他們投靠寄居的社群，包括都會區域與城市以外的農村地帶，卻正在蓬勃成長。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急速成長，各項農產品的價格也快速飆升。空襲帶來一項副作用，那就是住宅房屋的極度短缺。許多從東邊內遷的難民寄住在農村裡，實際上是住在農民的屋舍當中，這在抗戰爆發以前，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本地人與外來者在許多料想不到的地方，彼此相互影響。社會學家費孝通描述他全家人寄居在昆明時，對借宿的一戶農民帶來的衝擊：

> 我的房東太太（因此）能夠向內人學習撫養孩童的方法。而因為我經常出面干涉的緣故，房東在我們所居住的屋裡責打他太太的次數，也沒有以前那麼頻繁了[5]。

這場戰爭在自由中國地區創造了一波社會變動，其規模與速度，即使是最具企圖心的社會改革論者（包括費孝通本人在內），在戰爭爆發之前都難以想像。

主題與案例研究

堅毅忍耐

吃苦耐勞

Eat bitterness and endure hardship

在抗戰的這個階段，透過忍受苦難以達成最後勝利的偉大信念，主導了公眾對於戰事走向的預期。這種堅毅忍耐的想法是基於一種信念，相信中國習慣於承受苦難，並且可以戰勝苦難，這個國家過往的種種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最偉大的力量，就在於能夠吃苦耐

勞。蔣介石的外籍顧問端納（W. H. Donald）在人為浩劫與自然災害之間作了一番類比：「在過去好幾個世紀裡，一下子席捲數萬、甚至有時是數百萬條性命的自然災害，已經在中華民族的血液裡造就了一種求生存的強大能力，讓他們可以很快減輕、並且克服人為浩劫所帶來的可怕效應。[6]」

關於上述這番論調，著名的中國及中亞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看法稍有些變化。他認為中國正因為其廣土眾民，而能夠克服可怕的逆境：「中國最強大的抵抗力量，就在其古老的資源——廣袤而遼闊的疆域，以及能夠自發團結在一起的稠密人口。[7]」

這種堅忍的信念，背後確實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抗戰期間與國際紅十字會在華共事的英國心理學家愛德華（F. M. Edwards），就對於中國民眾妥善面對戰爭的本領，以及他們對待戰爭的「實際態度」，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人們不是試著去極力減低恐怖、貧乏與悲慘遭遇的衝擊程度，卻也不是在堅苦卓絕的忍受著這些境遇；我們所見到的，是他們對這些遭遇坦然受之，宛若事情理當如此，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縱然帶著這些悲慘和痛苦，人們依然繼續活下去[8]。

「堅忍不拔」這個傳承自祖先、不斷反覆出現的古老旋律，產生出一股強大的影響力；它使得人們的注意力，從日本的諸次勝利，以及其對中國所加諸的羞辱當中得到轉移。活著、生存下去、咬牙忍耐，才是最要緊的事，套一句小說家賽珍珠（Pearl Buck）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時說的話：「只要活下去，就算贏家。」（He who lives, wins.）[9]它也讓抗戰看來成為一場中國

典型的戰爭，因為這股堅忍力量的來源，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性，不來自任何遭受攻打的國家，而是中國人本身的悠久文化。它將堅強忍耐和民族主義，以及國家的團結統一結合起來。每一個吃苦耐勞、堅苦卓絕的中國人，都可以為抗戰大業盡心盡力。

為了強調這項訊息，政府發起動員民眾的宣傳運動。那些嘗試著和抗戰大業保持距離、不肯奉獻心力的人，將會在演說、文字和插圖裡遭到責罵。發起於一九三〇年代中葉的新生活運動，在這時強度更加升級。新生活運動要求人們過得簡單樸素，這是一種跡近刻苦禁慾的生活態度。人們的衣著配合這種新心態而作變更。在重慶，男子穿著軍裝或深色的中山裝，女子則穿簡單的棉布袍。在廣西，全省上下推行穿著一種制服。「為了將偷懶者公開示眾、羞辱他為無用之人，廣西省政府不分男女，已提供每位軍事生產人員一套中山裝——這是一種具有高度實用性質的半軍事服裝，有數個有蓋口袋，衣扣直到頸部，因此不需要衣領。證章別綴於左胸，標明這個人隸屬於哪一個組織。[10]」新生活運動也在一些狹小的層面上指責個人的行為表現，像是強迫勞工穿上襯衫，以遮蔽他們赤裸的胸膛。新生活運動被許多媒體記者和知識分子譏諷，他們將其視之為膚淺和愚蠢之舉，但是，新生活運動裡有一項活動獲得了舉世的認可：禁止人們隨地便溺。

到了一九四一年中，這股吃苦耐勞的堅忍精神變得疲弱。無論支持抗戰大業的意志再怎麼堅強，許多隨政府播遷到所謂自由地區的人們，對於持續的物資短缺和生活的不適已經感到厭倦。他們心裡明白：他們拋下的那些人，也就是留在被敵人占領城市裡的人，過的日子比

他們要好上很多。令他們能夠作出犧牲的理由，很難持續維持下去。這場戰爭至此已經綿延四年之久。蔣夫人宋美齡對於她身邊所見一些士氣淪喪的人們，就有一番強烈的批評（見延伸閱讀二）。

民眾遷徙

起於一九三七年、在一九三八年持續進行的巨大難民遷徙潮，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仍舊繼續。民眾和各機關組織不停的向內陸遷移。這股由民眾組成的洪流，往更加貧窮的省分而去：廣西、雲南、以及貴州。這些地方實在太過偏遠，可以確保不會遭到日軍的進犯——可是同樣也因為太過偏遠，以至於當地民眾之前很少有接納「外省人」的經驗。外來者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這裡的人說著他們聽不懂的方言，吃著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食物。有些人抱怨連天，而且持續咒罵不斷，另外一些人則適應了這種環境，但是他們很少能感到舒心自在。他們不是搬到了新家，而是在窮鄉僻壤寄旅煎熬。

分離與團圓　這股躲避戰禍的巨大遷徙運動，拆散了無數的家庭，造成多少家人離散。而到了目前，現實情況是人們適應了這種分離，而隨即開始恐懼這樣的分離是不是要永世持續下去。一位退役軍人出身的記者描述了這種分離的痛苦：

> 在中國政府控制區與日本占領區兩邊，都有數十萬無家可歸的人們，和他們的家人斷絕了一切的聯繫。丈夫不知道妻子和子女的生死。年邁的雙親見不著兒子或女兒，而可能從此再也不得他們的下落。這些屬於個人的悲傷和茫然匯聚起來，形成了一齣強烈而沒有留下紀錄的哀傷戲劇[11]。

有人被迫離散，卻也有人重逢團圓。有些躲避戰禍的難民發現，他們與託身寄居之地的人們竟有著親屬關係的連結；他們因此能遷入之前從未謀面的親戚家中借住。一九三九年，年輕的作家韓素音和新婚丈夫來到她叔父位於重慶的家；這是她與叔叔的第一次見面：

> 可是這並不真實！這是一場夢，是一個已逝過往的記憶，帶有諸般恩惠盛情，又是如此舒心快意。打掃乾淨的前庭、寬敞的客堂，裡面有緩緩搖曳的燈火，地上厚厚鋪著毯子、座椅和沙發上披掛著虎皮與金絲猴的皮毛、漆器和鍍金裝飾上頭閃爍的微微光澤、高頸花瓶上畫滿了臘梅、半透明的金花帶有春天的芬芳——所有這一切的奢華和舒適，都彷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我們的身上還帶著這趟極為痛苦旅程（由武漢、長沙、桂林、貴州到重慶）的塵埃，此刻卻倚靠在這寬大、柔軟的太師椅上，用薄瓷茶碗啜飲著茶水[12]。
>
> 這的確不真實：這座宅院在稍後就毀於空襲，而這對年輕夫婦也再一次無家可歸。他們託

身避難的這座城市，現在即將成為全世界上遭受轟炸最嚴重的一處地方。

重慶　在一九三八年底與一九三九年初，重慶已經由原來一個偏遠省份的城市，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的首善之都。全市人口快速成長。中央政府、最高軍事大本營、大學院校與各級學校、還有數百間工廠，全都沿著長江，從上海、南京和武漢，經過三峽，來到這座充作暫時首都的「陪都」。

重慶有長江三峽作屏障，不必擔心日本進犯。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性是這座城市的少數優勢之一。作為人們居住的處所，重慶有非常多不如人意之處。這座城市位於嘉陵江和長江交匯處的山崖之上。在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要上到這些山崖，只能從少數幾條路，一路拾陡峻的階梯而上；在山城裡沿著兩江夾岸的市區街衢，全都狹窄而壅擠。這座城市裡擠滿了人。房屋嚴重短缺，甚至連政府領導人也居住在擁擠的環境裡。大多數的外地人並沒有房子可住，只是在暫時的收容所裡棲身，或是和許多人一起擠在狹小的公寓裡。

重慶的氣候令人厭惡：冬日寒風刺骨，夏季又酷熱難當[13]。全城經常被大霧籠罩。溼度非常高，以至於牆上永遠長滿黑黴與青苔。城內的居民除了人類以外，還有老鼠、蟑螂和貪婪吸血的蚊子。潮溼招來疾病，特別是肺結核與痢疾。疾病的氣味瀰漫在空氣裡，這種「潮溼、帶有尿騷味般的氣味，像雲霧一樣籠罩著四川。[14]」

儘管有上述這種種不利之處，這座城市在抗戰的前幾年還是運作得非常良好。市民受到強

硬刺耳、有時奏效的宣傳活動所激發，紛紛投入有組織的戰時志願工作之中。不過，抗戰精神在重慶所作出最大的貢獻，還是來自於敵人，以及其無止盡的轟炸。

重慶是全世界首先遭到有計畫反覆轟炸的首都。從一九三八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八月這段期間，這座城市被轟炸超過兩百次以上，幾乎是只要天氣一放晴，就會遭受空襲。轟炸重慶輕而易舉，日本在攻占武漢後修築空軍基地，轟炸機從武漢機場起飛，不多久就能飛抵重慶上空。

日本飛行員只要往西沿著長江飛行，無須擔心會遭遇任何抵抗。重慶實際上沒有防空火網；這座城市惟一的防護網，就是惡劣的天候。共有三萬人在這些空襲中死傷[15]。最為猛烈的單次轟炸，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當天（這正是因抗議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民族主義「五四」運動二十週年），有四千四百人死亡，三千一百人受傷。一名美國人站在市區對岸江邊的美國大使館庭院裡，觀察五月四日這次空襲：

> ……整座重慶市在一陣突然而來、由天而降的彈片與黑色塵幕之下翻騰，在此同時，隨著似乎是同時爆炸的炸彈，其中有一枚炸彈在我們左近爆炸，折彎了一株大樹。黑色的布幕在重慶這座山城的上空翻騰，有幾分鐘的時間，這座城市看來似乎已經完全消失了。當塵埃落定、硝煙裊裊飄上天際以後，在重慶上空八百公尺高，晴朗無雲的夕照裡，反射出一片詭異的紅光，顯示下方正遭受熊熊大火燃燒的區域。夜幕來臨時，整個地平線都因為大火而被照得

通紅[16]。

重慶堅強苦撐。市政當局制訂出一套有效的空襲警報系統，讓民眾有時間能夠到沿著懸崖下緣鑿開的防空洞內躲避。市民學會了如何應對空襲：

> 傍晚以後有一次空襲警報；紅色三角標誌在美豐銀行上方的旗桿上升起，而七星街上有一群人群形成的漩渦：人們從每一個方向湧進來，小手推車上堆滿了行李，黃包車裡因為塞了六或七個大箱子而顯得沉重不堪，甚至連腳踏車上也裝載了民眾從家裡帶出的行李。家家戶戶大門深鎖。汽車一路喇叭直鳴，馳入鄉間。在這股人群所匯聚而成、湧入街衢的洪流裡，在傍晚的硝煙和塵埃裡，有某種殘酷無情、某種令人戰慄的事物，就像長江之水那樣滔滔不絕、綿延不盡。這些人出逃，並不是因為他們恐懼，而是由於那警報的聲響，以及那懸掛在建築高處上的大三角號誌，喚醒他們對於過去的記憶；而他們立刻本能地往防空洞跑去。就算是他們沒有動念要跑，他們的雙腿也會帶著他們跑開[17]。

多虧了這些防空洞，使得傷亡人數比原先可能的程度減輕不少，不過警消人員的死傷人數仍舊居高不下（見延伸閱讀三）。物質損失極為巨大。日機投下許多燃燒彈，而重慶這座城市裡的眾多木造和竹造建築，因此遭到摧毀。偶爾，會有重要目標被炸彈擊中。當德國駐華大使館在空襲中被摧毀時，重慶市民們大為幸災樂禍，碰巧那天——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日，當然也是星期五——正是倫敦白金漢宮被德軍投彈擊中的日子[18]。

對於前線的戰鬥人員和後方的平民百姓而言，以民眾作為轟炸目標是戰爭的新型態。有一種全然的隔閡，存在於天空中對地面施加破壞的飛行員，以及他們看不見的地面受害者之間。這種隔閡距離等同於冷漠無情，這從一九四一年，一位日軍觀察員隨著轟炸機編隊飛臨重慶上空後寫的一段文字裡可以看出：

> ……就在前方不遠處，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呈半毀狀態的重慶市。它看來夠熟悉的了——大片建築堆砌在兩條大江夾會的砂岩絕壁上頭——這就是蔣介石的首都，我已經從空中見過多次。從這樣的高度和距離看下去，這個蜂巢狀的毀壞遺跡，看來就像個被挖掘出來的遠古文明遺址。這是純粹的空想，還是一則預言呢？
>
> ……現在我們橫越天際，來到這座遍體鱗傷城市的上空。沒有戰鬥機升空迎擊。接著可以看見，一顆顆炸彈拋落下去，爆炸，以一種電影慢動作鏡頭的節奏，形成無數奇形怪狀的雲團，就像這麼多朵褐色的玫瑰紛紛盛開[19]。

重慶遭受日機轟炸的次數，遠超過任何其他中國城市，但是幾乎位於自由地區的每一個城鎮，在抗戰期間的某個時候，都曾遭到轟炸。日本空軍已經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得以任意施行

轟炸。其目的，似乎是要在平民百姓當中散播恐懼的情緒。

中國戰時的轟炸（見下列表格[20]）

空襲警報聲引起的恐怖感覺，以及內心裡產生的強烈恐懼從未遠去；許多親身經歷過大轟炸的人們，在他們的餘生裡，都被夢魘所困：只要聽見任何警報聲響，都會大吃一驚、渾身起慄[21]。不過，轟炸卻帶來一項正面的副作用：它開創了一種守紀律、重秩序的氛圍。當警報聲音響起，人們依照順序，急忙進入防空洞裡躲避，協助那些動作較慢的人，並且在潮溼、陰暗的防空洞裡彼此照應。大轟炸產生出一種集體意識，以及一種休戚與共的群體感，遠勝過政府的抗戰宣傳。

年分	空襲（次）	炸彈（枚）	死亡（人）	受傷（人）	受創建築（間）
一九三七	1,076	10,240	3,532	5,252	5,364
一九三八	2,528	50,252	19,885	30,060	75,834
一九三九	2,603	60,174	28,463	31,546	138,171
一九四〇	2,069	50,118	18,829	21,830	107,760
一九四一	1,858	43,308	14,121	16,902	97,714
一九四二	828	12,435	6,718	3,853	17,609
一九四三	664	13,642	2,333	3,406	14,161
一九四四	917	11,266	557	766	1,173
一九四五	9	3,718	84	91	151
總計	12,592	255,153	94,522	114,506	457,927

西南聯大[22] 由北方各大學院校撤退的學生，首先來到長沙和武漢。到了一九三八年底，他們必須再次遷徙。有些人去了四川的省會成都。其他人則前往貴州的兩個小城：貴陽和遵義。大部分的學生都到了雲南的省會昆明，這是一座位於湖畔的美麗都市，氣候良好，有著「四季如春」的美譽。學生們啟程上路，有的搭乘卡車或巴士，有的則步行。一支由大批清華學生組成的隊伍，以兩個月的時間，攀越重重山巒，由長沙抵達昆明。他們所走的道路，幾乎和四年前中共長征時的路線完全一樣。這支隊伍的幾位領隊之一，是善感的詩人聞一多。

在昆明，成立了一所堪列於世界上最偉大學府之林的院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這所大學的師生來自於北京、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學生們發現他們就讀的大學，擁有全國最重要的學術人才在這裡執教。朱自清、聞一多、錢端升、陳達、吳晗、潘光旦、費孝通、馮友蘭、錢穆、以及梁漱溟，全都是中國知識分子變遷的世代裡，才華最為洋溢的一群，他們在童年受的是傳統經典教育，然後進入中國的新式大學院校裡就讀。他們之中大部分都曾在國外讀書，很多人能說流利的英語。

政府看待學生和戰爭的態度，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歐美各國，年輕人被期待暫時放下學業，為戰事「盡自己一份心力」。在中國，政府並不希望學生參加軍隊；學生們報效國家之道，是繼續讀書學習，為將來和平之時做好準備，能以有才能、有訓練的男子（及少數女性）參加政府，重新恢復治理。他們不必繳納學費或住宿費用，政府還發給補助費，讓學生購買書

本和食物。這筆錢為數從來就不多，隨著通貨膨脹，更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因此學生們通常都處在飢餓貧困的邊緣。可是，不管他們有多麼貧窮困苦，在西南聯大就讀的榮譽，讓學生們晉身知識分子當中的菁英之列，而當一九五七年，楊振寧和李政道這兩位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共同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時，這份榮耀更是顯得特出。

隨著戰事綿延，學生們的心態起了變化，由原來的振奮轉為失望幻滅，最終對國民黨政府感到憤怒，並且逐漸將其冠上「反動」的標籤。他們並非共產黨人；他們所希望的，是一個自由開明、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而這卻是國民黨素來所不喜的。政府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敵意，在抗戰勝利後不久明確成形，化為昆明街頭上的兩場暗殺，聞一多和李公樸，這兩名自由開明的學界領袖，就在暗殺當中殞命。

農村重新安頓　大學院校羈留西南，被認為只是戰時權宜之舉。可是其他於戰時發生的重新安置則非如此。在抗戰初起時，對於難民遷徙的設想，全只是暫時的安排，但是局面很快就明顯了：許多難民並未回鄉。必須要對他們有所安置。這個推論符合中國政府向來偏好將漢人百姓遷往西邊與南部動亂地區安頓的傳統，因為這些地方一直是政府想要控制之處。其中一種辦法，是政府將若干被認定為不良分子的人們——罪犯、反對分子、士兵和窮人——施以強制移民。戰時移民安置的主要地區是西部，這裡幅員遼闊，占了全國陸地面積的一半；此地人口密度稀少，資源豐富，不過水源極度缺乏。自從中國的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開始，大西部地區就經歷過週期性的漢人移民潮。如此過程從來就不是容易之事。若干強制手段是必要之舉；被流放的罪犯與異議分子，額頭上都遭到烙印，以確保他們不會尋機會逃回內地。現在，抗戰又給了國民黨政府這樣的機會。

在一九三八年底，政府宣布安置五百萬難民的各項計畫[23]。這項計畫背後的驅使力量，不但在於需要安頓難民，同時也需要開墾土地以種植糧食作物，因為位於華東諸省的糧食產區都已遭到占領。

這些雄心勃勃的計畫並未充分得到落實，但是政府確實為難民制訂了若干安置計畫。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位於陝西的黃龍山墾區，安頓了超過五萬名來自河南的民眾。這些人裡有若干是抗戰期間進入陝西避難的難民，使該省的人口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五，由不到一千萬人，成長到將近一千四百萬人。在增長的近四百萬人之中，有九十萬人是來自黃泛區的難民[24]。

國民政府鼓勵轄下地區的所有地方當局努力安頓難民，但是安置計畫所需條件實在太過浩大，以至於單靠政府部門的介入，並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志願組織也參與安置。在甘肅，由活力充沛的紐西蘭人路易・艾里（Rewi Alley）領導的中國工業合作社，為當地民眾和難民興辦小型工廠、提供工作機會[25]。喬治・何克（George Hogg）是一名年輕的英國籍教師，他描述在蘭州郊外的一個小村莊裡，有兩百名從蘭州躲避轟炸而出走的難民，使用向當地農民購買的羊毛料，編織一萬三千頂羊毛毯[26]。在甘肅紡成的羊毛線，從前曾經運往天津，在那裡編成銷往西方的「天津地毯」。抗戰使得這條商業網路為之中斷，讓甘肅的羊毛產製者無處銷售他們的

毛料。中國工業合作社填補了這道缺口。

中共方面也參與了安頓農村難民的計畫。它最為知名的陝西屯墾區位於南泥灣，由八路軍負責開拓發展。在中共控制的地方，遍布著自然出現的難民屯墾區。在中共面積最大的根據地、陝甘寧邊區裡，有二十五萬難民，占該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27]。難民也在之前無人居住的地方定居。當黃河於一九三八年改道、大堤被掘開之後，原先的老河床乾涸見底。老河床的底部全是肥沃的土壤。數萬流離失所的農民在那裡開墾，共形成了數百個新村落。然而，這條出路卻不如看上去那樣平坦順利。這些新村落的居民依舊是沒有了財產的人。在中國，這樣的新村莊受到外界以鄙夷的眼光看待，它們沒有歷史，被認定是由一群無所寄託之人組成的聚落，可能在道德上還很受到質疑；「雜姓村」這個名稱，就是蔑稱之一。居民們處在這種悲慘的境地裡，就成為中共最佳的人力資源來源；而中共則給予這群不幸而貧困之人若干希望，成為領導他們的專家。中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社會，用以取代舊世界。

上述所有方法，都無法解決無家可歸的難民所帶來的問題。有些人認為自己受不住強制屯墾的苦，而悄悄的偷溜返鄉；另有些人則在一地又一地之間徘徊，期望能找到新的家園。他們都是動盪局面下的受害者。官方當局的宣傳裡，向他們承諾，在動亂時期刻苦堅忍，將會迎來改革和進步，這個承諾卻沒能在他們身上實現。

正當政府計畫將農村難民安頓於土地的同時，有些地方農民卻走向截然相反的道路。在自由地區的軍隊、建設和工業界裡，勞工得到新的工作機會。對那些處在農村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這樣的機會更是貨真價實；原來靠地主憐憫討生活的按日計酬臨時工，現在有機會在村莊外找到工作。

難民安置屯墾區將農民和他們的家族親戚分開，這些親戚像是堂表兄弟、叔伯舅舅、以及姑媽姨母，在中國社會裡全都定義得非常精確；親戚的重要性和關係各有不同，可是完全沒有親戚卻是非常孤單寂寞的事。當中最讓人悲傷的，就是失去原來在形式上沒有被承認的家族關係：那些就算是嫁為人妻，住得卻離娘家很近，和娘家關係卻還是很好、得到溫暖支持的女人，現在戰爭斷絕了她們與娘家的聯繫。出逃的女性難民失去了和娘家的聯繫，而難民家庭也得不到他們已出嫁女兒的音信。

戰爭對社會已經造成永遠的傷害，在很多地方，可能無法回復原來的正常生活，這是很清楚的事情；這個社會的物質基礎被摧毀的已經太多了。一名在避暑勝地牯嶺不幸成為難民的美國傳教士，當他好不容易下山，由長江口岸九江撤離時，他寫下這麼一段報導：

> 我們在前往九江的路途上，經過一處已經完全遭到戰爭蹂躪摧殘的地方。鄉間原有的居民，全都看不見人影了。在我們這趟孤單的旅途中，唯一看見的人們，是那些三兩成群的苦力，他們之前協助我們將行李搬下山，現在正在步行返回九江。道路兩旁的屋舍與農場都已成為廢墟。此地向來備受呵護的農田，現下既無播種也沒有耕作。當我們進到九江城裡的時候，赫然發現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也是同樣的沉悶和荒涼。除了那些從前是英國租界的地區以

外，整個九江已經是一處遭到遺棄的廢墟[28]。

這個地方不過只是中國許多遭受抗日戰爭摧殘的地區之一而已。在整個長江沿岸，特別是在江蘇、浙江、江西和湖南等地，主要道路與鐵路遭到破壞的程度是如此全面而徹底，以至於復甦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社會變遷、成長與解放

戰爭總是會對一個社會造成重大的分裂和破壞：年輕男子或死或傷，建築被摧毀，婦女慘遭姦淫，而財產橫遭搶掠。戰爭帶來的摧殘破壞，在中國歷史上史不絕書，紀錄可以追溯到嗜血的秦始皇，以及殘酷的商王朝。近代以前的災害很少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即使當改朝換代這類規模最大的動亂發生之時，也是如此。在總體戰爭來臨以前，戰爭帶來的效應只侷限在戰鬥實際發生的地區。但是，抗戰的影響前所未有，捲入了平民百姓、破壞地區不限於實際交戰地區，效應遠超過之前任何一次戰爭。大量的家庭在抗戰初起時，隨著大批難民遷徙的潮流而支離破碎、流離失所；面對貫穿整場戰爭的空襲轟炸，與因戰爭而來的經濟混亂時，他們更是歷盡煎熬。這就是總體戰爭，而它比起「之前任何浩劫，更加深刻的搖撼了中國家庭體系的根基。[29]」

家庭體系　舊日家庭體系的精神，旨在照顧家族內的各個成員。現在，這個角色遭受威脅，通常無法照應其成員的需求；加在這個體系上的壓力實在太巨大，而自身需要協助的家族成員又實在太多，致使這個家庭體系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 中國有的時候又被稱為多災多難之地。在長江尋常的洪峰來汛時，多出的洪水被長江沿岸的湖泊、支流、沼澤所吸收，因此對於農田土地並不會帶來嚴重的傷害。對於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來說，同樣也是如此。這是發生災難時的一般面向。
>
> 在中國，社會體系有辦法吸納衝擊，而不致於過度耗用資源。但是在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就如同當前中國陷入的戰事，在日本侵略之下，被戰事波及的省分不下十個，這套社會體系就瀕臨崩潰的邊緣[30]。

要如何適應這樣新的社會崩解、流動，然後繼續存活下去？實在找不到什麼指引。儒家思想能夠提供的幫助不大。在過去三十年來，儒家思想本身就遭受到嚴厲的攻擊和批判。況且，儒家價值現在還因為新支持者日本的大力提倡，反而受到連累危害。大談服從權威的「新民會」，就是個極度保守的社會組織團體。國民黨方面雖然贊成社會這樣大規模的變動，可是對於更進一步支持社會改革，立場卻顯得模稜兩可，他們沒有意願催生出一個可能太過激進的社會體系，換言之，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共則的確抱持革命立場，但是在一九四〇年代初

期，他們卻也避免提倡激烈的社會革命。他們後來之所以能逐漸取得成功，看來似乎是採取溫和中道做法的緣故。

舊有社會秩序的崩解，在不同的經歷者裡引起各自不同的反應。對某些人，特別是對那些年輕人和激進分子而言，舊社會的崩潰可說是絕佳的機會，隨著舊社會瓦解而來的，是對於新社會的承諾，由此得以創造實現。至於那數以百萬計撤入大後方的年輕公務員、知識分子、生意人和士兵，他們所拋下的，是一個本來就樂於離開的社會；他們並不想在後方再重新複製一個舊社會。那個陳舊、令人厭煩，而且讓人處處受限的老社會，已經遭受到猛烈的衝擊，以至於看來四分五裂——而他們心中卻沒有任何惋惜。費孝通在當時還只有三十歲出頭，他論及「一個文化轉型的年代，是起始於為期既久、範圍復廣的民族生存鬥爭，」並且認為「傳統體系的逐漸崩解，正是在吾人眼底下發生的。[31]」

年輕的社會學家許烺光，正是那群對社會動盪的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人們的其中一位[32]（見延伸閱讀四）。傳統家族體系本來著眼於家庭、擁有土地、以及透過考取功名來獲得成功的各種聯繫結構，在他看來都隨之崩潰了。這些信念現在都已經死滅，而民族主義則取代了家族主義。年輕人從他們的家庭出走，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過著自己想過的人生。傳統的孝道正安靜無聲的死去。以往敬重長輩、並且服從他們命令的習性，現在毫不費力的便遭到摧毀——因為長輩全告缺席，既然不可能接到他們的指令，就更別提順從他們了。在巴金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著名小說《家》裡，那種家門之內的激烈爭吵和抗爭，如今全成了往事[33]。他們是戰爭動

盪之下的受害者，從而也導致了大家庭組織的冰消瓦解。要能維持多代同堂的大家族，必須有下列若干先決條件：大批家族成員同居於一地、家族成員可在彼此相處時擁有充裕的閒暇時間、有足夠的錢治裝、以及沒有緊迫的問題需要處理等等；現在能夠保持這些條件的家庭屈指可數。

孫本文對於社會動盪引發的各種效應，有著更加冷靜沉重的看法。他質問：原有的家族體系在這段非常時期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認為戰爭對於舊日家族體系帶來的效應，不只是一個垂死老世界的消亡，而且更是社會關鍵結構的扭曲變形；這個社會關鍵結構，就是家庭組織，它能照顧成員的經濟、社會需求，關懷家族中的年輕人與老弱、而且是大多數實質財產的存儲處所。沒有了強而有力的家庭組織，社會就像是建構在流沙之上那樣的虛浮[34]。孫本文因而深感困惑，感覺中國社會已經陷入混亂，而這只能引來惡劣的後果。他的保守悲觀看法與許烺光大相逕庭，這反映出他的年齡。他們倆對於抗戰帶來社會衝擊效應的分析，正好位於詮釋抗戰社會效應的正負光譜兩端。對於年輕人、不安分者、和那些有才能的人而言，這場戰爭意謂著機會與刺激，意謂著他們在戰事伊始時，能稱心如意的離開原來的家庭。對於年紀較長和看法保守的人來說，抗戰造成的社會動盪帶來的是近乎走投無路的前景：他們所熟知的世界已告結束，而可見的未來，幾乎毫無希望可言。

當然，舊日的家庭體系並不像某些人所盼望的那樣，就此壽終正寢。中國人還是得仰仗家庭來支持照養那些患病、年長和有需要之人。這時的中國沒有退休金、撫恤金，沒有失業保

險，也沒有醫療救濟——在當代西方社會裡所有減低家庭重要性的非人情系統，中國全都付之闕如。但是，很多家庭本來扮演角色在短期內的衰退，促使社會基本盤的重新調整。

社會階層的重組　舊有的社會階層領頭的是讀書人，接下來是農人、商人，最後則是當兵的武人。這個階層順序現在實際上顛倒排列了。原來位於社會階級底層的武人，如今躍居首位。在戰爭時期，軍人總是占據優勢地位，不過從前於緊急時刻一向只由朝廷文官出掌兵符（例如在一八六〇年代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如今則由真正的軍人擔任將領。國民政府的領導人蔣委員長，就是軍人出身。軍人在各種資源上都有優先徵用的權利，而且受到民眾的敬佩，至少也得到尊重。抗戰使軍人的地位躍居社會階層的頂端。

商人階層是社會動盪之下的另一個受益群體。企業家們在抗戰導致的經濟不穩定局面中大為活躍。原來一度受到鄙視的商人階層，地位在民國初年時已經上升，而且快速爬升。多虧了戰爭引發的物資短缺，出現了一個新的商人群體。對參與生產過程的人來說，無論生產商品的規模有多麼小，都是非常巨大的商機；他們得以安排自己的小規模生意，用以製造那些在後方難以取得的替代物品。若干不可或缺的尋常簡單物品，例如墨水、鋼筆和毛筆等等，在後方很難取得。一個在自家開設小作坊、從煤煙裡製造墨汁的家庭，就能因此而踏上致富之路。

通貨膨脹以一種非常不受民眾歡迎的方式，讓企業家們大發利市，這種方式就是囤積居奇。政府必須靠著印鈔票來挹注戰爭的開銷。通貨膨脹在抗戰初期的前幾年裡逐漸成形，而且為囤積居奇者提供了大好機會，他們原來只需握有小額的成本，就能買入各類產品。接著他們就可以安心等候，什麼都不做，坐看物價上漲，然後在認為已經積攢了夠多錢時，賣出囤積的產品。服務業的人們可以利用一種間接的囤積方式來賺錢：他們在還沒有提供服務以前，就預先收取報酬，然後利用這筆金錢，購入相關的貨品，作為投機買空賣空之用[35]。企業靠著囤積發財的方式，是一道兩面刃。對於這麼做的人，囤積居奇是成功的生意發財之道；對沒這麼做的人來說，這就是發國難財。

新女性　抗戰為許多女性帶來一場女性地位轉變的革命——這場革命為很多女性帶來解放的可能性（通常是必然），讓她們從抗戰前就存在的家庭牢籠裡掙脫出來。在占領區和未受日本占領的「自由地區」，都有大量的女性加入勞動生產的行列。這些女性裡，有的是響應國家的號召，以一己之力為抗戰大業作出貢獻，但是也有其他的女性和丈夫分離，現在必須自力謀生，以養活自己和孩子。為了存活下去，她們必須出門工作。

在中國西部，抗戰使得工廠需要女性勞動力，並且為農村的年輕女孩們離開鄉村，到城鎮去工作提供了可能的機會，很多人選擇了這條路。隨著她們離家到城裡去，形同在實際上脫離了父母影響範圍的控管。

抗戰消除了若干長久以來對於女性離家在外、拋頭露面的壓力，而有能力的女性，特別是那些年輕女性，現在則看見了機會大門向她們敞開。在華北農村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區域裡，

婦女解放是社會主義政策的正規部分。女性開始在農村政府裡頻繁的參與政治事務，她們當中有些當選公職，有些則被指派出任職務[36]。但中共這些解放婦女的政策，較傾向在基層落實，而不是在領導高層裡實施。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就因為其他領導人的妻子反對她拋頭露面，而被迫退出公開場合；這是一個令江青痛恨不已的輕蔑怠慢之舉，二十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時招致可怕的後果：當她成為四人幫的領導人，就將攻擊的矛頭指向當年在延安曾經羞辱她的人們。

抗戰給予一大群「命運多舛」的女子群體，擁有得以擺脫她們原來悽慘處境、並且得到工作的機會。這些女子分別是「窮苦人家出身的女學生、被遺棄的女孩、被丈夫拋棄的妻子、女性難民、奴婢、逃跑的娼妓、歌女、軍眷、在別人家幫傭的妻子、受盡欺凌壓迫的婢妾、以及各式各樣不幸遭遇的女人。女性現在能出外工作這個事實，代表這些不快樂的女子現在有了脫困之道，從而有了活下去的可能。[37]」這群命運悲哀的女子如今透過出外工作，獲得了一個補救贖回自己人生的機會，一個讓她們將不光彩過往置諸腦後的可能。

政府宣傳大力頌揚新女性的美德。官方的出版品裡，以熱情的語調講述中國的新「職業婦女」故事：二十歲的張鄧芬（音譯）靠著她在財政部擔任職員的薪水，供養守寡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彭子岡是重慶主要報紙《大公報》的明星記者，也是重慶十名女記者當中的一位。「她出門採訪各個機關和人物，然後趕回她的家去監督廚子的工作，並且照看她一歲的孩子是否安好。」李淑萍（音譯）是位三十二歲的推事（即法官），在鄰近重慶的眉山地方法院任

職，她同時也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是鄰縣的縣長。費瑪莉（Mary Fei）是空軍飛行員的遺孀，她不但一手撫養兩名子女，同時還是四川藝術學院的小提琴教師[38]。

隨著學校或工作機關內遷到後方的單身女性，也是這股婦女新自由風潮底下的受惠者，特別是她們因此能免於受媒妁之言的婚姻安排。現在，她們能夠慎選自己的如意郎君；沒有代她們挑選丈夫的雙親在身旁了。這樣的自由使得女子心中對愛情的浪漫、幸福夢想得以實現，中國女性可以逃脫媒妁之言婚配的苦境，而真能像原先她們在翻譯自托爾斯泰（Tolstoy）、左拉（Zola）、大仲馬（Dumas）等人的浪漫愛情小說裡找到的真愛。

可是，找尋如意郎君的過程有其危險存在。很有可能，她們所屬意的未婚夫老早已經是有婦之夫，放著妻子在家鄉奉養父母。關於這方面的查核，多半委由居間穿針引線的介紹人進行，但是介紹人很難打探到距離遙遠的詳情，除了靠未婚夫的自述，也沒辦法查明什麼真相。

另外一個風險，是女性有可能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夫婿人選。在一九四一年，有一則楚楚可憐的故事出版問世：

> 我已經三十歲了，至今還是沒有房子可以打理，沒有丈夫在身邊好讓我叨絮，也沒有兒子足供自豪。對一個中國女孩而言，這實實在在是件非常不幸的事。因為在今天的中國，身為一個老處女，對於社會與自己的家庭而言，仍然還是一件非常丟臉、令人尷尬的事[39]。

關於母親天職的問題，則非常棘手。在中國，身分最顯赫的女性，首推蔣夫人宋美齡和她的姐姐，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她們兩位全都膝下空虛，沒有生育孩子。宋美齡最接近母親這個角色，是她實際上領養了外甥女孔令偉，孔是一個作風怪異、雌雄同體的人，和她的姨媽（即蔣夫人）同住在一起[40]。在中共這邊，身分最顯貴的女性，首推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她也沒有生育子女，不過她的確與丈夫一同領養了好幾名「革命烈士遺孤」，裡面包括當時還是嬰兒的李鵬[41]。領養孤兒，特別是領養烈士遺孤，成為延安的標準作風。

在當時，宋美齡是引領婦女的頂尖模範人物——她才華洋溢，外貌美麗，受過高等教育，能說流利的中、英語，而且在抗戰期間逐漸成為國際知名人物[42]。於此同時，傳統戲曲、故事裡的巾幗英雄又重新回到舞台上；頭一個登場的是花木蘭，她是個著名的傳奇少女，打扮成男子模樣代父從軍。一九三九年，有一部關於花木蘭英勇事蹟故事的電影《木蘭從軍》上映。之前就有關於這位傳奇女英雄的戲曲和插畫，現在則改編為一名志願和日軍作戰的女子。古代的詩歌〈木蘭詩〉再次大受歡迎。

某些女性地位的變化，要是不巧碰上她們的家庭門風傳統又守舊，就會為她們帶來威脅。費孝通在昆明郊外借住的村莊觀察，父母對於他們的女兒出外到工廠裡去工作，都不感覺高興：

> 在工廠工作，要比起在田泥裡辛苦勞作輕鬆得多、也更有趣得多。女孩們受到高工資和都市生活的吸引，於是不管有沒有得到家中父母的首肯，都紛紛往城裡面趕去。她們回到家的時候，穿著露出腿腳的短裙、高跟鞋，還燙了頭髮！之前由家中為她們安排的媒妁婚約已經被毀棄了，浪漫的美夢迷惑了她們對未來的展望[43]。

在許多國家的社會裡，婦女地位在戰爭時期獲得的改善與提升，等到男性返家時就宣告結束。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在中國；這些發生在女性身上的改變是永久的；女性不再重返從前受到奴役的狀態。之後的內戰和中共的勝利，代表女性從前傳統上的低落地位一去不復返了。這部分是由於共產黨人堅持男女地位平等，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女性都需要投入到工作行列裡。過去女性在家依靠父親、婚後仰賴丈夫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女性受害者　女性地位的各種變化，主要發生在身處自由地區的女性身上，她們並不是戰爭和日軍占領的直接受害者。在日本占領區裡，很多女性淪為戰爭底下的犧牲者。有一個至今仍然在中日兩國之間引起劇烈爭端的議題，就是那些被日本軍隊強行擄去、充作軍妓「慰安婦」女子所遭受到的待遇。在過去十多年裡，隨著倖存者以她們本身的經歷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尋求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賠償，這些女性的悲慘故事已經逐一浮上檯面。在她們當中，看來有極大部分是來自朝鮮、菲律賓、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女性，全部都是日本軍方所殘暴運作的慰安婦體制底下的受害者。亞洲的「慰安婦」總人數究竟有多少，目前尚有爭議，不過各

界都普遍接受的人數，是大約二十萬名——對「慰安婦」人數抱持質疑看法的人士是某些日本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他堅持認為「慰安婦」就是妓女。

發生在這些女子身上的每一個情節，全是深深的痛苦。許多從這樣嚴酷考驗裡倖存下來的人，對於那些年裡自己遇到的非人待遇，選擇絕口不提。她們所受的痛苦實在太深、太巨大，以至於無法回想。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不曾說出口的認知，在她們回到家以後，希望她們**別去**談論自己所經歷的遭遇。

那些被擄去充當「慰安婦」女子的悲慘命運，導致大量生活在日本占領區的女性形同在監牢裡度日；她們活在害怕被擄去作「慰安婦」，或是遭到強姦的恐懼裡。日本占領區裡的女性解放運動，方才萌芽就遭到掐斷，這是由於女性需要藏身家中，避免和外界接觸——因為她們害怕，要是步出家門，就可能會遭遇不幸。

兒童　抗戰扭曲了許多孩子的童年。在抗戰爆發以前，孩子的童年是各式各樣、多采多姿的。童年的本質取決於家庭環境、性別、家庭的社會階級、以及其他許多因素。這場戰爭為孩子們的童年帶來一個令人厭惡的千篇一律：無論孩子們在中國的哪一個地方生活，他們的日子都因為戰事綿延而受到不安全感的困擾籠罩。只要這個國家還陷於戰事而分崩離析，就沒有政治或經濟上的保障可言。

安全缺乏保障是共通的情況。然後，童年還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干擾，或是完全遭到剝

奪。那些隨著父母作難民的孩子，失去了包括祖父母在內的所有親人；他們可能還會失去上學、受教育的機會，生活在貧困之中。李美鳳（音譯）的童年全都在逃難途中度過，她與父母一再顛沛流離，先由廣州逃到香港，又因為戰禍的關係而被迫回到廣州。因為這場戰爭，李美鳳的雙親變得一貧如洗，她的兩個姐姐被賣掉，好讓家人能夠活命，她自己則被送去作童婢[44]。利德蕙（Vivienne Poy）原本富裕的家庭並未真的淪為赤貧，但是他們同樣也必須再三逃避戰禍，先是從香港到廣東內陸避難，然後途經廣西、貴州，最後來到重慶。利家這個大家族因而四分五裂，成員分布華南各處。他們原來在跑馬地過的那種大家族團圓生活，現在是再也回不來了[45]。

在這場戰爭結束之時，還能活下來，並且留在父母身邊、一家人平安無恙的孩童，再怎麼說，處境總是好過大量在抗戰之中成為孤兒的孩子。

孤兒

無家可歸
No home to return to

傳統中國社會沒有收養無名孤兒的觀念。領養是非常普遍的情況——但總是在家族之內進行；領養毫無關係的孩子或是棄兒的概念，可以說是聞所未聞。膝下無子的夫婦，通常會由

姪子或外甥過繼為子，以確保晚年時有人奉養，不致孤單終老。失去父母的孩子會交給親戚撫養；大家族在這個方面扮演社會福利機構的功能。如此一來，被族親收養的孩子還是有家可歸，不會遭受被遺棄的心理痛苦。這種歸屬感不但真實存在，而且至關緊要；沒有了它，人們在這個重視家族身世譜系的社會裡，幾乎是難以立足的。

抗戰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新需要：數以萬計的孤兒（或許遠不只這個數字），完全和他們的家人失散。畫家劉國松就是這樣一位孤兒（見延伸閱讀五）。大部分的孤兒都不知道他們的雙親或其他家人是否還在人世，有些年幼的孩子甚至連自己的名字叫什麼都不曉得。

為了因應這樣的新需求，收容這些因為抗戰而產生的孤兒，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由宋美齡擔任會長，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出任副會長。到這年的年底，在四川、貴州、廣西、福建、江西、廣東、香港、浙江和陝甘等地區，一共成立了二十八所孤兒院；稍後，孤兒院的數字成長為六十一所[46]。這些孤兒保育院的運作都有嚴格規定，看來更像是二十世紀初期出現在中國的教會寄宿學校。保育院裡的孩子全都儀容清潔，吃得好也穿得暖。他們不斷引來人們的注意，他們的照片（通常是與國民政府的要人合照）則為中國為抗戰所作的努力，作了生動有力的宣傳。在海外華僑社會與北美洲，孩子們都引發了人們大量慷慨解囊的捐助熱潮。

其他成群的孤兒，則得到外國人士出手相救，將他們由戰爭前線帶往安全的後方。他們這些史詩般的旅程，已經被改編為多部電影。一九四〇年，身材嬌小卻意志堅毅、不屈不撓的英國女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帶領一群孤兒，穿越山西的層層山巒，以躲避日軍的追擊。一九五八年上映的電影《六福客棧》（*Inn of Six Happiness*）在威爾斯拍攝，以英國利物浦（Liverpool）唐人街的華裔孩子扮演當年的孤兒，未婚的老姑娘艾偉德由女星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飾演，變成一個充滿魅力的角色，電影裡還添加了一段關於她的浪漫情節。一九四四年，喬治．何克帶著另一群孤兒，走了更長的一段路，從陝西跋涉到甘肅。這段旅程在二〇〇八年被拍成電影《黃石任務》（*Children of Huangshi*），由男星強納森．萊斯．梅爾（Jonathan Rhys Myers）領銜主演。

孤兒院或許能保住這些孩子們的性命，卻不能保證他們有幸福快樂的未來。孩子們不知道他們的親生父母是誰，或者不曉得他們的家庭在何方，這就表示在他們往後的餘生裡，都要活在一句令人哀傷的成語「無家可歸」當中。家庭的庇蔭為什麼仍然這麼重要，這些孩子就是例證。官方對待這群孤兒，似乎表明國家能夠成為他們的新家庭，但這卻是一個渺茫黯淡的希望；而「國家能勝過家庭」的想法，並不能給予那些失去了家庭的孤兒任何安慰。

革命的社會與農村游擊區　在日本占領區裡，很多農村地區並不在日本長期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在這些地方，有若干新的社會形式正在形成。新社會的典範出現在中共的首府延安。延安是個多風沙的邊遠小鎮，位在陝西黃土地上深為貧困所苦的山谷裡；一九三六年，在「長征」裡倖存的少數中共黨人在這裡落腳，隔年又有來自華北與上海的年輕革命分子前往會合。

延安的生活樸素刻苦，居民全都處在同樣的貧困狀態之中。他們居住在從軟黃土挖掘出來的房屋或窯洞裡，有木質門窗充作門面。從領導階層到普通百姓，每個人都要從事若干體力勞動。他們身穿簡單、發皺的衣裳。這裡沒有下人或僕從，只有巡守隊員和調皮搗蛋的「小鬼頭」；這裡沒有豪門宴會，只有大眾歌詠和各種民俗舞蹈。

對少數想盡辦法要進入延安的外界觀察人士來說，這裡的生活簡直就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實踐，對於共同理想的徹底付出和奉獻。延安的中共黨人頓時成為西方左傾新聞記者的最愛。像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夫婦、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媒體記者，對於中共領導人們生活的清潔樸素和熱誠奉獻，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樣的生活型態，與他們之後即將見到的某些國民黨要人那種放縱鋪張的生活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他們為中共黨內表面的團結和那富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人毛澤東所折服、迷惑。他們看到了他們想要見到的事物：一個新世界誕生了；而這個帶有高度宣傳手法，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新世界」，日後也成為中共宣傳的標誌。

延安根據地是中共的總部所在。在華北的其他農村游擊區，中共在當地的組織還沒有延安那麼健全，對於中共各種政策的執行，就算真的曾經付諸實行，也沒有那樣確實，因此就有其他新的社會型態出現。這些新的社會型態，可能是傳統社會形態的再創造；而如此的傳統社會形態，在《水滸傳》這樣的小說裡，有著生動鮮明的描寫。他們的領導人物是類似歐洲中世紀騎士傳奇故事（Romance）裡的角色，全是些盜匪和走私販子之徒。這些人所生存的世界，由體魄上的英勇、策略與計謀的精明、以及相互之間的忠誠所支配，他們並不在乎任何既定的社會階級。這種生活令人感到興奮刺激，卻極度缺乏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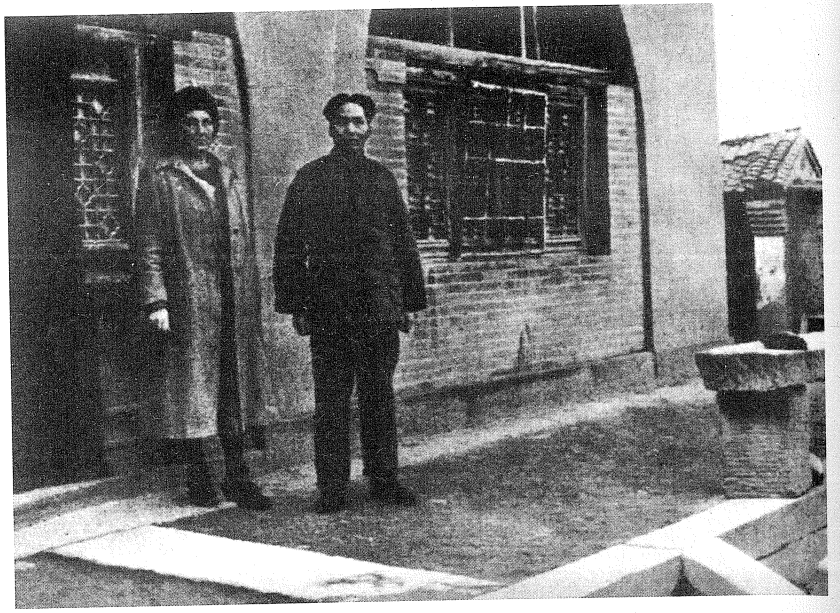


圖3.1　毛澤東和范爾蕾・克瑞希－馬克斯合影。（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into China*, 1940, p. 157.）

民族主義與個人關係間的拉鋸

在日本占領區裡，對國家忠誠之心並未死滅。舊有的社會經歷了一場不同的變遷，在變遷的過程中，有些人將對國家的忠心擺在對家庭和雇主忠誠依附關係的前頭。在抗戰中期的那幾年裡，包括謀殺與刺殺在內的抗日活動，逐步破壞了舊時的個人忠誠觀念。被看作「忠於國家」的人，現在揚棄了傳統社會裡對個人的忠心，化小忠為國家大

義，開始對抗日本人和他們的爪牙。

一九四〇年九月，北平因為一連串「重慶分子」遭到逮捕、處決的新聞而大為震動。結果，這些所謂的「重慶分子」其實是七十名年輕學生，年齡在十三歲到二十歲之間。他們因為參加一個名叫「抗日救國會」的地下組織而遭到逮捕。當中有三十人被處決，另外四十人下獄監禁。

這個故事之所以特別讓人感覺沉痛，是因為這些年輕學生全都是參加占領區偽政權人物的子女[47]。他們的父親完全無法想像，在他們決心背棄愛國的志向以後，孩子們竟然會投入愛國志業，並且願意犧牲性命。

一個月後在上海，日本人扶植的市長傅筱庵從一場宴會返回、在床上熟睡時遭到刺殺。傅遭到割喉，下手的人顯然就是他雇用十年之久的傭人，這名僕從在完成刺殺任務以後，還在市長官邸裡、日本當局派來的警衛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悠哉閒晃[48]。在日本占領區發生的這些謀害、刺殺，以及神祕的死亡案件，通常都被歸咎於共產黨或罪犯下手行兇，不過其實當中有許多案件，都是由國府特務所派的殺手執行的，他們是杜月笙和戴笠的「軍統」[49]。對於暗殺的恐懼，以及對人的無法信任，使得這些和敵人合作者神經緊繃，日子過得極度痛苦，尤其是在他們連身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相信時，更是如此。

人際聯繫

郵局 在抗戰四年之後，中國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控制之下的世界。在這個分裂的國度，郵局是少數還能夠通行全國各地的機構之一。此時的中國郵政，不但如同它過往超過五十年的歲月那樣，仍然照常運作，而且還發揮了超乎往常的效率，這當中大部分都要歸功於郵務人員對職責的奉獻熱誠。實際上，「綠衣使者」（因為郵差穿著綠色制服而得名）的員額人數在抗戰期間還有所增加，從二萬八千八百人增長到三萬一千八百名；郵局甚至開始招聘女性員工[50]。信件是分隔各地的家人之間彼此保持聯絡的唯一管道，而就算郵件遞送的速度有時變慢了，它仍然能夠發揮作用。

使用郵遞信件這個聯繫方式，有許多危險和困難之處。危險的地方在於敵我雙方的祕密警察（日軍憲兵隊、國民黨的軍統、或中共方面由康生負責的特務監控系統）會私下開啟信件，而且可能對他們懷疑的收信人採取行動。眾多困難之處則在信件的遞送相當耗時，而且既然許多出外逃難的人居無定所，落腳之處都只是暫時地址，要將信件寄送到他們手上也就相當難辦。

識字或許會被認為是寫信、讀信的必要條件。其實不然。在中國，雇人捉刀代寫信件早已有悠久傳統。下面這段文字，就是對一九三八年在西安的代寫信件者的描述：

圖3.2　一名信件代寫人。（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into China*, 1940, p. 109.）

在繁忙的郵局外頭，門廊底下，坐著幾十名信件代寫人。他們幾乎全都是老頭子，而且都配戴眼鏡。不識字的顧客上門，他們或者是口述自己要寫的信件，交由代寫信人寫下，或是由信件代寫人充當顧問或律師，聽取顧客們的煩惱，然後寫下他認為「量刑判罪」的適當文字[51]。

音信斷絕　許多人逃離占領區之後就沒有音訊，他們的父母完全不知道孩子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父母坐在家裡，成天替他們的孩子操心——無論孩子們究竟是生是死。更加令雙親衰弱的憂心，是既混合著對孩子政治立場的欽佩尊重，又氣惱他們

拋下家中老父老母，一走了之，而每天都盼不到他們有信來，更增添失望之情。在東北籍女作家蕭紅的短篇小說〈北中國〉裡，就描述了一對東北父母，在兒子不願居於日本人占領之地而出走後，日漸衰弱的故事。他們只收到兒子寄來的兩封信。母親不斷的哭泣。「她無所因由似的說哭就哭。看見別人家娶媳婦她也哭，聽說誰家的少爺今年定了親了，她也哭。」孩子的父親則有不一樣的反應：「人家也就曉得耿大先生避免著再提到兒子。家裡的人更沒有人敢提到大少爺的。大少爺住過的那房子的門鎖著，那裡邊鴉雀無聲，灰塵都已經滿了。」這個家庭逐漸的分崩離析；少爺的離去，已經帶走了這個家的生命[52]。

天底下的父母親在失去孩子的音訊以後，反應都是如此。他們的兒子為了愛國大業而參加抗日，並沒有讓小說中這對父母稍微寬心釋懷。最令他們哀痛的是，他們完全不知道兒子身在何處，狀況如何。這樣的失落，在日本占領區裡的許多子女出走的家庭裡，反覆上演無數次。

孩子本身可能也是離散分別的受害者。葉嘉瑩的家庭是世居北平的滿人世家。抗戰爆發時，葉的父親在上海的中國航空公司做事。他隨著政府撤退，首先前往武漢，接著又到重慶。抗戰八年期間，他完全沒有和留在北平的家人通信聯絡過。在戰爭進入第四年的時候，葉嘉瑩的母親去世了，留下她給舅舅撫養。葉的雙親離她而去，同時也帶走她的快樂童年。事隔六十多年，那種分離的痛苦和失落傷痛猶存[53]。

結論

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是痛苦煎熬的年份，但是在這些年裡，人們在面對可怕的不幸與災難時奮力撐持下去，讓他們心中興起了些許微弱的信心：有朝一日抗戰或許能夠得到勝利，一個新的中國將會隨之而重生。隨著時間過去，在國府統治區域與日本占領區裡，這種自信心和期待幸福結局的希望漸漸枯竭消失了；反之，中共的日漸壯大，則讓人們心中漸起疑問：如果將來真的出現一個新中國，那將會是何種模樣。

⊙延伸閱讀

閱讀一：戴望舒〈獄中題壁〉

戴望舒是當代最知名的詩人。他於一九四二年遭到日本當局逮捕下獄，監禁了一段時間。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裡，
他懷著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

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溼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54]。

閱讀二：蔣宋美齡，〈七種致命罪惡〉

蔣夫人譴責許多她在重慶所見的人們：

> 抗戰使我們的許多缺點都暴露出來。現在，對我們而言，在事理和在心理上，都是我們改正這些缺失的時候了。世界上其他各個國家，當面臨戰爭逼近時，都認為立刻開始改革和改造措施，是必要而精明之舉；負責任的官員奮起投入行動，評估不適當的敵對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並準備必要的肅清措施，以因應一切緊急狀態。現在戰爭已臨到中國頭上，她應該也如此作為。她在行動上必須迅速敏捷而機動，在言談上必須沉緩而寡言，以求避免遭受放縱或冷漠的指責[55]。

在一篇長篇講詞裡，蔣宋美齡接著列舉這些罪惡（此處加以整理改寫）：

自私自利：以民脂民膏發財致富、發國難戰爭財、壓榨百姓、貪汙——此種罪行最為墮落可惡。

注重面子：不願顯露無知愚昧，致使做出「極其愚蠢的決定」，並且掩飾其無能力。

排除異己：依賴親近同僚，只問出身地域、教育程度、或者是否具有相同政治利益——這是「一種政府之內的腐敗」。

缺乏自律：懶散、冷漠、沒有效率——全都是散漫教育下的產物。

迴避責任：愚昧、無能、甚至蓄意掣肘阻撓，全都是避免承擔責任之舉——已經造就出一支「領薪而不適任的大軍」。

沒有法子：面對任何處境，均採取不做決定、不作為的態度。

差不多：散漫、粗枝大葉、懶惰——「隨波逐流和邋遢不修邊幅者的專用詞」。

閱讀三：艾青，〈抬〉

艾青同樣也是中國最知名的詩人之一。這首詩作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在日機對重慶進行的一次空襲之後。一九五〇年代，艾青被打為「右派分子」，流放到邊疆地區將近二十年時間。

> 請你們讓開
> 請你們走在人行道上
> 我們把他們抬起來
> 請你們不要推擠

請你們站在街旁
讓我們把他們抬起來
請你們不要叫嚷
請你們用靜默表示悲哀
請你們讓我們抬起來
這是一個婦人
她的腦蓋已被彈片打開
讓她閉著眼好好睡
願她過一陣能慢慢地醒來
讓我們抬起她送回她的家
讓她的家屬用哭泣和仇恨
這是一個服務團的團員
灰色的制服上還掛得有他的臂章
你們認識他麼——他的臉已蒙上了土灰
無情的彈片打斷了他的勤勞的臂
請你們讓開，請向他表示悲哀
他已為減少你們的犧牲而被殘害

請你們不要擠，這裡還有更多的
他們都是傷兵住在兵醫院裡
他們在前方受了傷躺在床上
等著傷好了再上戰場
現在無恥的敵人已把醫院炸倒
現在他們已收到了更大的創傷
請大家讓開
讓我們抬起他們來
請大家站在旁邊
讓我們抬著臾床的走來
請大家記住
這些都是血債[56]

閱讀四：許烺光，〈中國的社會新精神〉

這些重大的變化，儘管主要是戰爭所帶來的後果，因此為時短暫，但是其對社會結構卻可能產生長遠的效應。徵兵、戰爭的蹂躪破壞、以及新產生的機會結合起來，驅使或引發年輕人離開家園，並且撼動家族長權威的最後堡壘，也就是上一代對年輕人的經濟掌控。舊日的禮

儀，像是在信中稱呼人們為「仁兄」等文言習慣，我還堅持了一段時間，但是這個國家的社會秩序主流，並不是傳統家庭權威，而是國家法律。即使是在偏遠地區，這樣的情形也會逐漸出現。

更有甚者，在工商貿易界出現的新機會，以及昔日士大夫群體作為特殊團體的瓦解，已經促使一個中階階級的興起，他們的終極的企圖，在於貿易、工廠和其他類似的冒險事業上。在這個程度上，這項新發展會讓學術志業更加全面合理，而使得官員階級更加「精準純粹」。國內喜愛冒險犯難的人士和士大夫階級不再以「讀書作官」當成他們個人致富、提昇的主要道路。讀書人也因此不再那麼輕視體力勞動者。

人們是否能將公民身分與職業地位分開看待、分別看待能到何種程度，仍將是未定之天。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基層官員仍舊被高階官員目為私人僕役，並且遭其任意對待。而不識字的農民也可能在這類專制思想底下，依舊被看作是官吏們的下屬臣民，持續一段漫長的時間。但是至少在新出現的中間階級之中，對於職業貴賤之分的強調，彼此之間高下的分別，將不再那樣顯著；至於軍人，他們身為國家重要群體的角色，將逐漸受到社會的認可，而不再被看作是被遺棄、低賤的人[57]。

閱讀五：劉國松，〈一個孤兒的生活〉

劉國松是知名的台灣畫家，他在抗戰期間度過少年歲月，並且進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念書。

和許多同時代年輕人一樣，劉國松的童年少年生活是在烽煙遍地的抗戰期間度過的。他生於一九三二年，原籍山東益都（青州）。在出生前一年，日本已占據了東北三省，威脅整個華北。他的父親是一位軍人，負有保衛國土的責任。劉國松從童年開始，就遠離家鄉，隨著軍旅生活，到處漂泊流離。這些生活對劉國松來說，雖然艱苦，但卻培養出他有獨立的性格、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遠大的志向與自信心。這使他可以到處為家，易於適應新的環境。

當他六歲的時候，抗戰已經開始一年多，一個重大的轉變，給他極大的打擊。他的父親在抗戰中擔任營長，年輕勇敢，極受部下的擁戴。一九三八年，當日軍進攻武漢時，劉國松的父親拼死守土而犧牲，一時間，劉和母親及幼妹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們流浪在湖北、陝西、四川、湖南、江西一帶。

對這一段困苦的日子，劉國松這樣記述：「母親帶著我兄妹二人過著流浪的生活，我上山砍過柴，母親做過紡織工，吃過鹽水泡發了霉結成霉塊的米飯，凍得睡不著時，母子三人抱著默默流淚。[58]」

⊙相關電影

- 《黃石任務》（*The Children of Huangshi*），導演：羅傑・史波提斯伍德（Roger Spottiswoode），二〇〇八年。
- 《六福客棧》（*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導演：馬克・洛伯森（Mark Robson），一九五七年。
-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導演：張藝謀，一九九七年。
- 《色戒》，導演：李安，二〇〇七年。

■注釋

1 Evans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1940), p.295. 伊凡・卡爾遜（Evans Carlson）是位才華洋溢的美軍青年軍官，他在一九三八年壯遊中國各地，遍及日本占領區與自由地區。

2 Lin Yutang, "The four-year war in review," *Asia*, July 1941, p.335.

3 *China Weekly Review*, October 18, 1940, p.223.

4 張根福，《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頁51。

5 Fei Xiaotong, "Some social problems of unoccupied China," in H. F. MacNair (e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p.54-55.

6 W. H. Donald, Letter to Harold Timperley, December 30, 1938, p.5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RG25/ 1755/ XIV.

7 Owen Lattimore, Letter, November 11, 1938.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RG25/ 1754/ XII.

8 F. R. Edwards, "Impressions of China under war conditions," in *Individual Psychology Medical Pamphlets*, Vol. 22 (London: C. W. Daniel, 1940), p.43.

9 Pearl Buck, "He who lives, wins," *Asia*, November 1939, pp. 635-636.

10 Rhodes Farmer, *Shanghai Harvest* (London: Museum, 1945), p.200. 在後來的毛澤東時代，中山裝實際上被採用為全民的制服，因此這款服裝在西方通常被叫作毛裝。

11 Hallet Abend, *Chaos in China* (London: Bodley Head, 1940), p.138.

12 Han Suyin, *Destination Chungking*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2), p.167.

13 重慶是長江流域著名的三大火爐之一（另兩個是武漢和南京）。夏季溫度超過攝氏四十度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14 J. K. Fairbank, *Chinabou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228.

15 Zhang Ruide（張瑞德），"In the shadow of the bomb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air raids on 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p. 1, 2. 本篇論文係於二〇〇四年根據對四十名轟炸倖存者的訪問寫成。

16 Robert Ekvall, "The bombing of Chungking," *Asia*, August 1939, p.472. 在中國，五月四日是紀念日，用以慶祝一九一九年同日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

17 Robert Payne, *Chungking Diary* (London: Heinemann, 1945), p.274.

18 *China Critic*, XXX, 12 (September 14, 1940), p. 68.

19 Kinji Sudo（須藤欣二），"How we bombed Chungking," *Asia*, October 1941, p.585.

20 國史館，《日本在華暴行錄》（台北：國史館，1985），頁755。

21 Zhang, pp. 3-5.

22 對此大學的詳細研究，參見：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 *China Critic*, XXIII, 10, P.158, 1938.

24 李麗霞、王建軍，〈抗戰時期入陝移民群體的人口分析〉，《西北人口》，三卷三期（2006），頁5。

25 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簡稱為「工合」；這個詞彙的舊日拼法「Gung Ho」進入美式英文當中，成為一句俚語，意為「十分賣力、起勁」。

26 George Hogg, "The new countryside," *China Joural*, XXXIV, 3 (March 1941), pp. 138-142.

27 張根福，《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頁199-200。

28 F. W. James, *Changing China* (Kilmarnock: Ritchie, 1946), p.176.

29 Edgar Snow, *Scorched Earth*, Vol. II (London: Gollancz, 1941), p.232.

30 *China at War*, Vol. II (January 1939), pp.52-53.

31 Fei Xiaotong, p. 52.

32 France Hsu, 'China's new social spirit', *Asia*, September 1942,pp. 506-509.

33 Ba Jin, *The Family* (New York: Garden City, 1972).

34 孫本文，《現代中國社會問題》，頁202-204。

35 抗戰時，陳志讓教授是昆明的一位年輕學生，領取政府的津貼金：他卻只能很勉強的維持溫飽。每個月的月初，他就拿著剛領到的所有津貼金到當地一家飯館去包飯，確保他這個月接下來的每天，都能有固定一頓飯可吃。

36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BC Press, 2008), pp. 232-233.

37 Hsu Meng-hsiung, "The unoccupied women of unoccupied China," *Asia*, March 1941, p. 123. 文中舉出的各個女性都沒有提及實際的姓名。這篇文章裡並未提供任何中文字。

38 *China Newsweek*, *114* (November 23, 1944), pp. 7-10.

39 Chai Chi-chen, "Being an old maid in China," *Asia*, September 1941, pp. 492-494.

40 據某些人表示，孔令偉其實是宋美齡所生，而交由她的大姐，孔祥熙夫人宋靄齡撫養。譯按：此說應不確，孔令偉確實是孔祥熙、宋靄齡夫婦之女。

41 李鵬後來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而且被外界普遍認為應該為發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屠殺負起責任。

42 戴安娜（Diana Lary），〈創造一個領袖兼內助的角色：對日抗戰時期的蔣夫人〉，收於《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0），頁558-565。

43 Fei Xiaotong, p. 58.

44 Lee Mei-fung, *Childhood Lost*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Bauhinia Press, 2004).

45 Vivienne Poy, Profit, *Victory and Sharpness: The Less of Hong Kong* (Toronto: York Centre for Asian Research, 2006), pp. 120-129. 譯按：利德蕙（1942-）出身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利家，是加拿大第一位華裔上議院議員。她的夫婿、著名整形醫師伍衛權（Neville Poy）則是加拿大總督伍冰枝的兄長。

46 林佳樺，〈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建立與組織運作〉，《史匯》，第十期（2006年9月），頁269-320。

47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ember 7, 1940, p. 2.

48 *China Weekly Review*, October 19, 1940, p. 228.

49 張藝謀於一九九五年執導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拍出了這樣的時代氛圍。「軍統」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的情報單位。

50 *China Newsweek*, 134 (April 26, 1945), pp. 5-7.

51 Violet Cressy-Marks, *Journey into China*, P. 111.

52 Xiao Hong, "North China," in Howard Goldblatt (trans.), *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 (Beijing: Panda Books, 1981), pp. 175, 176.

第四章

陰鬱的年份

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

53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訪問葉嘉瑩。譯按：葉嘉瑩（1924-），蒙古旗人，滿洲姓葉赫納拉，祖父名中興，進士出身，曾任朝廷候補主事，父親葉廷元畢業於北京大學，葉家學淵源，自幼熟讀詩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後，開始教學生涯，一九四九年隨夫撤退到台灣，在彰化女中等校任教，因丈夫被捲入匪諜案而短期入獄，一九五二年起，在台灣大學等多所大學院校任教，一九六九年移民加拿大。

54 In Joseph Lao and Howard Goldblatt (eds.),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14.

55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 Shall Rise Agai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41), pp. 38-48.

56 艾青作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收入《艾青選集》，卷一（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頁378。

57 *Asia*, September 1942, p. 508.

58 台北市立美術館，《劉國松畫輯》（台北：1992），頁12。

重大事件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攻擊美國，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之內，又橫掃各地，拿下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印尼）。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參加盟國對軸心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國）的全面作戰。日本偷襲珍珠港大獲全勝，但是，有如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在當時就已經看出，日本此舉，將是帝國宏圖終結的開始。憤怒的美國以舉國之力投入對抗日本的行動。這自然意謂著要高度涉入中國的對日抗戰。

對中國而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那兩年，是一段交織著樂觀與悲觀的年代。從樂觀的那一面來看，中國現在有了堅強的盟邦：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蘇聯，這些盟邦會加入對日作戰，並且增加擊敗敵人的可能性。從悲觀的那一面來說，在戰爭開始時極為重要的政治團結業已一去不復返，物價開始大幅飆漲，而民心士氣正在消退。新一波的難民潮，由香港逃往中國內陸。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這兩年間，中國境內少有戰事發生。日軍主力此時全力投入對東南亞的占領，並且正在籌劃向他們的終極目標印度進軍。為了阻止敵人這個企圖，中國軍隊遠離國境，在緬甸作戰。這些中國軍隊由一位在華資深美軍將領統率，美軍將領的名字是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就在這時，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發生尖銳的爭執與摩擦，最終導致他被美國召回，離開中國戰區。

國共合作下的抗日統一戰線，此時已經是垂死掙扎。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實際上陷於分裂狀態，而這種分裂又因為國共雙方彼此指責、各自私下發起破壞顛覆對方的軍事行動，而更形惡化。中共在軍事和經濟實力上仍然是較為虛弱的一方，但其宣傳攻勢卻逐漸取得成效；中共的宣傳讓許多人相信，共產黨人是一群強悍、正直、愛國而且勇敢的人們。世人眼中的中共，既有極度革命的一面，也有相當傳統的面向。《三國演義》是毛澤東最愛讀的小說之一，這是一本關於大膽、機智、勇敢、有時又充滿悲劇色彩的英雄傳奇故事。毛和他手下的將領，儼然就是《三國演義》筆下的那些英雄人物——不守常規、作風強悍、又帶有幽默感，注定會受到大眾的喜愛與歡迎。

在抗戰的這個階段，中共的部隊主要進行的是游擊戰，這種型態的戰爭不拘泥於形式，反應快速敏捷，而且務實、不依照教條行事。此時的中共，在人民與其軍隊之間，已經建立起一種密切的認同關係。

於此同時，在重慶，開始瀰漫一種厭戰情緒。隨著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經濟困境也逐漸加深。物資短缺的情形惡化；最後一條通往沿海口岸的管道，也就是往香港的空運路線，在一九四一年耶誕節當天，香港落入日軍之手後斷絕。現在，能夠運送物資與人員的路線，只剩下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中航線，或是穿越蘇聯國境，由新疆進入中國的陸路；可是上述這兩種聯外管道都受到特別關照，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使用。

那些撤退到大後方的人們，士氣狀況並不佳。在抗戰的第五個年頭伊始，悲觀沉重的情緒開始蔓延。很難想像這場戰爭會有結束的一天；對於未來沒有什麼憧憬。抗戰到此早已不只是僵局、停滯，而是一場永恆拖沓的夢魘。人們已經筋疲力竭、厭倦乏力、欠缺信心、牢騷滿腹，並且暴躁易怒。戰爭之初為了共同大業團結一心的心態，已經被求生存的嚴酷競爭所取代。冷漠與倦怠的情緒，在每一個居住於潮溼昏暗重慶居民的心裡蔓延。這種普遍存在的情緒，就有如這座城市的天氣那樣，憂鬱而黯淡。對於提振士氣，或是鼓舞人心，政府或其他任何人此時都無能為力。

抗戰到此已經五年，下江來的人們正飽受思鄉病之苦，這可以從他們對家鄉菜的渴望中表露無遺。中國人對於其家鄉美食的熱愛，意味著當他們一旦吃不到家鄉食物時，就有遭到剝奪、甚至是憂傷愁悶的感受。來到大後方的人尤其有飲食方面的問題——四川人特別愛好辛辣食物。四川人以他們能吃全中國最辣的食物為傲（湖南人對這個看法有意見）。從華東和華北來到大後方的人，從前很少吃過這樣辣的食物，而且從未能夠習慣它。

自由地區的食物問題讓人惱怒，可是卻完全無法和華北平原的饑饉相提並論，那裡發生了一場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饑荒，在一九四二年裡逐步蔓延展現開來。這場冗長、持久的浩劫，是中國戰時所遭受的苦難裡，最為悲慘的一次展現。

圖4.1 〈擁護咱們老百姓自己的軍隊〉（*Holzschnitt im neuen China*, East Berlin, 1976, p.82）

主題與案例研究

社會混亂與衰敗

一九四二年，中國未遭敵軍占領的地區正顯示出各種混亂與衰敗的徵兆。社會模式易變而不固定。舊日的穩定不再，而且取代舊秩序的新系統還沒有出現。臨時特定的社會模式正在逐步發展，用以取代缺席的家庭功能。年輕人自行找尋結婚對象，生下孫輩，完全不考慮家中長輩的意見。家庭離散現在已經持續太久，以至於看來像是永遠要這樣下去；和家庭離散給年輕人帶來自由，但是也在違背一些根本社會義務時，讓年輕人感到罪惡愧疚。當中最重要的義務，與父母雙親去世有關。

家族儀式的缺席　身為一個兒子，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讓他的父母百年之後能夠安息。人子若不能替父母辦一場風光的葬禮，並且替雙親服喪，會被看作有些違背天理。許多到後方去的難民都得經歷這樣悲痛的考驗。老舍的母親在遙遠的北平去世時，他甚至完全不知情，在老舍得知以後，他為之震駭莫名（見延伸閱讀一）。冀家的族長於一九三八年在漢口去世時，家人設法安葬了他，但是這並不算是合乎規矩的葬禮，因為他並未葬在故鄉汾陽，家人也無法以正常的祭拜禮進行哀悼，因為他們很快又得逃難[1]。冀家是個鄉紳世家，不過他們心中所感受到崇

奉父母遺體的需求，就和社會裡每一個階層同樣的強烈。張中順來自徐州近郊的農村家庭，他和父親在一九三七年底加入國軍。前四年父子倆在同一支部隊裡，先是在正規軍裡，後來則在江蘇南部的國軍游擊隊當中作戰。之後，他的父親在作戰時陣亡了，遺體被火化。張中順帶著父親的骨灰搭火車返鄉，他身著白衣孝服，沿途的日軍沒有找他麻煩。張於是將父親的骨灰歸葬在家族墓園，這是身為孝子所應該作的事情，卻也是他最後一次能為家人克盡孝道。他回到軍中，從此再也沒能再見母親和祖母一面。四十多年以後，他拋下家庭的這段往事仍然折磨著他，這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緩解的沉重哀傷[2]。

沒能妥適歸葬先人的話題，在任何社會裡都很難啟齒討論，在中國更是如此，因為厚葬先人、在親人離世之前關懷他們、確保各種身後事（包括購買自己的墓地和棺木）能妥善辦好，是極其重要的。人們相信，去世先人的靈魂，如果沒得到妥善歸葬，會不斷困擾著還在世的子孫，懇求他們找到遺骸，並且歸葬故里。

很多家庭在戰時和親人音信斷絕，不曉得是否應該哀悼他們的家人。士兵戰死，通常不會有紀錄留下。同樣的，他們的家屬通常也不會收到通知。士兵死亡以後，沒有什麼管道可以有效的通知家屬，陣亡官兵的遺體也不是安葬於軍人墓園內。在戰鬥正熾時，只能因陋就簡，匆忙對遺體進行處理，草草埋葬於墳地，或是亂葬崗[3]。軍人的家屬長期處在「欲祭疑君在」、不知親人生死的懸疑擔心狀態下。戰時最讓人哀傷悲痛的下落記載，就是「失蹤」。「失蹤」既可能意味著人們在戰鬥中被炸成碎片，被埋進亂葬崗，或者是像在南京那樣，屍體被拋進長

江；也可能他們仍舊活在世間，但已經遺棄了他們的家人——因為沒有傳達音訊的方法。不知道親人下落究竟如何的家屬，心中的痛苦轉化成永無止境的悲傷，無法接受喪失親人的事實。

無法出席若干沒那麼具有重要意義，卻更加充滿喜慶氣氛的家庭活動，例如兒子誕生、婚宴、父母七十大壽、或是清明節返鄉掃墓等場合，引發人們心中另一種不同於上述的悲傷，而且突顯出戰爭所帶來分離和損失的意義。抗戰期間有好幾百萬的人們，至少有八年的時間，完全不可能在家裡慶祝最具喜慶氣氛的農曆新年[4]。

這種難以慶祝喜慶場合的情形，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在適當的時機來臨時，慶祝一場生日宴席，會被舉辦到近乎鋪張奢華的地步。一九四二年初（譯按：應為一九九四年三月），白崇禧的母親過九十大壽，這個歲數對當時的中國女性而言，算是驚人的高壽了。白崇禧對母親格外孝順，因為其母年紀很輕時便守寡，全心撫養兒子成人。桂林城裡舉辦了一系列盛大的祝壽活動，有流水宴席，還一連演了好幾天戲。很多中國高級將領在壽日當天都暫時從戰爭裡脫身，專程由重慶搭機到桂林祝賀。蔣介石並未親自到場，但是他送來法幣一千萬元充作壽儀；這筆錢雖然反映出通貨膨脹已經強烈影響自由地區，卻也仍然是一筆大數字。有些批評的聲音認為，在抗戰時期不應該舉行如此鋪張浪費的祝壽活動——不過如果考慮到九十壽誕是這樣的罕見稀少，對於立下不良示範這方面，倒也不會有太大的危險[5]。

有些家庭活動並未定期舉行，但是同樣極為重要。這些活動裡，包括了分家產，分家的過程十分複雜，需要家庭成員親自出席參加，以確保其各自的利益，並對例如生意、學堂、祠堂和墓園等需要大量投資的家中大事，做出決斷。在抗戰期間，逃難在外的家庭成員無法參與這類事務。他們通常認為自己缺席時，家族作出的決定是偏差不公的結果，從而造成家庭成員之間長期的痛苦怨恨。這類偏差不公很難說是侵略者所造成，但是它確實是敵人占領所帶來的副產品。

恐懼與社會根基的流失　在敵人占領區，另有幾種不同的壓力正在逐漸侵蝕原來社會的凝聚力。長期的擔驚受怕，使人們變得膽怯，更關注自己，而不那麼在意他們的家庭或社群。遭到逮捕或甚至死亡的威脅，現在變得零星發生而且難以預測，但是卻從未遠去。在城鎮區域，日本人和他們的爪牙永遠都在人們身邊現身。

在農村地區，日本當局藉口掃蕩游擊隊支持力量而進行的「三光」戰役還在持續進行，其程度甚至有增無減。這類的搜捕攻擊可能會激起更強烈的抵抗——或者，也可能會造成完全相反的效應。農民和游擊隊之間有著固有的內在矛盾關係。農民既是供抗日游擊隊賴以生存的那汪水，同時也是當游擊隊離去、日本人發起報復時，首當其衝的對象。「三光」戰役的殘酷野蠻，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心理狀態。反抗是其中一種，但是順從和慣常的焦慮同樣也很普遍，還伴隨著一種絕望、消極、看不到任何未來前景的感受。在抗戰中期的那幾年裡，華北農民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們感到恐懼、懦弱、無助、還有無奈。他們心裡最關切的，就是生存狀態（self-preservation）（譯按：原文在英文後加上「生存狀態」的漢語拼音）。對許多農民而言，順從的接受

日本人的存在，而不去積極反抗，是他們惟一的選擇[6]。這樣的態度和中共那種「人民大無畏起而反抗」的傳統論述大相逕庭，但是這通常才是現實中的情況——此種順應現實的行為，得自於起而抵抗徒勞無功、還會招來日軍報復的慘痛經驗。在許多地方，這樣的態度根深蒂固；在未來的二十年間，它讓農民安然度過早期中共統治那段動盪的年歲。他們主要的關懷，就是要生存下去，並且抓緊他們的財產，這種關懷，實際上已經超出很多農民能力之所能及。

接近抗戰結束的時候，有一種新的恐怖威脅出現在華北農村民眾之間：毒氣與生物戰。日本人以毒氣來對付反抗他們的華北農民，尤其是用在將反抗者從華北平原的田壟溝渠網絡裡驅趕出來的時候。而就在抗戰期間，日本人在中國六個地方執行生物戰研究，其中最為惡名昭彰的是七三一部隊，位於滿洲哈爾濱附近。在七三一部隊裡，戰俘被用作人體實驗。無論是化學戰，還是生物戰，從來就沒有被公開談論過；關於當中情況的各種謠傳，只讓這一切變得更加恐怖駭人。

驅逐與抓壯丁　強制徵收土地實際上導致華北若干社群的消失。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日本軍方開始淨空河北、山西和長城沿線接近滿洲邊境的土地。日軍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製造封鎖區，以禁絕游擊隊的活動。住在這些地方的民眾被驅逐出去，他們的土地被沒收充公。總計有四萬兩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清空而成為「無人區」。在執行此任務的十二個月內，超過十萬名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被送往東北[7]。原來在這些地方生活的社群不復存在。

圖4.2　抓壯丁。（《抗日戰爭時期宣傳畫》，北京，一九九〇，頁14。）

在占領區抓壯丁，在中國本地或是送到日本從事勞動，是另一個造成社會崩解的原因，在戰爭的最後三年特別如此。

被拉走的壯丁必須拋下家人，通常事前沒有任何準備，因為他們大都是被強徵入伍的。他們得不到報酬，不能寄任何錢回家給那些原來仰賴他們收入維生的家人。他們的家人不但就此陷入貧困，同時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生是死。被抓壯丁的確切數目很難確知，但是在整個戰爭期間，被抓的壯丁必

定有數百萬人之譜。徵集勞工是一項大規模工作[8]。被強制徵用的勞工至今仍然是一項議題；若干之前被日本「抓壯丁」的人士在日本向他們的「前雇主」發起訴訟，因為當年這些公司在今天仍然存在。

混亂、憂鬱、與身心疾病　在自由中國，社會解體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並不如上述這些例子來得引人注目，但是通常也都十分嚴重。對逃難在外的難民來說，身陷敵占區的親人長期沒有音信，讓人苦悶哀傷。失望沮喪、抑鬱消沉、甚至災厄死亡的感受正在蔓延。一位成都的程姓（Leslie Cheng）精神科醫師注意到這種心理抑鬱不振的情況。他運用自己所學的西方心理學知識，研判這種心理現象不能歸因於心理疾病，而是心情上的悲傷、不幸和脆弱。程醫師發現，戰爭所帶來的精神衰弱情形，比他之前預期的還要輕微；許多民眾都能妥善應對戰爭帶來的心理壓力，在程醫師看來，人們具有一種「卓越的幽默和歡笑能力」。不過，他也見到很多心理崩潰的案例，特別出現在年紀介於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人們，這些人的內心被年華正在老去、未來又看不見希望的感覺所壓垮[9]（見延伸閱讀二）。

程醫師注意到的種種心理失調混亂，在民眾的身體健康方面也能找到類似的情況。戰爭帶來的社會崩解，成為身體健康崩壞的溫床。傳染病在戰時的混亂情況之下快速傳播，因為人們到處遷徙暫住，所到之地通常衛生狀況都不佳。下面的表格列舉的，是抗戰各個時期的主要流行傳染病[10]。

年分	疾病	受害省份
一九三七	霍亂、痢疾、鼠疫	長江下游各省、福建
	霍亂	湖北、湖南、江西
一九三八	瘧疾	湖北
	回歸熱（Relapsing fever）	西北各省
一九三九	霍亂	湖北、陝西
一九四〇	鼠疫	福建、浙江、江西、湖南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	瘧疾	雲南

非流行性的傳染病也造成嚴重的死亡。撤退到大後方的人們，可能會因為四川惡劣的氣候而罹患肺結核病。一份一九四三年的統計聲稱，重慶的大專院校和高校學生裡，有百分之五的人正罹患開放性肺結核，而此時的重慶，只有一座肺結核療養院，裡面只有六十張病床[11]。

從較進步城市撤退到後方農村地區的人們，難以在此尋求醫療救助，而可能會死於一些在其他地方能夠治癒的疾病。傑出的近代史學者楊天石在只有三歲稚齡時，隨家人由揚州疏散到後方鄉村，他的母親在那裡得病去世，而這種病在楊的家鄉揚州，卻能輕易得到治療。

巴金的小說《第四病室》是仿效契訶夫（Anton Chekov）《六號病房》（*Ward Six*）之作，這部作品是一篇充滿悲苦意味的戰時中國紀實文學。小說裡，一群飽受病痛折磨之苦的患者待在權充收容所的醫院裡，境況悲慘，他們就是這整個不幸社會的隱喻[12]。這部小說

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出版，讓人讀來悽慘悲悶，尤其是小說的作者，曾經一度還是個對於變革、對於一個新而自由社會，都抱持著樂觀看法的人。病情的猛撲很容易就被詮釋以一則醫學的隱喻，讓身體的疾患比作降臨在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浩劫。這種比喻在加入經濟情勢時更加神似。

隨著社會結構的崩潰瓦解，自由中國的經濟也變得萬分拮据——最為明顯的徵兆，就是來勢猛烈、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戰爭所引發最具破壞性的社會效應，就起於通貨膨脹。由於日本入侵，占領了大多數戰前徵稅的區域，致使政府稅收銳減；又因為軍費開支大幅增加的緣故，政府只能靠印鈔票來支付戰事所需，這明顯無法顧及此舉所帶來的社會效應，將會波及在貨幣經濟底下生活的所有人。

通貨膨脹當中的非貨幣原因也清楚顯現：物資缺乏、商業貿易和交通受阻、貨物與產製管道的毀滅、進出口貨物的急遽銳減、以及難民的大量湧進。不過，上面這所有的原因，都比不上浮濫印鈔票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這個解釋，來得更有說服力[13]。

在抗戰的頭幾年，自由地區通貨膨脹的速度雖然顯著，但仍算緩慢。從一九四二年初開始，惡性通貨膨脹全面爆發。曾任印度駐華外交專員的梅農（Krishna P. S. Menon）在回憶錄裡引用一家地方報紙的生動敘述，來描寫後方法幣購買力日漸低落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時，一百元法幣能買兩條耕牛；
一九三八年，一百元法幣能買一條半耕牛；
一九三九年，一百元法幣只能買一條牛崽；
一九四〇年，一百元法幣只能買一條牛崽；
一九四一年，一百元法幣能買一頭豬；
一九四二年，一百元法幣能買一條豬腿；
一九四三年，一百元法幣只夠買一隻雞；
到了一九四四年，一百元只能買到一小袋米[14]。

另一個觀察通貨膨脹的方式，就是觀察單項物品價格的上漲程度。下面的表格，列出福建泉州歷年的米價[15]：

時間	每一百市斤（五十公斤）的米價
一九三八年五月	七元
一九三九年初	八元
一九三九年底	十五元
一九四〇年秋季	三十元
一九四一年底	八十至九十元
一九四二年七月	一百五十銀元
一九四二年底	四百銀元
一九四三年九月	九百金圓
一九四三年底	一千二百金圓
一九四四年初	一千四百金圓

通貨膨脹影響各個群體的程度並不一致。仍然占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除非他們居住在城市農產品市場的附近，否則受到通貨膨脹影響的程度不大，而住在城市農產市集周邊的農民，又因為他們農產品的價格上揚而得利。他們

同時還能夠以物易物，交換農產品，這是非農產品生產者的人所無法做到的。領取日薪的勞動者，酬勞能夠趕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領取固定薪津或者薪俸者，才是受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一群。這些人當中包括了低階公務員、基層軍官、一般士兵、教師、以及按週或按月支薪的勞動者。聞一多是八口之家的經濟支柱。他在西南聯大任教，身為教授，他的月薪只能供全家人生活十天之用。為了生計，他在一所中學裡兼職教書（校方以米作為報酬），並且為人們代刻印章[16]。

通貨膨脹嚴重影響依靠親人匯款為生的人們；當錢匯到的時候，可能已經比匯出時的價格還低。而這樣的情況還會傷害人們的自尊。下面這則悲傷的評論出自一名駐紮於湖北宜昌前線戰地的陸軍少校，內容顯示出在一九四三年初，中國守軍的處境：

> 我真是顏面盡失。雖然我可以請假到萬縣（位於長江上游）去探視我的妻子，可是我不能這麼作，因為我每個月法幣一百七十五元的薪俸，根本不足以讓她維持生活。甚至她自己擔任教員，每個月的收入就有五百元。她大可以直接告訴我：「你算是哪門子的丈夫？[17]」

這個故事裡的男子，收入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只不過是通貨膨脹對社會帶來衝擊的一個小例子，代表男性因為無法照顧他們的家庭，或是匯款回家，而萌生一種缺乏信心、挫敗的感受。這種情況，通常是壓垮本已疏遠、或者毀壞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尤其是出現在女性不如從前那樣依賴男性，並且愈來愈無法忍受她們的丈夫失敗的時候。

因為通貨膨脹而引發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困擾著許多居住在自由地區城市裡的民眾。糧食供應沒有短缺，人們並未挨餓。在重慶，政府對於糧食的管理非常慎重。政府盯著糧食供應，首先確保軍隊和公務人員的供應，然後及於城市居民。土地稅從地主那裡以實物徵收，由農民那裡強制購買穀物，政府償付的通常不是現金，而是國庫發行的公債。政府制訂了很多如黃龍山墾區那樣的大型土地開墾計畫。上述這些方法提供了足夠的穀物供給，但是在其他的食物方面，就沒有那麼充裕了[18]。穀物徵購計畫對於原有的傳統作物市場，就算沒有毀滅性的效果，也帶來妨害擾亂的作用；它還得罪了一批人，這些人通常都是地主，因為他們原先都是傳統作物市場的得益者。

中國政府對應戰時糧食短缺的問題，和其他國家的做法一樣：提倡各種新替代食品。英國人使用「*ersatz*」這個德文字眼，來為替代食物命名，像是使用菊苣根或橡樹果實作出的咖啡粉。而在中國，杯麵的祖先就在此時問世了。

行政院糧食部開發出大量種類的乾燥食品：湯塊、醬油結晶塊、雞蛋粉、白菜粉、米磚、玉米磚、麥磚、茶素、以及薑素糖等等。這些新替代食品原來是供作軍糧使用，但是後來逐漸推廣到民間[19]。後來，美國的罐頭午餐肉和英國的伍爾頓鹹派（Woolton Pie，一種以蘿蔔取代肉餡的烤餡餅，以英國戰時內閣糧食儲備大臣伍爾頓爵士為名）也加入上述這些「美食」的行列，盡可能讓人們感覺這些食品勉強還可以下嚥。不同之處在於，在美國和在英國，美食

佳餚都不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戰時替代食品對於這些國家裡對口味不怎麼挑剔的消費者來說，或許可以接受，但對於講究食物的中國饕客而言，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上面這些關於食物的考量，都是些抱怨，而遠非營養不良或饑荒的徵兆。在自由中國的北方前線，經濟問題要嚴峻得多，而且帶有災難性質。襲擊河南的大饑荒，是抗戰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悲劇之一。

河南大饑荒　河南是中國幾個最為貧瘠的省分之一，時常發生饑荒。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間，戰爭與天然災害結合在一起，觸發了一場大饑荒，奪走超過三百萬人的生命，並且迫使另外三到四百萬民眾出外逃荒。

中日之間對峙的戰線貫穿河南省境，中方在西側，日方則據有南、北、東三面。一九四二年的春、夏兩季，河南全省滴雨未落，蝗災隨即而至，農作物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收成。在過去，像這樣的天然災害發生時，就會引起政府的介入救濟：釋出公家穀倉的存糧賑災。但是這一次，地方當局手中已經沒有剩餘的糧食，也沒有鐵路運輸，或是從省境外引水救急。本省的現有存糧都是軍用糧食，軍方對民間糧食的徵用確實已經減低，但是減免的額度非常少[20]。災情初起時，除了在河南省西部和南部有傳教士努力救災以外，實際上完全沒有救濟工作[21]。河南民眾要不是出外逃荒，就是坐在家中等死。

被這次饑荒災情襲擊的區域，原來在一九三八年時，就已經因為黃河花園口決堤而受害。河南省扶溝縣就位在花園口決堤地點的正南方，決堤之後遭到洪水蹂躪，幾乎全縣都被水淹沒。等到此地好不容易開始復甦，又遭到蝗災和旱災的接連打擊。隨著饑荒在一九四二年底日漸嚴重，民眾被逼著不顧一切鋌而走險，用盡各種辦法，只求能生存下去：

> 父母鬻其子女，丈夫售其妻室，兄弟賣其姐妹，以人易物，城裡有人市。當人們和其骨肉同胞生離死別之時，痛哭和悲嘆之聲催人淚下[22]。

這段充滿感染力的文字，是敘述饑荒帶來恐怖的傳統方式，但是這並不會讓悲劇的真實性有所減損。下面這段同樣有感情渲染力的文字，以一連串三字成句所構成，用來描述位於河南西部山區鞏縣的情況：

> 狗不咬，雞不叫，井水枯，河水乾，樹落葉，草麥枯，天無雲，黃（蝗）風起[23]。

在鄭州以西的汜水，饑荒災民吃草根、野生植物、果皮、花生殼、樹皮、甚至連土都吃下肚；他們燃燒衣物，將灰燼揉成糊團果腹。他們宰殺牲畜家禽吃掉。在這些「食物」裡，有些會引來災難性的後果：中毒、水腫、出血、疼痛，甚至死亡。很多農民以極低的價格賣掉土地，而他們所得到的錢根本不足以挽救家庭面臨的危機。到最後，本地人口由原來的九萬五千

人，在饑荒期間降到六萬一千六百人：當中有三萬人出外逃難，三千四百人死於飢餓[24]。

在本省未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地方行政當局仍然在運作，他們和在地仕紳懇求政府協助，可是幾乎得不到任何幫助。於是他們依靠各種傳統方法，試圖緩解旱象。在鞏縣，縣長於龍王廟前祈雨，期望這場儀式可以安定民心、為民眾帶來若干心理緩解的作用[25]。在河南省西北，一座名叫唐河的小鎮，於一九四二年底時出現了「人市」。到了「人市」的交易日子，女孩們被帶來這裡販售。她們大多都來自難民家庭。人肉販子買下這些女孩供作娼妓，或是婢僕[26]。

河南大小城鎮在飢荒中的遭遇，並沒有比農村好上太多。大膽無畏的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深入這次大饑荒受害最嚴重的核心區域，鄭州：

> 當我們於早晨醒來之時，這座城市已是一座住滿了灰色亡魂的白色大墳。死亡主宰了鄭州城，因為此地正是饑荒最嚴重的中心點。在戰前，本城有居民十二萬；現在全城百姓不足四萬。這座城市曾遭到日本人的轟炸、砲擊與占領，以至於和所有其他位於前線的城市一樣，瀰漫著一股半毀的氣氛。沿著貧民區走，瓦礫碎石成堆，而那些大建築，沒了屋頂，直面朝天[27]。

這場饑荒在旱象結束以後仍然繼續綿延，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比爾．辛普森（Bill Simpson）是一位加拿大傳教士，一九四三年四月，他在鄭州有著下面這番記述：

>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美好的春季，天氣就像今天這樣，偶爾落點雨，而大院裡和鄉間的景色看來非常美麗。大麥將要成熟，小麥剛發芽拔尖後不久，正是青翠繁茂的時候，人們在這片麥浪起伏的美景底下，當可看見更深一層的美好：那就是當人們了解到，這場豐收意味著人們再一次擁有貨真價實的穀類食物，可以餵養那些長期以來持續以菜葉、雜草、棉籽餅、和其他各種各樣不適合消化東西的胃了。可是，讓人悲傷的事情是，很多栽種這些麥子的人，沒辦法再來收割了。已有數以千計的人們死去，而那些去年秋天出外逃荒的那批人，明知道擺在前方的路途，有多麼艱險，至今都沒有人返鄉，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再不會回來了。有些村落據說杳無人煙，而大多數的鄉村人口都已急遽減少，比起去年，剩下一半或四分之一[28]。

這正是最令人難以承受的至悲愴痛，一種大自然結合了戰爭而帶來的恐怖勝利，它容許大饑荒如此蔓延賡續，而受難遭災的人們卻得不到任何援助。

農村不安

山東高密縣　在日本占領區內，農村不安定成為抗戰期間人們生活的普遍情況。山東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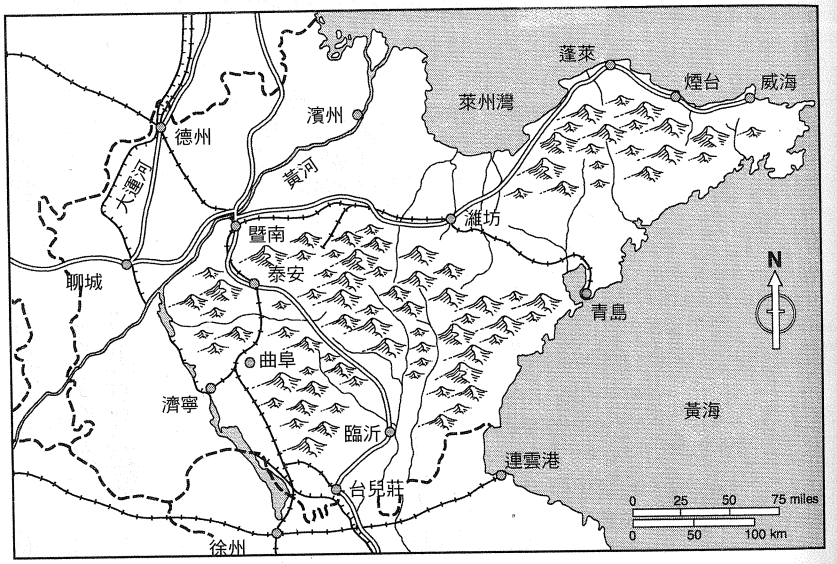
生的情形，可以算是代表整個華北地區的典型案例。山東歷來有著起而戰鬥、抵抗外來控制、反抗不公不義的傳統民風。此處正是「梁山泊」裡那些英雄、鬥士、酒豪、醉漢的嘯聚之處。本省同時還是三國時代大戰略家諸葛亮的家鄉，也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里。山東民眾並不會輕易就受到驚嚇。近代以來，山東人最知名的冒險勇敢之舉，就是十九世紀末年的排外運動義和拳。日本垂涎山東已久，之前曾經三次（分別於一九一四、一九二〇、以及一九二八年）企圖入侵這個省分。

抗戰初期，山東陷入一片混亂局面之中。該省大部分的在地菁英人士匆忙出逃，地方社會實際上淪為群龍無首的情況；省政府、軍方，以及許多農村檯面人物，在日軍入侵之前，都跟著省主席韓復榘出逃了；韓復榘還撤出他的部隊，而不是抵抗日軍進逼。韓復榘很快就遭蔣介石下令逮捕槍決，以儆效尤，並激勵其他國軍將領認真作戰[29]。日本在濟南設立傀儡省政府，而國民黨的山東省政府殘部，在韓的前任、文人省主席何思源的領導之下，撤退到黃河出海口、鹽鹼沼澤三角洲一帶，這些人的成分混雜，來源各式各樣，有國府的支持者、海員、脫離部隊的士兵、學生和盜匪。何思源一直主持省政，直到抗戰結束，不過他的省政府沒有固定駐地，沒有財政進項，也沒有實質的威信和影響力[30]。

中共方面對於在山東發展寄予厚望，並且派遣得力的幹部由陝西進入山東，企圖在這裡建立堅強的根據地。但是，在日軍不間斷的進攻，以及根據地內部產生分裂的情形之下，表示中共的根據地在進入戰爭階段時，並未能像抗戰前所預期的那樣，達到團結與堅強的程度[31]。

日本只控制了山東的部分地區，主要沿著兩條鐵路沿線，主要道路，以及幾座大城附近。在規模較小的市鎮和鄉村，實際控制者如走馬燈般變換不定，偶爾是日本人，大部分時間是傀儡政權，有時候則形成自治的情形。在海岸線，像青島、煙台這樣的主要大港口，都牢牢掌控在日本人手上，至於像蓬萊這樣規模比較小的港口，只要不妨礙日方的行動，日本人大致上不加以干涉。

在縱貫山東省境的山區，還有黃河沿岸的沼澤地帶，看不見日本人的身影，甚至連傀儡政權的人馬也很少現身。這些地方無人負責。哲學家梁漱溟曾經在山東發起鄉村重建運動，他於一九三九年祕密潛回山東，訪視那些先前活動的地方；他所見到的是一個混亂



地圖4. 山東省

的局面：一群稱作「游擊隊」的人們——地方民兵武裝、政府軍的殘部、共產黨的八路軍、以及盜匪——「共同組合構成一個萬花筒般令人眼花撩亂的模式，當中既有結盟、相互仇殺火併，也有妥協和解，以及彼此間的競爭敵對。[32]」實際上，在山東的鄉間地區，有一場內戰正在上演。在這個有明確國家敵人的時候，山東各支游擊隊進行的並不是有組織的抗日行動，而是在製造混亂與不確定的慌亂狀態。

逐漸的，中共的勢力占了上風。隨著戰事繼續進行，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離開沿海城市，到山區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他們其中一個動機，是參加革命的行列；另一個原因，則是要逃離被日本人爪牙抓去充當奴工的危險。山東根據地成為山區與沿海基地的組合，彼此之間互有鬆散的連結；出於各種理由，延安的中共領導階層尋求將山東這個根據地置於黨中央的直接掌控之下[33]。

山東的混亂情況對於農村社會產生了癱瘓效應，這種效應的範圍是如此遍布而持續，以至於只有地處邊遠、自給自足的區域，可以置身事外。農村的社會結構承受極為鉅大的壓力，所以通常都瀕臨崩潰解體的邊緣。由於年輕人離開家庭而從軍和參加游擊隊，造成家庭的混亂。隨之而來的農村勞動力短缺，則造成經濟上的蕭條。農村交易市集舉足維艱，存款枯竭，家畜被侵奪沒收。農民回歸原來生計作物的耕作，逐漸有捨棄經濟作物，改回原來糧食作物的趨勢[34]。

隨著日本對付「共產黨」（日方將所有游擊隊的行動，一概冠上「共產黨人」的標籤）的做法愈來愈殘酷，農村社會的混亂情況也日漸嚴重。日本的「三光」（殺光，燒光，毀光）策略以令人髮指的殘暴手段進行。農村遭受到集體的懲罰：民眾被殘殺，建築遭焚毀，而一切有價值的物質，全被摧毀殆盡（見延伸閱讀二）。

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以鮮明生動的細節，描述山東農民此時的痛苦；《紅高粱》是一部風格樸實的小說，故事發生在山東高密縣東北邊的沼澤溼地，莫言就在那裡長大成人。高密的位置，處在濟南和青島之間的鐵路線上。抗戰期間，高密縣城受到日軍嚴密的控制，但是該縣的鄉間則不然，特別是在夏季的時候，當高粱長得高過成年男子的頭時，田地就成了一片香氣濃郁的紅高粱海。在抗戰開始時，此地的農民雖然貧窮，但是心情卻很愉快，他們因為喝下大量的高粱酒而能夠振奮精神。戰爭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劫難。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因為要修築一條穿越縣境的公路，因而強制徵用數千名人力來修路。騾子對於栽種高粱至關重要，現在全被徵用去修路。對於在地人士來說，最讓他們為難的地方是，一旦高粱成熟，等於為游擊隊提供了完美的藏身處，而在那年夏天，游擊隊果然前來攻擊新修好的公路。這些活動引來的，是日本人的反擊報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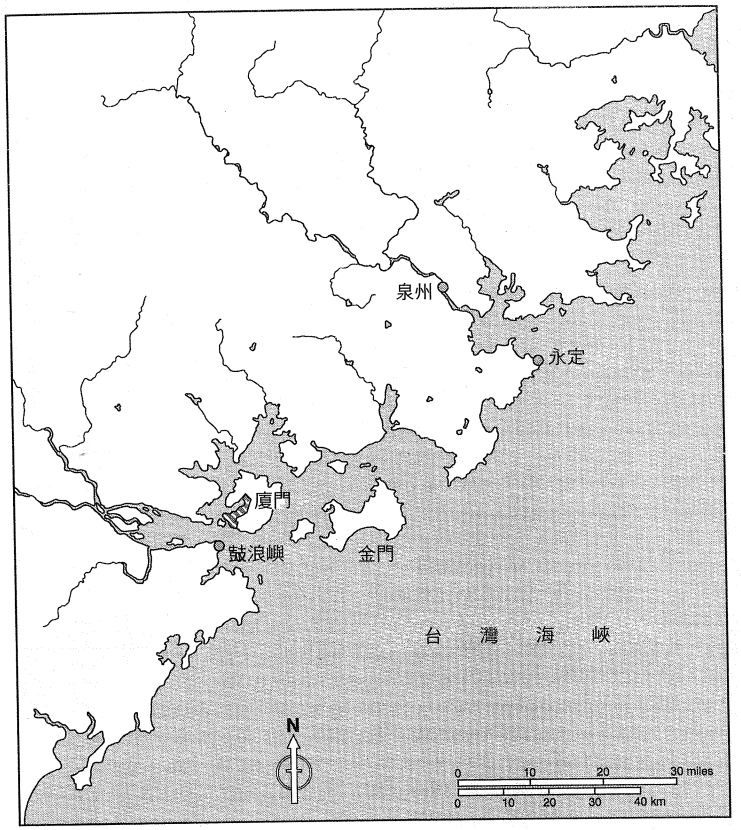
小說的男主角是一名地方盜匪，名叫余占鰲。他的妻子九兒娘家姓戴，從她頭一任丈夫那裡繼承了一家小酒館。余占鰲很難稱得上是個品格端正的角色——事實上，九兒那罹患癲瘋病的丈夫就是他殺害的。但是，他的力氣和膽大，還有對高密的熱愛，都足以彌補他的缺陷；在山東鄉間有個傳統，強悍而健壯的男子，都會被看作是英雄人物。余占鰲和他熱情又美麗的妻

子組織了一次偷襲行動，在「鬼子」（日本軍隊）狠狠的責罰了修路的領班工頭之後，他們決定要爆破新修道路上的一座橋梁。這場偷襲行動失敗了，因為他們預期會前來相助的盟友並沒有現身。九兒在戰鬥中遇害。這次偷襲引來日本軍隊對他們村莊的報復；村莊被燒毀，村民要不是死了，就是在悲慘的恐怖情緒裡苟活下去，再沒有人能夠信任其他人，他們原來生活的那個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小說結尾時，余占鰲被送往日本北海道的勞工營[35]。

莫言筆下的這段故事，可以密切對應抗戰時期發生在高密與其他縣份的情況。從高密往西走，來到山巒的中央地帶臨朐縣，這裡所遭受的劫難，不能直接歸因為日本人的入侵——當地受到一場為期四年的旱災侵襲，這場旱災起於一九四〇年，逐漸使全縣陷於貧窮與饑饉之中。臨朐縣原來將近三十五萬的人口裡，幾乎有一半出外逃荒，大多都是逃往滿洲投奔親戚。那些留下來沒有離開的人裡，超過十萬人餓死；戰爭結束後，縣裡只剩下八萬人口。在抗戰期間，臨朐沒有得到任何外來救濟[36]。

社會經濟的破裂：僑鄉的案例

戰爭帶來的動盪有許多形式，其中有些不如其他的動盪來得嚴重，但是對於身處其境的人們來說，仍是同樣的艱難。其中一個沒那麼嚴重、但卻仍然造成創傷的戰爭動盪，就發生在海外華僑出身的故鄉社群，也就是僑鄉。抗戰使得中國隔絕於國際社會之外，大部分通往外界的連結管道都斷絕了。海外華僑和故鄉斷絕音訊，這嚴重影響到這些華僑出身的地區。僑鄉主要



地圖5　閩南地區

分布在廣東和福建省的南部，也就是閩南地區。

廈門是閩南的港埠城市，位於福建省南端的一座島嶼上。廈門在十九世紀晚期發展成一座通商口岸，規模逐漸超過北邊的老港口泉州（也就是馬可・波羅時代的刺桐港）。廈門成為移民到南洋的轉運中心，同時也是中國食物出口的主要港埠；廈門商標

（Amoy Canning）的罐裝醬汁和醃製泡菜都聞名世界。廈門是外國外交官和商人們最喜愛造訪的城市，他們都住在廈門港對面、洋溢田園風光的小島鼓浪嶼。對英國人來說，廈門是香港商品的輸出口岸；對美國人來說，由於廈門位置靠近菲律賓，因而顯得重要。對日本人而言，廈門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聯結；台灣在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之後就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絕大部分居住在台灣的華人，都來自於閩南地區。

廈門另一個吸引外國人之處，在於這座城市和它的福建內陸腹地有一項歷久不衰的趨勢，無論中央政權怎麼更迭，都不予理會而自行其是。在進入民國的二十五年內，廈門和福建經歷的是一種半自治狀態；不過，像這樣的自治狀態，也必須要付出代價，因為在本省的海岸防衛這方面，中央政府能提供的協助不多。

一九三八年初，距離廈門只有兩公里遠的金門淪陷。廈門的民眾驚恐的看見大量金門難民湧入這座城市，他們聽說許多日軍殘暴的故事，包括許多女性從「亡島」被帶往台灣，「以滿足兇暴軍人殘酷的色欲」[37]。過了不到幾個月，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支日本軍隊登陸廈門，占領了這座城市。日軍攻城時非常兇猛殘暴，導致數百名民眾喪生，死傷之慘震驚全城。在恐慌情緒下，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廈門市民逃走。全城人口從戰前原來的二十六萬人降到一九四一年時的八萬八千人[38]。

許多從廈門出走的民眾先逃到鼓浪嶼；鼓浪嶼這座島嶼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才被日軍占領。有些廈門人又從鼓浪嶼出走，到香港和南洋去。另有些人往內地走。例如馬來亞橡膠大王、出身廈門的僑領陳嘉庚贊助設立的廈門大學就往內地搬遷，學校最後遷到長汀。廈門市政府也往內地撤退，改設在漳州。隨著市政府出走的，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和商界人士。在短時間內，所有能夠離開、有辦法離開的人們全都走了，只剩下窮人還留在廈門。

從廈門逃出來的難民，按照先後順序被安置在本省內地的各個地區。地方上的社會福利組織收到指令，要為收容的難民支付開銷，並且接收未開墾的土地，以供難民安頓；這個舉動代表省政府已經認為，日軍將會長期占領廈門[39]。

爆發難民出走潮以後的廈門，實際上並沒有遭遇到南京陷落之後面臨的恐怖命運。有一些關於日軍暴行的謠言出現，包括諸如「肥胖的年輕男子和豐滿的女孩在街頭失蹤，再次出現時已經是在肉鋪裡慘遭烹熟」這類的故事[40]。這些謠言誠然非常恐怖，令人不安，但是它們的真實性很低；帶有猥褻意味，以及和吃人肉有關聯的故事情節，是通俗文化裡時常反覆出現的主題。廈門實際上並沒有遭受日軍的暴行和轟炸，可是，這座城市卻開始蕭條、死亡。港口遭到封鎖，貿易急遽下降。沒有了對外貿易，廈門的經濟幾乎等於被摧毀。茶葉、砂糖、水果等這些昔日從廈門港川流不息湧出的出口品，現在全告枯竭，而廈門和其還未遭受日軍占領的後方腹地間的聯繫，也逐漸隔絕。靠移民貿易致富的運輸與金融行業，在一九三八年後萎縮，一九四一年消亡。廈門經濟不靠貿易的那部分也被摧毀。漁業崩潰，因為漁船不許出海。土地被沒收充公，作物遭到日本軍隊的強制徵收。

從廈門逃出去的人們並沒有回來。到了一九四〇年，住宅十室九空，門窗都被打破。滿

地都是垃圾，城市裡瀰漫著可怕的惡臭氣味。本地唯一還繼續繁榮的經濟活動部門，都是些不道德的特種行業：娼妓、毒品，以及賭博[41]。厦門曾經的繁華，現在已經土崩瓦解，成了一座「死市」。這座城市死亡的過程，全程在福建主要的地方報紙（以及若干全國性報刊）記者的紀錄之下，因為記者們仍然能夠自由來去厦門。

日軍的占領做法相當粗糙。日本人大多不見蹤影；他們將占領的任務，委由手下的台灣人去做。厦門是台灣人在大陸規模最大的集中聚居處。台灣人受日本人統治，但是他們的祖先大都來自福建，因此說的也都是閩南方言。一九四〇年時，在厦門的台灣人將近一萬一千人，幾乎達全城人口的八分之一。他們大部分都是攜家帶眷，前來定居[42]。

抗戰像是對厦門進行多次截肢手術，只剩下軀幹殘存。厦門的四肢，也就是和南洋與後方內地的聯結，都遭到切斷。抗戰對厦門來說是一場劫難，這場劫難使得厦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都沒能恢復戰前的繁榮；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厦門的貿易量才第一次達到戰前時的水準。

鄰近厦門的泉州，則有一段不同的戰時經歷。泉州和附近地區在抗戰期間所受到的損害相當輕微。日本人並不打算往北擴張他們的占領範圍。泉州附近崎嶇而布滿暗礁的海岸線，以及內陸的山丘地帶，都為進攻泉州增添困難；日軍於是頓兵不前，改以海路封鎖[43]。

泉州並未遭日軍占領，但如果說這個地方看來安然度過抗戰歲月，則又是不切實際的幻像；這座城市正是因為抗戰而起了徹頭徹尾的改變。泉州從建城之初，就是一個面向外界的開放港埠，它是數十萬台灣與南洋移民的故鄉。這些移民出外貿易，在種植園（例如橡膠、木

材、咖啡等）產業裡工作。他們以匯款的方式寄錢回家鄉，這成為泉州地區經濟收入的一種主要來源，尤其在傳統地方經濟來源——茶葉和瓷器——的收入減少之後，更是如此。

很多體格強健的男子出外打拼，他們到了南洋以後，或多或少就不再回故鄉了。這些人獨身前往，將他們的父母、妻小留在家鄉。有些發展得好的，就在海外又討了一房「小老婆」。留在家鄉的親人從事若干耕種勞作，但是並不靠耕作的所得來過生活；他們生活支出的絕大部分，都仰賴在海外的男人匯錢支付。海外匯款有一部分用做生活開銷所需，另外則作為建造家宅的費用，有些家裡建起了大宅子，這取決於他們家的男人在海外發展的情況而定。海外移民在故鄉的家人們過著愉快、愜意的生活。他們平日的主要工作，是打掃、維持家裡和家族祠堂，維繫好地方上的情感，並且確保在海外的家人從來沒有忘了家鄉。其他的時候，他們有時耕種，互相取樂，並且狂熱的賭博。

這樣愉快的生活，隨著抗戰的爆發而畫上休止符。地方上的經濟情況搖搖欲墜。日軍對沿海的封鎖，使得地方上兩種主要的雇傭活動：捕魚和走私——變得幾乎不可能。各個家庭和南洋家人的聯繫，在日軍於一九三八年占領厦門之後，變得非常緊張。有些款項還是能夠匯到，但是海外家人回國探親則幾乎宣告中止。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所有和南洋的聯繫都斷絕；信件沒有辦法寄達，沒有海外親人的音訊，而來自海外的匯款也徹底中斷了。海外匯款的斷絕並不是日本侵略帶來的直接後果，而是一套細緻複雜的網絡體系的瓦解，這套體系建立在彼此聯繫信任的基礎上，而且倚靠跨國間郵務體系的順暢運作。所謂匯款，並不涉及直

接轉帳，而是將錢寄存於設在海外移民工作地點的「錢館」。然後，在家鄉的收款人會得到郵局的通知，從「錢館」在本地的合作夥伴那裡，用中國貨幣領取一筆數額相同的款項[44]。

沒有了這些海外匯款，故鄉家人們的生活就全亂了套。他們失去了原先的收入，想要維持生活，眼前只剩下兩條路可走：變賣家產，或者出外工作——不得不如此，這是他們之前從來沒有料想過的。原先靠海外匯款充當潤滑劑的家庭與社群關係，現在開始萎縮衰敗[45]。抗戰是一個充滿極度不安、貧困和焦慮的時代，上述這些感受全都動搖了原來一度自信、振奮又樂觀的社會結構。

在抗戰期間，泉州地區人們的這種焦慮裡面，參雜了一種恐懼情緒，他們害怕日軍會在任何時刻登陸。日軍的第一次登陸，令人印象極為深刻。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清晨六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泉州以南永寧鎮的堡壘登陸。海上的戰艦首先砲擊永寧鎮，落彈之處包含了許多用菲律賓生意匯款建起來的大豪宅。日軍拿下明代為防倭患修建的堡壘，殺了許多人，然後在同一天退兵[46]。事後證明，日本這次入侵，也就是最後一次。日本軍隊此後再也沒有上岸，不過他們的飛機還是經常凌空飛過，而日本的砲艦也時常週期性的砲轟靠近海岸線的村落。每次有人發現日本人的蹤跡時，地方百姓就急忙跑進海角的洞穴裡躲避。他們長期在緊張和焦慮的狀態下過日子。他們還必須忍受愈來愈多的中國軍隊出現在這裡和日軍交戰，這件事情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遭遇過了。

福建在抗戰中的遭遇，也同樣發生在其他的「僑鄉」，特別是廣東省的中山和台山兩縣。在這些僑鄉，男人們長年在北美洲工作，將雙親、妻子和子女留在家鄉。家人靠他們匯回家鄉的錢生活。抗戰爆發以後，這些人匯回家鄉的錢，以及回鄉探親的次數都開始減少，然後停止。於是華僑留在國內的親人，必須學習靠自己照料家庭度日。很多人勉強存活下來，他們下田耕作，接下所有能接的工作；這樣的生活，和過去他們在海外的家人徹底靠自己奮鬥，卻縱容他們過著輕鬆寫意的那種日子，真是有天壤之別。家人之間的聯繫幾乎遭到摧毀。一九三七年，余海倫（Helen Yu）在中國出生，這時她的父親才剛返回加拿大。她和家人在抗戰八年期間，在台山千辛萬苦的過活。在這段期間，他們從來沒得到父親的任何音訊，也沒收過來自加拿大的任何信件。直到一九六四年，她隻身前往加拿大，才第一次與父親相見——這個時候，她已經二十七歲了[47]。

鄭藹玲（Denise Chong）的家庭被分隔在廣東台山和加拿大兩地，為時甚至更長更久。她的祖父陳山（Chan Sam）討了兩房妻子，大老婆在家鄉台山，小老婆梅英（May-ying）在溫哥華。在一九三〇年代，陳山的日子過得相當寬裕。他往返中國探親好幾次，在幾番來回旅程裡，他將兩個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兒留在中國。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陳山的兩個老婆都臨盆：他的第三個女兒在加拿大出生，而他的獨子則在台山呱呱墜地。陳山卻從未設法再次回國，完全沒見過他一直殷殷期盼的兒子。戰爭讓他不得不和梅英留在加拿大。後來他們聽到消息：一九四二年，留在中國的二女兒在遇上了一隊日軍士兵後死去，死因成謎。他們不敢去想，女兒在死前可能受到了什麼可怕恐怖的遭遇。戰後，國共內戰又使得陳山無法回鄉探親。他待在

溫哥華，只要一有辦法，就寄錢給在家鄉的親人。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他的第三個女兒阿欣和孫女鄭藹玲才回到故鄉探視。這個家庭到此已經分隔長達四十年之久[48]。

僑鄉的人們在抗戰時的各種遭遇，如果和中國其他地區民眾的苦難相比，看來似乎沒有那麼恐怖，但是對於這些海外華僑的家人來說，抗戰仍然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考驗。過去愜意愉快的生活已經告終，不過在當時，他們還不曉得，前面還有超過四十年的艱難歲月要度過。抗戰的爆發是海外社群和故鄉親人分離的開始，日後在共產黨政府統治時期，持續這種分隔狀態，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當時似乎有奇蹟出現，在五十年的分隔以後，舊日的聯繫居然還能重新恢復起來。這些親人間的聯繫還能重新恢復，著實讓人訝異，而人們有足夠強韌的精神與調適能力，能夠在這些聯繫看來已經死絕的時候，還能勉力撐著、維持住一線生機，也足堪令人驚異。

調適機制

隨著戰事曠日持久，有些人陷入冷漠和沮喪消沉的情緒之中，恐懼這場戰爭將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另有些人的內心則被痛苦仇恨所吞噬。在這兩種極端心態的中間，人們找到了很多讓自己適應這種情況的方法。

有些調適機制很普遍。實質物品的寄託——鴉片、酒精、香菸，都能讓人心靈解脫，在戰時中國，這些物品都能取得。在自由地區，並不鼓勵人們抽鴉片煙，但是鴉片仍然能夠輕易到手。在日本占領區裡，鴉片實際上是政府壟斷的專賣事業；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嚴厲的譴責日方，因為日本試圖讓中國人淪為毒品的不幸奴隸。復辟的前清廢帝溥儀，駐蹕在滿洲國的新首都新京（長春）的迷你皇城之中，就是靠著毒品來逃離現實世界。

酒類的消耗非常可觀，城市人口的飲酒量還不如農民來得多，尤其是在華北，當地農家自行蒸釀出若干世界上最烈的酒種。至於抽香菸，不但在男性當中非常普遍，女性的抽菸人口也開始成長。可是，要調適惶然不安、悲傷與焦慮，上述這些物品都只能提供協助作用而已。其他的調適機制則深入挖掘中國傳統，在其中尋找新的解決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或是短期放鬆的方法，來緩解戰爭所帶來的壓力。

堅忍不拔

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譯按：英文版原文作「患難見交情」。）

Adversity reveals true strength

中國人賴以度過逆境的最偉大文化遺產傳承，就是堅忍不拔的精神；中國的歷史動盪不安，社會體系嚴酷殘忍，自然災害紛至沓來，讓這個國家的子民學會忍耐。關於這種精神，有一句最常見的成語，就是「吃苦耐勞」。這句成語背後蘊含的意思是，當事情變得艱難，未來的前景無疑的會更加辛苦，此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接受逆境，在忍受苦痛的同時，期望局勢能夠

好轉。這種精神的特點，用負面的說法，是宿命論，而用正面的說法來描述，則是堅忍不拔。

在抗戰這個時候，特別能見到這種心理狀態發揮作用。人們接受降臨在中國的艱辛困苦，他們歷經災難和動盪，很少大肆抱怨，既不屈服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也不會頹唐絕望。這種「處艱彌厲」的堅忍精神，不但讓外國盟友印象深刻，也讓日本人深感困惑，因為他們在入侵之初曾經認定，中國人作為理性的民族，將會明白他們已經被日本擊敗，而且會接受新的統治者。結果完全相反，中國人靠著新式民族主義與舊有文化結合在一起，繼續堅持抵抗。他們回顧歷史，拿過往文化當中的男女英雄來勉勵自己撐下去，這些人物都歷經恐怖，甚至死亡，卻不肯向敵人屈膝。花木蘭就是其中的一位。戰略家諸葛亮和大將岳飛，同是為了公義大業奮戰而殞身，現在合而成為民族精神的典範，昭示人們準備為了國家捐軀，而不是向敵人投降。

持久忍耐的能力——以及姿態優雅、帶有幽默感的忍耐，是人們的主要調適機制之一，也是外國人很難加以分析的一項本事。有時候這種堅忍的能力會被曲解成欠缺感情、一種遲鈍、無情的本事，如此才能經歷苦難而不抱怨，在面對逆境時顯得順從，或是無法挺身而出，捍衛自己。這些曲解並不公平，也顯示出對於忍耐能力意涵的誤解。

光憑忍耐並不足以讓人度過那些艱難的歲月，必須要以其他的辦法和措施來搭配。

求生存的心理狀態　抗戰時有一種只顧自己生存、罔顧他人的心態興起，這種心理狀態的興起，代表此時中國社會規範起了劇烈變化，並且在戰後還持續非常久的時間。這種在戰爭動盪之中求生存的需要，造成家庭圈的緊縮，人們能夠付出關心、或是真心在乎的家庭成員數量，大為縮減。此種現象稍後被政治學者愛德華．班菲爾德（Edward Banfield）說成是「無道德家庭體系」（amoral familism），即人們無法顧及身邊核心家庭以外的利益。在大的家族體系和更廣泛的社會關係或者因為家人離散或死亡，而缺席斷絕，或是在時間和金錢方面有太過嚴厲的要求時，極度的貧困與不安就會造就出這樣的心態來。處在這個人們自相殘殺、你死我活的世界，每個小家庭全力爭取的，完全是自身的安危利益。這種心態並不是可以選擇的課題，或是背德卑鄙的事情，而是反映出這種生存極度困難的環境底下，人們除了自己身邊的家人以外，完全無法關心任何人。抗戰期間，這種只求自己生存的心態變得根深蒂固。它是混亂動盪之下的產物，由抗戰時的戰爭、天然災害和隨著戰爭而來的敵人占領所造成。

在這些為了生存而爭鬥的戰爭裡，出現了若干贏家，他們成功戰勝困難，發展順利；但是也有更多的輸家。這些輸家最終會倒向任何一股向他們承諾帶來穩定和可靠掌控的勢力。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具吸引力之所在，也是中共在中國得到支持的原因。上述二者同樣都承諾會帶來穩定與保障。在中國，共產黨人承諾一個相互依靠、信任的新社會，提供一種新的信念，看似將貧窮、陷入困頓的人們置於最優先考量。在先前的信仰看來正搖搖欲墜的時候，這種信念就應運而生。

宗教信仰　在戰爭和危疑不安的時候，很多人向宗教尋求安慰與導引，他們祈禱上天神祇的協助；戰爭增強了對形而上權威的需求。在中國，宗教信仰於抗戰期間似乎無法提供太大的慰藉力量。信眾向佛、道兩教的神祇禱告，祈求神明的拯救，卻沒有得到回應，與民間信仰相關的神祇同樣也難以緩解戰爭招致的浩劫。在自由地區，寺廟的宗教活動由於設施受損而受到侷限；寺廟多數被學校、醫院和政府部門進駐占用。

基督教是在抗戰期間惟一繁榮壯大的宗教。在國民黨高層人物裡，蔣夫人宋美齡就時常熱誠的宣揚她的基督信仰，並且讚頌基督教特別關注在社會服務層面。在占領區，外國傳教士得到了特別的機會，得以協助這個他們居住生活的社會：在日本軍隊來犯時，他們可以為地方百姓提供庇護所和醫療協助。傳教士的協助，使得很多人突然間改變信仰，皈依基督宗教。在江蘇，加拿大耶穌會傳教士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日軍占領期間的短短幾個星期之內，就獲得數千名新信徒；這個人數遠超過他們之前傳福音所獲信徒人數的總和[49]。某些人轉換信仰帶來的效應，遠過於應付當前的危難，這使得徬徨無措的人們，都前往投奔傳教士，尋求他們的庇護。可是，傳教士對民眾的協助沒能持續下去。到了一九四二年中，大部分同盟國籍的傳教士，要不是已經離開占領區，就是被集中拘留看管起來。而還留在占領區的德、法、義等國傳教士，能夠發揮的影響力不大。

如果宗教信仰並不是人們的主要幫助力量，那麼中國傳統裡的其他層面才是。

幽默感　黑色幽默、大難來臨時的自我調侃，以及自卑自嘲等，向來飽經考驗，一直是面對苦痛與逆境時的良方。幽默感讓人發笑，而且讓他們嘲諷那些讓人們陷入當前困境的人。它釋放緊張壓力，而且製造出讓人難以忍耐的荒謬可笑感。

幽默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文化印記；在某些具有深厚悠久傳統的文化裡，它相當根深蒂固，其中就包括了英國和中國。身處在逆境當中，卻還能夠笑的本事，可以總結成一句二戰時期的英國名句——墨普太太（Mrs. Mop）說的：「知道自己一直在前進，這讓我感到振奮！」這句話在每一集的《又是那個人！》（*It's That Man Again*）裡都重複一遍，而且在庶民百姓之間不斷的相互傳播[50]。在中國抗戰期間，有些來自沒有笑聲傳統社會的外國人士，很驚訝的發現：中國人面對這樣糟糕可怕的局面，竟然還可以發出笑聲，微笑以對；他們帶著幽默感，而不是絕望。林語堂發現，能夠領會中國廣大民眾這種精神、包括他們的幽默感的國外專家學者，竟是如此之少：

> 那些不苟言笑在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不但是一群可悲的人，而且他們通常還設法忽略掉在中國人民身上、中國政治當中，那種微妙而難以言說的人格特質，而這樣的人格特質，卻帶有一種極具說服力的現實感[51]。

幽默感通常在笑話裡呈現，而在戰時的中國則有一些非正式的笑話集，不斷在講述、流

傳。這些笑話的來源當中，有一位讓人意想不到的提供者，此人是以叛國罪被處死的韓復榘。韓復榘鬧出的那些低俗笑話，通常粗魯不堪，而且庸俗乏味，在他本人於一九三八年被處決之後，這些笑話還在繼續流傳。韓式笑話最好笑的地方，就在於韓自曝其短，這些笑話突顯出他的無知。其中一個他鬧出的最著名笑話，是關於北京的使館區：「北京東交民巷修了那麼多大使館，差不多世界各國的都有，就是沒有我們中國的，這太不公平。[52]」韓復榘的笑話在自由地區各處都被反覆講述，說的人還不僅僅是那些沒文化的粗人。最為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簡又文，就是一位說韓氏笑話的高手，在聯誼會之類的場合，時常應邀上台表演一番。在桂林，像歐陽予倩這樣的職業表演者，就靠著講韓復榘鬧出的笑話、以及模仿他的結巴來吸引觀眾。例如當蔣介石企圖透過推行新生活運動，以逐步對中國灌輸紀律時，其中包括要求行人在街上必須靠右行走，歐陽予倩模仿韓復榘的口吃語調，講出下面這番評論：

> 俺、俺、俺、俺是百分之九、九、九……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的贊成，但、但、但是俺有百分之一不贊成。為、為、為什麼呢？要是所、所、所有的行人都靠右走了，那馬路的左邊要做什麼用咧？[53]

任何場合都可能會成為施展幽默感的處所。哲學家梁漱溟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舉行的婚禮，就是一個讓人訝異的例子。梁是個五十五歲的鰥夫，而他的新娘則是在學校教書的未婚老姑娘。他倆陷入愛河，決定在桂林的一家旅社舉行公開結婚儀式。婚禮之後隨即是一場吵雜、粗俗的宴會，若干中國知識界的領袖人物在席間大聲朗頌曖昧的詩句，新郎倌還跟著大唱京劇[54]。

或許幽默感帶來的最大益處，是改變了人們看待敵人的態度。嘲諷敵人讓他們看來很愚蠢、無能。這些笑話裡包括對日本人身高和性能力的詆毀，全都能確保敵人看來荒謬可笑，而非可怕威脅。

詩歌　在中國，受過教育的人總是以寫詩作為表達他們最深、通常也是最為痛苦的情感。雖然這項傳統通常和文人士大夫有關，不過也有幾位知名的武將詩人，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寫出〈滿江紅〉的宋代將領岳飛。在抗戰期間，軍事將領和政治人物寫出大量的古體詩，並且臨帖練習書法，以恢復他們精神上若干程度的寧靜。知識分子所寫的詩與字，甚至還要更多。

有些詩人堅持用傳統主題創作：例如大自然、愛情、飲酒等等；但是其他人的創作題材，已經受到民眾的苦痛所觸動。于右任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他以孤兒的苦難遭遇為主題，寫下一首詩，名為《戰場的孤兒四首》：

> 東村屋煨燼，西郭人逃亡；

吾父征胡去，何時死戰場？
左鄰小妹妹，右鄰小弟弟，
狂寇虜之行，居心不能計！
戰場幾孤兒，祖國幾行涕！
何人衛祖國？中華此孩子[55]。

這是一首傳統體裁的詩作。以新語言創作的現代詩，在整個抗戰期間也有很高的創作產量；最著名的現代詩創作者，包括了聞一多、戴望舒、以及艾青。他們的詩作不但幫助他們自身面對戰時的逆境，也同樣協助閱讀這些詩作的讀者。中國詩歌裡描寫戰爭的作品，並不是威爾佛利德・歐文（Wilfrid Owen）或者薩松（Siegfried Sassoon）筆下的反戰詩（譯按：兩人為好友，同在一次大戰時服役，有描寫戰爭殘酷的自傳體小說與詩歌傳世。），中國描寫戰爭的詩歌深含愛國情操，沉鬱悲痛，而且感人至深。

逃避戰爭的方式：離去、懷舊、偽裝　中國傳統裡一向有避開戰亂的傾向。其中的一種是成為一個避世隱居、遠離世上一切恐怖的隱士。跡近於徹底遁世的態度，是道家的做法，它能讓人們不必離開人世，卻在心理和精神性靈上逃開這個動盪喧囂的世界。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每一次動亂的時期中，都有若干人選擇逃離衝突，而不是捲入紛爭之中。在十七世紀明朝行將滅亡之時，中國最偉大的畫家八大山人，就遁入山林，成為隱者。因為他是明朝皇室後裔，選擇這樣的遁世之舉，是少數能夠在亂世存活的方法。另一位同樣是明朝皇室後裔的畫家石濤，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後遁入寺院，削髮為僧，只在晚年因為畫作名聲鵲起，才又為人所知。另有一些忠於明室的遺臣，不願接受清廷的統治，渡海到台灣去。這些人裡最知名的是鄭成功，他在台灣創建起第一個漢人政權。

在抗戰時期，出現了逃離亂世的新模式。在戰爭剛爆發時，想要躲避混亂局面的有錢人，要不是出國，就是躲進外國租界。上海的外國租界和香港都擠滿了情願避開中國戰事，而不願逃進內地的人們。在這些避難地的生活既陌生又與外界隔絕，這樣的情況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更為嚴重。香港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幾乎完全封閉，人口下跌至不足五十萬。上海則成為人們口中的「孤島」。在當地，人們對日本採取消極抵抗態度，多半拒絕和敵方合作[56]，不過在很多層面上看來，生活仍舊如常進行。上海忙亂喧鬧的社交活動照舊，生意活動繼續進行，不過活動的程度下降不少，而當地居民則試著無視日本人的存在。

可是上海已經不是從前的上海了。這些待在安全避難所裡的人，行為舉止顯露出懦弱的跡象；他們不肯共赴國難，就和戰時英國某些到美國去的人，被看作逃跑一樣，遭受到人們的批評責難[57]。留下來的人略覺羞愧，在戰爭結束以後，很少提起他們在當時的事蹟。這些庇護所只為有錢人而設；窮人除非是和親戚一同遷入，否則是住不起外國租界的。

另一種逃避的辦法，是假裝現實世界並不存在，並且退回到往日歲月，讓自己沉浸在懷舊

情緒裡。這樣的懷舊情緒，並不是常見的對已逝過往的遺憾與緬懷。相反的，它刻意創造出一個美好的過往，用來和可怕的當下作分別。這是極為不快樂的人們所做出的誇大反應；它甚至還可能會讓人創造出各種想像世界。在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的一部小說裡，對於這種人格特質，有這麼一段犀利的描述：一位住在柏林的漢學家，太過浸淫於中國文化當中，以至於他對納粹已經接管自己公寓以外的世界，竟完全渾然不覺[58]。在中國，某些留在占領區的人們，放任自己在過去的回憶裡漂流，留在北平的人尤其如此，因為過往「天子腳下」的歲月，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這座古都。他們沉浸在過往，靠著脫離現實的美好記憶薄霧來過日子，然後將戰爭和它帶來的恐怖擋在外頭。

還有一種在艱困時代能夠適應良好的退隱形式，是偽裝隱蔽自己，徹底藏匿在隱晦不明的角落，到幾乎完全無法被人發現的地步。在抗戰期間，很多知名的中國藝術家和表演者都採取此道。他們沒有辦法撤退到後方，但是卻想盡辦法不和日本人有任何關係。在抗戰初起時，知名畫家齊白石已經年近八十，他因年老體衰，難以離開北平。他在家門口貼出告示：「停止收件作畫」。

為了支持龐大的家庭開支，他確實謹慎的售出若干畫作；其中有些作品（例如畫作中的螃蟹），表明他反對戰爭的心志[59]。京劇裡最傑出的旦角演員梅蘭芳並未前往重慶，但是他明確拒絕為日本人登台唱戲——他還蓄起鬍鬚，以表明自己無法演出女性角色。他定居上海，訓練徒弟，並且學習英語，但是從未登台公演，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60]。胡蝶是當時最知名的電影女明星，她在抗戰期間大多住在香港，過著息影的生活，直到戰後才又復出。小說家張愛玲於抗戰時都住在上海，她創作細膩婉約的散文，內容大多與浪漫的愛情和個人強烈的傷感情懷有關，彷彿抗戰和外頭的世界都不存在似的。

反其道而行的隱匿之道，是公然明白的逃避戰爭。這是一些東北年輕女作家所採取的辦法。她們公開寫作，但是文字裡藏有密碼，暗中為女性發聲，並且間接的攻擊日本人。梅娘與她的朋友們就努力實現這種路線；她們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而當局也沒發現她們的文字是多麼具有顛覆、破壞性[61]。之後，這些女作家卻為此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時，她們遭到攻擊，指控她們曾與日本當局「合作」。

結論

從中國社會的角度來看，抗戰到了這個時期，看來幾乎已經是最惡劣的階段。各項關係到日常生活的指數增長率，例如物價上漲、物資缺乏等等，全都加速飆升。家庭親人的分別離散仍在延續。發生在河南的飢荒浩劫突顯出中國的農民現階段是多麼脆弱、多麼容易受到傷害。當天然災害來襲之時，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中國正處在相當低落的地步。

⊙延伸閱讀

閱讀一：老舍，〈我的母親〉

老舍的母親是個滿族婦女，住在北平郊外的農村裡。老舍是她最小的兒子，他敬愛母親，但是當他拒絕母親為他安排的婚姻、還遠走英國時，便讓母親失望了。抗戰時，他遠走西南，再次讓母親傷心。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於老母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像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62]

閱讀二：〈心理戰線中的戰爭傷亡〉

戰爭所造成的心理因素病例：

……重慶的一位政府辦公室職員。在一九四〇年夏季，日本對戰時首都持續施行的可怕轟炸當中，這名男子失去了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從這以後，這名男子就愈來愈像個隱士，對其工作喪失了興趣，並且逐漸的陷入徹底遲鈍、無活動力的狀態之中。現在，他乾脆坐著或躺著不動，完全拒絕做任何活動。

……一名中學教員的妻子。這名男子和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之前一直住在華北，在侵略者打過來的時候，他們全家帶著大部分有價值的物品逃到後方來。他們來到四川省的樂山，在尋找長期住所的時候，先在一家旅店落腳。就在他們外出找房子的時候，這座城市遭到日本人的轟炸……這家人回到旅店時，發現旅店已經被炸毀了，他們的全部家當，也完全化為烏有。這位妻子失去了她的家產——也就是她先前安居樂業的物質證據，這似乎破壞了她的心態平衡。這家人搬往離此不遠的鄉下地方，他們在那裡被當成陌生的「下江人」看待。妻子開始感覺她遭到迫害。她認為，人們都在訕笑她。到最後，這個她幻想出來的迫害，終於讓她相信，

鄰居已經害死了她的兩個小孩。她被送往精神病院，所幸在送抵那裡時，她就死了。

在學生當中，離開家鄉看來是造成心理沮喪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很少得到來自家鄉的消息，而每一場在前線爆發的新戰事，憂慮就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結果造成若干症狀（頭痛、失眠、失去食慾）。[63]

閱讀三：〈山東龍口，一個被日軍蹂躪的村莊〉

關於日軍在占領區內掃蕩許多農村，現在已經有報告出現。其中很少是當時留下的紀錄。日本軍方並未公開紀錄；農民則震驚過度，以至於無法寫下當時發生細節。儘管如此，記憶仍然留存；在最近二十多年來，許多回憶都在《文史資料》出現。

山西頭村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傍晚時分，五到六百名日本士兵突然闖入位於西河陽與豐儀道路之間的山西頭村。山西頭是個小村莊，村裡只有七十到八十戶人家。一下來了這麼多的法西斯侵略主義軍隊，就像是爆炸一樣的驚天鉅變。槍聲在村內村外，山丘上和樹林裡徹夜未停。人們驚恐的叫喊，馬匹嘶叫聲，雞飛狗跳，叫聲不停歇。日本士兵闖進每戶人家裡，村民驚惶失措。這個小村莊陷入恐怖氣氛之中。

當農民結束一天的工作，返回村口時，看見正發生的景象，他們立即拋下家畜與農具，四散逃走。有些年紀輕的村民在日本軍隊來到的時候，已經想辦法要逃跑，但是大部分的村民仍舊受困在村裡。

日本軍隊的到來，將這個本來寧靜、祥和的小村莊，變成悽慘的人間煉獄。整個村子裡，到處燃起熊熊火光。所有的雞和鵝（大約有四百來隻），都被日軍搶去，在火上烤來吃掉。豬和羊也都慘遭屠戮。屋裡儲存的糧食全部被取走，較好的糧食被士兵食用，較粗礪的則拿去餵其牲畜。日軍搶奪糧穀，實在太漫不經心，致使裂開的麥穀散落遍地。這場搶劫代表著已經短缺糧食的本村，將在明年開春時遭遇饑荒。

隨著夜幕降臨，日本兵像野獸般攻擊村中婦女，強暴了十到二十名女性。有些女性在受辱之後，一連好多天都無法動彈。這其中最讓人難過的案例，就是張中順新娶的漂亮媳婦，她被日軍強姦至死。

到了天將黎明時，日本兵搬空了這座村子裡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並且擄走了五名我們的年輕女子隨他們而去。[64]

⊙相關電影

- 《紅高粱》，導演：張藝謀，一九八七年。
- 《梅蘭芳》，導演：陳凱歌，二〇〇八年。

■注釋

1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16. 族長的遺體在抗戰勝利後被運回家鄉安葬——可是在文革期間，墳墓又遭到摧毀（頁163）。

2 張中順，〈父子兵〉，收於司徒福等，《抗戰歲月》（台北：中央日報，1985），頁32-39。

3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對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對待陣亡將士方式的傑出研究顯示，戰爭帶來的殺戮造就了美國通知軍人家屬的一套辦法，以及葬禮、追思儀式和賠償撫卹系統。參見*The Republic of Suffering* (New York: Knopf, 2008).

4 中國人慶祝的是農曆新年，日期通常落在陽曆的二月。至於西方陽曆的新年則無足輕重。

5 程思遠，《白崇禧傳》（北京：華誼出版社，1991），頁222-224。

6 江沛，〈華北「治運」時期諸群體心態考察，1941-1942〉，「第三次中日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6年11月，日本箱根），頁15。

7 陳建輝，《無人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8 Ju Zhifen, "Labour conscription in north China, 1941-1945," in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rz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pp. 227-246; and Zhuang Jianping, "Japan's exploitative labour system in Qingdao, 1933-1945," *ibid*, pp. 267-284.

9 Jean Lyon, "War casualties on the psychological front," *China at War*, XIII, 3 (September 1944), pp.33-37. 程醫師本人在妻子去世之後，則尋求宗教的慰藉。

10 行政院衛生署數據，引自Yip Ka-che, "Disease and the fighting men: Nationalist anti-epidemic efforts in wartime China, 1937-1945,"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p.174.

11 C. K. Chu, "Modern public health movement," in H. F. MacNair (e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 29.

12 Ba Jin, *Ward Four: A Novel of Wartime China* (trans. by Haili Kong and Howard Goldblatt)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1999).

13 Arthur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XXXX, P. 299.

14 Krishna Menon, *Twilight in China* (Bombay, India: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72),, p. 213. 之後情況繼續惡化。到了一九四五年，一百元只能買一條魚；一九四六年，能買一顆雞蛋；一九四七年，半盒火柴。

15 彭天華，〈抗戰期間泉州的米荒及其黑幕〉，《泉州文史資料》，第十三輯（1982），頁55-56。

16 Hsu Kai-yu, *Wen I-to* (Boston: Twayne, 1980), p.155. 在中國，印章可用來代替簽名。刻印章是一項具備高度技藝的工作，而聞一多在這方面的技巧極為嫻熟。

17 Young, p.319.

18 Chang Tao-hsing, "The food situation in China," *Asiatic Review*, XLI, 148 (October 1945), pp.196-200.

19 *China Newsweek*, 117 (December 14, 1944), pp.8-9.

20 張仲魯，〈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災的回憶〉，收於宋致新（編），《一九四二：河南大饑荒》（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145。

21 Erleen Christensen, *In War and Famine* (Montreal, Canada: McGill-Queens, 2005). 愛琳·克里斯坦森（Erleen Christensen）的父親是位傳教士兼醫師，當時人在河南省南部。

22 《扶溝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93。

23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河南文史資料》，第十九輯（1986），頁156。

24 王子官，〈一九四二年大遭災之汜水〉，《河南文史資料》，第十九輯，頁160-165。

25 劉慶昭，〈民國三十一年鞏縣災情及救災〉，頁157。

26 金士倫，〈唐河的「人市」〉，收於宋致新（編），《一九四二：河南大饑荒》，頁209-211。

27 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6), p. 170.

28 引自Christensen, p. 128.

29 Diana Lary, "Treachery, disgrace and death: Han Fuju and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 *War in History*, XIII, 1 (January 2006).

30 何茲全，《一位誠實愛國的山東學者》（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323-334。譯按：何思源擔任山東省主席時期，應為抗戰勝利前後。據張朋園、沈懷玉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繼韓復榘之後出任國府山東省主席者，分別為沈鴻烈（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牟中珩（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薛岳（一九四四年）、何思源（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

31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BC Press, 2008), p. xi.

32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303.

33 Elise Devido, "The survival of the Shangdong Base Area, 1937-1943," in Feng Chongyi and David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 173-188.

34 Ramon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78-282; 在這一研究中，馬若孟（Ramon Myers）以日方的檔案材料，描述了山東和河北的農村經濟情況。

35 莫言，《紅高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紅高粱》的英文版由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譯，書名為*Red Sorghum* (London: Penguin, 1993)。電影版《紅高粱》於一九八七年推出，由男星姜文飾演余占鰲，女星劉曉慶飾演戴九兒，這是當時中國電影界最具知名度的兩位演員。男女主角間的戀情讓這部電影具有高度話題性，這和因為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兩人的戀情，而使《埃及豔后》（*Cleopatra*）這部電影受人注目的情形類似。譯按：作者將電影《紅高粱》女主角鞏俐誤植為劉曉慶，而劉曉慶是在拍攝電影《芙蓉鎮》時與同片男主角姜文熱戀。《紅高粱》女主角鞏俐並未與姜文談戀愛。

36 Thomas Gottschang and Diana Lary, *Swallows and Settl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p. 117.

37 《星光日報》，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38 《廈門抗日戰爭》，頁572。

39 《南方日報》，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復興日報》，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永春日報》，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40 《大成日報》，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仰光日報》，一九四〇年七月九日。

41 《中南日報》，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及《福建日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42 《大成日報》，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3 O. J. Caldwell, "Japan's Failure in Fukien [Fujian]," *Amerasia*, IV, 2 (April 1940), pp. 83-85.

44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四日，在晉江池店鎮訪問曾坤洛（音譯，Zeng Kunluo）。

45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五日，在泉州豐洲村訪問陳淑碧（音譯，Chen Shubi）。

46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六日，在永寧鎮訪問邢天英（音譯，Xing Tianying）。

47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訪問余海倫、余約翰（John Yu）。

48 Denise Chong, *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 (Toronto, Montreal, Canada: Viking, 1994).

49 Diana Lary, "Faith and war: Canadian Jesuits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XXXIX, 4 (2005), PP. 825-852.

50 《又是那個人！》（It's That Man Again，簡稱ITMA）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喜劇節目，是戰後《貢斯與蒙提．派森秀》（*Goons and Monty Python*）的前身。《又是那個人！》和邱吉爾的歷次戰時演說播音，並列為英國人難忘的兩大廣播節目。

51 引自林語堂為高克毅（George Kao）著作所寫的序文。見George Kao, *Chinese Wit and Humor*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1946).

52 沈云佳，〈無知中的幽默〉，《思維與智慧》，一九九八年第一期，頁48。

53 Diana Lary, "Treachery, disgrace and death: Han Fuju and China's resistance to Japan," *War in History*, XIII, 1 (January 2006).

54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pp. 311-314.

55 Lu Qian, "Chinese poetry in wartime," *Asiatic Review*, XLI (October 1945), p.75. 譯按：本詩原有四首，作者摘錄二至四首，據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詩集》，下卷（台北：國史館、監察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頁7回譯。

56 參見黃心村（Nicole Huang）的重要研究：*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1940s* (Leiden: Brill, 2005).

57 諷刺的是，在《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8）一書裡促使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正進行戰事的兩位作家克利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和奧登（W. H. Auden），在戰爭降臨歐洲時都離開英國，前往好萊塢。

58 Elias Canetti, *Auto da Fei*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2).

59 T. C. Lai, *Ch'i Pai Shih* (Kowloon: Swindon, 1973), pp. 99-103.

60 王長發，《梅蘭芳年譜》（南京：河海大學，1994），頁137-151。對於梅蘭芳生平的戲劇誇大描寫，可參見二〇〇八年的電影《梅蘭芳》。

61 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62 這篇散文首次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四月的《文萃》；後來收入《老舍文集》，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250-251。

63 Jean Lyon, pp. 33-35.

64 「中共龍口市委黨史委」，《龍口黨史資料》，第三集（1990年11月），頁190-191。

第五章

轉捩點

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

重大事件

戰爭的進程

在抗戰的最後一年，中國境內的權力平衡發生了決定性的重大變化。國民黨的政府和軍隊力量，因為遭受猛烈的攻擊而陷入極度衰弱的狀態，而中國共產黨和其軍隊的實力則急遽增強。美國是國民黨的重要盟邦，現在也嚴重懷疑這個政府未來是否還能撐下去；而就在戰爭的最後一個星期，中共得到了一個將來的國際盟邦，也就是它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1]。

一九四四年底，歐洲的戰爭局勢已經翻轉。德軍採取守勢，在蘇聯和北非戰場都退回到戰前態勢，而在當年六月，英美兩國於諾曼第登陸之後，更是接連丟失土地。義大利在實際上已經被打出戰爭局面之外。在歐洲戰場，仍在德國控制之下的城鎮，全都遭受盟國強烈的空中轟炸。在太平洋戰場，美國海空軍接連擊敗日軍。日本的本土城市開始遭到猛烈的空襲。規模最大的一次空襲，發生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引發風暴大火，幾乎將東京摧毀，死亡人數將近九萬。美方似乎是在報珍珠港的一箭之仇。距離戰爭結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盟國宣布歐洲戰事勝利結束。三個月以後，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場震動世界的戰爭，結束得比預期中還要快，由於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而使亞洲方面的戰爭結束。可是，就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前，日本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勢——很諷刺的稱為「一號作戰」——帶給中國嚴重的傷害。

一號作戰

一九四四年五月發動的「一號作戰」，是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發起的最大規模攻勢。對中國而言，這幾乎成了抗戰以來最為慘重的大敗，更嚴重的是，這場大挫敗竟然發生在日本的失敗看來已不可避免的時候。日本發動「一號作戰」背後的戰略構想仍是個謎。從戰略層面推想日本發動這次戰役的用意，是要打通由滿洲到新加坡的陸上交通線，將中國和印度支那（越南）的日軍連成一氣；但這樣的構想並不切實際，因為考慮到中國與印度支那邊境之間崎嶇的地形，以及欠缺鐵路與道路運輸的條件，都使得原來的構想大打折扣。

參與這次戰役的士兵人數超過一百萬人，在日本方面就超過五十萬人（這個人數是日本戰役所動員的最大規模兵力），中國方面的參戰兵力則更多。日本在河南發動攻勢，然後向南推進，一路經由湖北、湖南、廣西，進入廣東省境。接著，日軍由廣西攻入貴州，由後側威脅重慶。中國軍隊在接連的失敗中，被打得節節敗退。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中國方面死傷近十萬人，日本方面的傷亡則超過六萬人。

國民黨的軍隊在「一號作戰」當中遭受重創。經驗豐富的老兵作戰已經長達七年，還無法回家探望，部隊士氣低落，筋疲力竭。新兵都是些徵召入伍的男丁，訓練情況相當低劣。而無論是老兵或是新兵，全都沒有足夠的裝備，許多人還處在飢餓狀態底下。儘管多場戰役是在糧產豐饒的地區進行，軍隊的後勤給養補給體系，卻在本次「一號作戰」之初就宣告瓦解。於是，部隊的作戰能力也就所剩無幾了。

棄甲曳兵而走
Abandoning weapons and running

部隊作戰能力不佳的後果，是士兵大量開溜逃亡，或是無組織的混亂撤退。美國對於國民黨在軍事方面的顢頇無能，感到非常憤怒。美軍必須預先摧毀設在湖南和廣西的空軍基地，以免落入日本軍隊之手。到了這場戰役接近結束的時候，國民黨再一次被迫使出了可怕的「焦土抗戰」手段——美麗的桂林城因此被自家守軍所焚毀。

「一號作戰」突顯出國民黨軍隊士氣消沉、筋疲力竭。看起來，日軍的戰略彷彿是要摧毀國軍，在戰爭結束以前將國軍徹底消滅，以便騰出空間，留給北方的中共軍隊——在「一號作戰」裡，中共完全沒有遭受攻擊，對他們來說，這次戰役是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大禮。由於日本出兵侵略中國，是打著「防範共產勢力擴張」的大旗，「一號作戰」的戰略似乎與上述藉口矛盾；它至今仍然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動機最令人費解的一次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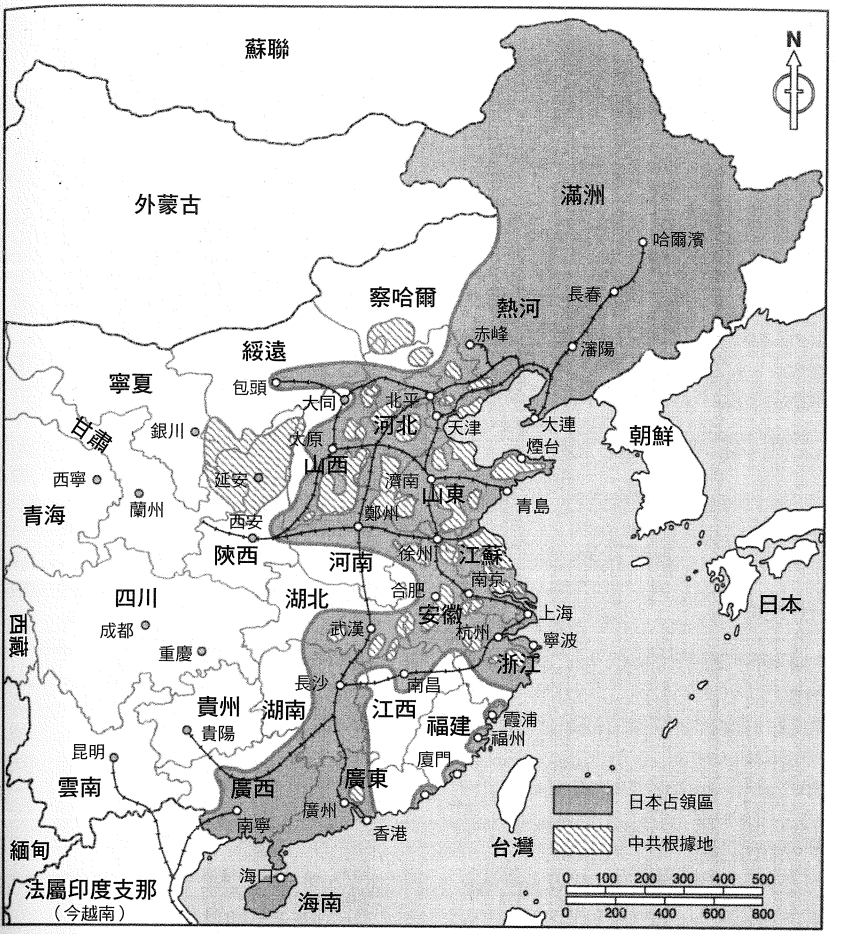
中共的崛起

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共的主體是一小群筋疲力竭的人，盤據在偏遠的陝北崎嶇山區當中的延安小城。他們才剛剛逃脫在長征當中可能遭到殲滅的厄運。中共位居在北方山區，這就表示共軍的主力很難參與大規模的陣地戰——要是他們真的參與了，很可能也已經被日本人擊敗。中共軍隊很少直接與日軍作戰；在整個抗戰過程裡，和日軍作戰的主體，以及絕大部分的傷亡，都來自於國民黨的部隊。

在抗戰進行六年之後，中共的軍事態勢經歷了一番天翻地覆的改變。這場戰爭的最後兩年，中共已是一股強大的勢力，在陝西擁有主要根據地，在華北各地控制眾多的地區，並且有一支大軍。在政治方面，毛澤東已經處在無人可挑戰的地位，成為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和理論思想家。日後人人都必須背誦的四篇文章裡，有三篇（分別是〈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與〈愚公移山〉）就寫於抗戰期間。這幾篇文章的篇幅都很簡短扼要，又能振奮人心。知識分子能夠了解這些文章的意思，只認識幾個大字的老粗同樣也可以讀懂。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能背誦這幾篇文章。它們顯現出中共與其領導人的自信心，並且具備信念，相信他們能夠掌握未來（見延伸閱讀一）。

中共目前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它的軍隊。共軍成員的來源很複雜，其中包括抗戰前訓練有素而且強悍的紅軍戰士、前國軍士兵、盜匪和地方武裝民兵。將上述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

圖5.1　村長選舉（《抗日戰爭時期宣傳畫》，第109號。）



地圖6.　一九四五年的中國

各股力量團結在一起，成為一支有紀律、能一致作戰的部隊，是一項艱難的任務。而這一點正足以顯示出中共擁有那些強悍到令人佩服的將領，是多麼的重要。在抗戰期間，後來的解放軍「十大元帥」（分別為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全都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不但是高明的戰術兼戰略能手，也是能夠鼓舞軍心士氣的指揮官[3]。以軍隊的素質而言，中共已經完全壓倒國民黨，國軍有更多的將領，但是能夠振奮手下士氣的人並不多。中共的軍隊在裝備和火力上仍舊很貧弱，但是他們能夠作戰。到了抗戰結束的時候，中共已經具備能夠挑戰國民黨的軍事實力，至少能和國民黨平分天下。

中共在政治和組織這兩條戰線上，也取得同樣的進展，特別是在華北農村地區。根據日軍高級參謀寒川義光（Samukawa Yoshimitsu）指出，一九四四

年底，在超過四百個名義上日本可以控制的縣份裡，真正能夠徹底掌控的只有七個；當中有一百三十九個縣，實際上落入中共之手。在剩下的二百九十五個縣份裡，占全部數字的百分之六十七，地方的控制權經常變動易手，而在地民眾則大致傾向支持中共[4]。

此時中共的各項政策仍然不算太過激烈。他們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徹底的階級戰爭；黨所推動的政策，像是減租和小規模的土地重新分配。同一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能保持對淪陷區裡先前效忠政府游擊隊的掌控。在淪陷區這些地方的民眾，上一次見到國民黨，已經是七年以前的事情了。

中共展露出在這樣的情勢當中崛起的能力，而這個局面是由抗戰變動的情形所造就的；中共在這個環境中領導民眾，讓群眾組織起來抵抗日本、從事生產，並且接受教育。達格芬．嘉圖（Dagfinn Gatu）在他具開創性的研究當中，對於中共的這種能力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 ……很多歷史學者聲稱戰時的局面對於中共的成長發展相當有利，這是對歷史的一種粗率簡化的解釋；這種論調只強調全新的機運在中共的面前開展，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與此同時卻忽略了此時中共推行的運動裡，其實也正承擔了極其巨大的困難、風險和危難。除此之外，要想乘著有利局面而興起，也需要有和這樣的局面相稱的本事才行[5]。

中共也展現出結交盟友的本事，它將地方上不願意與敵人合作的菁英人士，都變成其同盟戰友。這些人士大多都是低階的地方仕紳，和他們建立合作關係，對於動員群眾來說非常要緊。在河南省南部的中共根據地裡，中共就指派了不少這類的低階仕紳擔任行政職務，這些人都有共同的感受，認為戰爭讓人走投無路，必須鋌而走險；可是，如果按照黨的意識形態標準——他們全都是階級敵人[6]。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試驗摸索與犯錯之後，中共在其華北各個根據地裡，磨練出組織民眾的技巧。

中共還趁著華北日軍重新部署調動的機會，以及留守日軍的各種行為，來壯大自己的力量。隨著戰局的演變，前線戰事往華南與海外推進，駐守在華北的日本軍隊數量愈來愈少。留守在此的日軍變得更加不安，甚至變得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擔心游擊隊的攻擊。日軍這種心理狀態，導致了他們對平民百姓施加更大程度的暴力，對於確實發生、或是他們認為可能存在的威脅，也發起更多的報復行動。「華北群眾對此大起反感，以致於成了抗日人力資源的重要來源」，而在這些民眾的面前，惟一具有領導他們的能力、看來也願意出面領導人民抗日的力量——就是中共[7]。

中共同時也正在和國民黨對抗的宣傳戰當中取勝。中共刻意和農民文化打成一片，運用農村藝術形式——木雕、民謠、和傳統民俗舞蹈——以展現黨和人民群眾的交流互動[8]。國民黨則和高雅的上層文化較有關係，例如詩歌、書法、以及山水畫等；政府在抗戰初期在宣傳方面取得的成功，現在已經凋零枯萎。中共領導人的平易近人，以及他們看似沒有敗德卑鄙的行為，很讓他們得到前來延安訪問的外國人士好感。這些外來訪客所寫下的熱情記述，與來自重

慶的煩躁報告相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別，後者顯示出國民黨的貪汙腐敗、缺乏效率，並且無心於對日作戰。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中共的聲譽節節高升，而同時國民黨則衰退虛弱，使人們更容易設想中共參與政府、治理全中國的可能性。

蘇聯到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蘇聯加入對日作戰。蘇聯紅軍越過中蘇北方邊境，進入滿洲境內。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對於擊敗日本的貢獻很小，因為蘇聯對日宣戰的時間，在美國於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之後，而在於長崎投下第二顆之前。不過蘇聯對日宣戰，已經足夠讓日本軍民陷入恐慌、逃離中國東北。蘇聯和日本之前有歷史宿怨，現在正是結算的時候了。一九〇五年，日本在中國東北擊敗帝俄，大為羞辱俄羅斯民族，並且加速俄國內部的第一次革命，至今記憶猶新。日本人為了趕緊逃避俄國的報復，拋棄他們的武器彈藥、糧食補給、卡車和工業設備。蘇聯將許多日本工業設備當成戰利品，裝船運回俄國的歐洲部分。他們這樣做的意圖，是要以這些設備彌補蘇聯在歐洲戰事上遭遇的損失。其它的物資，例如武器、卡車、以及軍事補給等，都逐漸被交到蘇聯在社會主義大業上距離相當遙遠的盟友：中共之手。現在，中共發現自己的裝備與火力，已經可以和國民黨進行較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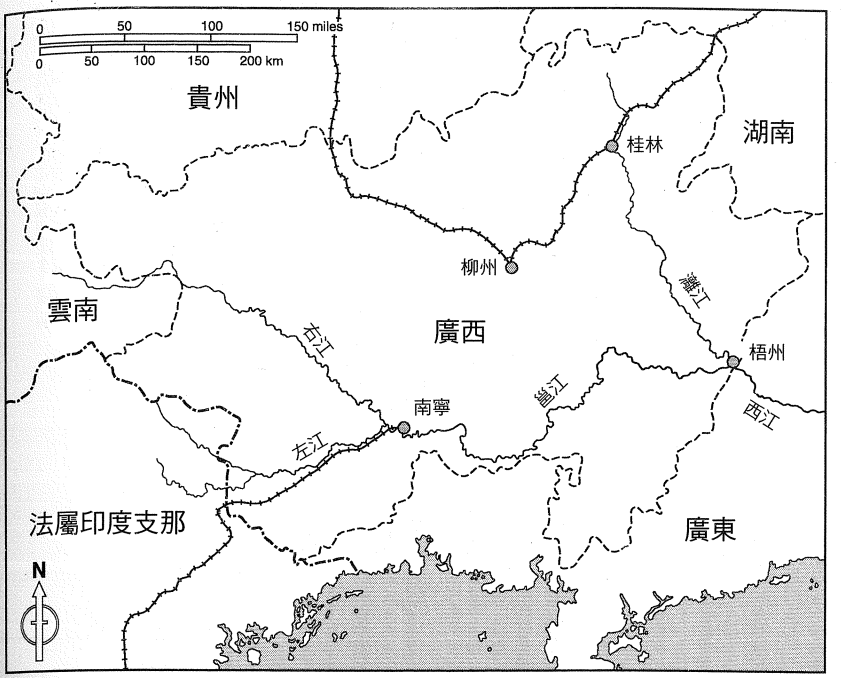
主題與案例研究

到了一九四四年，抗戰已經進行得太久，彷彿永無結束之日。日本可能會被擊敗的希望，至今還是很渺茫。前景黯淡的「新常態」雖然令人沮喪，但是還能夠忍受。人們所無法忍受、甚至連絲毫安之若素的平靜也做不到的，是戰局突然惡化，一九四四年的情況就是這樣。

新一波逃亡潮

抗戰的最後一年引發了好幾波新的難民潮，以及中國在物資方面又一回的慘重損失。戰事進行到西南邊陲，之前這些省份大致上都不受到戰爭的直接衝擊。這裡的大小城鎮雖然遭受敵機轟炸，但是之前都沒有大規模傷亡。現在它們遭到報復性的攻擊，淪為日本攻擊與己方守軍焦土抗戰策略底下的雙重受害者。湖南、廣西和貴州被一波新的逃亡損失潮所襲擊，這是抗戰前期降臨在其它地方惡運的可怕重現。一九四四年六月，長沙被日軍攻陷，這在抗戰的象徵意義上是重大的挫敗，因為長沙在先前曾經三次成功擊退日軍的進犯（儘管在一九三八年時被守軍放火焚毀）。大火現在又吞噬了中國南方另一座重要城市。

桂林大火　一場大規模的火災，是毀滅的終極象徵。建築被烈焰吞噬；民眾被燒成灰



地圖7　廣西

燼。生還的倖存者流離失所，失去一切身家財產。這就是一九四四年秋天時，降臨在桂林的命運。

對於桂林市民來說，這座城市的末日是一場悲劇，對於那些在此躲避戰禍的人而言，同樣也是如此，這些人裡許多都是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桂林被焚毀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桂林名列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漂亮的建築背後，是石灰岩峭壁和青翠稻田，構成一片幾乎是超現實的美景。

桂林大火是一場自我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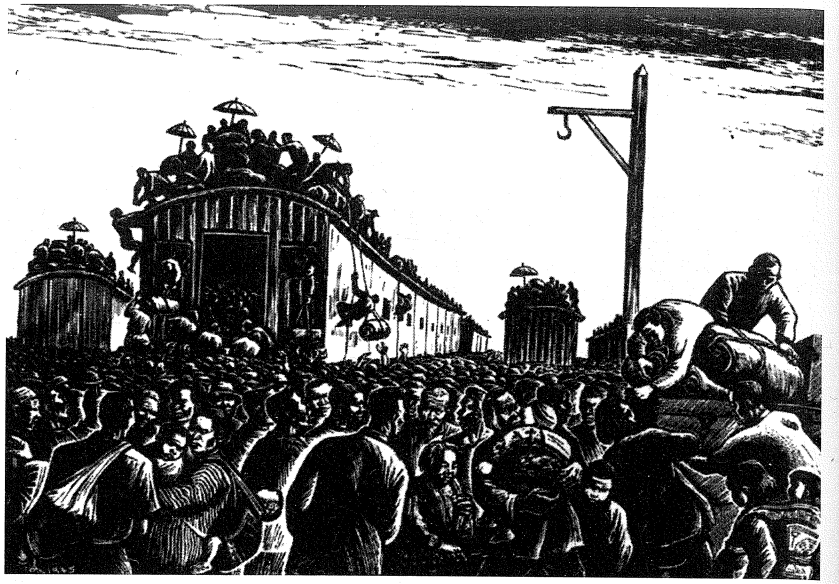


圖5.2　桂林大撤退。（蔡迪之作品，收於*Woodcuts of Wartime China, 1937-1945*, 1946.）

牲的行動。這場焚城大火是守軍在絕望無奈之下所做出的焦土策略，下令放火的指揮官，本身就是廣西人。為了擋住日軍冷酷無情的南向攻勢，他們放火燒毀了自己的家園。十月初，謠諑蜚語失去控制，到處流傳日軍已經兵臨城下的消息。此時防守廣西北面的部隊人數仍然不少（約有十七萬人之眾），但是軍心士氣已經崩盤。即使將擅自從湖南、廣西邊境撤退的軍長陳牧農槍決，也無法扭轉這波失敗的浪潮[9]。十月中旬時，桂林守軍司令韋雲淞下令全城疏散撤退。大部分的平民百姓出城逃難，一波巨大的難民潮，先往南到柳州而去，再沿著新修的鐵路線往西到貴州：

沿路三兩成群的散布著戰爭最為不幸的產物——難民。家家戶戶淪落成人們背上一捆又一捆的包裹，像是被人連根拔起的植物，在大風裡無助地擺盪瑟縮。各種年紀的女性，背負著重物和孩子，舉起蹣跚的腳步前行。一列歪歪斜斜、士氣低落的撤退士兵經過。在市郊的鐵道上，以及火車南站裡，有三列動彈不得的列車，裡面擠滿了難民。各式各樣的車輛裡裡外外還有上頭，全爬滿了人，好像蜜蜂群集在蜂巢上，都爭先恐後的要搭車離開。由於有一節列車出軌，鐵道受阻無法前進。人們大都表情嚴肅，耐心等待。有些人乾脆棄車步行，無助地走著，找尋安全的避難所。

桂林現在是座死寂之城，原來熙熙攘攘的熱鬧城市，突然之間成了一座杳無人跡的鬼城。商鋪、住家、旅店、茶館和娼樓全都被木板封死[10]。

要求守軍「死守」這座城市的命令，隨著各部隊紀律的崩潰而瓦解。許多士兵陣前逃亡，他們的士氣實在太過低落，組織也過於渙散，以致於完全無法戰鬥；而他們也想要返鄉保衛自己的家園，畢竟他們已經有七年沒有返家了。沒逃走而留下來的部隊則陷入暴亂狀態，他們洗劫桂林，直到這座城市被搜刮一空為止[11]。實際上，城裡的每一間房子都遭到搶掠者翻箱倒櫃、徹底破壞。接著，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這原本是為了要清空守軍火砲射程內的障礙，或是避免日軍取得戰利品，可是現在看來，更像是搶掠者為了銷毀證據而放的火。桂林的大火足足燒了十天，沒有任何人試圖撲滅火勢。幾星期之後的十一月十一日，日本軍隊抵達桂林，他們得到的是一座被燒得焦黑的空城；留存下來的，只剩下城市四周的天然美景。

在逃難人潮的大股洪流裡，有些來自湖南，有些則是廣西民眾，他們沿著新修築的鐵路線向西逃往貴州。一路上，日本飛機低空掃射這些難民。到最後，日軍地面部隊也追上了這股難民的洪流。當場就引起大亂，混亂之中有大量民眾死亡，死者或者是遭日本飛機轟炸、掃射而導致大量傷亡，或是被日軍地面部隊殺害，又或是擁擠之下自相推擠踐踏而喪命。一名桂軍將領試圖在鐵路線上維持若干程度的秩序，可是徒勞無功；他宣稱在廣西和貴州兩省的接壤處，總共有十萬名難民和在地民眾遇難[12]。這個數字並不確切，很可能有誇大的嫌疑，不過就算實際傷亡數字比上述少上許多，那也是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民眾沒有受到自家軍隊保護這個事實，顯示出中國軍隊的士氣已經低落到何等程度。這場大潰敗清楚的表明，曾經是中國最精良的廣西部隊桂軍，至此已經土崩瓦解。即使白崇禧這位桂系最具才智的戰略家，也無力阻止桂軍的分崩離析。

抗戰最後這一場可怕的戰役，受到打擊最為沉重的地方，是中國南方各省。在北方，這場戰役帶來的效應，是日軍關切的焦點已經改變，由北方轉向南方。而這場戰役是如此殘暴，則日本雖然能贏得這次戰役，卻會輸掉整場戰爭，是想當然爾的事情。現在，已經到了準備迎接抗戰結束的時候了。

淪陷區裡的戰爭尾聲

隨著抗戰結束的日子愈來愈接近，住在華北各大城市裡的人們已

經逃過了戰爭帶來的直接衝擊，他們開始擔心在不久之後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有些人參加最近的抗日運動，另外一些人則改寫自己在抗戰時期所做所為的歷史，但是大多數的人都保持沉默，困處在一個慍慍不樂的憂心狀態裡。他們的情形，就和一九四四年初德軍占領區裡的法國人境遇完全一樣；這些法國人知道德國很快就會失敗，地下抵抗運動因此而風起雲湧，原來能夠忍受德國人的人，突然都變成反德分子。在中國，被人們描述成「風派」成員的分子，也就是那些善於觀察風往哪個方向吹，並且據此改變他們效忠對象的人，開始和日本人保持距離，並且小心謹慎的與國民黨或中共暗通款曲。

戰爭的恐怖終於降臨在一些占領區的城市；這些城市遭到轟炸，這是抗戰初期它們逃過的災劫。轟炸這些城市的並不是中國空軍，而是美軍新型的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這種新型轟炸機從印度、關島、和馬里亞納（Mariana）的機場起飛，航程可以達到日本和中國被日本占領的區域。武漢是長江中游大城，六年以前曾經作為中國的臨時首都，此時幾乎被盟軍的轟炸整個摧毀。這些空襲，伴隨著東京遭受大規模可怕空襲轟炸的消息（人們是從謠傳得知，而不是由新聞媒體上面看到的），讓大家深信：戰爭就要結束了。

謠言滿天飛
Rumours flying everywhere

在仍然由日本人和其羽翼控制的大小城鎮之外的地方，政治與軍事的情勢錯綜複雜。有些地方實際上已經處在中共的控制下；其他地區則反覆受到好幾股不同勢力的爭奪。一部名為《鬼子來了》的電影，捕捉到了這種可怕的不確定氛圍：在一個位置靠近日本人要塞的農村裡，人們不知道要是日本人走了，而那個總在夜間來去、身分神祕的游擊隊領導人——觀眾只曉得他叫做「我」——接管農村時，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即將要降臨在他們身上。

社會與經濟解體

物質的毀滅，是中國加速衰弱和分崩離析局勢的其中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是社會的解體。在人們察覺到戰爭可能很快就要結束時，同樣會開始算計、並且領會在戰爭時期，他們究竟失去了多少東西。隨這種失去的感受而來的，是一種體會：如果人們年紀夠大、記得從前的事情，那麼他們可能已經回不去戰前那個熟悉的世界了。這諸多恐懼無法說出口，而除了在共產黨人的陣營以外，也沒有被政治界和知識界的領袖們提起。即使是在中共方面，討論革命的聲音也很微弱。沒有人知道戰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傑出的作家茅盾筆下呈現出了抗戰行將結束前的重慶，被一種徹底的沮喪情緒所籠罩的情況（延伸閱讀二）。舊有的各種社會關係已告消失，沒有任何新的事物可供取代，只留下混亂、困擾與分裂。

經濟危機是社會解體的另一個層面，它不斷破壞社會的結構。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經濟局勢由原來長期衰弱的情況急轉直下，成為一場嚴重的大危機，所有被捲入當中的人，都必須竭盡全力才能繼續存活下去。通貨膨脹就是這場經濟危機裡最顯著的徵兆，也是一

頭無處不在的大怪獸。

通貨膨脹　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讓所有依靠貨幣維生的人，幾乎無法生活下去[13]。在抗戰後期，通貨膨脹的速率隨著政府不斷增印鈔票，而有如脫韁野馬，疾馳而去。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四家政府銀行發行的紙幣金額，以每年七月為準，見下列表格一[14]。

大量發行紙幣是通貨膨脹加速發展的主要原因，現在則猛然演變而為惡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月上漲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本書第四章裡，曾經提及印度駐華外交專員梅農對通貨膨脹的描述，顯示出在抗戰結束之際，物價上漲的加速程度，見下頁表格二[15]。

下頁表格三則是泉州的米價[16]。

上面這些巨大的天文數字還遺漏了一個通貨膨脹的層面，這個層面相當重要：那就是政府不

表格一

年份	金額
一九三七	1,445,000,000
一九三八	1,754,000,000
一九三九	3,193,000,000
一九四〇	6,250,000,000
一九四一	11,296,000,000
一九四二	25,308,000,000
一九四三	52,505,000,000
一九四四	129,057,000,000
一九四五	462,327,000,000

願意發行大面額的鈔票。因此人們在領取酬勞或薪水時，必須攜帶布袋、箱子，或甚至是手推車以裝載鈔票。隨著通貨膨脹的速度加快，人們必須盡快把領到的鈔票花掉，他們不用步行，改採跑步，趕緊到市場或商家去，首先購買生活必需品，然後是任何販賣的物品，不管他們是否需要——因為稍後他們或許可以用更高的價碼，賣出這些物品。到抗戰結束的前後，重慶的平均物價已經比戰前水準高出兩千五百倍之多[17]。

通貨膨脹對各個群體的打擊程度並不相同。以日計酬的工人雖然窮困，但是並沒有明顯得變得更為困苦。但是對那些領取固定收入或薪津的人們來說，情況現在變得非常可怕：他們陷入焦慮惶然之中，不知道下一餐要怎麼張羅；在看見自己的銀行積蓄河乾海落時，又感到深深的絕望。對國民黨而言，通貨膨脹的政治效應非常巨大。國民黨視中間階級、商人和軍人為它的基本

表格二

一九三七年	一百元法幣能買兩頭牛
一九四四年	一百元法幣能買一包米
一九四五年	一百元法幣能買一條魚
一九四六年	一百元法幣能買一顆蛋

表格三

時間	每一百市斤（約五十公斤）價格
一九三八年五月	七元法幣
一九四四年初	一千四百金圓
一九四四年末	五千金圓
一九四五年初	一萬金圓

支持群體，通貨膨脹將這些人對國民黨的信心與信任感侵蝕殆盡。

通貨膨脹帶來的羞辱和不堪，因為囤積居奇、發戰爭財和黑市交易者逐漸地四處活動，而變得更加劇烈。對這些人來說，這場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簡直是上天所賜的禮物。本地與國外對這種情形做出的尖刻批評，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見延伸閱讀三）。由於大部分民生消費物資短缺，已經造成黑市交易猖獗的情形；通貨膨脹讓這些牟取暴利者更是大發利市。現在，他們只要等上幾個小時，就能把手頭上的貨品以更高的價格賣出。

許多原來靠薪水度日的人感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投身於黑市交易，參與投機買賣；他們的薪水完全無法趕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些他們投入的交易，像是跑遍各個市場、查明價錢、討價還價、算清楚幾百張鈔票等等，全都得要繃緊神經、全神貫注，而且極費時間。這些活動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而他們也因此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考慮政治，或是關心其他人。

抗戰的士氣和民族精神到此幾乎是徹底淪喪。在抗戰之初為了國家民族願意拋棄家園和親人的人們，這時沉默地承認，金錢已經成為衡量成功的惟一標準。

通貨膨脹引發的各種弊端起於政府的高層。重慶充斥著各種關於蔣介石的親戚如何富有的謠言，特別指向蔣夫人的大姐宋靄齡，以及她的夫婿、主持政府財政事務的孔祥熙，說孔氏夫妻利用身居行政最高層的職位之便來斂取錢財。這些謠言在本質上都是無法證實的，但是卻廣為人們所相信，而且讓那些深受通貨膨脹所害的人們感到極度的憤怒。有一位外國評論人士總結概括了地方民眾的感受：問題其實出在那些「下江人」所帶來的有害影響，也就是上海那種

貪迷於財物的價值觀：

> 上海的各種價值觀，現在已經移植到重慶來了。這些價值觀，諸如快速致富、擁有一名漂亮的情婦（或者至少包養一個條件可堪與好萊塢標準相比的女子）、能夠吃上幾乎已經完全無法取得的魚翅，並且當作晚餐佳餚、出門以豪華轎車代步、而且能夠說自己的收入可以用百萬元來計算，這些全都是最為精緻高雅品味的展現[18]。

抗戰後期的那幾年，對於任何有辦法能取得美元的人來說，簡直是黃金時代。隨著中國的貨幣（法幣）不斷貶值，美元的價格扶搖直上。一九四二年後，美元透過租借法案和支付美國在華軍事行動開銷等名目，大量湧入中國。法幣與美元兌換市場匯率的變化，相當令人吃驚，見下頁表格[19]。

換句話說，人們在一九四五年持美金所能購買到的東西，會是在一九三七年時同樣額度的一千倍。這樣的兌換比例讓有辦法持有美元的人，變得非常有錢——因此而產生了一個強取豪奪的貨幣黑市，當中很多玩家都是政府官員和軍隊職員，任何直接和美國人打交道的人，都可能涉身其中。

通貨膨脹也對占領區內的城市經濟造成打擊。一項北平的物價指數，在一九三七年時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四月時，成長到一千七百九十。糧食價格指數增加的百分比甚至更高

[20]。而通貨膨脹只不過是一項財政問題而已；除此之外，人們對於日本戰敗之後，戰時通用的貨幣將會發生什麼情況，感到非常憂心焦慮，在台灣和香港的人們，也有同樣強烈的焦慮。

拉伕　農民並不受到通貨膨脹的惡劣效應影響，因為他們的糧食，就是自己的產品，而且他們也可以在實物交易的經濟裡生存下去。但是他們會因為徵兵而受到傷害。在自由地區，拉伕是為了徵召壯丁加入軍隊；在日本和受到日本控制的朝鮮、滿洲國等地，拉伕實際上是為了要給日本人做奴工。

國民黨部隊對於新兵補充的需求數字，遠高於自願參軍的人數；到了抗戰的後幾年，再也沒有出於愛國而從軍的新兵了。拉伕徵兵就成為自由地區的常態。根據法律，所有年齡在十八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成年男子都有接受徵召的義務。而在實際上，只有貧困的農民才會被拉伕從軍；在抗戰期間，總共徵召了一千四百萬人。每個縣和村莊都有指定預備達成的徵兵人數配額，各支部隊會派出接兵隊來押送這些新兵。這是個上

時間	匯率：一美元兌換法幣額度（元）
一九三七年七月	3.37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17.6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49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84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570
一九四五年七月	2,925

下其手貪汙的絕佳機會；任何有管道、有辦法的家庭會拿錢買回他們的兒子，要不是出資讓人頂替，就是付錢賄賂負責徵兵的官員。

徵召的新兵會在村莊裡先集中起來，通常用繩索捆綁，然後硬是將他們拉走，到軍隊的駐紮地，或是直接上前線戰場。他們預計要以步行走到各自部隊的駐地，有時候相隔有數百公里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有辦法逃走的都跑了；而沒本事跑掉的新兵，就只好在接受訓練時，被迫承受持續的虐待，一路走到他們所屬的部隊。當蔣介石聽聞新兵遭受到的苛待是多麼的惡劣時，他顯然因為悲憤交加而情緒崩潰，以致於一邊痛哭流涕，一邊對著兵役署長大吼：「你正在謀殺我的士兵！」並且下令立即處死一名主管兵役的軍官[21]。無論上面這個故事真實與否，或者是另一個例子，就是蔣介石以處死代罪羔羊的方式（正如他懲辦韓復榘和一九三八年長沙大火），來處理受到公眾注意的大慘案，比較接近真實，兩者都不能掩蓋當局以「為國作戰」的名義，行虐待窮苦年輕男子事實的不光彩景象。虐待新兵是軍隊士氣徹底淪喪的象徵，同時也顯示出一個事實——在戰爭的後幾年，是這些貧窮人在為抵抗日本付出代價。

被日本人拉伕去做奴工的華北男子（主要在山東和河北一帶）所遭遇的情況，也是同樣的惡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對於士兵的需求急遽升高。成年的日本男子都被徵召入伍，而改徵集中國勞工，在日本、朝鮮、蒙古和滿洲等地的工廠、礦場與耕田裡勞動，以填補日本人受徵召後的空缺。日本徵召體系的人力需求非常巨大，一九四四年實際徵集的人數低於

預計的目標，但是仍然相當龐大，見下列表格[22]。

沒有任何藉口或托詞，能聲稱這些人是自願從事勞動的工人。傀儡政權的軍隊在村莊和市集抓走這些人，持續拘禁他們到裝船送往日本為止，他們在日本受到的待遇極為惡劣，從來沒有得到酬勞。這些奴工所得到的待遇，是當時對待中國人的普遍種族歧視主義態度下的一種終極表露。

這樣的排華種族歧視有一個隨之而來的層面：先前在中國，白種人是優越種族的具體化身，現在這種情況扭轉過來了。

西方影響力的崩盤

自從鴉片戰爭開始，在中國的西方人就生活在各種各樣程度裡的優惠和特權裡，他們除了一段短暫的期間之外，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這些西方人幾乎都有僕役。他們的孩子上的是專門的學校。有些洋人（特別是傳教士）費了很大的工夫適應中國的事物，並且學習中文。其他的洋人（尤其是外交官、商人和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外國人）則不然。英國小說家巴拉德（J. G. Ballard）在上海度過他生命中的前十六年歲月，完全沒有學

時間	計畫徵集人數	實際徵集人數
一九四二年	907,000	1,087,350
一九四三年	800,000	1,009,050
一九四四年	700,000	476,350
一九四五年	410,000	51,970
總計		2,624,720

會一個中國字，也沒有吃過任何中國食物[23]。大部分住在中國的西方人，生活和中國人隔離，無形中有一種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沒辦法在戰爭時期繼續存在下去。到戰爭結束前後，西方的影響力已經受到極大的破壞，以致於在實際上形同遭到摧毀。完成致命一擊的是日本人。頭一批掉入黑暗深淵的西方人，是同盟國籍的平民人士（例如英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及紐西蘭人），他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被拘留在集中營裡。軸心國籍的人士（也就是德國、義大利和維琪法國）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得意洋洋，但是在戰爭結束時隨著日本敗亡而遭受重挫，地位一落千丈，成了戰敗國的公民，和他們同樣處境的，還有為數眾多的日本人，這些人通常已經在中國住了許多年了。

另外還有其他無國籍的西方人士。這些人當中，包括人數近兩萬的歐洲猶太人，大部分都住在上海，他們在納粹對猶太人開始進行迫害時，經由陸路從西歐來到中國。數以萬計的白俄人士這時也在中國，東北是白俄規模最大的聚居處，他們居住在那裡，和日本人相安無事，長達十五年之久。隨著戰爭接近結束，蘇維埃到來的威脅漸漸逼近，他們往南逃入中國內地，無論怎麼樣都可以，就是不願意落入蘇聯的控制。

美國人是惟一在戰爭期間影響力逐漸增加的外國人士。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給予中國政府可觀的援助，以及對於重慶的政治影響力，代表歐洲人此時已經靠邊站了。在中國崛起的新強權，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濰縣集中營　珍珠港事件之後，在日本占領區裡的同盟國籍平民成為敵方，被拘留起來。在接下來幾個月之內，他們被驅趕進多座臨時成立的集中營裡。規模最大的一座集中營，位在山東濰縣，成立於一九四二年。這裡之前原來是一處傳教士的院落（樂道院）。有超過兩千名同盟國籍的平民、傳教士、生意人和教師被拘留在這裡。於是頭一回，原本過著不同生活的不同外國人團體，現在被集中在一起生活。

集中營裡相當擁擠，營區裡的建築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人們永遠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伙食不但單調，而且品質低落。此地的氣候相當嚴酷，夏天過於燠熱，冬天又太過寒冷[24]。和在亞洲各地的盟軍戰俘的情況一樣，集中營裡的人犯並沒有遭到虐待。營區裡沒有對身體加害的暴行，也沒有強姦女性的情形。可是，對於被拘禁在集中營裡的人們來說，這種失去自由的日子是痛苦而沉悶的。他們得學習在沒有僕役協助的情況下，自行打理生活。單身的人合住在集體房舍裡，有家庭的人全家擠在狹小的房間中。他們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耗用在無止盡的排隊，等待著領取食物、上廁所，或是沖澡。

濰縣集中營裡知名度最高的被拘留者，是號稱「倫敦愛丁堡特快車」（Flying Scotsman）的李愛銳（Eric Liddell），他就是電影《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裡的那位運動健將。一九二四年巴黎奧運時，他拒絕在禮拜日出賽（譯按：巴黎奧運健將李愛銳預備參加的男子一百公尺賽跑項目排在星期日，他因為出身傳教士家庭，信仰虔誠，認為這天應該敬拜上帝而拒絕參賽，於是改參加隔日舉行的四百公尺賽跑，並獲得金牌）。他由於腦部腫瘤，在戰爭結束前夕去世；雖然在集中營裡有很多位醫師，卻沒有足夠的設備好為李愛銳進行手術。大部分的被拘留者都活了下來。他們所受的待遇，比起中國戰俘不知道好了多少倍；這些中方戰俘要不是慘遭殺害，就是被送往滿洲、日本或朝鮮等地充當奴工。不過，對許多外籍拘留者來說，他們原來在中國的生活就此畫下句點，還是令他們感到深刻的悲傷。

日本當局或許抱持著這樣一個希望：將他們的白種人敵人拘禁起來，會贏得中國民眾的好感，使中國人相信這場戰爭是一場反帝國主義的正義之戰，目地在於拯救亞洲和亞洲人民。但是中國人民早已飽受日本的欺凌，完全不可能將日本看成是拯救者。中國人惟一察覺到的種族主義，就是針對中國人的排華心態。

海外華僑

在許多抗戰造成的難以發現、但卻效應長遠的改變裡，其中一樣就是很多海外華僑的認同改變。海外華人社群在抗戰期間與中國音訊斷絕。再加上戰前經濟大蕭條期間通訊聯絡的減少，就讓往返僑鄉的來回費用變得太昂貴。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逐步受到破壞，現在看來已經到了完全停頓、消失的地步。返鄉探親次數的減少，以及從那時起匯回家鄉金額的逐步枯竭，改變了留在家鄉的人與那些身在海外者之間關係的作用模式。抗戰改變了人們的效忠和身分認同。好幾個國家的華裔男子紛紛從軍，於該國在中國的租界裡服務。加拿大有許多年輕華裔男

子堅持接受徵召入伍。當他們於戰爭結束、退伍返鄉以後，就敦促加拿大政府授予華裔加拿大人投票權，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公民[25]。

少數海外華僑走上相反的道路。他們在戰爭爆發時回到中國，參加抗戰大業。有些人就此永遠留了下來。有三千兩百位海外華僑，受到愛國熱情的驅策離開南洋，於一九三八年在滇緬公路服務，擔任駕駛或技師。華立方（音譯）是這些人當中的一位。他拋下妻子和兒子來到中國工作，但是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卻無法回到故鄉，而在昆明安頓下來，並且再婚[26]。他心裡並沒有忘了元配，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卻完全沒有返回南洋的可能性。好不容易，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元配終於前來和他團圓。「現在他和兩位妻子一起，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海外華僑和他們的家人在抗戰和隨後的內戰期間，被強迫拆散分開，這終結了傳統的僑鄉世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外界隔絕，更讓這種情形持續下去。到了僑鄉能和外界恢復全面聯繫的一九八〇年代，事情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往返僑鄉完全要靠護照和簽證，非正式的旅程安排變得根本不可能。很多海外華僑的第二、第三代已經改換他們認同的對象，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安身立命。而匯款的長期斷絕，也代表海外華僑不再能在僑鄉扮演經濟上的關鍵角色。

誕生中的新世界

在方才描述的一切苦難之間，中國有些地方的人們，心境卻大不相同，這些地方，就是中共統治的區域。勝利的曙光照耀在中共勢力強大的華北農村地區，一個新社會已經誕生。地方上的領導人受到鼓舞，可以開始大張旗鼓的著手社會和經濟改革——他們分配通敵者的土地，將財產充公，而這些曾為日本效力的人們，此時已經得不到日方的庇護，因為日軍在華北的堅強據點，已經愈來愈少。在一九四五年初的山東黃縣，日本人和其爪牙被中共的武裝部隊圍困在港口煙台和其他城鎮裡，只能從海路離開。中共在這些地方已經建立起行政機關，許多農村人口也被組織起來從事生產。中共地方武力將若干偽軍部隊包圍繳械。戰爭的結束看來隱約在望，而中共則已經成為贏家。黨員的人數急遽增加[27]。

中共在那些因為和日本人有來往而被冠上「漢奸」罪名的人，與那些坐擁大筆財產的人之間，很輕易就可以畫上等號。這些人被批判攻擊，而不會明顯涉及到階級鬥爭，因為後者在這個時候還不是中共的公開政策。這種做法實際上等於是階級鬥爭，很受到歡迎，因為它將「漢奸」財產充公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項事實：在華北這些以單一大姓為主的村莊裡（這種情形在北方相當普遍），富人和窮困者其實都有血緣關係。

抗戰最後的這幾個月，對於現在成群結隊投靠在中共旗下的年輕人來說，真是一段令人振奮的時期。原先的各種許諾，看來就要成真：日本占領的結束、舊世界的瓦解——這正是〈國際歌〉裡的承諾，現在已經成為抗戰時期最常被人們詠唱的歌曲。〈國際歌〉的中文歌詞由共產黨人烈士瞿秋白所翻譯，宣稱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些許諾看來替某些為抗戰而遭受的磨難，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且讓人們為了抗戰所付出的犧牲顯得有價值。

結論

殘兵敗將

Scattered soldiers, defeated generals

對於國民黨與其支持者來說，抗戰的最後一年是整場戰爭裡情勢最惡劣的一年。軍事上的失敗、通貨膨脹、以及政治上的貪汙腐敗，全都加總在一起，形成民心士氣與統治正當性的大幅淪喪。對中共而言，情況恰好相反。國民黨的衰弱，蘇聯以盟友的面目（儘管靠不住）到來，以及中共本身在基層逐漸取得的成功，全都意味著共產黨人可以在戰事一旦結束之後，將展望一個更加偉大的勝利局面（見延伸閱讀四）。

抗戰到了這個階段，所即將引發的局面，是許多中外觀察人士最害怕的抗戰結果：一場內戰。在這個部分，中國社會所付出的代價還沒有被列入考慮。或許，抗日戰爭已經讓中國社會付出太過慘烈的代價，所以後續的損害看來是如此無足輕重。

⊙延伸閱讀

閱讀一：毛澤東語錄，摘錄自〈為人民服務〉（一九四四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閱讀二：茅盾，〈挫折〉

張太太叫像聽見了，又好像沒有聽見，凝定了一雙眼睛，只管出神，一會兒，她又悄悄問道：「當真今年可以勝利，大家都回老家去麼？」

「當然大家都這麼盼望。」

「那麼，不一定了？」

「恐怕沒有那麼快。」

「再一年呢？」

「那也許差不多。可是你問我，也還是白問，我跟你一樣的不知道。樂觀的人說少些，仔細的人說多些。其實他們也跟你我一樣，誰又不是預言家。這又不是我們造一件貨，可以算得準準確確的。」

張太太聽了半晌不作聲，後來歎口氣道：「要是說，非在這裡過一輩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讓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走，這就比什麼都難受了。日子又是越來越難過。連天氣也跟你打麻煩，昨天在水裡，今天便是火裡。」

「挨也挨到現在了，再忍耐一些。……」

「誰不打算再忍耐些，」張太太打斷了丈夫的話。「不過說說倒容易，事情碰在你身上，心裡怎麼能夠不煩呢？眼前的一件事，天氣忽然那麼熱了，叫我怎麼能夠心裡不煩呢？」[28]

閱讀三：梅農，〈重慶〉

梅農是印度駐華外交專員，派駐重慶三年時間，並且在之後成為印度首任駐華大使。

雖然重慶有種種缺點：朦朧的煙霧、潮溼的泥濘、難聞的氣味和階梯與灰塵、蒼蠅蚊蚋、瘧疾、傷寒和霍亂——但是這個城市還是有其迷人之處。這是一座有性格的城市。它有自身獨特的性質。

重慶醜惡的那一面已經多有記載。世間的各種禍害都群集於此：囤積居奇者、發國難財者、黑市交易客，還有那些關心自身財務狀況，更甚於國家經濟局面的金融家。政府的部長們在他們美國銀行的帳戶裡擺放了無數黃金，官員們奢侈地享用民脂民膏的同時，民眾們卻在吃樹皮和草根。他們的名字將與草木同朽，而我並不是一個非暴力主義的堅定信徒，所以我希望，報應如果不是在來世，也會在這輩子降臨在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後繼者身上。但是重慶仍然會堅持下去，它是中國抗戰的磐石，已經支撐了七年之久，承擔了四方來襲的風雨[29]。

閱讀四：白修德，《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白修德對戰時中國的分析，是英文抗戰寫作當中的經典作品。在當時，他是一個立場堅定的親共分子，深信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群推動改革的人士，而非革命分子。

儘管共產黨的敵人們醜詆他們的信仰，並且將所有超出其能想像的罪名，都加諸在他們身上，卻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共黨人已經造就出一項奇蹟。在過去六年當中，共產黨人由陝西貧瘠山區當中的各個根據地裡崛起，從東北到長江流域各地，都建立起他們的據點。在現代戰爭或政治的歷史裡，很少有任何的政治奇幻遭遇，能夠在想像或史詩般偉大層面上，與這樣的情形相匹配。這樣的偉業是由一群譜寫歷史、史冊留名的人所完成的，他們猶如推動歷史的工具，和農民一起，猶如他們正是書寫歷史的素材；他們深入每一個農村的幽暗之處，以他們的

意志和口號召喚出如此豐沛的權力資源，而這樣資源的存在，是國民黨和日本人所無法想像到的。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從長期使農村麻痺癱瘓的內部緊張當中釋放出來，從人民大眾的聰明才智當中得來，從勇敢無畏、堅毅不屈的農民身上得來[30]。

⊙相關電影

- 《鬼子來了》，導演：姜文，二〇〇〇年。

■注釋

1 在中文裡，沒有單一字彙可以表達兄弟關係，只有「哥哥」或「弟弟」（譯按：「兄」和「弟」兩個單字即可表示兄弟關係）。蘇聯將自己視為中國的老大哥，這是日後兩國關係轉劣的起源。

2 「玉」指的是中國；「石」則指日本。

3 就像任何在西方的將領一樣，這些將領在中國享有盛名。他們當中除了一位以外，全都是南方人，在長征期間來到北方。六人當中有四位（譯按：原文如此）在文革時遭到迫害。

4 引自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BC Press, 2008), pp.30-31.

5 Dagfinn Gatu, pp. 358-359.

6 Odoric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75-379.

7 Lincoln Li,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32.

8 在一九八〇年代掀起一場電影革命的影片《黃土地》，描述一名八路軍採集民歌工作者的活動，給予生動鮮明的圖像。

9 《廣西通志大事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232。

10 Harold Issacs: *CBI Roundup*, 1944. 艾薩克（Issacs）此時人在桂林附近，採訪美軍空軍基地被摧毀的新聞。

11 黃夢年，〈日軍進犯廣西〉，《廣西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1987），頁91-98；巢威，〈桂林焦土抗戰親歷記〉，《文史資料選集》，第十四集（1963），頁181-189。

12 曹福謙，〈湘桂黔大潰退親睹記〉，《文史資料選集》，第十四集（1963），頁191-197。

13 關於這場通貨膨脹危機，可參見張嘉璈的細節描述：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8).

14 Arthur Young, *China's Wartime Fiana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63-365. 一九四二年以後，法幣統歸中央銀行發行。

15 Krishna Menon, *Twlight in China* (Bombay, India: Bharatiya, 1972), p. 213.

16 彭天華，〈抗戰期間泉州的米荒及其黑幕〉，《泉州文史資料》，第十三輯（1982），頁55-56。

17 Young, p. 327. 物價在戰後的三年之間，又上漲了兩千五百倍。

18 Robert Payne, *Chunking Diary* (London: Hienmann, 1945), p. 99.

19 Young, p. 265.

20 張泉，《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史料與研究》（南昌：江西出版社，未標註出版時間），頁131。

21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35-138.

22 Ju Zhifen, "Labour conscription in north China," in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rz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18.

23 J. G. Ballard, *Miracles of Life: Shanghai to Shepperton*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第六章

戰後初期歲月

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

24 濰縣集中營裡的各種情況，可以在一本文字迷人的書籍裡見到。這本書籍是根據萊拉・艾克福（Lilla Ekford）的日記和食譜寫成的，艾克福被拘禁在集中營時，靠著寫出所有曾經做過的食譜，來緩解自己的飢餓。見Frances Osborne, *Lilla's Feast* (London: Black Swan, 2004).

25 Ng Wing Chung,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p. 44; and Judy Maxwell, *A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 Chinese Canadians deba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5.

26 見錢其琛，《華僑與抗日戰爭》（北京：1995），頁6。

27 「中共龍口市委黨史委」，《中共龍口市黨史大事記》（1990），頁84-85。

28 茅盾，原作刊登於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重刊於*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6), pp. 253-254. 譯按：據《茅盾選集》，卷11（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3）回譯。

29 Krisha Menon, *Twilight in China*, pp. 165-166.

30 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6), p. 201.

一個已經死滅，另一個卻無力誕生[1]

重大事件

八年對日抗戰和太平洋戰爭在同一天結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加速戰爭結束的事件並未發生在中國，卻發生在日本，在長崎和廣島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迫使日本政府投降。戰爭的結束來得突然，但是接下來日本軍隊的投降過程，卻非常緩慢，令人苦惱。

日本在華軍隊的正式投降儀式，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連續三個「九」——在南京舉行[2]。另一次受降典禮則於十月十日在北平舉行，這一天是造就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三十四週年紀念日（譯按：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日軍奉命不能向共產黨的軍隊投降，只能向國民黨的軍隊投降。逐漸地，國軍接收之前日本占領的地方。他們的到來，並不總是扮演「解民倒懸」的角色，受到地方民眾的期待（見延伸閱讀一）。受降相當費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以廈門來說，國軍部隊一直到十月三日才抵達。日本軍隊一直堅守各自的崗位，直到他們可以向國民黨投降為止，有些地方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才受降完畢。在香港，出乎許多中國居民的意料，中國軍隊根本沒有前來，而是由英國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恢復對香港的治理。

戰利品相當龐大。國軍部隊掌控了大量的日本軍用存儲，其中包括武器、卡車、馬匹、飛機、船隻、以及其他戰爭物資。在東北，蘇聯接收了日本的作戰裝備，並將其中一部分送給中共。日本軍人和政府官員的處理，完全由盟軍決定。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東京大審時以戰爭罪名上法庭受審，但是在名義上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昭和天皇，卻在暗中被刻意赦免了。

在八年戰爭結束的時候，許多中國人民都已疲憊不堪、精神沮喪，並且哀傷至極。在日本投降消息傳到的當天，在自由地區的很多城市裡，同時有多場自發的遊行，可是之後便少有活動來慶祝戰爭結束（見延伸閱讀二）。中國已經筋疲力竭，而戰後立刻要面對的問題卻如此巨大。戰後和平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不斷逼近的內戰陰影表明，軍隊不會遣散返鄉，軍事開支也不會減少。從前在工業、農業有高產量的東北與台灣回歸中國，並沒有在經濟上帶來振興的作用。相反的，在一段短暫的緩和期後，通貨膨脹繼續上揚；這對許多民眾來說，不啻是向他們表明，經濟上的不幸悲慘局面，還要再延續下去。

國民黨政府並沒能在這次戰後立即的災難餘波當中置身事外。對於戰後的局面，政府似乎欠缺準備，而且沒有信心。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抗戰歲月，政府對於戰後初期的這幾個月，卻少有輪廓清晰的計畫。對於勝利的到來，政府彷彿十分驚訝，因為它本來已經慢慢相信，這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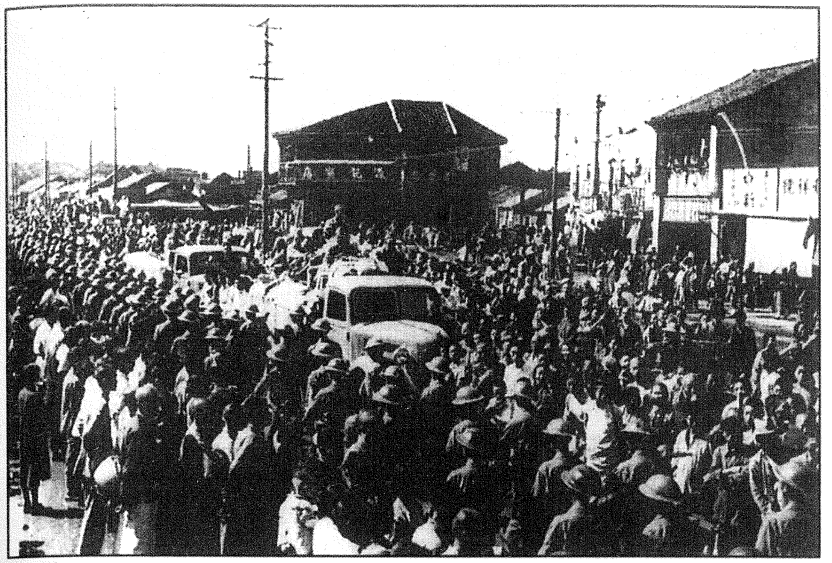


圖6.1　南京市民歡迎國軍（《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圖錄》，台北：1995。）

爭會永遠進行下去。

在中國自由地區，頭一波議題是到後方避難的民眾要回鄉，也就是他們期盼已久的「勝利東流」。實際上，所有在一九三七年時西遷的人們都決心要東歸；他們對於四川沒有太多留戀，對於這個讓他們容身的省分，也沒有什麼感謝之情。除此之外，在更北邊、西邊和西南面，還有數百萬的難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底估計，在抗戰勝利時有四千二百萬人遠離家園，用一句簡單扼要的成語來形容，就是「流離他鄉」。大部分的難民必須靠自己想辦法才能回到家鄉。政府設立各種組織，協助民眾返鄉；但是到最後，這些組織所能協助的民眾，人數少於兩百萬[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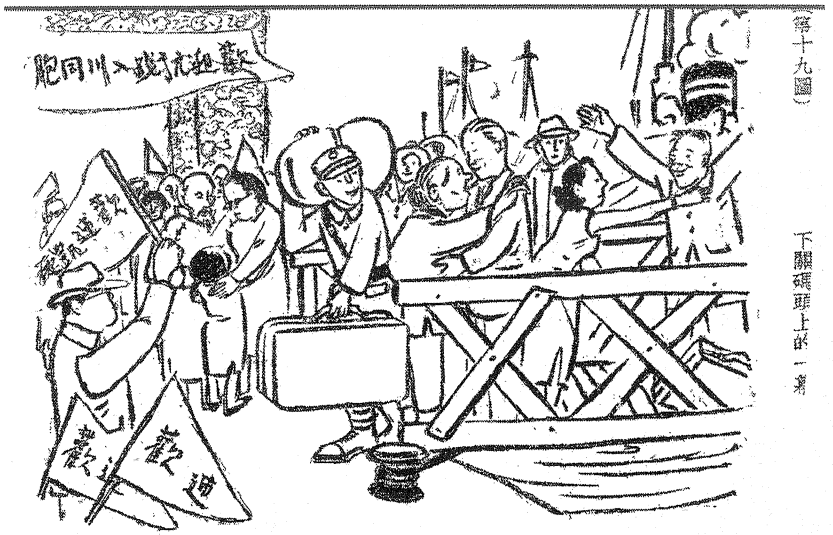


圖6.2　慶祝勝利（張恨水，《八十一夢》，1946，頁269。）

對於許多難民來說，他們已經無家可歸。黃河中下游流域受到洪水氾濫的地區，大部分都已經不適合居住；華北那些居民與村落都被清空成「無人區」的地方，也無法提供人們居住所需。在這些土地被開墾之前，逃避戰禍的農民都沒辦法返鄉。他們正是受到抗戰影響、長期流離失所的數百萬民眾當中的一群。

在大部分的原日本占領區裡，日本人的離去是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的事情，不過在某些已經被日本統治很久的地方，這樣的情況要打一些折扣。在東北，日本人在這塊土地原來的殖民者俄羅斯人（現在是蘇聯紅軍了）到達時飛快離開。滿洲國的傀儡皇

帝溥儀則沒能逃走；他遭到蘇軍逮捕，被送往蘇聯[4]。東北的經濟隨著日本人的撤離而宣告崩盤；工廠與礦場關閉，數十萬來自華北的勞工移民失去工作。蘇聯紅軍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洗劫了許多工業設備，奪去大量東北的工業生產能力。

台灣是大陸中國怒火宣洩的目標。日本人的離去，宣告其五十年殖民統治的結束，這段時期比起大多數民眾的一生都還長。台灣幾乎完全和中國隔絕，而台灣人也被初來乍到的大陸人看作是敵方陣營的外國人。戰後台灣經濟的各種效應來得既快又帶有破壞性。台灣人在政府機關、教育機構、軍隊和治安機關裡，立刻就丟掉工作職位；這些職位要不是被撤銷，就是給了剛從大陸過來的外省人[5]。日本與台灣之間原來的經濟聯繫現在斷絕，導致在這個原先以農業生產支援日本的島嶼上，有更多人失去工作。經濟上的損失導致社會嚴重的動盪和瓦解，並且在戰爭結束後一年多的時間，就於一九四七年二月爆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暴動（即二二八）。這場暴動遭到嚴酷的鎮壓而平息。這在台灣人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憎恨、疏離、以及憤怒。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可以說就是起於二二八事件，不過還要再等上四十年，才能見到台獨運動的公開活躍。

中共在戰爭結束時展現出的強大實力，比起抗戰剛爆發時，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雖然在華北，共產黨沒有掌握任何一座主要城市，但控制了大部分的北方鄉村地區，並且在北方和西北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它至少能在國內的部分地區和國民黨政府爭奪權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事。中國絕大部分的民眾——還有中國的盟邦——都盼望雙方能夠像一九三七年、

抗戰爆發之前結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那樣，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以華麗的詞藻，將自己說成是「為中國帶來和平之子的助產士」，來華阻止內戰爆發（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任務卻告失敗。和平在國共雙方的冷酷與執拗當中苦苦掙扎。就在馬歇爾懷著滿心厭惡的情緒離開中國時，內戰的烽火已經燃起。

這就是抗戰結束之後的嚴峻局面。政治和軍事控制上的各種新議題，將抗戰帶來的各種損失傷亡都推到第二順位。但是它們仍舊存在，而且規模鉅大。

主題與案例研究

戰爭傷亡

兵連禍結

Ravaged by incessant warfare

在抗戰勝利後的初期階段，戰時民眾生命的大規模傷亡情況逐漸變得清晰，不過實際的死傷數字則不然。關於抗戰的傷亡數字，有各種統計出版，但是這些統計數字通常都片面、模

糊，並且不可靠。以整個國家而言，戰時死亡的統計數字，從兩千萬到三千萬都有，這其中包括軍人和平民百姓，都被廣泛的列舉在內；這些數字實在是太過巨大，以至於讓人們幾乎難以理解。根據官方在一九四七年時所作的統計數字，中國的總人口比起戰前於一九三六年時的最後一次普查，有了大幅減少；一九三六年時，全國總人口數是四億七千九百零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在一九四七年，則為四億六千一百萬六千二百八十五人[6]。由統計人口時的情況來判斷，幾乎可以肯定這些統計數字並不精確；不過兩相比較，確實可以看出人口減少超過一千八百萬。考慮到戰前人口急遽的成長，這樣的減少規模的確非常驚人。

這個巨大的傷亡數字，是隨中國廣大人口規模而出現的產物。不論在戰時或在承平時期，中國的各項人口數字總是非常巨大，其規模之浩大，已經到了看起來幾乎不真實的程度。下列的各項數字，全都來自一個單獨的省分，比較容易使人們理解。在廣西省，戰時的死傷將近一百萬人，幾乎占了全省人口的十四分之一，見下列表格[7]。

廣西戰時傷亡統計：

	戰時傷亡人數
被敵人殺害的平民百姓	211,080
軍人死亡	超過500,000
疾病死亡	282,256
受傷	433,823
失蹤	58,456

廣西的悲劇，在於發生時間密集。該省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死亡，都發生在抗戰的最後十一個月，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之間。就在這同一時間，大批廣西的公共建築、橋梁和道路都遭到摧毀，有些是被敵人的空襲炸毀，也有些是毀在自己人預先堅壁清野的破壞行動當中。

軍隊方面的傷亡統計數字，比平民傷亡的統計要來得清楚。根據官方的統計，在八年抗戰之中，死亡或受傷的官兵大約有四百多萬人——不過，這項統計只將列名於正規軍的人數計算在內，因此會遺漏很多輔助作戰的人員，例如非正規部隊，以及地方民兵游擊武力的傷亡[8]。平民百姓的傷亡統計數字，就沒有那麼可靠了。沒有詳細的統計數字。在抗戰期間，國內的混亂局勢意味著在政府和中共雙方，都無法繼續從事統計資料的收集工作；在日本占領區，有些地方作了若干統計數字，其他地方則否。有一項統計的來源正在消失之中。直到今天，來自日本方面的傷亡統計數字並不多見；沒有一個日方的統計數字，能夠和納粹所作的、能夠全面顯露猶太人大屠殺恐怖的詳細統計數字相比。

中國在軍事上的傷亡數字相當驚人，程度和規模可以和許多歐洲國家在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死傷相提並論。除了三個世紀之前滿洲人入關造成的死亡差堪比擬之外，官兵在抗戰時死傷的規模遠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前例。人們心中對這些傷亡的哀慟，在當時沒有任何管道可以表達出來。對於戰死的官兵，公開的追悼活動不多，追思儀式——或者之後的紀念活動，就更少了。很少歷經戰陣存活下來的士兵獲頒勳章，獲得賠償撫卹的遺孤寡婦人數同樣也很少。在整

個抗戰過程當中，在那些被認為有資格獲得撫卹的死傷士兵家屬裡，實際上真正領到賠償撫卹的人，不到全部人數的十分之一[9]。

人們在看到這樣慘重的傷亡規模時，不應該產生一種冷酷或惡意的認定，認為既然有如此大規模的死傷，便使得個人的損失變得沒有那麼重要，或者像史達林（Josef Stalin）那番令人不寒而慄的可怕評論：「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就是統計數字。」對於百姓死亡的無情麻木，向來就是中國歷代執政者思考模式的特色，對於人口的大量損失，他們通常都無動於衷[10]。可是在民間，每一個在這場戰爭期間死去或失蹤的人，都有家庭和親人，而他們的死或失蹤，都會有人為之心痛。只要這些人的家庭還有人活在世間，這種痛失親人的感受就永遠不會消失，因為死者會在世代排序和家人彼此間的稱謂裡繼續存在。這種情況在男性之中尤其明顯。就算是「老大」（長子）死了，他的弟弟們會永遠是「老二」、「老三」和「老四」。中國以外的其他任何社會，都更有可能對各個為人子者的死去感到漠不關心。

婦女和女孩如果死去，按照傳統不如男性那樣受到哀悼。婦女只可能在她們出嫁的婆家裡受到悼念，而不是在她們出生成長的娘家。對年輕婦女的追悼可能會流於敷衍。年紀較長的女性則是例外——只要她們身為母親。沒有任何社會比起中國更加敬愛母親，而失去母親則是為人子者的巨大悲痛事件，哀悼的時間會延續甚久。在舊帝制時代，官員們如果逢雙親其中一人之喪，必須離職丁憂兩年，以表哀思。

在經濟層面上也能感受到失去家庭成員帶來的影響。在戰爭結束時，許多農村地區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這個時候，舊社會體系底下親戚間互相依存、互相幫助的需求，就急遽的提高。家族必須繼續照顧族中死者遺留下的親人。隨著勞動力的減少、沒有外來的援助，如何獲取足夠食物以求溫飽的問題，在戰後變得嚴重起來。

平民百姓喪失生命很少得到公開討論的機會，不論是在新聞媒體上，或是在政府機關裡，都是如此。在抗戰勝利後的初期階段，想要確定誰已經死亡，而誰只是行蹤不明，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之內，隨著出外躲避戰禍的難民回到家鄉，有些失蹤者重現身影；但許多失蹤者卻沒有現身。於此同時，沒有傷亡名單，沒有給家屬的電報，也沒有正式的書面通知。

流離失所　在抗戰結束的時候，高達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國民眾，都曾經在抗戰的某個階段被迫出外逃難，見下頁表格[11]。

從表格中的數字裡很多都是整數可以看出，這只是粗略的概估。總數的人數也不是當時所有人口的精確比例；有七個省份沒有被列入表內，那些位於後方的省份（例如：陝西、四川、貴州、雲南、西康和新疆）並未產生任何難民。上面這份表格裡，無疑的包含了逃難不只一次的人們。但是，即便有這許多可能招致誤解之處，表格所呈現的數字仍舊極高，令人驚駭。難民比例顯示出戰事的激烈程度，與焦土政策造成的影響。難民占總人口數比例最高的幾個

省分與城市，都是那些戰事進行最密集的地方（例如：武漢、湖南、山西、江蘇等），或者是直接受到堅壁清野破壞所影響的區域（特別是河南）。

物質損失

中國在抗戰期間遭受的物質損失，相當鉅大。不過，在

抗戰期間難民人數：

省份／城市	難民人數	占人口百分比
武漢	534,040	43.56
河南	14,533,200	43.49
湖南	13,073,209	42.73
山西	4,753,842	41.06
綏遠	695,715	38.20
江蘇	12,502,633	34.83
南京	335,634	32.90
山東	11,760,644	30.71
湖北	7,690,000	30.13
河北	6,774,000	23.99
浙江	5,185,210	23.90
廣西	2,562,400	20.37
北平	400,000	15.45
上海	531,431	13.80
廣東	4,280,286	13.76
安徽	2,688,242	12.23
東北	4,297,100	12.12
察哈爾	225,673	11.08
天津	200,000	10.00
江西	1,360,045	9.55
福建	1,065,469	9.25
總數	95,448,771	26.17

中國的大城市裡，因為戰爭而遭受的破壞蹂躪程度，要低於日本、德國，或者蘇聯境內的都市。位在自由中國境內的城市受到轟炸，占領區裡的城市通常未受波及。淪陷區裡的各項基礎公共建設，在戰爭爆發之初遭受破壞摧毀者，到了戰爭結束時大都已經修復，侵略者通常是出手修復的那方。而日本人還在工業和礦業上留下大量的投資，範圍超出戰爭物資，不過很快的，他們就將這些設備投資都棄置在中國，位於東北的工廠被拆除，機械設備被裝船運往蘇聯。日本軍隊還留下某些相當不受歡迎的武器，化學武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們被存放於滿洲各處，在戰爭結束時掩埋起來。戰爭結束六十多年後，這些不為人知的掩埋地點仍舊引發人們的焦慮，偶爾還會造成民眾的傷亡。

許多歐洲國家的歷史古蹟和建築，在大戰期間都受到嚴重的破壞，中國的古蹟建築並沒有遭受到同樣的命運。絕大部分中國的國家地標建物——例如長城、紫禁城、天壇等，都能逃過戰火的摧殘。在被占領的北平，明清時期的宮殿建築群很少受到破壞。日軍占領南京，引發了一場大屠殺，有許多民眾死亡，不過這座城市裡的古蹟地標，卻沒有受到摧毀。放眼全國各地，在抗戰之中遭受破壞的大廟宇佛寺，數量並不多。但是有許多珍貴的文化寶藏在抗戰期間消失無蹤，它們要不是在空襲轟炸當中被摧毀，就是遭人偷竊；事後回顧，這些損失都被看作是對於中國文化結構的攻擊。

數量最為龐大的損失，首推書籍和毛筆抄本原稿。第一波文物的浩劫在一九三二年來臨，當時日軍進攻上海，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付之一炬；與商務印書館同樣遭災的，是近代

手稿抄本的珍藏。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這段期間裡，超過二千萬冊圖書文物從公家圖書館、大學和私人的收藏當中消失，它們如果不是因為其含有「反日」內容而遭到銷毀，或在轟炸中焚毀，就是被人給偷走了。其中半數文物被認為是「重要或極具價值」[12]。價值最寶貴的是儲存中國文學寶庫、《四庫全書》存世的四套抄本之一，從瀋陽被運到東京。

最知名、並且最具神祕性的損失文物，就是「北京人」的化石骨頭。一九四一年下半，它在北平消失蹤影。為了它們的安全著想，這些化石人骨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研究單位被移往美國使館存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海軍陸戰隊奉命將這些化石人骨帶離北平，以船運離開中國。它們被載離海岸，但是之後就告失蹤，這些化石的下落有種種可能：船隻意外沉沒、被帶往日本、被帶往紐約，或是被埋藏在中國西部某處。尋找「北京人」化石的行動，至今仍在進行。另一個慘重的損失則屬次要性質。二十世紀初，德國探險家亞伯特・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新疆吐魯番洗劫的佛教壁畫，算是中國已經失去的珍貴文物。在大戰末期，它們在柏林受到空襲轟炸時，遭徹底摧毀。

其它的藝品文物則被保全下來。故宮裡收藏的珍寶：畫作卷軸、青銅器、陶器和玉器——在一九三七年時被裝成數千只箱子，裝船送往內陸[13]。這些裝載著文物的箱子被存放在洞窟和寺廟之中，度過整個抗戰的歲月。抗戰勝利後，它們重返南京，而最終被運往台灣，構成現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品的主體[14]。一九三〇年代在河南安陽挖掘出土的商代（中國信史當中第一個朝代）古器物，同樣也獲得保全。三百只裝滿這些銅器、玉器和甲骨文的木箱，於抗戰

爆發時被運往四川。這批文物最後也到了台灣，被存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一項損失則要到了六十年後才會浮現：日本人在安陽建了一座小型機場，結果這座機場有部分是蓋在商代都城的遺址上面。由於這座機場仍然在使用，當代的考古學者還沒有辦法在那裡進行挖掘。

私人的財產與所有物的損失相當之鉅大，而且大部分都沒有紀錄留存。最嚴重的損失是由轟炸和焦土政策所造成的。其他的損失則是戰爭爆發時逃難的人們放棄的財產，或者是交託給親戚或友人的產物。想要以數字來衡量這大部分的損失，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們的規模極為龐大、難以計數。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時期，不可能以鈔票的面額來估算財產的價值，更別提用鈔票來確認，這些財物是否真的損失。丟失的財產很少能夠挽回；在八年過後，失主很難再找回原有財產，或者即便找到了，也難以取回。在占領區內被日本人徵用的財產，於戰爭結束後被當成「敵人產業」充公，並未歸還原主。對於這些財產損失，很少能得到賠償，這是因為在當時，中國家庭投保財產險者相當少見，而就算那些有投保的家庭，可能也因為戰爭屬於無法理賠因素，而拿不到賠償。人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損失——他們心中或是無奈順從，或是悲憤痛苦。

四十年以後，在中國於一九八〇年代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開始「落實政策」，補償個人損失；許多人試著取回在抗戰時、或是在共產黨統治初期所失去的財產。有些人成功了；其他人則未能如願。[15]

無論財產的損失多麼巨大，它們所帶來的痛苦，仍舊無法和失去家人朋友相比。在戰爭結束時，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和家人、朋友最終能夠有團圓重逢的一天。

重返故鄉和家人團圓

在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大批原來向西逃避日本人侵略戰禍的人們開始回流，也就是所謂的「勝利東流」。許多家庭在整個抗戰期間被拆散分開。當戰事仍在進行時，這樣的分離看似永無止境；沒有人知道戰爭會在何時結束。一旦戰事結束，人們開始盼望能再次見到他們的親屬。路途交通的問題實在太過繁雜，以至於這樣的希望仍舊渺茫。

返鄉的路途不像當初逃離時那樣混亂動盪，但是仍然十分的艱難險阻，這是因為運輸工具相當缺乏的緣故。由四川走水路返鄉的行程，因為長江冬季水位降低而受到耽擱。當時除了船運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能搭載大量的人回到南京。這時候是國民黨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還都南京的九個月前。那個月，在中國出生的加拿大籍外交官切斯特．朗寧（Chester Ronning）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張離開重慶的輪船票。當他前往登船時，輪船這時停泊在長江江面上，登船時的混亂場面讓他深為震驚，尤其是因為乘客們都是些有辦法的人，才能拿到手上這張取得難如登天的船票：

> 在輪船四周聚集了幾十艘舢舨，每一艘上頭都擠滿了人和成堆的行李。乘客們用繩索將他們自己和行李綁在一起。在每層甲板，船上的親戚高聲呼叫，指引船下的親友。隨著每艘舢舨把行李清空裝船以後，人們開始在繩索和家人伸出手來的幫助之下，爬上這艘已經擠滿了人的輪船甲板[15]。

有些計畫周詳的人，決心繞遠路以避開長江水路上的擁擠困境。余家一家人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從成都回到南京；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底離開溫暖的四川，搬回冬季寒冷的地帶。他們往北取陸路到隴海鐵路，接著搭乘火車往東抵達徐州，然後才往南來到南京。走陸路的這一段，他們乘坐騾車，有一段時間，還搭了一輛軍用卡車的順風車上路。他們和其他許多民眾不同，由於他們的父親在南京神學院任職，所以有一些經濟收入（美金），所以他們的旅途相對比較「平順」一些[16]。

和家人與同事友朋團圓重逢，通常很溫暖，但是八年時間過去，在家庭關係和周遭各種環境上，都有重大的改變發生。抗戰後中國電影界推出的第一部院線巨作，是在一九四七年上映的《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部電影說的就是一位盡責勤奮的妻子，和她那放蕩丈夫的不幸重逢；妻子在抗戰時留在東邊，而丈夫則在戰時功成名就，生活變得腐化。這部電影大為賣座，是由於它拍出了家人重逢時的種種艱難，在當時已經歷過這麼多破壞與離散的社會，電影裡的情節絕對不是特別罕見。

戰爭時期的離別，塑造了家庭的結構。李約瑟（Joseph Lee）於一九四〇年在香港出生，他

的父親是位海員，隔年出海後一去就是九年，隨著輪船「藍煙囪」號（Blue Funnel Line）在世界各地航行，這艘船先是載運軍隊，之後則搭載難民。李父在這段時間裡幾乎完全和家人斷了音訊，而李母此時到澳門避難，她在那裡擔任教師，認定丈夫已經死了。李父回來以後，全家人才又團圓，而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法蒂瑪（Fatima），就在一九五一年出生[17]。

但是對很多家庭來說，並沒有團圓的一天。對他們而言，這波返鄉潮證實了一個他們在戰時歲月裡逐漸明白的哀傷領會：離他們而去的親人不會再回來了，甚至連他們的遺骨也可能找不到。方振武原來是一位知名國軍將領與抗日活躍分子，他因為與國民黨領導階層起了衝突，被迫流亡香港。一九四一年底，他在神祕的情況下突然失蹤，幾乎能夠確定是被國民黨特務人員暗殺。戰爭結束後，他並未再次現身，他可能還在人間的最後一絲希望也隨之破滅。方的家人必須接受他已死的事實[18]。

取回死者的遺骨是一個令生者痛苦的問題。在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強有力的習俗：一個人如果在外地過世，家人必須盡全力將他的遺體帶回家鄉安葬，就算只剩下骸骨，也得帶回家鄉。在戰爭結束時，有數百萬人失蹤，這些人裡有的還活在人世，但是卻音訊斷絕，其他人則已經不在人間。他們的親屬苦無方法，可以紀念這些幾乎可以肯定已經離世的人。在英國，人們找到了一個方法來紀念這些最後歸宿不明的人：「無名士兵之墓」（Tomb of Unknown Soldier）。埋骨在這座墳墓裡的人，是一名身分未得證實的士兵，墓碑上的銘文寫著「只有上帝知曉（他的身分）」。他象徵所有已經死去的失蹤者，並對於那些家中子弟沒有得到安葬的家屬而言，提供某種程度的撫慰。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可以撫慰已死者的親人。

返回華東諸城的接收者　在抗戰結束後的幾個月內，隨著難民返回華東的各個大城市，對於那些留在占領區、接受日本人統治的人們的惡感，就此浮上檯面。這些留下來的人看來不具愛國情懷，實際上幾乎是可鄙的。而這些人本身通常也害怕那些從後方勝利還鄉的人，在經過八年身處內地的歲月之後，內心會感覺很不是滋味。勝利還鄉的人想要拿回他們失去的一切——而對那些留在日本占領區、過著比較舒適生活的親戚朋友，他們並不怎麼抱持著寬恕慈悲的心腸。有些後方回來的人，想將鬱積了八年流亡後方歲月的怒火，發洩在那些留在淪陷區家鄉的人們身上。不少人在抗戰初起時離開，但是有更多的人留了下來，而且逐漸的將那些離開者的房子、財產和職位據為己有。在這些大城市裡有若干地下抗日運動存在，可是規模都不大，不足以令日本人感到困擾。

在香港，那些出走的人其實就待在附近——廣東內陸或是澳門。戰後，他們很快就返回香港，並且重拾舊日生活。英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本來關閉的機構又重新開張，而生活繼續下去。從這些人共同的態度看來，戰爭已經被遺忘。

在上海，情況更加複雜。在勝利還鄉的人們眼中，上海是匯聚富庶繁榮之處。上海是抗戰第一場衛國戰役爆發的地點，但是參加這場戰役的人們，要不是已經死去，就是撤退到後方去了。現在，幾百萬上海市民，無論是戰時留下來，或甚至是出逃到其他地方去的人，全都緊

張的屏息以待。他們這麼做是對的；上海幾乎被當成是一座被攻克的城市，從大後方勝利回歸的人大舉入侵。有些初來乍到的人本來就來自上海，他們不但想要收回原來屬於自己的財產，更想要奪取那些本來不屬於他們的產業。接著，是一群原來與上海並無淵源的人。這些以勝利者自居的人，以官員和軍官為首，將一切他們看上的房屋、汽車和其他產業盡行沒收。胡素珊（Suzanne Pepper）描述處在被接收一方的人們，是如何看待這樣的過程：

> 中文「接收」一語是中性的，其涵義絲毫不超過接受或收到。但隨著民眾不斷經受國民黨的接收，表示洗劫和明奪暗搶的同音異義詞（漢字各不相同）就替代「接收」而流行起來[19]。

這種接收演變成「劫收」的情況，最劇烈、嚴重的地方，莫過於台灣。頭一個階段，是徵收和處分日本的產業：數萬幢房屋、農耕用地，當中約百分之二十的產權，原來在日本人手上；另外還有學校、工廠、政府建築和博物館等。這些日本產業，有許多都位於台北市中心區域，那裡有不少在日本殖民時代興建的建築，其各種風格，從希臘古典到法式城堡都包含在內，至今仍可看見。日本產業被當成戰利品徵用，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將台灣人的財產沒收充公，這麼做的根據，是認為台灣人昔日和敵人站在同一陣營。這樣「劫收」的過程，滿足了從大陸來台的接收者，卻讓台灣人感覺他們是遭到再次占領，而非光復[20]。

永遠的別離　許多家庭並不知道，他們的親人還活在人間，只是無法回到家鄉。這些家庭離散的時間，比抗戰還要長得多。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這些人無法回到家鄉。國民黨的追隨者，或是舊社會菁英階級的成員，對於回到已經處在中共控制的農村地區故鄉心存恐懼。儘管這時候的中共還披著改革者的外衣，土改已經在若干受到其控制的地區展開，而回到家鄉的人，現在可能會被劃歸為階級敵人。在此同時，家鄉位於南方的中共支持者，主要都是「長征」的革命老幹部，他們在戰爭結束後不能回鄉，以免被貼上「共匪」的標籤；逐漸逼近的內戰，讓上述的擔憂成為現實。這些人至今已經離開家鄉至少十一年了。某些共產黨人（當中最有名的就是鄧小平）則從來沒有再回過家鄉。

對於大部分的國軍士兵而言，戰後仍然不能返鄉；許多人就此永遠和他們的家人分開。在抗戰結束以後，國民黨立即開始調動大批部隊回到華東，並且北上前進東北。對少數士兵來說，大軍重新部署調動，讓他們得以跟著自己所屬的部隊回到家鄉[21]。但是，對大多數的士兵而言，抗戰的結束不過就是延長他們和家鄉分別的時間罷了。廣西部隊從一九三七年下半開始出省參戰，到這個時候已經離鄉八年之久。現在，他們和家鄉分離的時間又被延長。分別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當時是內戰的尾聲，有數十萬桂軍士兵逃回家鄉，而人民解放軍則在他們身後緊追不舍。這些人被叫做「國匪」。而這些昔年的對日抗戰英雄，要不是被殺害、監禁，就是被送到勞改營裡，接受「再教育」[22]。

一九四九年，大部分的國軍都已經隨著國民黨撤往台灣。他們無法返回家鄉，只好不情願

的落腳安頓下來，通常是住在日本人廢棄的軍事營區裡。有些人娶了本地女子為妻，他們大多沒有告訴妻子，自己其實在大陸上另有家庭。三十年過後，在回到中國大陸探親逐漸成為可能——和被留在大陸上的家人令人不愉快的重逢團圓，也變得逐漸有可能時，夫妻之間就開始互相指控、爭吵了。在白先勇的小說《台北人》裡，對於這些老兵有同情悲憫的描繪，而他筆下這些老兵的形象，必定是來自於他父親（白崇禧）麾下部隊士兵的生命故事。

身在海外的華僑，於抗戰期間和人在家鄉的親屬斷了音信。少數來自家鄉的消息傳到他們耳中，但是不足以讓海外華僑與國內家屬保持密切聯繫。現在，逐漸逼近的內戰陰影，讓身在海外的人返回國內，成了一件危險的事。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與整個世界隔絕，海外華僑同樣也有家鄉而歸不得，因為這些人當中，很多都是頑固堅定的反共分子，除非透過祕密管道，否則他們不敢返鄉，或是和他們身在國內的親人聯絡。

上述這些長期的家庭離散，都是抗戰重創中國社會的跡象。那麼，問題就在於這樣的傷害是否能夠彌補挽回——並且，在不久的未來，是否會對那些侵略中國、或者是為敵人效勞者，進行追究問責。

漢奸處置、社群重建

抗戰甫結束，對於那些與日本積極合作的人，究竟是否會受到懲罰，還是會逃過究責，沒有人能十分肯定。有些主要的漢奸人物，被提解上法庭受審，當中好幾位被判處死刑。幾名汪精衛的親信僚屬如周佛海、褚民誼、以及陳公博，下場就和在汪精衛的南京政權之前成為漢奸的梁鴻志一樣，都被處死。汪精衛的遺孀陳璧君則被判處長期徒刑。不過，在這些審判之外，政府對於如何處置情節較為輕微的漢奸，則似乎沒有一個清楚的政策。可是，有一件事情卻顯得很突出，那就是官方追究、報復漢奸的規模，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23]。

這種令人困惑的混亂情況，背後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人心普遍厭戰的心態；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人們已經意識到，另一場戰爭此刻正在醞釀成形。國民黨這邊需要所能找到的一切人力，以重建戰前的經濟和社會局面。中共也有同樣的人力需求，因為黨的組織正在華北各地擴張勢力。於是國共雙方都情願不去計較人們在戰時的活動，只要這些活動不要太過劣跡昭著就行。接下來是人數規模的問題。戰時大批生活在占領區的民眾，他們做出妥協、艱難度日，並且向敵人低頭表示順從；想要統計出這些人的總數，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農村地區，對漢奸的處置通常不會動用到法律體系或正式審判。在中共的根據地，共產黨人正在嘗試一種懲戒漢奸的新形式；透過「清算」的過程，人民群眾得以審判和占領當局合作過的人。由於這些通敵者通常都是地方菁英階級的成員，這種清算過程於是又混雜了階級鬥爭的成分在內（見延伸閱讀二）。

在一個特別的層面上，所有留在占領區的人們都受到懲罰——而這種懲罰指的就是淪陷區貨幣的處理方式。在各個日本占領區使用的貨幣都必須兌換成法幣。兌換的過程是一團混亂，根本沒有標準的匯率，但是結果通常都一樣：官方設下的兌換比率表明，淪陷區的貨幣形同廢

紙。這個爭議在香港和台灣目前仍然存在；老一輩的人們還收藏著當時的鈔票和銀行存摺，證明他們曾經擁有的金額。在他們心中對於求取賠償的希望，仍然沒有消滅。

社會與經濟重建

百廢俱興
Picking up the pieces

在抗戰結束時，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都處在非常惡劣的狀態之下。社會裡有些部分已經完全遭到毀壞，其他的部分則嚴重受損；只有在少數地區，社會型態還能保持相對完整。經濟已經處在瀕臨徹底崩潰的狀態。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而在某些地方，很多人接近餓死，這種情形，在那些被家人遺棄的人當中特別嚴重。

經濟復甦與社會重建的需求規模非常巨大——但是在國民黨這邊，對於該如何重建，沒有任何解決之道。政府雖然制定了若干重建計畫，可是這些計畫完全無法使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準。相反的，經濟的復甦與否取決於社會的新結構，因為經濟是在這種新社會結構當中發揮功用的。而通貨膨脹已經劇烈的改變了人們的經濟能力。

社會和經濟的新階層　抗戰最後幾年的通貨膨脹，促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階層產生了劇烈的重組。在這個社會體系的頂端，有極少數的人比起戰爭爆發以前還更加富裕，這些人分別是資深政府官員、軍隊將領、以及某些生意人——由於政府要確保他們的效忠，而施以援手，讓他們全都免於受到通貨膨脹的打擊。這些人心中念茲在茲的考量，主要是獲取金錢以照顧自己和家人。他們想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是毫無疑義的，而從這個方面上來說，他們同樣也想要阻止通貨膨脹的繼續惡化。

戰前被視為中國現代化希望所在的商人與企業家集團，現在發覺他們除非和國民黨有密切關係，否則都已失去權力。他們沒有辦法重新回到戰前的地位。經濟上的通貨膨脹與政治上的動盪不安，使得他們難以恢復戰前的事業。那些努力想挽回昔日版圖的商人，都因為種種極端不利的惡劣條件而遭受打擊，其中包括國際市場的狀態，還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從大戰造成的破壞當中復甦。無力出口產品到國際市場，使得沿海城市的許多輕工業企業為之癱瘓。有些企業家另覓他途，找尋更適合做生意的地點，他們逐漸將旗下所有（或部分）的事業轉移到香港。

在經濟階層光譜的另外一端，工人與按日計酬的勞動者，情況幾乎沒有改變；他們按日領取酬勞，通常或多或少會根據通貨膨脹而有所調整。和戰前的情況相比，這些人和住在城市、鄉鎮近郊的農民，在經濟方面來得更好過一些。生產蔬菜、肉類、蛋和油，銷售到城裡市場的農民，總是能夠躲過通貨膨脹的影響。那些沒有往城市銷售產品的農民，要不是在食物上能夠自給自足，就是陷入他們一貫的貧窮狀態當中，通貨膨脹與他們沒有關聯。

那些真正受到通貨膨脹打擊的人，是原先過著好日子的一群：專業人員、領取固定薪資的勞工、以及知識分子；現在他們陷入極度擔心受怕、幾乎貧窮匱乏的狀態。他們的收入來得很慢，通常是按月領薪；因此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個悲慘的社會中間階層，本來一度是萌芽發展的中產階級，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希望，在戰後的初期幾乎完全被國民黨政府所遺棄。由於這些人原來是國民黨最大的支持群體，這個損失十分關鍵。

有些專家認為，戰後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和中國的人口規模密切相關。「戰爭時期所帶來的徹底動盪與破壞，是施加在一個範圍更加廣泛、程度更加深刻、持續時間更加久遠的不安定局面之上。中國各項經濟問題的根源，都是起於人口眾多、資源稀少的巨大壓力。[24]」然而，既然經濟災難最明顯的徵象，就是戰爭所引發的通貨膨脹，想以這種長期、幾乎是深奧難懂的解釋路徑來詮釋當前的苦難局面，是很困難的。

消失的菁英　舊時鄉間社會的菁英分子的地位，因為抗戰而受到損害；在這場戰爭到了尾聲時，這些人想要重新恢復他們戰前的地位，算是難上加難。那些逃難在外的人，在戰爭期間飽受經濟上的損失，而且也無法完成他們照看桑梓的各種職責。他們在抗戰期間已經被人取代，取而代之的人，或是由日本人所扶植，或者是那些「被人民群眾推舉出來」者——換句話說，就是受到中共安插、任命的地方人士。中共的農村幹部在戰後並沒有被排擠成邊緣角色；他們已經組織起民眾，提升他們的政治意識，並取得地方上的領導權。舊社會的地方菁英成

員，索性放棄返鄉，許多人就真的沒有回到家鄉。那些留下來、並且和日本人合作的地方頭臉人物，不管他們和日本人合作的程度是高或是低，在日本人離去以後，他們的地位都陷入極其悲觀的境地。這些人不但失去了原先的後台，而且也無法履行傳統上在地方應盡的義務。他們受人鄙夷，並且遭受唾罵。這些地方頭臉人物丟盡了顏面，或許能夠說明他們的農民鄉親為什麼會在土改期間，願意站出來攻擊他們。

某些人數較少，但是一度手握權勢的菁英族群，也在這場戰爭期間遭到徹底的打擊和摧毀。許多滿族人士在抗戰時期熱切的為日本人效勞，享受這段他們權勢復歸的時光，猶如昔日身為清王朝統治族群的一部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被打回原形，名聲掃地。許多和日本人關係密切的滿人都遭到逮捕，並且受到監禁。社會地位沒那麼遭受危害的滿人，不斷嘗試要隱藏他們的身分，並且更換姓名。演員英若誠的家人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一直等到一九八〇年代，在比較開放的新氣氛之下，他才敢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同事們承認，自己是個滿人。

西方人是另外一個喪失昔日地位的菁英族群。戰爭的結束，顯現出這些原來高高在上的西方人，地位遭到這場戰爭傷害的程度。白人的優越性那種神祕不可言說的氣質，已經在日本人的集中營裡被打破了，而除了在東北的蘇聯人和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美國人之外，白人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已經宣告結束。被日本人沒收的外資產業和生意並未歸還，白人強權在中國只剩下兩個堡壘，那就是香港和澳門這兩個殖民地。

經濟重建：黃河回復舊河道　黃河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鮮明的象徵之一；無法管束好這條大河，就是一個政府即將喪失「天命」（統治權力）的跡象。在日本人撤離以後，再次重申對於黃河的控制，並且修補一九三八年花園口決堤所造成的大量動亂與貧困，對國民黨而言至關緊要。政府下定決心，要「堵口歸故」。堵截黃河決口這項任務，被看作是政府還都南京以前的當務之急；它被列名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gency）在中國進行的主要計畫當中之一[25]。

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有一萬名工人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監督之下，將寬達一公里的黃河決口合攏堵上。在山東黃河舊河道沿線修復河堤的工人，數目更為龐大，達到二十萬人之眾。上述工程的總花費被列舉在冊的，高達五千九百二十億元，這是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數目，不但反映出工程的鉅額開銷，同時也表示通貨膨脹的不斷盤旋上升[26]。

這項事業被各種政治問題所掣肘破壞。在戰後快速發展的內戰當中，黃河實際上是國共雙方控制區的界河。舊河道本身的大部分地區，都在共產黨人的控制之下，這些地方還有四十萬農民在乾涸的肥沃土壤上定居、屯墾[27]。儘管這些人的處境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時的國、共、以及美國特使馬歇爾的會談當中被提起，他們的利益還是被忽視了。這些農民後來注定要支持中共這一方，因為當回歸故道的黃河河水淹沒農民的家園和田地時，中共看來確實關心他們的命運[28]。

即使在工程行將結束時，修復工人遭受來自黃河北岸的砲擊，河道修復工程還是快速進行。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這天，在這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節慶紀念日，花園口堤防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典禮；這場慶祝儀式並不是紀念數百萬在決堤時喪生的人們，而毋寧是一場因為合堵決口而自鳴得意的慶典[29]。這場慶祝儀式讓人有一種脫離現實的感覺，並且還使用一個浮誇的辭藻——「合龍」，來形容河堤缺口的圍堵。記錄這場典禮的紀念冊極其華麗，卻毫無跡象表明這個地區即將落入中共之手，而國民黨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從事這項事業，實際上是幫了中共一個大忙。雖然它們完全無法因此建立起自身的可靠信譽，它們卻已經完成了一個巨大的任務，而這個事業是中共遲早要自己扛起來擔負的。

遣送回國

在戰爭的尾聲，有數十萬中國人身在日本和朝鮮，他們被強制帶往那裡，在戰爭期間充當苦力。在戰爭結束以後，這些男子很快就被遣返回國。遣送的過程看來相當直接乾脆，因為大部分苦力都來自河北和山東。他們由船舶載運，穿越黃海，到達天津與秦皇島，在政府設置的收容所裡短暫停留，然後就轉往各自的故鄉農村。實際上，這趟返鄉路並不像看來那樣簡單。返鄉者回到的故鄉，是被戰爭蹂躪破壞的地方。在山東，很多農村地區都已經在中共的手中，而大城市和小市鎮則處在國共雙方的劇烈爭奪之下。這種情形讓返鄉者無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名譽恢復和補償。對於戰時強制勞工遭受的虐待所引來的積欠薪資或賠償的支付問題，當時中國的各方政治勢力，對此沒有作過任何努力，或是提出這樣的問題。直到幾十年以後，才有少數

倖存者向日本法院提出申請賠償的訴訟——通常都以失敗收場。

戰時被關入集中營的盟國平民，在戰爭結束後就獲得釋放，他們骨瘦如柴，委頓不堪，但即使如此，還是遠遠比不上盟國戰俘在日本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戰俘營裡所經歷的遭遇。在戰俘營裡，他們遭到蓄意、有系統的凌虐。關押在集中營的盟國平民，在戰後由各自的國家安排，很快返國。對於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來說，這意謂著「回到」未知的國度。小說家巴拉德在十五歲時，才第一次親眼見到英格蘭。惟一沒有返國的盟國平民是白俄，他們一點也不想被送回蘇聯去。那些原來住在東北的白俄，在他們的「同胞」——蘇聯紅軍到來時，往南方避難；那些定居在上海的白俄，則在不久的稍後，中共的勝利看來愈發肯定時安排出走。到了一九四九年，大多數的白俄都已經離開中國，如同難民般移居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他們一手打造的充滿活力社群，就此消失不見。

敵人的遣返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在一九四五年底，中國面臨「如何處理戰敗的日本士兵和平民」這個問題：當時光是在東北，就住有一百六十萬日本平民，而在關內的日本人數字則更為龐大，朝鮮人與台灣人也同樣如此。遣返日僑的過程相當平順，遠超過原先所預期，而比起東歐的德國人和德裔僑民（volksdeustch）遣返過程，當然來得更加順利[30]。中國對戰敗的日本人沒有進行屠殺，不過那些還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卻都在擔心受害的狀態下生活，憂慮發生在東歐、對於德國人進行的暴力復仇情況，會降臨在自己身上。兩顆原子彈帶來的摧殘破壞，或許在中國造成一種感覺，認為日本已經受到懲罰了。美國確實對中國施加很大的壓力，要求中國將日本人遣返，而不是去攻擊他們。

遣返日人在許多港口同時進行；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行動位在葫蘆島，這是一座位於遼寧省近海的小島。葫蘆島成為一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遣返遷徙行動裡的中繼站。在一九四六年初，中美兩國共同作出決定，將住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全部遷移到葫蘆島。由葫蘆島遣返回日本的行動，在同年五月展開，到了這年的年底，有超過一百萬的日本人被送回國內。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又有超過五萬人被遣返回日本。共有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列次的火車被用來運送日僑到葫蘆島，此外還有八百趟船運[31]。共計有兩百零二萬三百四十五名日本人從中國被遣返回國，此外被遣返的還有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名朝鮮人，以及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名台灣人[32]。上面這些數字並未包括在東北和蒙古的五十萬日本士兵，他們全數落入蘇聯之手，並且被運往西伯利亞充當奴工。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他們之中的最後一批才獲得釋放。

日本戰爭遺孤

當日本人於蘇聯軍隊即將攻入的慌亂之中逃離東北時，許多人別無選擇，必須拋下他們的孩子。這些被留下來的孩子，主要以出生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的女孩居多。這些孩子被中國家庭撫養長大。她們長大後只會說中文，也取了中國姓名。她們當中有些人向來知道，自己出生時是日本人；另外有些人要等到成年以後，才發現自己的身世。等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國重新向外面世界開放時，日本政府派遣官員來尋訪這些戰爭遺孤，這時她們都已經四十多歲了。數千人被接回日本，與她們原生家庭重逢。骨肉團圓很少能夠成

功。年長的雙親和已經成年的孩子之間，說的並不是同樣的語言，而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已經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對日本人抱持著憎恨的態度，她們發覺要適應日本，幾乎難如登天。對於這場戰爭來說，這是一則悲傷而遲來的註腳[33]。在二〇〇六年，這些年紀都已是六十多歲的遺孤，共同發起訴訟，指控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時使她們遭受遺棄，因此而陷她們於悲慘的人生境地，而贏得賠償[34]。

這裡有一個極其強烈的反諷對比。上面這場訴訟發起的同一時間，正是年長的慰安婦和奴工開始在日本法院採取法律行動，為他們所受的苦難求取賠償的時候，這些人卻很少得到成功；駁回訴請的根據，從時間流逝的長度到缺乏證據等不一而足。駁回這些訴請，讓日本陷入極為尷尬、羞恥的境地，並且在韓國、中國、菲律賓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助長了對日本的敵意。

結論

戰爭結束了，可是戰勝日本，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太多喜悅。相反的，抗戰的結束是另一場更加激烈戰爭的開始：國民黨和中共為了爭奪天下而發動的內戰。中國人民在抗戰期間所遭受的痛苦，只是接下來更加嚴重苦難的序曲。二次大戰結束後，在東歐發生的情況，與中國有相似之處：東歐最後落入蘇聯令人窒息的懷抱之中。不過，在中國，敵人來自家門之內。中國人即將在一場最為激烈痛苦的戰爭裡相互對抗，這場戰爭就是國共內戰。

⊙延伸閱讀

閱讀一：麥可．大衛．關恩（Michael David Kwan），**〈國民黨入青島〉**（The GMD Entry into Qingdao）

關恩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住在中國北方大港青島。經過數年處在日本占領之下的艱難歲月以後，青島在戰爭結束時重回中國的懷抱。

一面新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全城飄揚。蔣介石的巨幅肖像到處出現，每一面牆壁和燈桿上，也都貼滿了顏色鮮明的海報，上頭寫著各種口號：

歡迎英雄凱歸！
打倒帝國主義！
八年抗戰萬歲！
光輝勝利萬歲！

蔣委員長萬歲！

在青島，這樣歡欣鼓舞的日子只是曇花一現，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憂心忡忡的注意到，那天有一群衣衫襤褸，骯髒、處在半飢餓狀態的人們，拉著長長的隊伍，拖沓進了城。他們身上的制服破破爛爛。許多人腳上沒穿鞋子。另外有些人穿著大團茅草綁製的草鞋。某些人身上沒有攜帶武器；其他人拖著古早的獵槍，甚至是鳥槍，他們拖著槍管行走，看來活像是一群戰敗撤退的軍隊，而不是戰勝凱旋的英雄。搭乘美式吉普車的軍官們吃得油光滿面，神態瀟灑的出現。美國人的援助顯然沒有來到基層。

突然來到城裡的國軍有如蝗蟲，拿走一切事物，包括人們的家園和生意，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理由，哪怕這個理由有多麼單薄，都能讓他們伸手搶奪。人們急於去拍新主子的馬屁，並且藉著譴責其他人是漢奸、通敵者或發國難財的人，以確保自身某種程度上的人身安全[35]。

閱讀二：巴金，《寒夜》

這段摘錄收束了一段背景發生在重慶的陰鬱故事。肺結核是故事裡夫妻不愉快關係的隱喻；妻子已經離開她那患病的丈夫；他則由自己的母親照料。

母親打了一個冷噤。她那隻拿著湯匙的手也在打顫。她忍著心痛再勸道：「你忍住痛再吃兩口罷，不吃東西怎麼行！」她又把湯匙送到他的嘴邊。他顫動地張開了口，努力吞下雞湯，一次兩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緊了薄被。

「宣，」母親低聲呼喚；他含淚地看她，緩緩地吐了一口氣。

母親咬緊牙關，再把湯匙放進他的嘴裡去。他照樣痛苦地把湯吞下去了，以後又吞了兩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湯匙的雞湯全噴了出來。他無聲地嗆咳了一陣。母親連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閉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喚。他默默地跟痛苦戰鬥。母親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親的身上，他希望暫時忘記他那個痛苦。

忽然街上響起了鞭炮聲。雖然在這個山城裡幾年來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但是他們並沒有心腸注意它。出乎他們的意外，鞭炮聲接連地響著，遠遠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發生了什麼大的喜慶事，人聲嘈雜，許多人在跑，有人大聲唱歌，有人笑著講話。

「什麼事？」他想道，母親卻說了出來。

「日本投降囉！日本投降囉！」孩子的聲音在街上叫著，年輕人的聲音響應著。

他吃了一驚。母親忘了一切地大聲問他：「宣，你聽見沒有？說是日本投降囉！」

他搖搖頭，他還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聲響得更密了。

人們像潮湧似地走過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會這樣！」母親興奮地說。

他還是在搖頭。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

「合眾社電報：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聲報告。

「你聽，這還不是真的嗎？日本投降了！抗戰勝利了！我們不再吃苦了！」她歇斯底里地高聲叫道。她一邊笑，一邊流眼淚。她好像忘記自己是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裡，床前一根板凳上放著一支蠟燭，燭光抖得厲害，燭芯偏垂在一邊，燭油從一個小缺口流下來。

他睜大眼睛呆呆地望著母親，彷彿不懂母親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淚。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靜下來。他吐了一口長氣。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號外！號外！日本人投降！」報販大聲叫著跑過窗下。

母親拉著他的手，溫和地帶笑問他：「宣，你高興嗎？勝利囉！勝利囉！」

他用顫抖的手捏著筆，吃力地在紙上寫著：

「我可以瞑目死去。[36]」

閱讀三：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Fanshen*）

韓丁這本著名的作品描述了中共黨人在山西潞城縣張莊村的早期統治情況。中共在該地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之後，很快就開始「討回八年的血債」。

> 張莊炮樓的偽軍司令溫啟榮、五區保安隊長申計梅，他的副手秦天興都面對面地站到了全區各村裡來的一百九十多名農民代表面前，可惜四中隊的史仁保逃跑了。每村都派了十多個人作為本村的代表，集合在張莊的空場上。他們都是在敵偽時期苦大仇深的人：家裡被搶光的，丈夫、兒子被殺害的，妻子、女兒被糟蹋的。
>
> 那天，成百的人控訴了漢奸頭子及其幫兇的罪行。張莊一位婦女講了她的兒子金卯是怎樣被殺害的，當她講到保安隊如何把她兒子捆起來塞住嘴扔到井裡時，已經泣不成聲了。群眾中也有不少人跟著她哭起來。……
>
> 大會結束以前，溫「司令」和申「隊長」被判處了死刑。他們被帶到村邊的一塊空地裡，面對著他們曾竭盡全力修築和守衛的炮樓被槍斃了。申計梅的屍體還沒涼，張莊的一個民兵玉興就把他的毛衣從身上扒下來，另外一個人把他的褂脫了下來，有人拿走了他的鞋子。他們把屍體交給他的親屬，隨他們的意願埋葬[37]。

⊙相關電影

- 《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蔡楚生，一九四七年。
- 《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一九八九年。
- 《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九八七年。

注釋

1 Matthew Arnold, *Growing Old*, 引自K. P. S. Menon, in *Twilight in China*, p. xi.

2 這個「九、九、九」的選擇，似乎是要呼應一次大戰結束時間，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一、十一、十一。這種數字上的重疊，後來在北京奧運的開幕時間選擇上，又再次出現：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上午八時。

3 張根福，《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北京：朝陽日報出版社，2006），頁49。

4 溥儀的一生在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於一九八七年執導的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當中被演繹。

5 在戰爭結束幾十年以後，台灣人仍然為了討回工資以及賠償事宜，而向他們曾經效力過的日本當局提出訴訟。

6 侯楊方，《中國人口史》，卷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266，296。

7 沈奕巨，《廣西抗日戰爭史稿》（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324。

8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105。

9 同上，頁106。

10 這種態度同樣適用於清廷在一八六〇年代中葉（譯按：原文作一九八〇年代）鎮壓太平天國之役，以及共產黨政府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那場人為的飢荒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人命傷亡的態度。

11 引自Chi Hsi-sheng (齊錫生),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45," 收於James Hsiung (熊玠) and Steven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Sharpe, 1992), p. 180. 表格中的數字已經按照數量重新排列。

12 戴雄，〈抗戰時期中國圖書損失概要〉，《民國檔案》，3 (2004)，頁119。

13 這些珍貴文物當中，許多在這年以前被送到倫敦去，因為當時倫敦正在舉行一次規模空前的中國藝術品展覽。此次展覽所展出的文物，將近一千件，包括一百七十五件畫作，以及三百五十件瓷器。見*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Government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Londo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14 劉北汜，《故宮滄桑》（香港：三聯書店，1988）。同時也參見Janette Shambaugh Elliott and Davi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Treasur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15 Chester Rorning, *Memoir of China in Revolu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pp. 192-193.

16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訪問余約翰（John Yu）。

17 二〇〇八年十月四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訪問法蒂瑪．李。

18 方振武的孫女陳方安生，之後曾擔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是一位民主和法治的堅定支持者。

19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8. 譯按：本段引文據王海良、金燕等譯，《中國的內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11。

20 這段經過在台灣導演侯孝賢的經典巨作《悲情城市》中，有令人動容的刻劃。

21 少數士兵隨著部隊調動而和家人團圓的經驗，就和法國軍官紀業馬（Jacques Guillermaz）一樣奇異。紀業馬長期在中國擔任駐華武官。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他隨著自由法國的部隊一同在法國南部登陸。他所屬的部隊光復了他的故鄉。在這個時候，他的母親已經將近十年沒見到自己的兒子，在母子重逢的前一晚，她相信自己聽見了兒子的聲音，但是在真正親眼見到紀業馬的時候，她還是激動得昏厥過去。見Jacques Guillermaz, *Une vie pour la Chine* (Paris: Lafont, 1989), p.126.

22 《當代中國的廣西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46。

23 法國在戰後同一時期也發生相似的情況，在此可以做一個對照。關於德國占領期間法國的諸多情形，都有如覆蓋上一層神祕面紗，不得其詳。這層神祕面紗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導演馬塞爾．奧菲爾斯（Marcel Orphuls）推出《悲哀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e*）時，才被掀開來。

24 George Woodbridge, *UNRR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gency, Vol.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405.

25 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於一九四三到四九年這段短暫的存在期間裡，在全世界各地進行多項大型救濟計畫。這

第七章

抗戰的遺緒

些計畫向那些從軸心國控制下解放的地區提供救濟。

26 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局（一九四七），《黃河花園口合龍紀念冊》。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號568。

27 George Woodbridge, Vol. II, pp. 430-437; and O. J. Todd, "The Yellow River reharnessed,"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XXXIX (1949), pp.38-56.

28 趙富海，《老鄭州》（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133-135。

29 《黃河花園口合龍紀念冊》。

30 德裔僑民指的是十八世紀以來在東歐各地移民屯墾的德籍人士。

31 網站：china.org.cn，查閱日期：二〇〇五年五月五日。

32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aipei, Taiwan: Chungwu, 1971), p. 571.

33 王歡，《歸根：日本殘留孤兒的邊際人生》（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34 *Guardian*, December 1, 2006.

35 Michael David Kwan, *Things Tha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acfarlane, Walter and Ross, 2000), pp. 145-146.

36 《寒夜》首版於一九四六年。本段摘錄取材自*Cold Nights*, translated by Nathan Mao and Liu Tsun-ya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61-162.

37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6), pp. 116-117.

這場戰爭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一道深淵。

在此之前是一種人生，在此之後又是另一種人生。[1]

在北京中華世紀壇的正下方，圍繞著一環巨大的圓形甬道。在甬道的外牆上，陳列布置了官方正統版本的中國歷史，雕刻成金黃色的石片浮雕壁畫。歷史起於神話時期的英雄人物，並且以圖像逐一介紹所有的文化歷史人物。最後一位是鄧小平，他的肖像銜接起整個環形步道。這道壁畫傳達了兩個訊息：其一是展示出當代中國的歷史必然性，從遠古到現今沒有中斷過的前進旅程。其二則是顯現中國賡續不變的文化，是中國的最重要特質。

這個雕刻在石板上圖像歷史版本，是名符其實「中國永恆不變」的比喻：永恆的中國、不變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在這個歷史記述裡，侵略、戰爭和叛亂很少出現。它們被輕描淡寫的帶過，因為這些事件帶來動盪與混亂，卻並未改變中華世界的根本特質；它們是增生積累在一個文化與文明的故事上的粗俗附加物。按照這種詮釋觀點，對日抗戰就成了又一層的附加物，可怕恐怖但是為時短暫，只會造成暫時的動盪，不會影響、觸及中國的本質。

在毛澤東時代主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論和上述觀點截然不同，但是它同樣也持一種看法，認為戰爭只是歷史的一個偶然、附帶部分。歷史被區分成各個時期，每個時期最後都注定要滅亡，在消亡的過程中又誕生另一個時期。因此被貼上「封建」標籤的舊社會，其滅亡是必

然的。對於一九四九年接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來說，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以階級做為區別基礎的：地主、土豪劣紳、貪汙腐敗——全部都能透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鬥爭加以解決。抗戰只是加速了這個業已難以阻擋的進程罷了。

對於中國近代史，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另有一套詮釋觀點。好幾位學者的觀點，開始於同樣的前提：中國歷史的進程，受到十九世紀以來變遷的影響。

有一種看法將中國近代史看成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衰敗過程，這樣的過程帶來的，是中央政府權威的衰弱和帝國主義的入侵，兩相結合在一起。這種過程被賦予軍國主義的成長、暴力和不平等等種種特徵。日本人的侵略，雖然在程度上比衰弱時期的早期階段來得更加殘暴，卻和前者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換句話說，這是歷史的不可分割連續整體的一個部分。用杜贊奇的話來說，就是：「日本政權在華北帶來的各種影響效應，不該和本地先前的各階段，做太過明確的切割劃分[2]。」另一種歷史觀則以更加樂觀的態度，看待這樣的歷史進程：隨著變遷而來的，是進步和現代性、民主、人權，以及自由經濟；理念和全球趨勢比個別事件來得重要，即使是像八年抗戰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也同樣如此[3]。

有一個例子，是最近一個關於中國家庭演進變遷的研究，涵蓋的時間達五十年；在這個研究裡，完全沒有提及抗戰，而只提到了戰前和戰後的時期。這彷彿是在說，社會變遷可以自外於戰爭所帶來的衝擊，不受其影響；或者反過來說，是認為社會在戰爭時期已經停止變遷[3]。

本書採取不一樣的詮釋角度，將戰爭擺在社會變遷的中心位置。這種詮釋路徑著重在戰爭帶給中國的激烈改變，並且主張戰爭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動亂來源，它給社會帶來深刻而持久的改變，戰爭所蘊含的暴力與混亂，將原本的社會掃滅殆盡，卻沒有產生另一個新社會。

抗戰所帶來的社會衝擊，不同於之前外族征服的傳統模式；後者在一開始的暴力入侵、占領以後，隨之而來的是中國社會價值的復興。

滿人在十七世紀中葉得到天下之後，引出一個中國歷史上為時最長的王朝之一，長達二百五十年。（譯按：清代國祚為二百六十八年，但如果從康熙朝起算，至宣統朝為止，清朝定鼎中原共二百五十年。）清朝初期的幾位皇帝治理國家，比起他們的晚明前輩更加勤政，而雖然士大夫官僚階層大部分由漢人出任，在軍事控制上仍舊仰仗滿人自身[4]。他們採納、接受儒家的社會體系。類似的過程沒有出現在抗戰時期。

日本人在將他們的統治加諸在中國這方面的成就，遠遜於滿洲人。他們從來沒有攻下整個國家，而在他們占領的區域裡，占領者很少為中國做出調適之舉；相反的，他們將中國視為一個需要轉變的社會，不值得效法。他們的統治是建立在民眾恐懼的基礎上，而不是自願的結交或順從。日本人的入侵並不是傳統中國社會復興的起點，儘管日本人的目標看似是要提倡儒家文化，但結果卻成為一段充滿毀滅與災難動亂的時期。

抗戰為整個中國社會帶來普遍的苦難。在戰爭結束時，有太多的人在戰爭當中喪生，或是受到嚴重的傷害：士兵、他們的家人、空襲轟炸和焦土政策底下的罹難犧牲者、經濟動盪之下

倖存的人、強制奴工、慰安婦、以及戰爭遺孤——以至於整個社會都遍布著慘重的損失。對於少數沒有遭受損失，或是生活環境比較優渥的人，社會上有強烈的控訴情緒——因為這些人的「幸福」環境，是他們與占領者或發戰爭財者調適所產生的一項副作用。

在戰爭的尾聲，中國社會瀰漫著不信任的氛圍。凝聚傳統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那種自然的信任感，現在已經消失不見，被這場戰爭破壞、侵蝕、從根基削弱、並且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遭到背叛。舊社會的菁英成員，要不是從占領區裡消失蹤影，就是和日本人共存，做出不同程度的調適。在自由地區，社會信任已經遭受離散、貧窮匱乏、以及士氣淪喪的破壞侵害。

信任感的喪失可以用官方進行的間諜活動做為例證，不管是日本特務機關，或是國民黨、中共所屬的特務系統都是如此。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那種樂觀、積極的氛圍，似乎是一去不復返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在中共建政初期更為加強，當時在政治運動造成的混亂裡，要求犧牲者被迫不能信任彼此——同時讓人們更容易攻擊那些與他們不再有個人聯繫的人。毛澤東時代的過激與越軌作風，在抗戰時就可以看出端倪。在抗戰結束不到二十年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逐步開展顯露出來。

在前述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之間，必定存在著一個密切的關聯——戰爭所帶來的社會解體，與一種攻擊其他人的普遍意願，後者是文革當中最使人感到悲傷、卻也是最為普及的特點之一。

社會解體與倖存

國破家亡
The country is broken, the family ruined

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將二次大戰的歐洲戰事比做一個萬丈深淵，劃分之前與之後兩個世界的深深裂縫。在中國，戰爭所造成的裂縫同樣深不見底。舊日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而新的世界還在不確定的醞釀之中。抗戰帶來的苦難，凝聚成一種根深蒂固而強悍的倖存者心態，讓個人或是小家庭比起大家庭或社群更能夠倖存下來。八年戰爭已經侵蝕或破壞了舊社會原有的聯結關係。倖存者的心態並不溫和善良。這種心態意謂著如果一個人必須要靠著傷害別人，甚至是傷害親朋好友，才能夠確保自己和一小群最親近的親人的生存，那麼他（或她）就會這麼做。

社會解體

在戰爭的尾聲時，中國社會已經喪失它大部分的凝聚力。這種內部凝聚力在民國初年時，就已經遭受威脅，因為舊有的秩序在軍國主義、政治變動和現代化的攻擊之下，已顯得脆弱不堪。抗戰劇烈加速了這樣的過程。家庭的規模縮小。原來家庭能夠提供的各項功能——共同生活居住、經濟財政上的補貼、以及急難所需時的援助等，全都淪落到幾近廢止的程度。定期的家庭重大儀式，在戰爭時期無法完成：父母沒辦法為孩子挑選婚配對象、無法為孩子取名、也不能為死去的家人辦理妥貼的後事。家人團聚過年或是掃墓，在戰時幾乎都是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巨大的開銷、重要成員的缺席、以及在戰爭時期歡樂慶祝的不合時宜，都讓原先可以凝聚家庭和社群的慶典活動，變得難以舉行。

對於社會安全程度最烈的侵蝕，來自於抗戰所帶來的持續不安全感，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破壞了人們相互幫助的想法，而後者是凝聚社會的關鍵要素。人們的互助互惠，是以長期的人際關係，和對於義務、恩情的長時間報答償還做為先決條件的。當整個世界都變得危疑動盪，未來茫然不明，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從短時間去設想。人們必須以最適者生存的方式，把自己的利益擺在最優先的位置。互助互惠幾乎成了和生活毫不相關的事情。

倖存

能夠對上述這一連串社會損失起到平衡作用的，是在戰爭帶來衝擊之下，一個比較崇高、超脫的概念，認為社會由於個人的勇氣與犧牲而受到鼓舞、向上提升。戰爭造就英雄。「戰火洗禮」（baptism by fire）和「戰陣之中鍛鍊成鋼」（steeled in battle）是中文和英文裡許多同樣說法的兩個例子，這樣的說法認為戰爭本身與其帶來的苦難、損失，全都是正面積極的，人們因此得以在面臨各種挑戰和危險時，發揮自己的長處，然後能夠戰勝它們。這是英雄氣概

思想的根據基礎，反過來說，這樣的想法也是獎勵英勇事蹟的來源：勳章、紀念儀式、戰爭紀念碑等。中國有受到歡迎的英雄氣概傳統：武俠；根據這樣的傳統，人們創作出一連串通俗文學、戲劇與電影[5]，以及同樣受到歡迎的功夫武術傳統[6]。

抗戰並未以英雄事蹟做為休止符；參與這場戰爭的人們當中，只有少數被公認為英雄。戰爭初期出現了幾位英雄人物：八百壯士與張自忠，但是在抗戰的後期，則寥寥可數。白求恩是最常受到紀念的英雄人物當中的一位（實際上，他個人擁有六處紀念場所，當中還包括兩處墓園）。在白求恩於一九三九年底死於血液感染之後不久，毛澤東就讚揚他是一位犧牲小我的社會主義者。在毛的文章〈紀念白求恩〉裡，脾氣相當暴躁的毛暗示說，白求恩身為一個外國人，在戰時的表現卻好過許多中國人（無論他們是否為共產黨員），而人們應該要將他的榜樣牢記在心：

>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7]。

在戰爭的尾聲，中國士兵很少被當作英雄看待。對於列舉或慶賀英雄，或是悼念死者，普遍有一種猶豫的情緒。或許人數規模實在是太過鉅大了。另一個更可能的原因是，國民黨和中共，這時中國政壇上僅餘的兩股政治勢力，正把全副的心思擺在內鬨鬥爭上頭。抗戰結束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內戰的威脅陰影，而不是對死者的追認，或是抗戰英雄的凱旋返鄉。

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抗戰勝利實在沒有什麼好值得慶祝。中國不像二次大戰後許多戰勝國家那樣，陷入一片熱烈狂歡之中。當中國的戰事結束的時候，對於那些烽火餘生的人來說，如釋重負是最為普遍的感受，因為有許多人沒能在戰爭裡倖存。能夠存活下來的各種原因，通常都很平凡無奇。所在地點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人們住在北方大城或是東北與台灣，躲過戰火存活下來的可能性更高，這些地方都處在日本占領之下，情形不像別的地方那麼嚴酷，在戰時生存下來沒有那麼困難，問題出在戰爭結束以後，這時留下來的人們必須向出逃的人辯解自己的行徑。

年齡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年紀輕的民眾適應力較強，更有能力和辦法，從敵人的地方逃出。年輕是一道兩面刃。年輕男子更有可能被徵召入伍，或是被抓去充當奴工。而財富，至少在戰爭剛爆發的時候，算是一項生存的關鍵因素。富人有財力出逃，他們更有可能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建立人脈關係，就算身處外國租界也是一樣。或許適應、克服艱困環境的能力，才是存活下來的關鍵因素。在許多人身上看到的這種適應能力，有部分來自於深植於中國傳統裡堅忍不拔的精神。

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力量。不過，有一件事情很顯然，那就是很少人能夠躲得開戰爭所帶來的衝擊，即使是那些顯現出極為吃苦耐勞、克服逆境精神的人亦然。

有些人認定他們可以重回到他們在抗戰前的生活。有辦法如願的人極為稀少。在社會、也在軍事、政治戰線上激烈爭鬥的內戰局面，已經不可避免。無論他們在戰爭爆發時已經成年、清楚他們所遭受的損失，或是在戰爭結束時還正當青少年時期、不太曉得戰前的情形，他們在這八年裡的生命，都是在困惑、壓力和恐懼之中渡過的。他們是痛苦創傷底下的倖存者。

創傷、調適、與超越

心理的創傷是一種加諸於內心的創痛，無法像身體的傷口那樣，可能有癒合的一天。心理創傷可能來自於一次單一的經歷，或是遭遇過一段漫長的時期，歷盡煎熬或虐待。創傷深深隱藏於內心，而且可能會超出個人的情緒控制，重新迸發出來[8]。那些在戰火底下倖存的人，無論是戰場上的士兵還是後方的平民百姓，通常都經歷了心理創傷，而這樣的創傷一直留存在他們的心中。

圖7.1　悲傷（謝曼萍，一九四八年。）

悲不自勝
Grief that one cannot overcom

創傷的經驗通常被認定是負面的。引用「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理論，作為在創傷經驗之後行為脫離常軌的成因，也相當普遍。這種「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的情況，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確認，特別是使用在通常處在戰爭或戰鬥之下的經驗，做為接受治療的前提。這種理論甚至還使用在刑事案件的審理當中（不過在中國則不適用）。

有些心理學者現在正離開

原先對於創傷帶來效應的想定，這種想定認為創傷的效應總是負面的，會帶來長期的心理傷害。新的研究路徑把重點擺在適應能力，度過傷害的決心，對於熬過劫難而存活的感恩。在這樣的重點之下，較不重視與戰場相關的創傷，較為注意平民百姓在戰時與平時的創傷經歷。

在這個研究領域上領袖群倫的學者，是法國心理學家伯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當他還是幼年時，就在納粹占領下的法國成為孤兒，之後的整個童年，都受到養父母的虐待。他克服了自己人生的悲劇開場，成為一位心理學者和創傷研究的專家。他在創傷後成長的概念發展上，扮演了領導學界的角色。西呂尼克並未否認創痛：「在我的內心，仍然感覺自己缺乏穩定。……我治癒你，但是你內心的傷痕永遠不會消失。」但是他談起「適應能力的觀點，這是人在面對可怕的問題時成長茁壯的能力。[9]」西呂尼克的觀點注意三件事情的有效性：治療、善良寬容，以及愛的經驗。

上述看法是一則古代諺語的現代科學版本：「你既沒有被殺死，就會更加堅強」。這場戰爭是一面顯露人性的嚴酷明鏡。人們展露出勇氣或懦弱，高貴或自私，慷慨或吝嗇。那些能夠讓自己朝積極面看的人，便可以將這場戰爭視為正面的體驗。處在不幸的災難逆境裡，可以產生力量與決心，他們就是活生生的見證。

對創痛的超越幾乎已經算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普遍情況。數百萬民眾在忍受可怕逆境時表現出堅忍與頑強，仍然帶著強烈的決心，繼續邁步向前，讓外國的觀察人士都充滿佩服。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在艱難的度過了抗戰歲月之後，成為驕傲而堅強的人。這些人裡，包括在接下

來的內戰當中，繼續站在勝利一方的人們，以及沒有那麼肯定，不過卻在一九四九年時繼續留在中國的人，他們不知道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卻認定將來的日子一定會比他們才剛歷經的歲月更好。在一九四九年時離開大陸的人們，同樣也具備堅強的生存信念，可是他們卻因為在內戰時的經驗，而遭受到猛烈的打擊。而他們首先會因為自己喪失了多少而深感震驚。但是，隨著時間流逝，這些人在香港與台灣所創造的兩個世界，儘管相當不同，卻同樣能結合中國傳統和現代化而獲得成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再次對外開放，被另一次浩劫所重創的倖存者們，這時帶著敬畏的眼光，看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所達到的成就，然後同樣也開始踏上香港和台灣在三十多年以前所採取過的經濟現代化道路。

就在中國大步朝未來邁進的時候，有一個疑問仍然懸垂在一九八〇年代的陰影之中：有多少最近的過往會被記得？而這種記憶又會是什麼模樣？

記憶

記憶並不簡單直接。它可能不正確，容易受到人為操弄，甚至或許還是假造的。它可能受到誇大，特別是當記憶與成功的經驗有關的時候。那些戰勝方參戰人員所述說的戰時記憶，通

常還會在所述事件之外，增添許多光榮和自豪。我這個世代，就是在聽著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祖父與父親們述說他們的勇敢與犧牲奉獻之下長大的。

紀念有時候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為了群體或個人的利益，以及當前一個特定的理由而使用。這樣的手段可能與以下的各種需求相連結：要求承認不公義的行為，要求道歉、返還財物、補償或是賠償。記憶也可能被用作不當虐待的證據，例如在最近日裔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或是印第安保留區裡的原住民所發起平反、要求賠償的運動，都是以回憶作為其主張的重要根據。在目前，這些運動都還只在於特定國家之內，還沒能夠成功的跨越國家的界線；換句話說，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無法在日本贏得求償官司，就是一個例子。

在大眾回憶這個層面，人們能記憶的內容，受到執政當局（通常是國家）的選擇，以符合特定的目的。勝利者可能會要求找回、修補某一段記憶，以確認敵方的罪惡。當我於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在德國法蘭克福上學的時候，我們在「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的課綱下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德國有部分仍然處在美國的管制之下，這個課綱是規定必須教授的課程。課綱的目的，是確認學童能了解二次大戰是國家民族的恥辱，是德國歷史上一段邪惡的時期。在日本沒有類似的情況。

中韓兩國時常對日本感到極度的憤怒，因為日本在「歷史遺留問題」上不是猶豫不決，就是強硬拒絕讓步；所謂「歷史遺留問題」來自一種感覺：日本之所以拒絕承認其發動戰爭帶給亞洲鄰國的苦難，是因為他們要掩蓋這場戰爭，也就是說，蒙混、逃脫過去所犯下的罪行。日本教科書的問題之所以如此敏感，原因出在亞洲各鄰國擔心：日本的年輕一代除了對自身在戰爭中受到的傷害之外，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所做的事情一無所知[10]。

大眾的記憶可能和受害者的情結密切纏繞，而只把注意的焦點放在種種苦難的經歷上。廣島是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地點，但是此地並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被人記得，而是以一個單一事件的姿態，進入記憶之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廣島蒙受人類史上第一次核子武力打擊的悲劇。[11]」上面這段話裡完全沒有提及投下原子彈之前的那場戰爭，有的只是一場人類世界裡新近被釋放出來的大災禍底下無辜的受難者。

對於大眾集體記憶的不可靠或掩蓋欺瞞、易於受到人為操弄等層面的批評，都是有根據的，但是這些批評並不能否定記憶本身。這些記憶仍然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力量強大。它們並不是存在於真空之中。記憶有其自身的紋理脈絡，附著在某些特定的場域和時間點之上。

紀念的時機

家庭生活的關鍵時間點——親人誕生、結婚、以及喪禮等——都是會引起社會記憶的活動場合，人們在當時將這些記憶儲存起來，然後定期在腦海心頭反覆出現，特別是在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更是如此。它們是記憶當中基本的時間點。個人的記憶則有另外一套時間表，對應人們生命中的不同階段。遙遠過去的回憶在人生的稍後階段時，變得更加敏銳深刻。年紀較長的人有更多的回憶，也有更多的時間來回憶前塵往事。對於生命即將結束的體認，以及對於喪失記

憶的憂心，使得人們開始回憶往事。

以紀念儀式做為形式出現的大眾集體記憶，則以不同的節奏推進。它可能受到紀念日的支配，紀念日是官方記憶一個歷史事件的正式時間。在中國，當一九八五年的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與二〇〇五年的六十周年紀念時更是如此，全年充滿了各種紀念儀式、典禮、特別出版的刊物、電影、以及電視節目。在這些戰時紀念日裡，有若干日子比其他的節日更常受到慶祝和紀念。這其中必定有出於政治考量下的選擇，關於哪些日子要被紀念，又有哪些要被帶過，而政治操作在此就產生作用；這固然與中國與日本兩國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和中國內部竭力鼓動民族主義也有關係。

二〇〇五年三月，間或夾雜著暴力的反日示威浪潮，就算不是中國官方在幕後策動，也必定經過其同意，而其他民間發起的抗議活動則不會得到批准。有很多紀念日屬於禁忌。例如，中共就禁止民眾公開紀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六四」事件。對於像這樣開始時起於希望和樂觀、最後卻成為悲劇的時期，官方存在著一種失憶症。官方對於記憶的否認，並不表示這些悲劇性的事件就此被人們所忘卻。禁止紀念活動，所得到的反應可能會適得其反，讓這些事件更加被人們牢記，而不是被遺忘。

紀念的場所

很多國家的社會都創造出特殊的場域，藉以喚起並提倡特定的集體記憶，例如公墓、紀念碑、以及衣冠塚等等。儒家社會非常重視對先祖的追念。家庭生活和祖先的關係很近。崇祀祖先的習俗使得家家戶戶廳堂之上都供有祖先牌位，時常整理修繕墓園，家人還會在每年清明節時掃墓，也就是在初春時節，由在世的後代子孫打掃照料去世先人的墳墓。上述這些儀式，是在私有家戶或宗族墓園裡進行的。它們是家庭性的紀念場所。惟一公開的喪禮祭祀儀式，是在大規模疫疾或天然災害發生，挖掘集體埋葬的墳坑時，才會舉行。這些場所充滿了驚駭恐怖，而沒有紀念性質。

在中國，公眾紀念的場域並不多，沒有公眾墓園，而對於在抗戰中死難的人來說，也沒有戰爭紀念碑或陣亡將士公墓。這些場所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現有的一些公共紀念建築，像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革命烈士紀念碑，或是八寶山革命公墓，都是在蘇聯影響力很大的時期，模仿蘇聯紀念建築之作。位於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完全與中國古代「皇帝陵寢必須位於都城之外」（例如，位於西山的明朝皇帝陵寢）的傳統背道而馳。將一具死者的遺體（雖然已經做了防腐處理）擺放在城市裡而不下葬，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也完全打破了既有的傳統。

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沒有任何官方設置的抗戰紀念場所。在過去二十多年當中，則有大量的公眾紀念場所，公開的追念這場戰爭。有三座大型紀念場所的開幕時間，正逢抗戰的紀念日：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抗戰勝利四十周年時開館；「盧溝橋抗戰紀念館」於一九八七年、抗戰爆發五十周年時開幕；而「台兒莊大

捷紀念館」在一九九三年開幕，以紀念抗戰初期中國贏得這場大勝利五十五周年。若干人物也受到紀念。遭到軟禁的張學良位於湖南鳳凰的居所已經被修復完竣，同時修繕完成的，還有佟麟閣將軍位於北京近郊西山的寓所。張自忠將軍擁有四處紀念館，北京市內的一條主要幹道——鐵獅子胡同，已經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為張自忠路[12]。蔣介石位於重慶市郊的官邸，也已經對外開放——就在這個時候，他在台灣的紀念館，正陸續遭到關閉之中。

這些紀念場所設置的目的，在於喚起人們屬於私人或集體的回憶。它們很少與記憶的實際運用層面產生關係，而這對許多人來說，卻更為重要。

具有重要用途的記憶

回憶對於評述過去非常重要；它們可能是歷史證據的惟一來源。在識字者不多、缺少書面文字紀錄的社會裡，回憶的用途，是做為口述歷史的基礎之一。而處在有強大政治或宗教力量控制的社會裡，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保有書面紀錄是一件危險的事，回憶是唯一可以存放往事的處所。

回憶也具有物質上的功用。識字的人可能會對他們的財產保留一份非常詳盡、準確的紀錄，可是對於文盲而言（一直到最近，絕大部分的中國民眾都是如此），這種本事是很難得的。一個大字不識的人要列出財產清單純靠記憶，人們藉著記憶儲存對他們重要的知識。回憶可以非常準確。當我於一九八〇年代在山東訪問年長的農民時，我對於他們陳述時說出的記憶細節印象極為深刻，也非常訝異他們腦海裡竟然還存著對一九三〇年代財務狀況的種種細節，當時幣值的波動可是非常劇烈的。在他們提到四十年前的收入時，不是說他們得到了多少現金，而是說他們能以這筆錢，買到多少數量的穀物或大豆[13]。

沉默的回憶

對於中國人來說，要記得抗戰並不容易。在戰爭方才結束的那段時間裡，人們內心裡有一股想要逃開記憶的壓倒性需求，將這場戰爭交付到內心深深的**地牢**裡去。這是對於這場駭人的世界大戰的普遍反應。在加拿大華裔小說家鄧敏靈（Madeleine Thien）那部關於回憶受到壓抑的小說《確然之事》（*Certainty*）裡，林馬修（Matthew Lim）在戰爭結束十年以後，重回到位於印尼山打根（Sandakan）的童年故鄉，他發現本地的人們無法談論這場戰爭，或是說起有關日本戰俘營的事情，這座戰俘營一度就設置在城鎮外。「要是他提起了，他們會慌忙搖手，眼神中顯露出疏遠的距離。『那時候真可怕，』他們說。在同時之間開啟、關閉回憶。[14]」

在中國，關於抗戰的記憶，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沉默的。這樣的沉默有自己的邏輯。這是痛苦的沉默，因位對於記憶的壓抑實在太過悲傷，以至於不能拿出來，暴露在光線底下。這是受害者的沉默，因為人們遭受到的苦難遠超過他們所能負荷。對他們而言，沉默是必要的應對機制。記憶還在那裡，深深的埋藏地下，處在意識的潛流之中，人們知道這些記憶的存在，但不讓它們浮出表面。對於過往記憶採取最為劇烈壓抑方式的人們，是遭受過最大痛苦煎熬的「慰

安婦」、遭到嚴刑拷打的受害者、以及屠殺之下浩劫餘生的倖存者。過往實在太不堪回首，幾乎要讓人失去理性。這樣的沉默通常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默契之下，彼此同意不去談論令人痛苦、羞辱的話題。沉默是具有感染力的。它成為一種社會習俗，避開麻煩，不去提起這場戰爭。

還有另一種在地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形式，出現在一度遭受占領的城市裡。在這些地方，戰爭的記憶被放入黑洞之中；看起來，彷彿人們對於自己生命裡一段很長的時間，完全失去了記憶。這是一種羞恥的沉默，人們拒絕召喚一段會在前占領區居民內心帶來恐懼和羞辱的回憶；這些從前身處在敵人統治下的人，通常會為自己沒有起來積極反抗，而感到恥辱，但是他們也清楚，要是他們這麼做了，抵抗的後果又將會是如何。

隨著時間推移，在整個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大陸，抗戰帶來的極度痛苦，被一段新的痛苦經驗所取代，這段經驗有時甚至更加痛苦——大躍進、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愚行——如果可能的話，這是一段人們想要遺忘的歲月。

無論沉默的理由原因是什麼，回憶**就在**那裡；沒有失憶症。在過去十多年以來，這些回憶開始湧現。歷史學者已開始對倖存者從事有計畫的口述訪談。其中一個例子，是對南京東郊的湖山村二十一位年長抗戰親歷者所進行的集體訪談計畫。當時他們還只是孩子或年輕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經歷了可怕的四天。在他們的記憶裡，有三十二個人喪生，還有其他人被擄走。他們說的時候用字簡潔，幾乎不帶激昂的情緒——但是這些死者有了姓名、年紀和身分關係，不再只是統計數字[15]。回憶將過去的往事又帶了回來。恢復記憶是重新復原中國最近這段時期重大往事的重要關鍵部分。

重建過去

為什麼要努力翻找、回憶過去？為什麼不讓往事就這樣過去，然後繼續往前走？如果辦得到的話，這個想法或許相當合乎情理。可是，記憶是無法受到嚴格控制的。就個人來說，記憶在人們的腦海裡時常湧現，可能會因為一個聲音、一個味道、一句不經意的談話，或是一段時期的開展，而被觸發出來。在一個許多人擁有相似記憶的社會裡，記憶或許會因為一次事件，或是公眾意識的某次改變，而被引發湧現。

記憶無法被永遠覆蓋；它們也容易隨著時間流逝而受到影響。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壕溝戰的可怕回憶，被掩蓋了將近半個世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它們才被喚醒重生。諷刺電視劇《仙樂軍魂》（*Oh What a Lovely War*）是一個觸發回憶的因素。這齣電視劇時機湊巧，正好遇上另一個更強而有力的觸發因素：年長的倖存者需要披露他們身上的遭遇，在死亡讓他們永遠沉默之前說出來。另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相似過程，是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記憶。在法朗哥

（Franco）政權執政期間一直被鎖藏的記憶，在過去數十年當中已經開始傾吐說出。

中國抗戰被掩蓋的記憶，也以類似的方式重新浮現在人們的心中。電影明星趙薇是在吃了苦頭以後，才學會「不能忽視歷史」這個教訓：二〇〇一年，她被拍到一張照片，當中的她姿態撩人，穿著最受到憎恨的戰時符號：日本的太陽軍旗。來自抗戰年長倖存者撲天蓋地的譴責聲浪，立刻朝她襲來，而她必須卑躬屈膝的道歉。趙薇在無意間作了過分之舉，因而在戰爭的倖存者和她自己的家庭裡都引發了痛苦的回憶：她的祖父是在抗戰時遇害的[16]。

想要說出記憶的需求，通常和人們了解到死亡或心靈的衰敗正在趨近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歷中國抗戰的一代，現在都已經七十多歲，甚至更老，他們感受到了同樣的需求；除非他們現在將記得的事情說出來，否則這些記憶就會隨他們一同進到墳墓。在戰爭時飽受苦難或是死去的人，他們的後代可能會是恢復這些記憶的推手。如果比較年輕的一代感受到他們父輩或祖父輩的痛苦，卻不知道這樣的痛苦是從何而來，他們可能會要重建——或是發掘——這段過去往事。他們會要求老一輩的人告訴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遭遇。張純如（Iris Chang）就是從她父母的口中聽來南京大屠殺這件往事。她的書引發其他許多人去追尋老一輩的人所保有的記憶，在過程之中揭露了大量受到壓抑的回憶[17]。

國家與戰爭的記憶和紀念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在某些國家，這意謂每年在莊嚴隆重的紀念儀式上追悼死者。這些紀念儀式旨在表達全國一致的哀傷，並且感謝那些為了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英勇奉獻生命的先人。國家可以運用紀念儀式，警告人們要是忘卻戰爭會發生什麼

情況；或者，國家能夠運用紀念儀式，作為一種自我標榜的手段，轉移人們的目光，不去注意當前的種種缺失。中國並未紀念抗戰勝利結束的日子。宣布國共內戰結束的日子，是人民共和國月曆上最重要的一天：十月一日是國慶日。沒有類似於美國「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或「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這樣的節日，來紀念抗戰之中的死者。（譯按：加拿大、英國、美國的國殤紀念日，訂為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美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則為每年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

國家知道，不去記憶是有危險的。中國作為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領導人們都清楚馬克思那句最知名的箴言：「歷史會重覆，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基於同樣的概念，有另一個更起到作用的版本，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說過：「那些不能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對過往的無知會帶來重蹈過去錯誤與暴行覆轍的危險。這同樣也意謂人們無法正視、承認過往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或是去糾正、補償這樣的損失。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後不久，中國政府承認文革所造成的損害。對於四人幫有一場公審，而一九八〇年代在返還政策之下，對於那些身受苦難者，也作出了可觀的賠償。這種正視的態度，儘管還不能掀過文革這一頁，卻讓中國較為容易能放下文革所帶來的創傷。

對於抗戰，沒有類似上述這樣的過程。在此有一個諷刺的事實：正是因為抗戰的緣故，中共才能夠席捲天下。

戰爭與革命

抗戰最具重要性的後果，就是導致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取得勝利。毛澤東很清楚這一點。一九七二年，在接見戰後首次日本領導人訪華時，毛回應首相田中角榮生硬造作而顯得遮遮掩掩的道歉時，表示中國實際上應該感謝日本侵華才對。「如果日本沒有侵略中國，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18]」

抗戰打得中國山窮水盡，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自信、強悍、冷酷無情的革命運動，搭好大展身手的舞台，最後接收整個國家；而在十多年以前，這個運動還遭到斷然的貶斥、打壓，當時政府已經將其清剿到幾乎絕跡。共產黨人已經下定決心，在經歷江西的失敗與長征的磨難之後，絕不再被擊敗，絕不再次遭受羞辱。抗戰給他們大好機會，蓄積自己的力量，以奪取整個國家。

社會所遭受的傷害，以及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流離失所，都是讓中共壯大的養分。舊日社會中的頭臉人物已經在抗戰期間失去了大部分的財富和名聲，以致於他們在實際上等於「在歷史的垃圾堆裡」。這是否意謂著這場戰爭既是抗日戰爭，也是一場階級之戰，一場無產階級戰勝舊社會菁英的戰爭？何稼書（Joshua Howard）在他具有開拓性的、關於重慶兵工廠的研究當中，主張確實如此；他認為階級意識的出現和階級的形成，都在抗戰期間發生。一個更常見、

現在有不少中國歷史學者支持的觀點，認為在抗戰期間，愛國主義浪潮便將階級戰爭含括在內了[19]。另一個基於階級史觀所做出的解釋則是：舊社會的領導人物在抗戰期間，都遭遇了悽慘不幸的失敗，他們因為在這場戰爭中過度撐持，而到了崩潰的地步；民眾指望他們能夠起來領導，他們卻沒有能擔起這個責任，至少就他們無法保護民眾不受侵華日軍荼毒這點來說，的確如此。

在階級鬥爭層面，抗戰確實在結構上給了中共助力。除了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各種損失，還有另一項損失——因為抗戰而無法發生的事情：個人的職業生涯的失去、一度充滿保障的前景成為泡影、沒有作出的投資等。這些「如幻影幽靈般」的損失，造就大量失望幻滅的民眾，他們的夢想與事業企圖心，都因為抗戰而遭到摧毀。他們正在找尋一個新社會、一個很可能是經由革命而造就的新社會。人們對抗戰帶來的苦難已經能適應習慣，這讓中共更輕易的能要求它的支持者、乃至整個國家的民眾，為革命大業作出犧牲。人們的生活變得簡易樸素許多。抗戰已經掃除許多舊社會的奢華鋪張。傳統文化裡最有象徵意義的奢華習慣，在戰時自由地區幾乎完全消失。在國共雙方的控制區裡，絲綢袍子逐漸被實用的棉布衣服取代。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產絲的地區當時全部都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生絲的產量下跌，而提供自由地區的貨源更是微不足道。

戰後中國已經不像戰前的社會那樣，受各地方勢力所分割。在辛亥革命之後極力阻撓全國統一局面出現的地方割據勢力，在抗戰期間被掃滅殆盡。地方利益隨著民眾在戰爭期間四處遷

徙，而受到掩蓋；遠離故鄉而居在抗戰時成為根深蒂固的習慣。戰爭結束時，中共根據地位處華北，但它的領導人幾乎全部來自南方。一度無法克服的地區差異，現在業已消失無蹤。

抗戰也使中共更容易採取強烈手段來追求其目標。這場戰爭導致暴力的普遍興起。人們習慣這種暴力作風，並且視其為某種稀鬆平常的事情，而不會感到離奇怪異。這種看待暴力態度的改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使得中共能從事於推動愈來愈激進、狂暴的政策；事情能以暴力解決，為人們所接受，這就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時，極其動盪的政治運動摧殘中國的情況。倖存者為了求生不顧一切的心態，讓人們在參加攻擊批鬥與他們不是極度親近的對象時，心理上更容易過得去。上述的這一切，在粗暴殘忍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最高峰；在文革的十年當中，人們處在政治動亂之下，相互殘殺，以一種暴力和解體的放縱無度，對付自己的家人、同事、還有朋友。到了這「迷失的十年」結束以後，在全體人民已經精疲力竭，並且一致同意之下，中國改頭換面，走上了一個全新的統治與經濟模式。

中國的現代化，看似是浮現於一九三〇年代，卻因為抗戰而受阻中斷。這種看法會得出一個簡單明瞭的事件先後順序，卻不是歷史的真相。在一九三〇年代已經排定進行的現代化進程，不是受到抗戰的阻礙，而是被這場戰爭所否定、抹煞。一九三〇年代在進行中的種種努力，比如法治的建立、教育的普及、政治的參與，以及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等，全部因為抗戰的緣故而中止放棄。由一九八〇年代開始的改革，並沒有回到一九三〇年代那個樂觀而開放的道路上。當局已經創造出一種和經濟領域緊密相聯、卻很少提及政治變革的現代化模式——換句

話說，就是經濟現代化加上社會主義的政治控制，或者叫做「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共可能在經濟路線上更改過方向，但是它絕不會大幅放鬆在政治領域上的極權統治。一九八二年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諸多權利與自由，當中包括言論與集會、財產、請願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宗教、投票、保有個人隱私、工作、以及休息等種種權利[20]。很少中國人會認為，上述各種保障已經付諸實施。

抗戰的遺緒至今仍然有其影響力。一場以抑制共產主義為名的侵略，到頭來造成中共的席捲全國。朝向建立一個更加自由的中國的各種努力，都隨著這場戰爭而宣告中止。直到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種種遺緒全都耗盡以前，抗戰必須被繼續當作是一場大浩劫[21]。

注釋

1 Michael Ondaatje, *Divisaero*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007), p.82.

2 Prasa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 253.

3 Susan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4 清初的前三位皇帝：康熙（一六七二至一七二二年在位）、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在位）、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在位），在現今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參見最近在倫敦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 in London）所舉辦的展覽：「康雍乾三朝盛世」（*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5 最為知名的當代武俠小說家是金庸，他本名查良鏞，曾擔任香港《明報》的總編輯。

6 在英文中，叫做Kungfu。

7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三九年底。它是最常被閱讀的「老三篇」之一，直到毛澤東思想在一九八〇年代逐漸消亡以前，一直在受到注目的排名上名列前茅。

8 參見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96), pp.2-5.

9 *Observer Magazine*, February 10, 2007, p.42.

10 日本的文部省有審核批准中學系統使用教科書的權力。在文部省通過的歷史教科書裡，對日本在亞洲各地造成的衝擊，都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

11 廣島和平紀念館網站首頁。

12 章紹嗣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頁1075-1080。

13 Thomas Gottschang and Diana Lary, *Swallows and Settl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14 Madeleine Thien, *Certainty*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007), pp. 302-303.

15 戴袁支，〈侵華日軍湖山村暴行證詞〉，收於《民國檔案》，二〇〇四年第三期，頁48-60。

16 趙薇後來在二〇〇六年演出以林語堂小說《京華煙雲》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她在劇中飾演姚木蘭一角。

17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nguin, 1998).

18 摘引自Geremie Barme, "Mirrors of history: on a Sino-Japanese moment and some antecedents," *Japan Focus* (May 4, 2005).

19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the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 317.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八二年），第三十四至第四十八條。

21 我非常感謝瑪莎・卡羅爾（Martha Carroll），和她對談使我獲益良多；她是一位最深思熟慮和深遠見解的全球觀察家。

巻尾語

抗戰結束後二十年，夏志清，這位文雅而敏於思索的文學學者，對於這場戰爭以及其與共產革命勝利之間的聯結，有以下這番見解：

> 自對日宣戰，經過了初期的愛國熱忱流露後，中國人民，不論身居內地或者淪陷區，吃盡了苦頭，都在那裡默默等待戰區以外的有利發展，將他們從敵人的桎梏裡解救出來。因為貧窮的煎熬，他們逐漸陷入失望的境地，如果不是完全絕望境地的話。他們對那些過去幫助中國人民度過種種歷史難關的精神價值，完全陌生了。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又貪汙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1]。

這番悲傷的陳述，出自一名飄零海外、流亡美國的人之手。山東的莫言則找到另一種方式，顯示出到頭來，這場戰爭裡的種種區分傾軋是多麼的徒勞、最後終歸於無用。他筆下描述一件一九八四年發生在高密的事件，對於戰爭的殘酷無情，而敵我之間毀滅性的對峙又是如此短暫，這是一次嚴酷的提醒。在死亡之中，之前生死相搏的敵人，沒有名姓地團結在一起；這些死者的身分，現在已經不可能確認了：

> 四十六年之後。那座埋葬著共產黨員、國民黨、普通百姓、日本軍人、皇協軍的白骨的「千人墳」，在一個大雷雨的夜晚，被雷電劈開墳頂，腐朽的骨殖拋灑出幾十米遠，雨水把那些骨頭洗得乾乾淨淨，白得全都十分嚴肅。那時候我正在家裡度暑假，聽到「千人墳」被劈開的消息，慌忙去看，……。
>
> 裂開的大墳周圍站著一些人，一個個面露恐怖之色。我擠進圈裡，看見了墳坑裡那些骨架，那些重見天日的骷髏。他們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誰是日本兵、誰是偽軍、誰是百姓，只怕省委書記也辨別不清了。各種頭蓋骨都是一個形狀，密密地擠在一個坑裡，完全平等地被同樣的雨水澆灌著。稀疏的雨點淒涼地敲打著青白的骷髏，發出入木三分的刻毒聲響[2]。

注釋

1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74. 譯按：引文據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320回譯。

2 莫言，《紅高粱》，卷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頁201-202。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作　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
譯　者—廖彥博
主　編—湯宗勳
特約編輯—吳致良
封面設計—Poulenc
行銷企劃—劉凱瑛
董事長
發行人—趙政岷
總編輯—余宜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定　價—新台幣四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 戴安娜・拉里 (Diana Lar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5.12　面；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232)

ISBN 978-957-13-6476-6 (平裝)

1.中日戰爭

628.5　　104025017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by DIANA LARY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6476-6
Printed in Taiwan